

赵永茂　李峰华　卢洁　著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63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

赵永茂　李峰华　卢洁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赵永茂等著。—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ISBN7-5035-0794-2

Ⅰ.毛…
Ⅱ.赵…
Ⅲ.①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②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Ⅳ.A841.6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90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7.20元

责任编辑　吉勇夫
封面设计　立　文
版式设计　张秀翘
责任校对　王洪霞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1）

　第一节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概况……………………………（3）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在国外传播和研究的基本特点…………（16）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国外兴起和发展的深刻原因………（23）

　第四节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启示……………………（31）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前苏联、东欧各国………………（39）

　第一节　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概况………………………………（39）

　第二节　传播和研究的主要内容………………………………（42）

　第三节　批判狂潮的缘起与内容概要…………………………（53）

　第四节　后否定时期对中国改革理论的关注与研究…………（63）

　第五节　成就与问题评析………………………………………（72）

　第六节　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85）

第三章　日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88）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其原因…………（88）

　第二节　日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成就………………（101）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的特点及其
　　　　　发展趋势………………………………………………（136）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研究……………（144）

　第一节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传播的概况………………………（144）

　第二节　欧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157）

　第三节　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191）

第五章　第三世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198）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发展的历史概况……（198）
第二节　第三世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问题和成就……（214）
第三节　第三世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 ………………（232）

第六章　商榷和对话 ……………………………………………（241）
第一节　关于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哲学家……………………（241）
第二节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体系和特点 …………（246）
第三节　关于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 ……………………（253）
第四节　关于毛泽东的矛盾理论的一些问题 …………………（266）
第五节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问题 ……………………（280）

附录　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书目文献索引 ………………（294）
一、著作 …………………………………………………………（294）
二、文章 …………………………………………………………（318）

结束语 ……………………………………………………………（360）

第一章
导论

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这是40年代初一位外国记者对毛泽东的判断和印象。这一判断和印象已经被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并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跨世纪改革开放大潮中增添新的光彩。

作为世纪伟人，毛泽东已被载入中华民族英雄的史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生机；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毛泽东及其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以超越时空的能量、独树一帜的风格，在世界传播，影响全球。“毛泽东现象”已不独属于中国。所以，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80年代仍然说，尽管毛泽东有过失，但毛泽东是20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中。”

史料表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由共产国际用俄文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使毛泽东的名字和智慧被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瞩目。从那时起，毛泽东及其思想以它自身的力量向世界证明中国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开始让世界了解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是怎样为生存、为光明而战。今天，当毛泽东的名字被光荣地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时刻，我们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世界意义，不仅仅在于世界各个角落都熟知毛泽东的名字；重要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开

创了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同时，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方法论，机动灵活、决胜千里的军事领导艺术，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战略，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体的诗词书法，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以外的世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教育薰陶了中国几代人，也在国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伟人风范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极富感染力的历史性话题。在90年代一位美国学者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已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工作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封闭式的研究方法和"概论"式的研究模式；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近50年来对毛泽东研究的成果而忽略毛泽东研究的世界性。如果我们把研究视角再放宽一些，面向世界就会看到凡是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研究的机构、学者，无不涉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已不能不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与探究；其研究专著洋洋数十万言，一本本，一卷卷，已成为国内出版界百万印数的"畅销书"。因此，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情况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强深入全面的研究，已成为一项具有开拓性的课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一书试图以有限的篇幅，承担起这一课题；以全面扎实的工作，提供一部集国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的概述介绍、评价研究于一体的专著。希望能够为拓宽和加深毛泽东哲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作一次有益的尝试与积累。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一书的编著宗旨是立足于国内毛泽东哲学研究50年的成果，运用"知己知彼"开放研究的方法，吸收研究世界范围内有关毛泽东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

在地理上，以前苏联东欧、日本、欧美及第三世界国家为基本单位展开；在逻辑上，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世界各地传播发展的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为基本结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遵循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力求将资料介绍与分析相结合，将对国外学者理论观点的系统研究与商榷对话相结合；由此挖掘出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纠正值得他们克服的方面。以加强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使毛泽东哲学研究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当毛泽东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可以预见，世界将以十分的热情向这位历史巨人致以深深的敬意；不仅如此，新一轮的“毛泽东热”将逐渐“升温”。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外的知名学者们都在尽其所能编撰“毛泽东全集”，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当以远见拓宽视野，明智而认真地对待毛泽东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站在世界精神文明的高度，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从一个新的角度再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风骨和面貌。

第一节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概况

一、毛泽东思想在国外传播的时空效应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驰名于世，毛泽东思想作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传播于世。目前，一般的研究都以埃德加·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为标志，说明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传播的起点。但有史料证明，早在2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就在国外有所传播。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上也刊登了这篇论文，并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说明：“在迄今为止介绍中

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高度赞赏这篇报告“字字精炼，耐人寻味。”①可见，从那时起，毛泽东的名字和著作已开始向中国以外的世界传播。如果从20年代中期算起，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历史大致可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第二阶段，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即从毛泽东逝世至今）。上述划分的根据来自于对每个阶段历史资料的研究。

在第一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著作、文章的关注与宣传，客观上造成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传播的机会和条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曾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10余篇著作的重要内容；1934年8月出版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毛泽东文集”；1935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上，署名赫的作者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情况，对毛泽东评价很高。1936年2月《共产国际》杂志在“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领导人”专栏中，刊登了“毛泽东——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一文，向世界介绍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这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传播的前奏。

然而，第一个向世界全面公正的报道、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毛泽东个人生平及思想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6年6月只身由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首都保安。他先后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进行多次采访与谈话，搜集了有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采写了30多篇通讯，拍摄了70多幅照片，先后发表在上海、美国的报刊

---

① （日）《历史学研究》杂志，1973年11月第402期。

上，引起世界轰动。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第一年就再版5次，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畅销书之一。斯诺用真实可靠的材料，打破了国民党的10年封锁，生动刻划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像，介绍了红军战士的战斗生活。毛泽东曾评价这本书"是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已成为国外研究中国、研究毛泽东的首选经典参考书，斯诺采访毛泽东的第一手记录以及后来四次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的会谈内容，不仅是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宝贵资料，也从另一侧面提供了国内研究包括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依据。因此，是斯诺使毛泽东这颗东方巨星闪烁于世界上空，尽显其"东方魅力"。在此意义上，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为毛泽东及其思想走向世界架起第一座桥。斯诺以他一生的亲身实践和辛勤笔耕，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特别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①

071232

除斯诺之外，当时有一批外国记者深入延安和解放区，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并有机会亲自采访毛泽东。他们以亲身感受迅速地向国际社会报道了毛泽东的风采和思想。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944年6月曾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6月12日接见了记者参观团。爱泼斯坦1945年9月2日在纽约《下午报》上撰文《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生动而客观地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我认为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美国记者福尔曼1945年在美

① 斯诺一生著述彼半，他留下的十余本专著都与中国问题有关。目前已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斯诺文集》4卷，百余万字，他后期著作有许多未译成中文。他于1928年到中国，长住13年后返美，又于1939年、1942—1943年、1964—1965年、1970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毛泽东亦把他视为"知己"，可以"无话不谈"。他死后遗嘱将骨灰的一半埋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他以访问毛泽东的经历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一开始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写道：“出人意料地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更不是一切智慧与指挥的唯一泉源。他的话也不是出口就变成法律。的确，毛泽东的思想与指示在树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毛泽东思想与建议只不过是中共领导者委员会的讨论的基础及最后的准绳而已。所以毛泽东所要出版的东西第一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然后再经过党员的研究才能出版。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终形式都是共产党委员们的综合表现，总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

英国《新闻纪事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斯坦因，1945年在延安期间曾几次采访毛泽东，写成《毛泽东会见记》长篇报道。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1945年9月27日在重庆采访了毛泽东，因此有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的谈话。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8月开始在延安几次访问毛泽东，她将访问记录发表在1947年10月10日的苏联文学报上。她同毛泽东的谈话最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斯特朗继斯诺之后，比较完整地向世界宣传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另外，1946年9月29日，美国记者斯蒂尔也曾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发表了《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的谈话，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总之，从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除共产国际的支持主要得力于一批外国进步记者的宣传报道。因为这一时期抗日与反对内战的斗争十分艰苦，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封锁，毛泽东著作不可能在全国发行，更不易输出国外。尽管到1948年各个革命根据地已有五个系统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但向国外的发行传播是极少的。可能只有香港新民主书店重印的晋察冀日报社的“毛选”版本。根据资料研究，当时还有一途径扩大了毛泽东在世界的广泛影响，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捷克举行的国际学联世

界青年节大会。根据与会代表张凡记叙说："毛主席的巨像悬在中国展览会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巡礼中认识了他，展览品的解释并且告诉了他们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奇迹和胜利。在青年节大会的闭幕典礼中，大家对他再不陌生了。……我们把许多毛主席的胸章通过开会、娱乐与其它日常的接触，送给了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青年。从换回来的纪念章来看，毛主席已经在全世界青年的心坎里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从斗争着的东方民族到民主的东欧，从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洲和南美。"可以说，这次国际性青年盛会使世界各国青年生动直观地认识了毛泽东和中国。在毛泽东及其思想传播史上值得重视。

第二阶段，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引起世界关注，毛泽东著作随新中国建立在世界各国得以广泛传播和初步研究。早在1948年，前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已开始把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5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提出编译《毛泽东选集》的建议，并答应派一位理论专家帮助完成此项工作。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到中国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译指导工作。5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责成师哲和费德林建立和组织中译俄的工作。尤金7月到中国，于1951年1月上旬回国，又于7月下旬至10月下旬再次应邀来华。这期间，他对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极为推崇，他要求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寄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已定稿的《实践论》提前发表。毛泽东同意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被全文刊登在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随后，苏《真理报》于1950年12月18日转载，并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矛盾论》也

于1952年首先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第9、11期），“两论”在苏首先发表，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50年代之后，《毛泽东选集》陆续在国内出版。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发表了第1卷内容介绍。随后，第2卷于1952年4月出版；第3卷于1953年4月出版；第4卷于1960年9月出版。同时，国内开始着手翻译《毛泽东选集》，以多种外文版的发行为内容。北京外文出版社承担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发行国外的工作。向外发行的文种有英、法、俄、西、日、德、阿等，到1960年出版第1—4卷；1977年出版第5卷；同时，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几十篇外译发行。由此，为海外毛泽东研究、宣传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条件。

在国外，《毛泽东选集》和单行本的译文版早于国内的译文版。当时，《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文版一出，英共、法共、日共和美国有关研究机构，都马上组织翻译成本国文字并很快出版。日本1952年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日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一次发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达7000册，一个月内被争购一空。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从60年代起，挪威、瑞典、希腊、芬兰先后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由于第5卷的中英文版本同时向外发行，故其在国外的影响更大。在亚、非、拉美各国，毛泽东著作亦广泛传播。1956年，缅甸黄林出版社已出版了3卷《毛泽东选集》；1958年，印度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4年，古巴出版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唯心史观的破产》；1965年，斯里兰卡出版了毛泽东3篇哲学著作。总之，第二阶段中，由于《毛泽东选集》第1—4卷的正式出版，以及斯大林的支持、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响应，中国自身的努力宣传，使毛泽东思想以比较完整、系统的面貌向世界传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此时，国内亦开始集中力量宣传、研究毛泽东著

作，主要以通俗化的解说，研究为特点，重点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第三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推向极端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被神化，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陷入教条化、僵化境地。林彪借“红宝书”制造“红海洋”，也使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国外的传播烙有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首先，在国内，根据1967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毛泽东选集》今年出版8640多万部，《毛主席语录》出版3.5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4750多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5700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其次，在国外，《毛泽东选集》和单行本的印数发行亦直线上升。原联邦德国一家出版公司，从1966年到1974年曾7次再版《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一书，总印数达104000册。1977年美国旧金山的中国书店一次就订购《毛泽东选集》第5卷12000册，当天就售出400余册。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发行量，到1963年已达10万余册。再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红卫兵组织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简称“万岁”本），亦在海外广为流传，并日益受到国外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其影响与日俱增。根据研究，目前在国外流传着三个标题相同的“万岁”版本：一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未注明出版者和日期），此为第一版本；二是《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此为第二版本；三是《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此为第三版本。第一版本被全文译出刊载于《当代背景》① 第891号上，还被收译在陈志让主编的《毛：伟大的生平评价》② 和《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③ 上。第二、三版本在1973年夏由台北国际关系学院制成

---

① Current Background（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Kong Press）。

② 新泽西，普林梯斯·霍尔公司1969年出版。

③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

照片透印本发行，美国的有关机构马上有英译本出版，名为《毛泽东思想杂集》①。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二本书都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当代事件最为重要的原始文件。”他特别指出，长达七百多页的1969年版本具有更突出的价值，其中包括了从50年代中期直至60年代后期毛泽东尚未公开的大量讲话和文章。1967年的版本包含了1959—1961年的材料，其中一些已见于别处，但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的一系列讲话则是前所未闻的。②麦克法夸尔在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时，曾大量地参考引用了这些讲话和文章内容。1991年，麦氏访问中国，拜会金春明教授，探讨《文化大革命起源》第3卷的有关问题，他赠送了《毛泽东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一书，其中材料多取自于“万岁”版本，他仍然认为这些材料可信，理由有二点：一是当时中国人以个人崇拜的心理编辑毛泽东文献，不会擅自改动，只会保持文献原貌；二是资料来源可靠。可见，“万岁”本虽非官方发行，非官方传播，但在国外已被承认和利用，特别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后期思想以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资料。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红卫兵组织编辑的各种毛主席语录，③也为国外有关机构广为收集和流传。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阶段，毛泽东著作和思想、毛泽东个人的声望在国际社会以多种的形式传播。客观上扩大了毛泽东与中国的影响，但也使毛泽东思想宣传学习的教条化传到国外，正如罗斯•特里尔形容的“毛主席”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用语，《语录》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0年代使得《圣经》也相形见绌。甚至孔夫子和他的学说也从未这样广泛地流传

① 弗吉尼亚，美国联合出版公司1973年出版。
② 参见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起源》第1卷，第526页。
③ 据材料介绍有：《毛主席教育语录》《毛主席论文艺语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最高指示》等。

过。①

在第四阶段，毛泽东逝世后，经过二年的徘徊，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使毛泽东研究进入科学务实的阶段。也使国外毛泽东研究逐步摆脱倾向性，进行理性的反思与评价。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首先，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国内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要力量，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毛泽东选集、文集或文选。作一简略统计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军事思想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0种约500多万字。这些第一手研究资料，除内部发行外，都向国外发行。这无疑为国外学者重新全面认识与研究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可靠基础。其次，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破除禁区，从新角度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业绩，出版了一大批纪实性毛泽东传记；一批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过的作者，向社会塑造了活生生的毛泽东领袖与凡人的形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特别为国外研究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学者所重视。另外，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前，中央文献室正组织力量，集中编撰大型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届时，将对国外毛泽东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次，以上述二点为基础，为能够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国外一大批学者不满足于翻译中国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组织地编辑出版不同语种和类型的毛泽东文集。主要版本包括英、日、德、意等语种。最早的英文版本是由鲍德·考普顿编译，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的《毛的中国——1942至1944年整风文献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其

① 参见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跋。

他英文版本计有：陈志让编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初版的《毛的论文：1957年后的著作和讲话》；施拉姆主编，美国神殿图书公司1974年出版的《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1956年—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享利·戴编译注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1975年出版的《毛泽东1917至1927年的文献》；麦克法夸尔等3人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收入毛泽东1957年至1958年的讲话、谈话和文件共19篇，全书正文523页，被列为"哈佛当代中国丛书"第6种；由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共23卷，计5500页，是英文版本中资料容量最大的一种。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竹内实主编，东京苍苍社1983年至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集》2版10卷本和《毛泽东集补卷》10卷本，共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7万字；是国外学者编辑的收篇最多，编辑最系统的一个日本中文版本。德文版本当属赫尔穆特·马丁教授编辑小组编辑、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7卷本，收编了毛泽东从1949年至1976年间的著作，约4500页；是在日本中文版20卷《毛泽东集》未出版前最有参考价值的一个版本。意大利文版本是乔治·曼提奇编译、意大利罗马吕蒂尼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湘江的沉思》，是毛泽东早年在四期《湘江评论》上所写文章的意译本。

此外，为弥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文献研究出版的新材料，美国布朗大学高英茂教授正在组织编辑《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作集》；施拉姆从伦敦大学东非研究院退休后，返回哈佛研究中心，也在组织编辑《毛之后》的系列论丛。施拉姆在1984年就讲过："毛的文献虽然不再如洪流般的涌现，但也没有变成涓涓细流，而且今天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将再次增多。"① 看

① 参见施拉姆：《毛泽东思想研究：回忆和展望》，《中国季刊》1984年3月号。

来，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将迎来海内外毛泽东研究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将在新起点上引起世人关注与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传播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其久远深刻的时空效应。

二、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动态趋向

在毛泽东及其著作、思想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国的基础上，毛泽东研究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课题。从总体上考察，毛泽东研究机构已遍布世界，毛泽东研究的外国学者日益增多；毛泽东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目前，在欧美、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包括香港地区，都建有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像久负盛名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又称费正清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日本大阪室冢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还有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在这里培养集聚了一大批专心于现代中国问题、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专家学者，他们其中大多数终身致力于中国和毛泽东研究，成为各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像著名的费正清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施瓦茨（又译许华茨，曾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麦克法夸尔（现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美友好协会会长）、施拉姆（原英国伦敦大学东非学院教授、现退休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竹内实（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教授）、近藤邦康（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泰韦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陈志让（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金思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在美国文科集中的大学里，像加州大学伯克利中心的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大学政治系等地都有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教授。由此可见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实力状况。

在这些著名学者周围，由于占有资料、研究方法的不同，加

之立场观点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研究学派；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国内毛泽东研究专业刊物上，10年内译载论文200余篇；国外仅《中国季刊》一家自1979年至1989年刊载毛泽东研究文章约50篇；从研究专著看，目前国外“中国学”研究专著约有2000余册，其中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专著占1/4多，约500余册；其中，日本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学院1983年向中央党校一次赠书44册，全部是有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专著。由于国内对这方面的图书收藏工作刚起步，目前就北京图书馆所藏有关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专著也是有限的。

上述研究成果中，学术价值及影响较大的大致如下：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1951年版、曾7次印刷)；松村一人：《辩证法的发展—以〈矛盾论〉为中心》(1953)；金思恺：《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1976)；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1978)；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64)；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1965)；施拉姆：《毛泽东》(1966)、《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7)、《毛泽东：初步再评价》(1977)、《毛泽东思想》(1989)；新岛淳良：《毛泽东的哲学》(1966)、《毛泽东的思想》(1968)；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960)、《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1979，1983)；威尔逊：《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1977)；汉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论》(1977)；阿维克恩：《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上、下册1979)；布尔拉茨基：《毛泽东及其继承人》(1980)；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1982)；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1984)；舍弗尔：《毛泽东思想导论》(1987)维克曼：《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1976)；特里尔：《毛泽东传》(1989)。这些专著有一半已译成中文出版，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现状和观点提供了方便，也使学术交流和

商榷成为可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外毛泽东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强烈反响。有识之士很快抛弃了中国在搞“非毛化”的观点，重新调整毛泽东研究的格局，并很快打破了中外学者毛泽东研究“背对背”的局面，开始互访进行学术交流。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接待了施拉姆率队的中国问题研究代表团，其中有迈斯纳、弗里德曼、特里尔等教授；在最近几年，施拉姆多次访华，在北京、上海同有关毛泽东研究机构和专家座谈讨论、交流；1989年施拉姆特别为上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撰稿，题为“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近藤邦康教授1990年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沙；特里尔教授于1990年6月、9月二次来华工作访问，并就《毛泽东传》一书中译本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麦克法夸尔于1990年来访，与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就《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时，中国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也被邀请到哈佛中心讲学；1986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黄卫平、卢锋以研究者身份参加了在意大利乌日比诺市召开的“毛泽东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了大会发言，这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跻身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国际性讲坛。

综上情况说明，世界性毛泽东研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一门学问。尽管各国学者研究视角不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挖掘概括各具特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难免有空泛不实之作；但由此呈现的灵活多样的开放性研究态势，为毛泽东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使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理性宣传，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客观上使毛泽东研究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可以确信，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将以东道主身份主持

召开大型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把毛泽东研究推向历史的新阶段。毛泽东研究将随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迅速发展而日益增强其国际性，国外毛泽东研究会继续保持动态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断深化和提高。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在国外传播和研究的基本特点

一、传播和研究的阶段性特点

纵观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传播、研究的历史，从时空角度讲，形成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各具特点。

（一）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属于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传播的准备阶段或认识阶段。埃德加·斯诺的客观介绍，共产国际的客观报道具有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

（二）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属于毛泽东思想在国外开始传播和初步研究阶段。斯大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60年代后，由于政治原因，也是苏联最先否定和批判毛泽东思想；在另一方面，西欧、美国、日本的毛泽东研究逐步兴起，日益显露出不同的观点和派别。如法共、意共、日共对毛泽东思想持肯定接受态度；美国则出现学者之间的第一次论战，形成了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第三世界各国则从60年代开始重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政界军界影响很大。

（三）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10年，属于国外“毛泽东热”阶段。由于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日共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围绕毛泽东思想展开激烈争论，日本青年学生则在“新左翼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其规模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在法国也出现类似情况。在美国则出现第

二次论战，形成“自由派”与“左派”的争论；在第三世界，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前苏联东欧各国则加紧“批毛”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四）自1976年至今，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再评价和深化研究阶段。国外“毛泽东热”逐步降温，各国学者开始在困惑中反思：日本学者放弃盲从，开始埋头搜集资料，做好研究的基础工作；欧美学者中“自由派”力量已占上风，集中人力和资金，力求深入客观研究取得成果；前苏联也由批判转向缓和对话，重新开始中国问题（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上述阶段性特点的形成与中国国内毛泽东研究和宣传的阶段性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国内的倾向性宣传与研究影响着国外的研究发展。

二、传播和研究内涵的特点

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传播和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基本研究资料的建设，传播与研究格局的确立，也包括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因此具有区别于国内研究的诸多特点。

（一）十分重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辨伪、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

首先，日本和欧美的有关机构，从40年代中期就开始此项工作。他们不惜重金和人力搜集购买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各个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从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到建国后公开出版的所有毛泽东文献（包括一些内部发行的文稿），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战报，《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等；从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到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中文出版物。根据资料介绍，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10年间，美国仅用于中国研究的费用就超过7000万美元（有人估计达1亿美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用于中文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出版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料、目录。因此，使藏有这些资料的馆、所

成为研究中国与毛泽东的中心，像著名的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在这里可以找到近乎完整的中国问题各方面研究资料。

其次，在充分利用资料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原始资料的辨伪考证和编辑出版工作。国外学者视此为研究的基础性任务。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中文资料中一丝不苟地挖掘、辨伪进而研究，如麦克法夸尔为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跑遍世界各地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馆、所，甚至他的孩子们都学会了如何装订《人民日报》；施拉姆认真与中国学者讨论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各种版本的源流，特意把1936年7月23日斯诺在保安与毛泽东谈话的一部分，题为《特殊问题》的谈话记录打字稿复印件提供给中国，并就《基本战术》的作者是不是毛泽东而同中国学者商讨、辨伪；国外学者还注重对毛泽东一系列文章的“原本”与“今本”对照研究，倾向于用“原本”的材料分析理解毛泽东思想；如近藤邦康主张，为了思想的研究，需要把革命时期发表的原文对照《毛泽东选集》研讨毛泽东从革命到国家的思想变化，把“经”还原为“史”。① 在此基础上，国外学术研究机构对毛泽东思想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其编辑质量、出版速度都令人叹服。重视原始资料建设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特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二）十分重视研究毛泽东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即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思想家、军事家，进而侧重于对毛泽东个人成长道路、思想发展的历史、理论特征及来源作深入探讨研究。

施拉姆就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三种内涵：一是毛泽东个人一生所想的；二是解放后修改好在《毛泽东选集》或另外的小册子或书中公开发表的著作内容；三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1990年第4期，第77页。

的科学体系，即“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倾向于研究毛泽东个人的思想①，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具体讲，第一，注重毛泽东个人生平业绩的传记性研究，把毛泽东置于中国现代革命的大背景下，深入探索毛泽东的个性与成长道路，反映活生生的毛泽东人生和思想。这方面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范本，施拉姆的《毛泽东》、阿维克恩的《毛泽东的不朽贡献》、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第二，对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注重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涉猎不多；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经济方面是“外行”，没什么重要思想。第三，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进程的发展，注重从思想史、政治史、党史角度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从宏观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构，从微观上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实质。第四，在断代思想史研究方面，重视早期思想的挖掘研究，敢于探索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内容，先于国内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施拉姆曾提出毛泽东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时期在“延安时代和五十年代。”《中国季刊》1986年设专刊系列文章反思评价“文化大革命”，1987年5月15日至17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专题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中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知名学者共37人，3天共开了10次会，专家们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探讨，涉及政治、思想、经济、对外政策、文化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其中有三篇专谈毛泽东晚年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目前，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标志着国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最系统水平。

---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1989年第4期，施拉姆：“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经验。”

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侧重点恰好与国内的研究重点形成互补，故应该加强学术交流，完善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总体性研究。

（三）十分重视毛泽东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比较方法为主，展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一大特点。

第一，进行比较研究是欧美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首先，在横向的比较中，寻找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同，例如，施瓦茨提出的“毛主义异端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是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它只是名义上而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共同点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同点是毛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基础或“革命先锋”，重视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作用，创造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其次，在纵向比较中，追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对其思想形成的作用很大。如英国学者怀利指出，儒家文化的薰陶，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带有社会伦理哲学的色彩，而且更体现了一种正统的国家观念。”杰克·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是儒家思想，毛泽东从中国传统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材料。”施拉姆则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刻有传统文化的深入印记”。因此“自由派”中多数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此外，毛泽东逝世后，一批学者又向下追溯，重视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思想的比较研究，如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加德纳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

再次，在交叉比较中，把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置于多学科、多领域。对毛泽东思想既与同时代的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

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又与卢卡奇、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的思想进行比较；同时又与韦伯的组织理论、俄国民粹派思想进行比较；一个基本思想是强调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理论同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相一致。而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毛泽东强调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知识分子的“新左派”。

运用上述比较研究的方法，便国外学者研究视野开阔，在小题目上可以做大文章。同时，运用比较方法，也有为比较而比较的倾向，往往夸大或忽略了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客观内容。这是国内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时需注意的问题。

第二，重视比较方法并不排斥运用其它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在各自的研究经验积累中，总结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一文中对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中总结的三种方法予以肯定，又补充了两种方法。

一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连续性的方法。以这种方法研究认为“毛泽东的青年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连续性比非连续性或发展更为重要，”因而把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被韦克曼所用，施拉姆也部分地使用这种方法，他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非连续性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有连续性的。

二是“还原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强调连续性，但不是从思想观点的角度来研究，而是从心理角度来研究。所罗门撰写《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采用的是此种方法。

三是非连续性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努力把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和早期思想及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区分开来，然后对各时期的思想加以评价研究。施拉姆在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中倾向于这种方法，但不是绝对运用这一种方法。

四是“反映综合法”。这是弗朗西斯·苏在研究毛泽东辩证法

思想时运用的独特方法。这个方法运用了思考、理解、回想、反映、直观、分析、提炼、推理和综合等思维活动，其中以“理解”、“分析”、“综合”、“提炼整理”和“评价”为重要步骤展开。弗朗西斯·苏认为，“理解”就是要正确地感知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在理解过程中要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力求达到全面掌握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还必须把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原则组织成系统的哲学结构，即进行提炼整理；最后一步是进行评价，采用“质量方法”，避免“数量方法”；因为“数量方法”容易过分强调数据和统计资料，容易机械地使用引语，容易根据老一套的范例或概念做出武断的结论。“质量方法”则注意思想的实质内涵和特定的历史场合，能够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进行客观深刻的评价。弗朗西斯·苏运用“反映综合法”写出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西方学术界高度评价此书是在比较文化分析领域里一项真正的成就，“它对了解毛泽东，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对当代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有所裨益。”①

五是斯塔尔的“定态性研究方法”。他用此方法探求毛泽东思想中固定的、不随时间的推移变化而发展的东西，并根据这点解释毛泽东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斯塔尔在《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一书中认为，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毛的“理论遗产”中，最主要的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施拉姆对此评价说，斯塔尔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具有非历史的性质，因而导致他孤立静止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就不能真正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贯穿始终的“实质性要素。”

对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应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以丰富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工具”。

---

①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中译本，第2页。

（四）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十分注重毛泽东哲学军事思想的学习和运用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民族解放和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经验对其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指南如饥似渴地学习，并领导了各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这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传播中独树一帜，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其独具的特色，对这一特点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重国外毛泽东研究、传播的基本特点，可以比较国内研究的特点，寻找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筛选出优点与缺点或弱点。以此拓宽研究视野，优化研究方法，加强合作，取得毛泽东研究的新成果。可以确信，“毛泽东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思想文化现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国外兴起和发展的深刻原因

1964年，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博爱德讲了一番寓意深刻的话，他说，“对中国的了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要求，这一要求日益迫近。”这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研究在国外何以形成趋势的内在原因。那么，如何了解中国？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一位美国学者从宏观上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其革命目标（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最好是研究那些制定这些目标的领导人……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①

① 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序言。

他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研究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并造就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才能真正认识中国。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客观需要与毛泽东同中国的内在逻辑联系，奠定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深入研究的客观场景。通过这种内在需要的条件，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毛泽东研究在国外兴起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刻原因。

一、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战略地位，必然引起世界的关注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走向民族解放独立、由贫弱落后走向繁荣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深刻的影响和震动。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其人口占世界1/4，地理版图居世界第三的泱泱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客观的政治战略地位。建国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封锁政策，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文化大革命”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足发展。当邓小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讲坛发表讲话时，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已经得到公认，封锁政策宣告失败。特别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又一次冲击了全世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中国将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再展雄风。因此，中国愈来愈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谁忽略中国的存在谁就会犯战略性错误。对此费正清在1968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说《70年代的任务》中就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就因为它不了解亚洲，执行了错误的政策。他强调“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问题，需要特殊对待。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相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战略策略上的考虑，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机构开始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把资金优先放在“中国学”研究上，“把

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的事业”。因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成为世界性“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理由很简单，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要了解新中国必须首先了解毛泽东。

铁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又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格局。可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将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着力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个常设常新的国际性课题。

二、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革命事业中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以及在新时期改革事业中的胆略与成就，对世界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

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会关注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不平凡道路，都会向中国共产党的英雄群像致敬；在其中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是首席。因此，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是其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他在党的创建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他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已经成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们所描写的英雄群像都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作为党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的地位作用。斯诺30年代在延安时就发现：“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这些政策很可能

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① 斯诺是有记者的敏锐与洞察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同时，新中国在发展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与失败教训也同样烙有毛泽东的深刻印记。所以，无论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过去与现在、成功与失败，都必须首先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完整内容。特别是要了解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国策，也必须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有明确的认识，必须以历史的连续性思想方法认识问题。总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必然伴随中国共产党的业绩而首先被世界承认，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首先研究毛泽东。

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思想文化宝藏，蕴含了东方文化深邃神秘的品格与博大精深的内容，对世界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近10年间，国外学界不断兴起的“孙子兵法热”、“孔子热”、“周易热”表明，国外学者努力追寻中国的思想文化之根，目的显然是为了“古为今用”，更明晰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所以才有学者以《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逻辑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关系。因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来自于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讲，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与发展。斯诺讲的很确切：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家、哲学家；特里尔也认为：“作为能够提出一种学说的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历代君王。也许我们应该将他与孔夫子以及其它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的圣贤们并列。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这些圣

① 《斯诺文集》第Ⅱ卷，第65－72页。

贤还要高出一筹。"所以，深入考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研究毛泽东批判继承改造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文化，形成现代思想文化主流的实质内容，是国外学者努力尝试的一个领域。随着东方思想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示出的作用，这个领域会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研究者。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根植于深厚传统文化的现代思想体系，作为一种能够重振民族精神、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引起世界的瞩目。

四、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结合的成就，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尊重与肯定，进而传播与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直接孕育了毛泽东思想，而它产生发展的内在契机是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与建设道路；毛泽东以他务实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为20世纪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仍源于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

首先，无论是西方的进步学者还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都承认毛泽东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自由派"的"异端论"，还是"左派"的"发展论"，都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创办的《方针报》1966年5月第一期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体现着在亚洲最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斗争普遍化时期的马列主义的发展阶段。"日本的松村一人教授认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国际的意义。"①

① 〔日〕《思想》杂志1952年。

其次，世界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特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一致公认毛泽东是20世纪的世界性人物，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与世界的影响予以高度评价。

施拉姆教授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人物。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对他的评价如果用通常对世界性人物的评价来估量是远为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领导中国人民恢复了国际地位，领导九亿中国人进行国内的现代化事业，而且还由于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无愧于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流的实践家和革新家之一——这是在西方传统以外的国家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特里尔认为"毛成为本世纪国际政坛上的巨人之一，如果谈到他的全部影响，只有罗斯福、列宁可以和他相比……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仅仅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支插曲，他重建了中国社会。他是与中国的革命融为一体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①

杨振宁博士以科学家的语言精辟地讲："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②可见，毛泽东英雄史诗般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力量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

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直接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等，在

---

① 特里尔：《毛泽东传》跋。

② 杨振宁：《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第三世界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他们盛赞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人物，这正是他的力量之源泉”；“毛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人物来使他的思想具有全球性”，他在非洲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也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真实性”。①毛泽东在非洲人民的心目中“象征着自由，他通过自己的思想为非洲提供了一条发展经济或改变思想的新道路。”②因此，毛泽东的著作在第三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毛泽东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那些与中国独立前政治、经济结构相似的许多国家提供了学习的范例；“三个世界”理论成为不发达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抗暴自强，发展自我的精神法宝。毛泽东和中国永远给第三世界的发展以鼓舞和支持。

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格外引起世界注目

首先，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和观点争论，出现了以苏联东欧为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中国的政治批判与经济制裁，中苏之间的白热化论战，无疑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注意，使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得以广泛宣传，这成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兴起的重要政治动因。因此，毛泽东及其思想尽管在当时的苏联、东欧各国受到冷遇，但在世界上总的传播、研究趋势并未减弱。相反，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指导思想。如比利时共产党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纪念馆里，陈列着毛泽东在延安讲哲学时的照片；还有列宁的一幅。美国十月同盟主席迈克尔·克朗基肯定“毛泽东的思想有超出中国国界以外的伟大国际意

①②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人民出版社，第306—313页。

义。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帮助奠定了我们运动的思想基础。”① 在撰文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之际、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号召全党开展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并强调当前着重学好毛泽东的哲学著作。②

其次，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面对社会主义命运前途的挑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认真吸取和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抓紧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速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愈加显示出发展与繁荣的内在潜力。这样做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仍然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共同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其中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因此，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世界又一次震动，中华民族的经济腾飞将再次有力地改变世界格局，这不能不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研究。特别在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将掀起新一轮大潮，已经得到世界的极大反响。同时，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将是一个极有现实性的课题。可以预见在和平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中国将以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基于上述种种深刻的原因，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兴盛与发展已成必然。这并不象国内外一些人所说的：毛泽东的世界性影响是由于我们进行宣传的结果。历史事实表明，正是由于世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确认，“对毛泽东给予巨大的信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巨大的信任，才有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广

---

①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人民出版社，第81—110页。

② 参见1986年5月26日《理论信息报》。

泛传播与研究。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愈加具有世界意义。毛泽东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将成为内涵丰富的永久性课题。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位世界性历史人物，他将永远活在历史的长河中。

第四节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启示

认真回顾、认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现状及发展的趋向，使我们在宏观上更加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增强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紧迫感，争取掌握毛泽东研究的主动权；在微观上，能够有目的吸收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内容；克服自身研究中的问题，加强研究的针对性；以开拓毛泽东研究新领域，提高国内的总体研究水平。因此，从国外毛泽东研究这个领域，可以获得几点重要启示。

一、解放思想，克服自居观念

如果说国内毛泽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缺乏深入的横向交流，仍局限于封闭式的“手工作坊”研究框架里，那么，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情况的了解和评价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没有重视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介绍，这一方面由于国内毛泽东研究力量和学科所限，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由于“自居”观念人为造成的一种封闭状态。“自居”观念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小农经济的观念形态；改革开放的实践首先从经济上破除了“自居”观念，但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仍有影响。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上，“自居”观念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只能产生在德国、俄国和中国，因为这是他们的故乡。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辩证法的观念。在这种错误思想方法支配下，曾出现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使一些人根本不重视当时俄国革命的经验，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后来又有一些人不重视中国革命的经验，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在如何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曾存在二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一是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现为僵化的“左”的倾向；一是“非毛化”观点，表现为“全盘西化”的右的倾向。由传统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形成的封闭性研究状态，既限制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视野，也阻塞了人们发展真理的道路。因此，要解放思想，加强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另方面则要以远见开拓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通过全面认真地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概况与内容，能够解决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真正克服“自居”观念，纠正“国外的研究一概不可信”的妄自尊大说法；也能避免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而能够在一种开放的系统和状态中，解放思想，遵循“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发展”的原则，树立全面、历史、开放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做到这一点，才能结合实际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具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启示之一。

二、迎接挑战，寻求发展，增加危机感

20世纪自然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飞跃，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的逐步推广，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不仅在地理上“天涯若比邻”，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强化，世界一体化进程由于这种联系而有所局部性发展，如欧洲一体化，亚洲环太平洋国家的合作等等。它要求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局限于一城一池一地，而必须有全球战略意识。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科学的思

想方法论，用以观察世界和审视自己。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则表现的更为直接和突出。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不同意识形态观念学者间的交流，使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产生的新理论、新成果，会很快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共有的精神产品；同时，一种科学理论也可以在另外的地区和国家得以深入研究和应用，以至于超过产生它的国度。中国的四大发明构成西方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因素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如果产生一种科学理论的故乡发生了意外，诸如战争或动乱，那么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们不仅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甚至在总体上超过它故乡的研究；诸如马克思主义在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胜利，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胜利。上述表明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日益强化这一规律的作用。由此考虑到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能认为毛泽东故乡的人们没有向国外学习的东西。恰恰相反，在毛泽东研究的大环境中，我们面临着挑战。客观上要求我们要打破封闭积习，面向世界与未来研究毛泽东；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应该研究了解新情况，在危机感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始终把握毛泽东研究的主动权。这是启示之二。

三、借鉴吸收合理因素，完善提高研究水平，拓宽研究领域

通过全面考察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传播和研究的成果，值得国内研究借鉴学习的东西是多方面的。第一，在宏观研究态度上，国外一些著名学者主张以客观的历史主义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遗产。他们因此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注重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当中国国内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任意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倾向时，这些学者也未轻易放弃自己的研究结论和观点。象施拉姆、麦克法夸尔、特里尔、近滕邦康等即如此。这种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态度在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借鉴与提倡。

回顾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由于毛泽东政治领袖的地位，无论他在世或辞世之后，毛泽东研究始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必然受来自“左”的或右的政治倾向的干扰与参与，所以会出现对毛泽东思想由“注经解经”到“立竿见影”的教条化庸俗化错误；也出现过“两个凡是”的新教条主义和“全盘否定”的实用主义错误。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其针对性就在于纠正以往对毛泽东研究宣传中的非科学非历史态度和积习。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学者的客观历史主义研究态度值得借鉴和学习，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与不可违背原则，把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加以研究，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总体上应该吸收国外开放式的多元研究方法，以克服国内长期存在的封闭式一元研究方法。国外学者普遍采用多元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方位研究考察毛泽东及思想，不管他们的结论如何，仅从开阔研究视野和领域来讲，无疑会更全面地反映研究客体的丰富内容。国内虽然已开始重视研究方法问题，但总体上仍延用自我封闭的直线式三套标题的模式，出现了“概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部分四大块”，“史论”其思想的单线进程和观点，从而严重束缚了毛泽东思想活生生的多方面内容。由于研究方法单一滞后，缺乏宏观上的大视角和微观上的多视角研究，必然影响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如果能够将国外学者的比较方法、连续性方法、反映综合法加以利用，结合已有的单一性方法，会丰富我们的研究工具。随着新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创立，还会有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因此，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才能破除研究方法上的僵化模式，拓宽毛泽东研究的领域。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可以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吸收其合理的乃至深刻的思想观点，以达到学术上的互补。目前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自满自足的情绪，对国外研究成果不屑一顾；由于知识结构限制，很少想到从其中发现藉以纠正我们研究

之不足的内容和特点。但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当国内研究陷于某种盲目性和倾向性时，局外人反而会看的十分清楚。如当国内一些人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哲学关于主体性、能动性理论时，国外学者却坚定地认为，自觉能动性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毛泽东哲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当国内一些哲学工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人，而毛泽东哲学更没有人的理论时，国外学者则明确指出，“毛的著作内容的中心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其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尤其是从社会和实践的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① 早在1965年，就有国外学者写了“毛泽东的人学”专著。当着国内对毛泽东晚年失误莫衷一是、由此及彼之时，国外学者已经开始从毛泽东的一生考察其思想的发生发展，历史地审视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施拉姆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就是这方面的力作。简言之，毛泽东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学术性极强的课题，首先需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认真对待国外的研究动态与成果，及时地吸收其合理的科学的成分，这不仅能够启发我们的研究思路，弥补研究中的不足。因此，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翻译几本国外研究著作，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思想内容，取其良去其莠，建立起一种学术研究的互补机制，由此在总体研究水平上，我们才能真正胜人一筹。这是启示之三。

四、面向世界，发挥自身研究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国际性特征。国内思想理论界在1987年第四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和年会上，就提出了毛泽东哲学研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和发展目标，这合乎毛泽东研究总的发展趋势。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限制，我们一

① 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

直处于守势。在学者互访方面，80年代初开始至今，国外学者曾多次来访（施拉姆已8次来华），而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就此题目到国外交流访问；在国际性毛泽东研究学术会议上，中国代表只有2人参加，占全体代表1/20；在资料交换方面，日本，美国学者历次访华首先注重搜集、索取中国最新有关毛的文献资料，如施拉姆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正式出版前，就已获得全部资料，而国内研究者还没有条件随时查阅国外编辑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文集”，如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20卷，只在中国几个重要部门有藏，并严格控制读者；谈不上比较研究、更谈不上同国外学术机构建立交流关系了；在研究课题设置上，由于背对背的研究现状，国内很少具有针对性的就国外有关研究内容进行评价，更少进行思想观点讨论与争鸣；对国外研究中正确的观点不能及时了解吸收，同样对错误乃至歪曲攻击的观点也无力纠正和反驳。

上述诸方面情况，是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不协调的，也与中国作为毛泽东故乡的地位不相称；因此，毛泽东研究要走向世界，我们必须打破守势，采取攻势，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发挥真正优势。

从根本意义上讲，毛泽东研究的真正优势还是在中国，在我们中间。首先一点，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中国人有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体验，应该有优先的研究权和发言权。其次一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造就了毛泽东的个性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比外国学者更具备理解其中深刻内涵的悟性与能力。再次一点，中国掌握着毛泽东研究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取得了基础研究的长足进展，因此，中国学者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比外国学者应更具权威性。最后一点，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主导意识形态的特性；其方法论价值是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到一般研

究者、宣传者，都必须珍视的，因而，中国学者切近改革实践，会比国外学者有更深的体验。客观地讲，只要我们能够发挥上述优势，加之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就可以把依据真实资料研究的成果推向国际讲坛，同外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商磋和对话，取得共识共进的效果，才能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深入发展。在1993年，预计中国学术界能够在中国主办一次国际性毛泽东研究学术研讨会，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国内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相信中国会以一流的研究成果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

我们撰著《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一书，其宗旨、意义已尽在其中。

第一，就广义而言，对国外毛泽东哲学研究现状作总体考察和评价，并将国外研究的成果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与反映，尽可能地形成一部集思想性与资料性于一体的书卷，起码可以为国内思想理论教育和学习提供一部生动新鲜的教材；可以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从而珍视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选择及其理论总结，自觉地从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中吸取营养。

第二，就狭义而言，国内对国外毛泽东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观照尚属薄弱环节，虽有一些译文专著，仍只限于介绍简评阶段。如果从总体上研究、评述国外研究现状，并就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商磋和对话，这或许能够为国内毛泽东哲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填补一块理论空地。同时，作为一本资料翔实的著作，也能够为今后的国际学术交流准备一份交换文献。或许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呼吁国内的理论工作者充分认识毛泽东及其哲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和任务是什么？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契机与方向在哪里？

国外毛泽东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它要求每一个从事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利用这个参照系，增强理论研究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宏观考察比较中，我们能够破除一

些僵化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重新调整研究的重心和格局，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课题，那么应该相信，毛泽东研究的权威在中国，我们肩负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任务。

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遗产，已经被世界共享，毛泽东精神将继续恩泽四方。

第 二 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前苏联、东欧各国

第一节 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概况

当今时代，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陷入低潮，毛泽东研究在这些国家里亦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与研究欧美、日本的毛泽东思想不同，考察前苏联、东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需要重新调整原来的研究角度。一般可能认为，目前苏联、东欧各国也面目全非，毛泽东研究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但如果从“毛泽东哲学与世界”这一学术研究角度、而不是从纯政治角度看问题，可以认为，前苏联、东欧毛泽东思想研究仍是必须考察的一部分。因此，为了研究的完整性和尊重历史的完整性，我们仍然应以重要的篇幅，认真回顾与评价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在前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概况。

一、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的阶段性

由于深刻的政治原因和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使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宣传研究和评价形成明显的阶段性，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时间上大致形成了“肯定时期”和“否定时期”以及“后否定时期”。

“肯定时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2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阶段，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介绍和传播直接通

过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来实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最早传播于世得力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从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这是中苏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富有成效合作的10年。同样，在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很大努力，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认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肯定时期”，从布哈林到斯大林，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与支持，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此前提下，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亦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并且引导了当时国外毛泽东哲学研究和宣传的方向，形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

“否定时期”亦包括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由于当时中苏两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出现严重分歧，苏联、东欧理论界为政治服务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展开强大的批判攻势，进而歪曲、清算、彻底否定。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端作法客观上损害了毛泽东哲学的科学形象，苏联、东欧的学术理论研究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因而丧失了科学性。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是“否定时期”的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的对峙有所缓解，在否定的倾向性中开始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仍然是否定性的，只是少了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攻击、谩骂和扣大帽子。这一时期苏联、东欧理论界出版了68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著，其中涉及评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容占2/3。在“否定时期”，苏联、东欧理论界已经完全成为政治的御用工具，把扭曲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套入他们设计好的模式中。今天看来，彻底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消灭一种学说，而在于服务其政治需要。

“后否定时期”是指在8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末苏联、东欧解体前这一阶段。这期间，由于社会主义各国都面临改革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改革

指导，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实践中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些深刻的变化，促使苏联、东欧政界和理论界开始正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开始反思过去20年对中国、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非历史、非科学、非理性的倾向；开始注意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对中共十三大理论、对邓小平思想产生研究兴趣。因此，经过这种反思自身的"后否定时期"，苏联、东欧理论界试图突破僵化的研究模式和思想方法，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纵观苏联、东欧理论界研究宣传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历史的辩证法是客观的，任何政党和个人都无法违背它。尽管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抛弃马列，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但要求民族、国家的发展强盛，就必须按客观的社会历史法则办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价值具有恒久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宣传研究机构、人员概况

由于前苏联、东欧各国对中国问题包括毛泽东哲学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资料积累已具相当规模。特别是前苏联，从沙俄的第一代汉学家比丘林开始，迄今出版的研究中国的学术专著约在2000种左右，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毛泽东的研究。前苏联在1949年至1958年期间培养的大批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有千人之多，其中大部分集中研究中国问题；前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比较集中，重要的研究机构有20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几家，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校在国际学术研究交流中仍占一席之地。中国与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校在50年代进行了实际的交流，当时一大批留苏的中国学

生，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由于人为的政治原因，中苏两国学术交流、学者互访中断了近20年，直到80年代中期，又重新开始。特别在毛泽东哲学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现行方针政策研究方面，中苏学者重新开始对话，如布洛夫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学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对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考察访问，由此增加了双方的了解。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关杂志刊物也加强了对前苏联有关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资料、文章的介绍。但总的情况不能与欧美、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相比；由于苏联、东欧相继解体，苏联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名称下化整为零，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变化不能不影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与质量。前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人员肯定会保存下来，但今后的研究重点不会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他们更多的将会关注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理论建设。在这个角度上，或许仍要涉猎毛泽东哲学与毛泽东思想。至于谈到前苏联比较著名的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学者，恐怕数量不多。50年代初，曾有尤金、米海耶夫、普列克夫斯基等人；80年代有布洛夫（他主要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布拉尔茨基（他主要研究毛泽东生平与后毛泽东情况）。从总体上讲，他们亦不能与欧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学者相比，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主观能力的差别，而是客观环境条件的差别以及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别。因此，从目前状况看，前苏联、东欧研究中国问题与毛泽东的机构和人员并不令人乐观。

第二节　传播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于前苏联、东欧各国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值得写下一笔的是在“肯定时期”的基本情况。如果说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的初始工作十分重要，那么前苏联共产党和她的理论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客观地研究评价

前苏联、东欧理论界这一时期的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如前所述，"肯定时期"包括两个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客观评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积极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给予高度评价与广泛深入的宣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共产国际开辟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传播的历史

史料表明，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正处于初步形成阶段。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国内发表不久，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发表了该文；1927年6月12日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也刊登了这篇论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清晰。"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曾高度评价这篇报告"字字精炼，耐人寻味。"由此，毛泽东的名字和著作开始向世界传播。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开辟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传播的历史，而且传播途径是通过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杂志。

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曾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10余篇著作的重要内容；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存在时期，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是最有权威的机关刊物。在毛泽东之前，仅仅只有一个中国人即谭平山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论文。1934年8月份左右，共产国际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文集用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印刷，极为美观。在当时中国国内，这样装饰美观的书，实属罕见。公开出版毛泽东文集，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内，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直到1944年才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

局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同年，《共产国际》杂志还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中国劳苦大众在等待并把希望寄托于苏维埃旗帜。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1935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上）署名赫的作者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情况，实际是一部内容较全面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评价相当高；1936年2月，《共产国际》杂志在《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领导人》专栏中，刊登了"毛泽东——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和"朱德——中国红军总司令"等文章。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1936年1、2期合刊上，发表了陈云同志以施平笔名写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章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肯定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丰功伟绩，颂扬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召开遵义会议使我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不断地报道了中国敌后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正确方针、政策。在1937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际通讯》第17卷第57期上，报道了毛泽东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说："尽管太原已经陷落，但八路军已经在河北、察哈尔、山西创建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一个地区是晋东北，一个地区是察东。""我们决定实行这种游击战争，即便日本占领了山西全省，假如日本南下，我们也不向南退却，我们将向北前进，以便在后方打击敌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考虑当时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注与支持，毛泽东思想向外传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中国革命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

二、斯大林关注下的毛泽东哲学宣传与研究

（一）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毛泽东哲学的宣传与研究是以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正确评价为前提的。

建国初，斯大林曾明确表示过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上有错误的判断，“妨害了”中国的事情。这主要是指在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信心不足，没有给予有力及时的支持。因此，在1949年7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会晤斯大林时，他为此表示了歉意，并希望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后，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可见，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清醒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力量，肯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成就。在会晤中，斯大林向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他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中国的历史责任加重了。由此说明斯大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这一评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两个小时后，苏联就来电承认并致祝贺，并于1949年10月3日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苏联之际，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面对毛泽东，斯大林赞不绝口，他评价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讲：“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斯大林则表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公理。”他再次强调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评价也就是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反之亦然。这是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热心支持毛泽东

及其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础。

（二）前苏联理论界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最早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的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早在1948年，前苏联有关部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已开始把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又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泽东说他也有此意，并希望斯大林能派一位理论上较强的同志帮助。因此，斯大林答应派尤金来华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尤金分别于1950年、1951年两次来华工作。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1、2卷的工作，他对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十分推崇，建议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寄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已定稿的《实践论》提前发表。经毛泽东同意，尤金通过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将《实践论》的译稿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当时的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发表。这表明斯大林十分关心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诚心诚意地为毛泽东哲学传播于世作出了努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关注与支持，毛泽东哲学代表作才能在国内未公开发表前，首先向世界传播。前苏联理论界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予以重视，先于中国开始对《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系统宣传和研究。

（三）前苏联、东欧理论界高度评价《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入研究其精神实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 对《实践论》的评价和研究。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表了修改后的《实践论》。1950年12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又加以转载，并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对《实践论》给予高度评价。文章指出："毛泽东写这一著作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

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的统一的原理。”他们认为毛泽东“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了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文章强调“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上叙述的形象性和辩证性的统一。”文章还阐述了《实践论》的写作原因。认为毛泽东写《实践论》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时候曾经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他们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另一方面，也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思想的错误，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批判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正是毛泽东写《实践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可见当时苏联哲学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是有深刻理解和认识的，所以才能高度评价《实践论》。

不仅如此，编辑部文章还就《实践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一一作了研究性说明：

第一，毛泽东在发展他对“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是立足于列宁的这个著名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

映了自然。”①

第二，毛泽东关于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的论述与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途径来认识客观实在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毛泽东在其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原理。毛泽东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出发，明确和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理论对于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文章最后表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②

上述情况，我们还可以从米歇尔·卢瓦所撰写的《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中得到印证。米歇尔·卢瓦原任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东方语言文明系研究员，现任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从事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她在《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中指出：《实践论》的出版在苏联早于在中国。因为这篇论文刊登在1950年12月第23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12月18日《真理报》转载，而《人民日报》在同月30日才发表。苏联人认为这篇论文“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篇论文“补充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评论家们指出，这两个说法，苏联的报刊只用于评价列宁和斯大林所作的贡献。同样，当《实践论》在1951年10月北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上发表时，苏联和中国的评论家们一致强调，这篇文章是属于马列主义路线的。这是一位法国学者对当时苏联理论界关于《实践论》的评价的评价。

当时东欧各国对《实践论》的反映也是积极的。原欧洲共产

①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146页。

② 见《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第一版。

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74期发表了伏尔科夫《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其中说：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合性。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干部来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①这表明了东欧各国共产党对《实践论》的客观态度。

2．对《矛盾论》的评价和研究。我们知道，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斯大林曾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不能同意《矛盾论》中有关同一性的观点。但苏联还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52年第9期、11期上刊登了《矛盾论》，并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2卷俄文本时，专门对《矛盾论》作了很高的评价，文章认为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着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对准着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因此，毛泽东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文章同时指出了《矛盾论》的核心内容，即“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紧结合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律是发展的源泉”。

伊·普列歌夫斯基和阿·索波列夫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署名文章中一致认为：《矛盾论》这一著作，在反对理论

---

① 《新华日报》1951年3月号。

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政策上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一著作给了党的政策以理论基础，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危害。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问题，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哲学界开始给予重新考虑和研究。他们开始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并且对否认“对立面统一”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斯捷潘年在一篇文章中把1955年以前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各种错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忽视作为一切发展的源泉和动因的矛盾的普遍性”；第二种是“常常缩小和限制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这一普遍的规律，把这一规律仅仅归结为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斗争”；第三种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的各方面的统一是辩证法基本规律不可缺少的因素。

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一书多处引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观点，并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这篇著作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在每种情况下，都应该揭示矛盾的特殊性。”①该书第8章第3节“不同矛盾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矛盾论》的思想写成的。在讲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末尾引用了《实践论》那段精辟的结束语。

1959年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和列宁大学集体编写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在谈到客观事物的本质时说：“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矛盾论》中关于对本质的理解的重要言论。这部著作具体化和发展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论述的许多重要原理。”②

---

①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9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3页。

总之，对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苏联、东欧哲学理论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研究。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中说：“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卓绝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致命地打击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共产党内部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粉碎了自己的思想敌人。制定了真正科学的战略和策略。”因此，“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① 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

3．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评价

1952、1953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2卷俄文译本。米丁、尤金、弗德林、普列歇夫斯基、索波列夫和米海耶夫等人在《共产党人》、《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介绍《毛泽东选集》1、2卷内容的文章，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得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了适合时局要求的口号，规定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他们指出：第一，毛泽东对战略战术问题的研讨是对军事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第二，毛泽东同志同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坚决地批评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了理论来解决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迫切问题。因此，毛泽东的著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②

① 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版，第32、66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3年7月10日第三版。

1954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益处。在《简明哲学辞典》中还写道："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他在其著作'论持久战'中指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在其'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及其它文章中，教导中国共产党员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他号召他们抛弃那种死背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或轻视理论的不良作风。"①

在"肯定时期"，除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实践论》、《矛盾论》的认真研究之外，苏联哲学理论界还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例如在《简明哲学辞典》第4版中关于"同一性"一条，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其中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作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②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苏联这种批评作了详细的反驳，③但这在当时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之争。况且在斯大林逝世后，苏理论界已经承认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错误，再

---

① 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1958年第2版，第66—67页。

② 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56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次证明毛泽东的观点体现了彻底的辩证法思想。

从上述研究宣传情况看，前苏东理论界在这一时期未形成有分量的研究专著，但以党刊名义撰文进行宣传和学习，其影响更显著。他们比较准确地理解了毛泽东哲学的精神实质，为确立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作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因此说，在“肯定时期”，前苏联、东欧理论界在苏共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扩大毛泽东哲学的世界影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哲学在前苏联、东欧问题的意义所在，只有尊重历史的存在、才能正视现实的变化，预见未来的发展。

第三节　批判狂潮的缘起与内容概要

中苏两党、两国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冲突乃至破裂的历史过程。从前苏联方面看，最明显的标志是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从高度评价、积极宣传研究转向极力贬低、攻击批判。毛泽东研究在苏联、东欧成为测试中苏双方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今天，宏观考察这段历史，无论是苏联学者、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能比较清楚地理出一条历史线索，寻求这种突变的根源，吸取历史的教训。

一、历史旧怨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现代中苏关系史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共产国际时期，追溯到斯大林时期。首先，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除了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外，在对中国革命阶段及其性质的估计上有过一些严重的失误；并把苏联普遍推行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时所制订的一些不正确的方针政策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其次，在组织路线上，斯大林比

较信任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和在苏联学习过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而对30年代中期由毛泽东所领导的一些共产党人，由于他们对许多事物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喜欢、不信任。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共产国际“瞧不起毛泽东并且对他进行过打击。”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派”是自己的人，而把毛泽东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上述两点纷争的根源在于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盛行的“大小”党关系模式，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考虑各国共产党的实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严重地“妨碍”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苏共与中共就存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因而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后果。再次，二战期间，斯大林想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军队去吸引日本军队，钳制他们向苏联发动进攻；而中共领导人不能完全服从苏联单方面的战略利益，把自己的军队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以保存壮大实力同时准备解决国内问题；当抗战结束后，中共准备同国民党决战时，莫斯科却另有想法，拒绝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历史旧怨在结盟时期有所缓和，达成了谅解；但是，在新的分歧产生后，历史的阴影仍起作用。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意见分歧导致批判狂潮兴起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从苏联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技术上的支持与援助，斯大林用行动表达了对中国的关心与诚意。但是，由于历史上“老子党”的惯性，一切苏联顾问仍在一系列问题上企图强迫中国完全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坚持要中国同志执行自己的指示；他们要求加速土地改革、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消灭平均主义，清除党内的“坏分子”，甚至批评中国的某些领导人；他们经常要中国人说出一些感谢援助的话，要求承认苏联在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在二次大战的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贬低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建树的功绩；进而在一系列经济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其次，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关系日趋恶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中共八大赞成批个人崇拜，但不久毛泽东否定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国际形势估计上，赫鲁晓夫主张裁军，也包括中国；但中国方面不同意这种估计。因此，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苏联与中国的分歧逐渐扩大到一些新的领域，导致了摩擦和冲突。在苏中关系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苏联于1959年撕毁了在核领域合作的协定，而在1960年突然从中国召回了所有的专家顾问，借口是他们在中国受到了歧视。进而，莫斯科把中国领导人的不同意见看作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利用1961年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向北京施加压力，指责中共搞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组织叛乱、保护个人崇拜。1964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责中共的方针是“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苏联驻中国的代表机构，赫鲁晓夫甚至撤消了苏联独立的汉学研究机构。这样，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苏共开始启用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清算，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思想和中共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了非理性的报复手段，任意扣帽子，带动东欧各国理论界掀起了批毛狂潮。

三、全面歪曲批判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从60年代初开始，前苏联、东欧理论界有组织地开始批判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思想体系、阶级基础、理论根源到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进行全面的诋毁批判。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扮演了意识形态附庸的角色。今天重新翻阅这些材料，感到当时苏联、东欧理论界理论肤浅与政治狂热。这期间，由斯特拉哥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和《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两本书，比较集

中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其言论多以攻击歪曲为主。今天以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科学性，需要从反面了解，从正面给予批驳。

（一）歪曲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根源和阶级实质。首先，用“一源说”否定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关系。他们统一口径讲，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儒家、法家和道家有密切联系。认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法家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和为建立专制独裁政权而采用的权术方面以及道家的辩证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因此，毛泽东是通过传统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毛泽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吸取的仅仅是“符合小资产阶级的有关社会革命理论，即阶级斗争和革命地改造旧社会制度的思想，而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而不合逻辑地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之的实际情况。

其次，他们不仅用传统思想否定毛泽东哲学的科学性，而且把中国现代政治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源相联系，进而说明毛泽东哲学的阶级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以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无产阶级实质。这是冷战时代所形成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反映，为否定毛泽东哲学的科学性，他们必然从根源上否定。

（二）歪曲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用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首先，总体上歪曲《实践论》是经验论，《矛盾论》是折衷主义。认为《实践论》的目的在于证明，只有直接和经常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才有资格来谈论中国革命；而《矛盾论》是为毛主义者在整风运动的幌子下分裂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思想准备。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毛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的基础是经过主观主义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折衷主义大杂烩。”可见，这种简单推理是极端的形而上学。其次，歪曲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主

观唯心论，是把人的自觉活动与客观条件相分离，因而导致把主观因素绝对化。再次，认为毛泽东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代替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把哲学基本问题等同于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这些都是前苏联、东欧理论界断章取义所得出的肤浅判断。

（三）歪曲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对《实践论》展开全面批判，推翻了他们以往的客观评价，发起全盘否定的攻势。第一，杜撰《实践论》是抄苏联哲学著作的情节。他们认为，经过重新修订的《实践论》与弗·伊·哈斯哈契哈在1940年以前写的《物质和意识》一书中的某些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进而说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通俗转述，都是从30年代苏联的小册子和苏联第一版大百科全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抄袭的。"抄袭说"的根据已被我国毛泽东研究界驳倒，历史事实是不能牵强附会的。从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讲，"抄袭说"也是苏联理论界自己否定自己的论调。中国国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人受此论调影响，但很快被纠正。第二，歪曲毛泽东把实践等同于经验，把实践理解为意志的任意活动，因此推论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狭隘经验论"。他们的论据是毛泽东贬低理论思维的能力、否认知识的继承性和利用间接经验的必要性，把直接经验绝对化；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是狭隘的，表现在忽视其它国家和兄弟党的经验，因此仅仅把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作出的结论看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认为毛泽东所理解的实践，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实践，其实践标准是实用主义的。上述对毛泽东实践概念和理论的歪曲，完全出于苏联、东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也就是要寻求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而没有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模式唯命是从的理论根据。试图从否定《实践论》而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性作用和现实意义。

（四）歪曲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他们无端攻击《矛盾论》是为分裂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理论准备，进而推翻了先前对

《矛盾论》的客观评价和宣传成就。第一，歪曲毛泽东的辩证法继承了中国古代循环论思想，认为毛泽东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辩证法来解释许多辩证法范畴，因此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内在联系。第二，不同意毛泽东“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是离开同一性的联系来考察差别性。鲁缅采夫在《“毛泽东思想”的根源和演变》一书中陈述说：“差异可能是矛盾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是说可能是自身包含矛盾，也可能不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不同的方面时，就可以说事物本身出现了内部差异，这些差异并不一定都转化成为矛盾。只有当这些方面转化为一个事物中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肯定方面或否定方面时，差异才变成为对立面。如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互不相同，存在差异，但是这种阶级内部的差异不是有对立面‘斗争’的性质，即这些差异不是成为一个阶级自身运动自身发展的辩证动力。”第三，歪曲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思想是形而上学。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构成矛盾的对立面是僵死的形式逻辑的两极，这些对立面仅仅是外在的互相对立，并不包含有互相转化，因此不是辩证法的矛盾观。第四，歪曲毛泽东割裂了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把斗争性绝对化。第五，反对“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忽视“外因”作用，把“外因论”等同于“被动论”，表明他对事物之间联系的理解是机械的。第六，反对“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观点。首先认为毛泽东把新旧力量对比仅仅理解为数量上的增减，而在辩证矛盾中，是不能简单地对新与旧进行比较的。新的方面产生于旧的方面，并否定旧的方面，同时也体现旧的方面的成就。其次认为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也不是简单地互换关系。第七，歪曲毛泽东只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不承认有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毛泽东的“新陈代谢”理论是一种“进化论”，否认事物真正质的转化，不了解辩证法的发展。上述论点从反面说明，前苏联、东欧理论界为了迎合

政治需要，对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任意曲解。在缺乏深入系统研究情况下，加上政治偏见，他们是无法客观反映毛泽东哲学的实质精神内容的。因此，他们极力否定的方面，也正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如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等理论，不仅从基本原理上发挥了辩证法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方法论作用。毛泽东从50年代初就开始寻求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现实道路，力图克服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的尝试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五）歪曲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没有完整的彻底的历史过程理论，用主观唯心主义否定毛泽东的唯物历史观。第一，歪曲毛泽东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观点，集中攻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思想，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克服“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是口头上反对“机械唯物论”，实际上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偷运主观唯心主义。对“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命题予以否定。第二，歪曲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是反列宁主义的，攻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集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革命观点，即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政治革命。第三，歪曲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认为关于“人民”概念的定义是主观主义和非阶级观点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确定也缺乏客观标准，等等。综上三点可以说明，前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唯物史观哲学思想本身就缺乏系统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因此只能抓住只言片语，攻击一番。比如，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毛泽东如何阐述与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思想，也就无法认识毛泽东在克服“经济决定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贡献。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左”的错误，但他全面阐述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符合社会历史实际的。

前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展开的批判攻

势，既无真正的思想内容，也无任何系统性，显得杂乱无章，肤浅无力。这是完全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的必然结果，缺少起码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批判"是不值一驳的，只能用历史的发展和毛泽东哲学自身的生命力来证明这种"批判"的谬误性。

四、政治缓和气氛减弱了批判狂潮，但主调仍是否定、批判

自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后，当时的苏联领导层采取了与中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建议举行高级接触。对此中国领导也表示感兴趣，因此双方论战暂时停止了，批判狂潮也呈缓和之势。然而，由于两国矛盾之深，双方没有达成和解，由"热战"转为"冷战"。一方面，苏联尽一切可能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中继续孤立中国，导致了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公开冲突；另一方面，在1966年初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了，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给予抨击，而苏联在中苏边境大规模屯兵以与中国对抗，冷战不断升级。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十二大对中国现行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调整，逐渐结束对苏联的冷战状态，但仍未进入彻底改善两国、两党政治关系时期。所以，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到80年代初，苏联、东欧理论界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仍是为政治服务，以否定、批判为主调。同前一阶段相比，只是批判的调门低一些、火药味淡一点，没有质的区别和转变。

（一）对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关注与评论。1980年10月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和伊里因合著的《70年代——80年代初毛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演变》一书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书中歪曲和攻击中国领导人批评个人崇拜，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认为只放弃了毛泽东的某些提法，但没有触动"毛主义"的实质，毛主义的战略方针没有变。认为表面上的"非毛化"是中国新领导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是用"毛主义"的现代化补充"四个现代化"，用实用主义取代了左倾冒险主义。认为"实践标准"讨论只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

是否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中共八大的肯定，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表示赞同，但仍缺乏深入理解。

由于苏联、东欧理论界还未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转变缺乏思想准备，只能局限在既定的框架里认识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至于对毛泽东功过的历史评价，他们只能在对斯大林的评价模式中认识，所以无法理解中共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把这种客观评价定义为“非毛化”，犹如他们搞的“非斯大林化”，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否定性思维模式。

（二）总体上仍然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性。由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毛主义思想政治实质》一书中称：毛主义形成于40年代。自1917年至1976年，毛主义经历了四个时期：毛主义形成前的时期（1917—1939）；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流派形成的时期（1940—1949）；对中国发展问题形成特殊的毛主义观点时期（1949—1957）；毛泽东思想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理论时期（1958—1976）。这种划分不仅背离科学，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前苏联和东欧继续否定毛泽东哲学的基本思想。第一，认为毛泽东哲学方法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表现在把辩证法归结为“一分为二”，偷换了列宁主义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的公式；把矛盾分析绝对化，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存在，又把量变和质变规律简单化地归结为量与质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从而把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第二，认为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修正”。布罗夫曾撰文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观，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学说的修正；“两类矛盾”学说判定一些社会阶层和个人究竟属于“人民”还是“敌人”，其标准是主观主义的。综上可见，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仍持否定态度。

（三）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属最薄弱的环节。弗拉基米洛夫等人评论说，毛泽东本人对经济的特点是一知半解的。由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没有深刻的理论分析，由于轻视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因而就产生了冒险主义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上的经常变化；由于缺乏对中国经济的严肃分析，没有考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重点放在凭主观意愿和行政手段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造上，所以毛主义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实现的。他们认为，毛泽东在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时，推翻了物质刺激、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保存商品货币关系等社会主义的范畴，而引用了一些非经济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行政的办法；毛泽东也没有弄明白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阶段，企图一下子跳过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也没有看到，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变成人民具有高度社会政治积极性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之前，用法律的形式树立共产主义秩序是不可思议的，而只能导致倒退和使共产主义思想丧失威信。

（四）认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哲学科学研究正处在十字路口。布罗夫撰文讲，不能不承认近年来中国发表的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开始有了科学性，其中还有一些可贵的情报资料，呈现出通过不同观点的对比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的倾向。他认为，鉴于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都这样或那样地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放弃这些观点，同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本人进行再评价。有些中国学者注意转向对理论问题采取分析态度，倾向于按原意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另外一些为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所特有的观点开始复活。所以中国的哲学科学正处在十字路口。

我们在整理这一段材料时，发现各种角度的专著文章很多，内容亦很杂，但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这也是整个否定时期的特点。现在只能把这些材料作为当时苏中政治关系的一个产物和标

志，理论上的一些观点不值得一驳。

第四节　后否定时期对中国改革理论的关注与研究

后否定时期是相对于否定时期而言，在时间上大致从80年代中期到1989年12月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在内涵上表明前苏联在80年代后开始正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并于1985年4月宣布开始改革，随之中国方面承认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表达了与其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因此，恰恰是改革大趋势消解了中苏两党两国长达20多年的“冷战”；结束了否定时期，开始认真关注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加之苏共中央领导阶层力主改变对中国问题的“否定”态度，使许多学者从以前的“否定”状态转向“肯定”状态。同时开始反思过去中苏关系这段历史、乃至反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从理论上清理过去的原则错误和经验教训。在此意义上称之为后否定时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巨变，这一时期很短暂，但苏联理论界在解放思想的条件下，对中国问题取得了有实质内容的研究成果。

一、客观评价中国的改革事业，认真讨论中共十三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8年3月30—31日，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全苏中国学研究者协会召开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是“中共十三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参加讨论的还有前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和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和哈巴罗夫斯克的研究单位的学者。他们就如下方面发表了意见：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博士莫罗佐夫强调，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

（至少100年）是一种在公有成分起主导作用条件下的多种经济结构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按其性质是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是生产关系体系中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结构，一定限度的雇佣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等的存在。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必然会涉及整个关系体系，并要求建立调节经济的崭新机制。

保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结束（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发生作用，社会主义进而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基础上的多种经济结构的存在，它的特点是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这也以长期阶级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尽管阶级矛盾已退居第二位。至于分配体系，初级阶段的特征是社会不平等性；按劳分配是主要形式，但允许由一定法律规范加以调节的非劳动收入。称为初级阶段的原因还在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

他认为在理论方面，这种新思想吸取和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践，它本身包括有列宁关于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要素，它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因为这个理论使社会主义在时间上大大"接近"它们，并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对低下阶段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开辟着新的可能性。因此，他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在理论研究方面，会使我们回到新一圈的认识螺旋上，并对诸如过渡时期、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重新进行探讨。可见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评价很高，认识也较全面系统。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过渡时期理论的关系。哲学副博士费奥克基斯托夫发言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能全部容纳进众所周知的过渡时期理论。它的主要特点是，把看

来应在过渡时期加以克服的多种经济结构的发展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而且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小阶段。作者认为，仅仅根据社会政治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不考虑经济和文化标准来说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比较复杂的。中国的理论家提出了划分本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三个标准：公有制形式的确立，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解决经济和文化问题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这种分期的主要标准是，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来引导生产关系。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景的其他亚洲国家，都是有意义的。

（三）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科洛瓦诺夫教授认为，中共十三大确认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其基础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过去认为计划调节是主要的，市场调节是辅助性的观点相比，这个思想是前进了一步。它把由国家计划校正和引导的市场、市场关系视为经济运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的调节者是价值规律，计划调节只是控制宏观经济过程的方法和形式。商品生产的质的特征，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但不以社会外壳为转移。可见，中国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发展所有阶段的必要因素。所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成为模式以前，是一种有前途的目标。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有若干层次，在一些层次占优势的是市场和国家的间接调节，在另一些层次占上风的则是指令性计划和国家供给原材料的传统形式。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从旧模式过渡到新模式，要经历很长时间。

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思想”还有两种评价。亚先科持一种所谓“有利论”，他认为把组织自由市场说成进步现象是不正确的。不如说自由市场的形成有利于通过市场加速协调供应更确切些。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现实性。

但也有个别理论家，如E·阿夫多库申批评说：“在中国某

一派理论家（尤其是少壮派）"中间也存在着对马克思经济学说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事实。这些理论家在某种程度上怀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于是无批判地诉诸于西方经济学的'纯理性主义'，并接受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这样或那样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科学中实用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则过分强调市场经营方法的作用"。我们姑且把阿氏这种论调称之为"过分论"。

（四）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刻意义。历史学博士波尔特亚科夫在发言中指出，这个理论具有国际意义。因为它不仅基于对中国本国，而且基于对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分析而制定的，它对业已展开的、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左倾思想作斗争的国际过程，有巨大贡献。在经济方面，把生产力发展水平视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基本标志，是极为重要的。多年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常常被片面地纳入生产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于是，社会主义是否有能力有效地回答科技革命的挑战问题，就日益尖锐起来，而这个问题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证明，对社会主义与贫穷不相容有了深刻认识。

波尔特亚科夫指出，中国从70年代末就提出、研究并着手解决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只是近二三年才不再是"禁区"。例如，对所谓"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详尽的（应该说是十分婉转的）科学评价和论述，对布哈林观点的分析，对各国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方法的特点的比较分析。

季塔连科也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所讨论的许多理论问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热烈讨论的那些问题是相呼应的，它们是社会主义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组成部分。他在宣布讨论会结束时说，这次讨论会将会对全面、深入和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起巨大推动作用。客观地评价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重大贡

献，是一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任务。可以说，这次讨论会的学风扭转了过去很长时间的积习，真正面对中国实际，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研究问题，心平气和地发表学术意见，因此才能取得建设性研究成果。

（五）对中共十三大报告的系统研究。布罗夫在前苏联《科学共产主义》杂志1989年第10期上撰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共十三大报告。文章提出，中共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两个要点：1.明确了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相当详细地论述了该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中国从理论上首次承认必须有一个特殊的、区别于过渡时期的阶段等，目的是把象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必须全面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各种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的存在，私营企业活动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鼓励劳动者的进取性。广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新的解释：1.关于所有制形式。过去认为，只有全民国家所有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对其他所有制形式则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认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与社会主义性质并不矛盾，多种成分不是残余，而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现象。2.关于分配多样化的问题。中国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分配形式的存在是必然的。3.承认“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否定“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任务是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和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它的时间只用了几年（从1949年至50年代中期）。而初级阶段的任务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这个阶段大约需要100年。

文章提出，中国执政者不仅面临改革目前的社会和思想关系

的任务，而且要领导从封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这个进程需要一个特殊的、决非100年所能完成的历史时期。如何定义这个时期？能否称它是使国家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通过对中共文件及中国学者文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初级阶段”的提法比“过渡时期”的提法要好，因为后一种提法使人感到它好象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好象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理论为社会经济试验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的自我发展的过程。显而易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仅具有民族特色，而且具有国际意义。

二、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一）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思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副博士瑙莫夫在1988年4月6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专题报告。他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发展线索。他指出，近年来，几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进入了旨在完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从1978年底就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中国原先形成的所有制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方面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出现了大规模改造所有制关系，从单一成分的经济转向多种成分经济的必要性。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取消了对副业的限制，在城市经济中迅速发展了个体经营活动和合作社成分，对国营企业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方面，是转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构想，发展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小而分散和生产过程社会化程度十分薄弱的条件下，自发市场关系的作用客观上还很大。

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旨在使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气氛健康化的措施。积极地运用了刺激劳动报酬的形式。由于缺乏物质和财源，1978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增加居民货币收入的财政赤字政策。为了避免财政动荡，采取了增加各类消费品生产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由于这些措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防止了一场最激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发生。增长速度变得更加稳妥，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得到缓解，科技进步大大加速，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亚诺夫斯基于1991年5月21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全国党校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认为：8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积极地寻找一个能够切实反映中国国情并对科技革命的挑战作出回答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阶段，是从理论上探索当代社会主义问题并从实践上寻求解决方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进步，社会意识和居民心理以及国家自身面貌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如发生在其他国家，就会被称作奇迹。中国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最重大的成果。在这一领域同时为从粗放经营类型转向集约经营类型；为从过去的命令分配模式转向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奠定了基础。中国在限制指令性计划范围并逐步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

亚诺夫斯基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寻找到并实行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模式，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0年内大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这一模式基于以下原理：社会主义不是共同贫穷的社会，而是其目标为创造条件使更多的人富裕的社会。放弃全面的行政管理和平均主义，使10亿人民温饱的问题得以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国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作用范围的方案，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各个居民群体收入水平上的重大差距，但是显然促进了最低收入居民群体的减少。中国的经验对于

正在积极寻找途径摆脱危机状态的苏联共产党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经济学副博士穆罗姆采娃对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立论，作了详尽分析，她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复兴计划和途径与孙中山的计划有一定的继承性，孙中山的计划也主张普遍动员社会的内部潜力，广泛利用外资。现代化的现代观念包括三项基本任务：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经济改革的所有措施，首先旨在发展生产力。工业现代化依赖于农业的发展。

经济学副博士奥斯特罗夫斯基分析了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指出特别是由于集体和个体成分的发展，以及与吸引外资有关的成分的出现，基层经济单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阶级状况，权利和利益的分配方面，都发生了有益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首先靠集体成分而大大扩大。家庭承包对农民的社会结构有本质影响。农民日益积极地参加非农业生产，使农村出现了一些“中间”社会阶层。这决定着8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变化。

知识分子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显著成长。改革对干部队伍的数量无大影响，如果说，农村由于推行承包制干部人数大大减少，而城市则相反，干部人数大大增加。

作者指出，要大力提高社会移动性。这里的主要因素是接受职业教育。首先要对工人阶级进行职业教育，逐渐改变工人地位的继承制，实行企业竞赛雇佣制和进厂前的职业教育制。这就由集中分配劳动力过渡到了独立的劳动结构。要使劳动者有更多的可能来改变居住、工作或学习的条件。

历史学副博士阿赫梅特申指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以及对改革过程发生不利影响的因素。促进因素是中共制定的变革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总体纲领，它把国内各广大居民阶层都联合起来了。家庭承包、私人和个体企业、合作社

等制度，与人民的传统进取精神和经商本领是一致的。其他重要因素有中共领导对待干部的严肃态度，要求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水平。最后，改革的主要敌人——官僚机构，近年来也大大削弱了自己的阵地。

改革的不利因素：“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一些人认为民主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特别表现在1986年末—1987年初的大学生游行，以及1987年9—10月和1988年3月西藏民族的发动上。

经济学副博士莫罗佐夫指出，中国的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仅达到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原已达到的水平，而且在许多方面走得更远了。中国正在形成新的机制，其实质是中共十三大通过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公式确定的。新机制取决于计划和市场、集中化的国民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相互关系的性质。经济学博士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新观点，即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作者强调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自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这种保护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利用经济进步成果，使之真正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经济学副博士克鲁格洛夫对把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结为“所有制体系的根本变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所说的应该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相互渗透的趋势。广泛发展企业承包或租赁，与其说是所有制体系的变化，不如说是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形式。

经济学副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建立新经济机制的一种尝试，这种新机制将更利于价值规律的充分表现。从80年代初以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计划。中国放弃了硬性集中。但在国营企业并未取得重大进展，还有大量指令存在。二是经济定额。对大型国营企业来说，收入税、调节税、利润提成仍然是硬性规定的。集体企业的定额比较自由。

三是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目前基本上包括了个体和私人企业。四是自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自治主要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实现的，其表现各不相同。在一些企业已经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转向自治；而在另一些企业，这种大会只是徒有其名。五是组织结构的变化。一些城市（如常州）单独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恢复了50年代存在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开始摆脱平均主义。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得更有活力。

（三）重视中国改革经验，建议制定总体研究计划。经济学博士米尔纳指出，第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第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改革机制的独特实验室。苏联经济学家正在探讨的许多问题，要求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经验。

历史学副博士波尔佳科夫指出，各研究所之间必须明确划分研究中国改革的课题，必须研究中国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实践。苏联科学院需要制定研究中国改革的总体规划。建议更有计划地在《远东问题》杂志上介绍中国改革的基本趋向。

第五节　成就与问题评析

如果从20年代中期算起，毛泽东哲学在前苏联、东欧各国的传播，研究的漫长历史超过在世界其它地方。直到苏联、东欧解体，这种“研究”和关注以多种形式、不同内容构成了曲折多变的历史情结。尽管其中充斥了否定歪曲的论调，但也不乏客观正确的评价与研究。因此，我们有责任对前苏联、东欧理论界毛泽东研究的成就与问题进行总体评析，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完整的总体认识。

一、“肯定时期”研究成果评析

如果说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那么在建国之初，斯大林继续了这项工作，并且做出了值得充分肯定的成绩。

（一）斯大林的提议规定了“肯定时期”的基本研究、宣传格局。毛泽东在建国初长达两个月跨年度的访苏活动是不寻常的。这次访问，不仅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协定，标志着中苏正式结盟；而且使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历史性人物得以历史性的会面，使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当面表达自己的良好意愿和实际想法，斯大林也能够面对毛泽东清理自己以往的思路。使斯大林真正面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由她创建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对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些错误估计和决定有所反省，开始注重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而主动向毛泽东提议；尽快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愿意派哲学家帮助工作。就这一点而言，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真诚的，对毛泽东是相当尊重和谦虚的。所以，不管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过多少失误，他在新中国初始对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领袖人物的胸怀和远见，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或提议，规定了之后十多年中苏联、东欧理论界研究、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格局，即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角度出发，被客观、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另外一点，毛泽东的两篇著名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发表后，在苏联理论界能够掀起一个研究高潮，原因之一在于斯大林亲自过问和参予了这一工作。在毛泽东选集（1、2卷）编辑出版过程中，斯大林能够很快得到俄文译本，特别是“两论”。属单独抽出提前编译的，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仅此一举，不止向苏联，也向世界宣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我们现在有理由充

分肯定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

（二）在“肯定时期”，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评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无论从中国学的角度，还是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角度，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及重点著作一一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研究。尤其是对《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许多著名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学习研究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具体讲有如下几点：

第一，充分肯定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成果。

第二，充分肯定《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高度评价《实践论》、《矛盾论》是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

第三，明确提出《实践论》是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矛盾论》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理论。

第四，明确提出《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坚决地批评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对战略战术问题的研讨是对军事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五，充分肯定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宝库的丰富，对世界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苏联、东欧理论界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世界作出了努力。由于当时苏联、东欧理论界是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因此能够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学风和极大的政治热情评价、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除了

学术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使《实践论》、《矛盾论》在公开发表的近10年中，就超越了国界而被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所熟悉和理解；从而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加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苏联、东欧理论界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总之，在“肯定时期”，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二“否定时期”几个观点的合理因素

很明显，“否定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基本倾向是否定的。而在第一阶段几乎是全盘否定。但是，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内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一些观点不仅仅只是无理指责和攻击了，已经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分析、概括；有些提法虽然还带有偏见，但已经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以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公布于世。凡是有头脑的学者不能不正视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中苏政治关系的对立和僵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70年代初就有松动的迹象，到70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已开始缓和；这无疑会缓解由政治关系紧张引起的学术理论界紧张关系。因此，苏联、东欧理论界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我们党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重新评价。进而抛弃一些简单的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开始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仍限于对事物表层的认识，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还是能分析出其合理因素，从另一个侧面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继粉碎“四人帮”之后，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震动了所有关心中国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纷纷从自己的理解层次上发表意见，评价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苏联学者观点中的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即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实质上是“宣布向教条主义发动全面进攻”。这当时仍处于僵化状态的苏联理论界，能够承认这一点，已经是不小的转变了。由于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不完全了解，也就不可能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具体、全面的客观评价。

（二）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对这个问题，苏联、东欧理论界是十分敏感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国内在搞“非毛化”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这种“非毛化”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是不同的。他们提出“用第五个现代化——毛主义的现代化来补充“四个现代化”的观点，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决议》中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毛主义的基本成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保留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肯定“八大”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表明对中国思想界理论界情况的实际反映。可见，“毛主义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了一个真实内容，这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没有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目前苏联理论界的“重评斯大林热”又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我们党和理论界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避免了这种错误倾向，因此才能形成《历史决议》的有关内容，指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范畴。这是一个学术问

题。国内学者提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主观和客观是毛泽东哲学的中心范畴。理由是：1．毛泽东哲学是应用哲学，研究主观指导如何符合中国客观实际，主客观关系是贯穿其全部著作的中心线索；2．“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哲学的精髓，是解决主客观相符合的；3．毛泽东著作中大量使用的是主客观这对范畴。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主体和客体才是毛泽东哲学的中心范畴。理由是：1．很多“批注”已表明这一点；2．毛泽东常讲主客观，但往往是与主客体相连的；3．毛泽东著作中大量的是用主客体关系分析中国革命规律。苏联、东欧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不深入，却早于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是从反面提出的。他们认为，“毛主义哲学的实质表现在：用主客观相互关系问题偷换哲学的根本问题——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这是用传统的哲学概念来理解毛泽东哲学，似乎只有强调物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才是真正的哲学。其实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确实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哲学的全部问题。要真正使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具有真实内容，必须研究主客观的相互关系——研究主观如何符合客观，又如何改造客观。毛泽东哲学的一大特色正在于此。他们从反面揭示了毛泽东哲学的实质或中心范畴，这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反映出苏联、东欧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理解有一定的深入。

（四）关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失误。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建国后，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道路十分曲折。就目前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来讲，也是困难问题很多，而且直接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现实课题。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制定和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是对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的结果。它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指导方针，所以称之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路"。那么，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这方面，苏联学者就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模式、动力等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经济的严肃分析，没有考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重点放在凭主观意愿和行政手段对社会进行改造上，构成了一种搞无偿劳动、用军事化增加劳动收效，用政治思想说教进行推动的毛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① 这种认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抓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一方面是对以往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因素的克服和调整，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总结新的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偏向。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实施。国外学者不仅关注中国的过去、研究毛泽东的失误；他们更注视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考察着我们党的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

（五）"中国哲学科学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提出了如何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特别是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任务。继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苏联哲学理论界十分注重中国国内哲学理论动态，开始从理论上作系统研究和评价。布罗夫所著的《当代的中国哲学》（1980年10月出版）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从1949年—1976年的中国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作者在总体上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水平估计不高，观点中否定倾向和政治色彩较浓，但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党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给予肯定。对阶级斗争问题、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等的重新认识，他认为是"倾向于按原意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在《历史决议》发表之前，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布罗夫的理解是："鉴于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都这样或那样地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放弃这些观

① 参见《1977—1980苏联反华著作简介和论点提要》，第125页。

点，同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本人进行再评价，中国现领导当然不愿搞真正的‘非毛化’，因为这会给他们建立的制度和他们本人带来痛苦的震动。”①他的这种理解表明两点：一是承认毛泽东的理论家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会象苏共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不会搞“非毛化”。二是提出了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再评价的历史关头，“中国现代哲学科学正处在十字路口”，具体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和“两个凡是观点的对立，因此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特别是发展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任务。在《历史决议》公开发表之前，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实际情况，与以往比较，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可以用布罗夫对中国理论界的估计来评价他们自己。苏联理论界的著述和观点也开始“有了科学性”，其形式和内容都有很大变化，呈现出通过历史的考察，有比较地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从学术角度看问题，布罗夫的《当代的中国哲学》对了解近期苏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及态度的转变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后否定时期取得了具有实质内容的研究成果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趋势的影响，更由于中国自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重新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而在大胆的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使前苏联、东欧各国放弃了作为论战对象的中国，转而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以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中心，集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和著书立说，发表了较深刻系统的学术观点，并开始被翻译登载在中国有关的学术刊物

① 参见（苏）布罗夫：《当代的中国哲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10月。

上，标志着后否定时期真正具有肯定性价值的研究工作的开始。他们主要在如下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针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结合苏联过去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高度评价，从国际意义上肯定其指导作用的广泛性和科学性。承认在改革理论方面，中国已经走在苏联前面，在改革实践中亦作出突出成就。由此评价和研究表现出真正的学术气氛与民主作风。

第二，以中共十三大报告为研究资料，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多方面探讨中国的改革理论内容。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经济改革的关系，“初级阶段”论与“过渡时期”论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力的作用问题，有计划商品生产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改革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第三，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方面，突破了以往僵化的研究模式，对社会主义从概念到实质、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深入反思。取得了研究的进展。但由于苏联、东欧解体，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东欧的失败和挫折，前苏联、东欧学者则在消沉迷茫之后，开始从更深层次反思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和解体的现实，更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对比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也能反映目前苏联、东欧理论界的基本现状。

四、总体上的问题概要

同欧美、日本毛泽东研究情况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并不令人满意。我们尽可能地从有限的材料、而且是大部分否定性的材料中挖掘出有一定价值的东西，给予肯定。但还必须认真总结总体上的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这种历史

性的反思，或许能从问题的反面找出正面的答案。

回顾前苏联、东欧理论界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哲学的宣传态势，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概括讲有几方面：

（一）在研究方法上教条主义盛行、非历史非理性色彩浓厚。在前苏联，无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以后的时期，教条主义始终是影响各方面工作的"紧箍咒"，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教条主义更加盛行。对中国学和毛泽东哲学研究宣传也不例外，一切都要按照斯大林的模式去套，如果符合，那就是正确的；如果稍有偏离，那就是"背叛"或者扣上其它帽子。所以，毛泽东哲学研究在苏联取得的实际进展是有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严重地束缚了毛泽东哲学的丰富内容，只剩下"几条原理"、"几个关系"，最后仍被扣上"实用主义""唯心主义"的大帽子予以彻底否定。教条主义研究方法是在貌似用理性的眼光、历史地看问题，实质上恰恰是非历史非理性的，他们把来自于活生生的历史中的理论教条化，变成了僵死的东西。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任何研究都会陷入僵局。前苏联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在80年代后亦开始反思以往的研究方法，并究其根源何在？他们认为，一是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这一方面压制了人们对新的现实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以及对教条化状态进行斗争的任何企图；另一方面，教条主义又责难哲学家们脱离实践，离开对迫切问题的研究，搞繁琐哲学。这就出现了虚伪性。实际上这种行政命令体制并不要求哲学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沉思，而是要求为之辩护；不要求勇敢地预见未来，而是要求证实现行政策和事后论证已通过的决议。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性原则，从而就排除了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过程进行理论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它不能不陷入教条主义和繁琐推理。所有这些也就不能不反映在其它研究领域。二是缺乏民主和公开性。在个人崇拜时期只许斯大林一个人发展哲学。斯大林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特征"和"生产特点"给任何独立的哲学思维确定了硬性的界限，谁越过了这

个界限就会被加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制造了新的政治气氛，曾为哲学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推动力，哲学界的思想明显地活跃起来。但是在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推动力后来不仅没有强化，相反逐渐地停顿了，因为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继续在发挥作用。只有在批判这种体制，并消除其对社会精神生活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才能把哲学推向前进。可见，教条主义研究方法不仅存在于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中，而且普遍地作用于苏联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影响的消除的根本途径在于破除僵化的体制，运用辩证的方法、历史的态度，解放思想，才能彻底克服教条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理性批判精神。

（二）在研究目的上，实用主义主导、趋附于政治宣传需要、服务于维护论证“苏联模式”的正确性，“文道主义”严重。因此，他们宣传毛泽东哲学时，是从肯定的角度说明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是符合“苏联模式”的，进而表明自身的合理性；他们批判毛泽东哲学时，则是从否定的角度说明毛泽东哲学和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偏离了“苏联模式”，由此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谬误性”。然而总的目的都在于完全为政治服务，完全作政治的“御用工具”。所以，在研究的具体方式上可以用政治观点代替学术观点、用断章取义不及其余；用贴标签、扣帽子代替具体分析和理性思考。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的理论界开始深入的反思，其认识更具说服力。苏联哲学博士季塔连科在1989年曾就苏联的汉学研究进行反思，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研究的反思。他从苏联汉学研究的教训和改革方向两个方面阐述了有价值的观点。首先，在教训方面，他认为，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汉学研究在一系列重要方面，过去带有、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过去的历史教训表明，汉学研究的作用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它同政治的相互关系而往往被贬低，以致在宣传上为现行政策的需要服务。科学由理论原理和评价的鉴定人、预测者、分析家和设

计者变成了形势政策的意识形态附庸，而且这种政策决定于上层领导中狭隘集团、甚至一个人的情绪。因此，在50年代，由于忽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结果使培养有全面素养的、有关中国历史、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学术干部的工作基本上成了狭隘的翻译专业培训。赫鲁晓夫执政时，曾撤销了苏联独立的汉学研究，封闭了有关学术机构，产生了极端的消极作用。苏联的汉学研究在60年代初开始恢复时并不是苏中关系较好的时刻，这不能不影响到培养汉学家的一般态度，有时还把我们的研究推上片面地、虚无主义地批判中共政策的道路，把"文化革革"的悲剧同中共整个革命道路的特点混为一谈。所以，从过去我们至少应该吸取三条教训：第一，汉学作为一门综合科学，只有在具有充分的活力并为这门科学和实践带来巨大好处的时候，它对历史、经济、哲学、文化、文学、对外政策、社会学、民族传统的广泛问题的基础研究阵线才能得到保证。科学与实践的联系不应降低到对这种或那种政治局势起宣传保证作用的地步。在做出这一或那一政治决定时，科学应保留自己的科学鉴定者、咨询者和客观评论员的特殊作用。如果说，过去对中国的研究过分意识形态化、趋附于论战的需要和苏联国内的政局，那么现在，许多屏障已经拆除，汉学的研究和出版物阵线宽广，却常常还感觉到过分学究气，有狭隘国家学的观点，缺少广泛概括和对比苏中历史经验的著作。第二，汉学学术成果的实际体现，只有在苏中友好合作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对我们伟大邻邦中国文明的全面和客观的研究，应该在巩固和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睦邻关系、相互丰富各自的文化、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一步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为了互利合作的利益均衡等方面，找出路子并制定方案。第三，在评价事实和现象方面，要彻底体现科学的原则性和客观性，独立性和不抱成见，组织自由的、创造性的讨论，承认学者有权探索、冒风险和犯错误，这是我国汉学这门科学健康发展的最可靠的保

证。

其次，总结教训，苏联汉学研究面临改革的任务。季塔连科概括指出，一要深刻而全面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作为一切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彻底贯彻历史主义原则，以及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语言发展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原则；二是认识中国独立自主政策的相互关系的内在辩证法和中苏间目前在下述问题上客观存在着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安全，在完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成就，在两国安全，平等、互利和互助合作进程中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坚决克服在对待中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方面的文道主义残余的惰性，揭示和彻底贯彻苏中关系的新哲学，这种哲学的出发点是承认利益均等和和平共处原则；四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个经验方面极广，既有巨大成就，也有严重历史教训，现在正大大丰富着科学共产主义观念的许多方面并使之具体化，将来无疑会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发生巨大影响；五是认识中国文明在现代世界文明的形成，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各国文明新的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中的特殊作用。这一地区在世界政治、科技革命和整个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尽量正确而全面地评价它，就会犯严重错误。综上分析和认识代表了苏联解体前的反思水平。

（三）在研究内容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没有形成研究传统。与欧美、日本毛泽东研究情况相比，前苏联研究宣传乃至批判毛泽东哲学的时间较长，但并未取得与之相配的实际成就。在肯定时期正面宣传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因此，目前还未看到一部较为系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专著；否定时期的批判也大都从政治上扣帽子，而不是从学理上谈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深度只停留在以党报党刊形式发表文章，进行概括性评价，缺少学术性观点，加之时间短，只能以宣传为主，也就谈不上研究的广度。如果说有广度，那只是“批判”的广度，即从总体上全盘否

定毛泽东哲学的科学结论乃至他们自己以往的肯定性评价。

上述几点问题概要，说明前苏联、东欧各国毛泽东研究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第六节 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

在前苏联、东欧各国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的历史进程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特点，这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性。形式上表现为非连续性的曲折发展。与欧美、日本毛泽东研究情况相比，没有形成客观地研究态度和传统，缺少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首先，从前苏联、东欧研究历史发展线索讲，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后否定的过程，其中的曲折和波动是相当大的。其次，否定时期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完全趋从政治的需要和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因而，使其研究态度由科学理性的转为实用教条的；其研究方法由比较客观转为完全主观，由比较全面转向极端片面；其研究内容从全盘肯定转向全盘否定；其研究目的也由客观评价、宣传而转为任意歪曲、诋毁。再次，后否定时期的形成也是在批评中苏关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前提下，带有行政命令性质的转向，因而是在新的行政干预下反思旧的行政命令、教条主义在中国问题研究中的问题；从总体上仍未摆脱旧有模式的限制。因此无论哪个时期，都带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究其根源，既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亦有政治的、文化的根源，这需要从宏观上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本书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已经用足够的篇幅介绍和评述了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在前苏联、东欧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概况、主要内容、成就和问题以及基本特点，由此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前苏联、东欧毛泽东研究的资料。对于将来情况的发展只能作一简要的预测。就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在目前独联体各国的发展趋势而言，可能会出现一些

新情况。首先，中国和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关系的发展和交流趋向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毛泽东研究也要受制于这个趋向。中国和前苏联在80年代末，曾加强了理论界的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共同表达了加强合作，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事业。但是，苏联的解体打断了这种刚刚恢复的学术交流。目前，独联体各国已经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转向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法学等，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一体化，广泛开展多学科、跨学科（包括与自然科学家合作）的综合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边缘科学。相比较，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研究课题及机构人员都被不同程度地削弱，减少。

其次，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独联体各国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要研究问题，他们会首先加强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这其中或许会涉及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哲学的发展这一课题，或许对邓小平思想更感兴趣。这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倾向。

再次，苏联、东欧政体的巨变必然引起对毛泽东研究的淡化，使其进入低潮，这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挑战，走入低谷是同步的。因为苏联、东欧各国在实践上已经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变为在野党。他们重新确立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的是另一套理论价值观念系统。中国在独树一帜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目前的情况表明，在这场跨世纪的大变动事件中，社会主义的胜利仍需要艰苦的探索和实践，苏联、东欧各国的挫折也需要经过自我调整与发展才能真正摆脱危机。在这期间，理论研究的重点肯定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淡化是必然的。但是，并不排除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成功，社会主义在自我发展中充分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的时候，作为理论指导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将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指导和方法。尽管本世纪末我们对毛泽东研究在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前景不抱乐观态度，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21世纪，确信中国与毛泽东的名字在21世纪的世界里会继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第　三　章

日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其原因

一、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的概况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文化思想交流渊源流长。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两国之间的正常文化交流受到很大的阻碍和损害。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精华的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日本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人士，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间要早一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日本共产党人和少数进步人士，就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这时，他们就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虽然由于统治阶级的限制和封锁，日本人民不可能获得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但是，日本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法收集和了解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资料。日本统治阶级为了侵略中国，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资料。1945年，外务省调查局第五课就编集了"毛泽东主要言论集"，共收入27篇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材料。这当然不是传播毛泽东思想，但是，一些先进的人们却从中了解了毛泽东思想。野坂参三同志曾谈到这种情

况。① 正是由于日本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努力，即使是早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也取得可喜的成绩。1946年，高山书院就出版了松本仓吉著的《毛泽东传》，参加过中国革命斗争的日本共产党人岩村三千夫，1948年就出版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书，指出："毛泽东及其思想，我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论仅仅是马列主义的中国版……他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符合亚洲实情的代表。"② 岩村三千夫是早期日共理论家，也是最早向日本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人士。野坂参三前日共主席，也是参加中国抗日斗争的，是早期向日本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代表。他在中国期间，一方面，参加抗日斗争，一方面，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1946年他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说，来到中国，"我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并且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中共和八路军。"他说，他见到毛泽东后，从他身上获得最深刻的印象，即是觉得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组织家和天才的战略家。他的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掌握统一战线政策、整风运动及各种著作可作范例。他还特别赞扬毛泽东对东方各民族革命运动洋溢着的高度热忱。③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日本组织领导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一些人继续留在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反对美蒋的解放战争，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他们回国后，许多人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日本共产党人回国后，努力结合日本实际，宣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野坂参三同志于1948年在东京神田区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作用，提出日本向中国经验学习的问题，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十月革命的发

---

① 参见冈野进：《对新华社记者谈话》，《解放》杂志第3期1946年。

② 岩村三千夫：《毛泽东の思想》世界评论社1948年，第144页。

③ 参见《解放》杂志第3期，1946年。

展，同时，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意义仅次于十月革命的事件。”他从中国的人口、面积、经济资源等方面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对世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将是巨大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的据点。从而在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方面，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对世界上的殖民地，特别是远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做出伟大的贡献。”他甚至认为中国将是左右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力量。“我们无妨这样说：世界历史将因中国站在反动一边，还是站在进步一边；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还是站在民主主义一边而发生变化”。根据这种分析，他提出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内容。

首先，学习毛泽东关于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三风’，……为了‘整顿三风’，中国共产党花费了两年的宝贵时间。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一个原来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很大比重的党，变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两年时间里，他们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激烈斗争。经过这样的思想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天取得胜利的原因。我们必须学习这一点。”

其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野坂参三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还强调思想修养。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之一是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党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不知倾注了多么大的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主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必须从对客观实际的分析出发。毛泽东一再反复地指出这一点。”

再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们不仅把理论作为理论来学习，而且把理论中国化，并且

进一步发展了理论。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我们可以从中国同志那里学习这种创造性地学习理论的精神。”

第四，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那样强大呢？如果说有什么奥秘，那么归根结蒂，可以说其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学习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间，如何接近群众、学习群众、教育和培养群众，以及如何领导群众、同群众共同前进的经验。”

第五，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野坂参三同志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可能，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经验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破裂的经验。他指出：“我们应当向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巧妙地变换策略，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的目的。”

最后，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风格。野坂参三同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亲自看到和体验到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为国家兴亡，那种大公无私、向人民负责、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说：“我们还有必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风格。”“学习中国共产党那种奋不顾身地同任何困难作斗争的忘我精神和勇气。”①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分子为代表，就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并且已经开始结合日本的实际，考虑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这为5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广大群众中传播，打下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1年10月到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1—4卷在我国出版发行；1977年10月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这一期间又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哲学的单行本。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

① 《野坂参三选集》（战后篇），第144—153页。

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本也出现了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首先，毛泽东著作在日本得到迅速、大量的出版发行，各界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毛泽东著作。1952年，日本就陆续出版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还出版了许多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其中，《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实践论》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于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而1951年4月57期的日共理论刊物《前卫》就全文发表了。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矛盾论》，1952年8月71期《前卫》就全文发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日本的《中央公论》杂志同年8月号就全文刊载由亚细亚通信社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并组织学者座谈文章的写作背景、基本内容和意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我国是1960年9月下旬出版发行的；1962年6月，日本就分上下两卷（日译本）出版了。同年，由日共《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发行7000部《毛泽东选集》第4卷，不到一个月，就被定购一空。

关于日本人民群众欢迎《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积极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情况，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安斋库治有如下的叙述：

“《毛泽东选集》第4卷日译本分上下卷于1962年6月15日出齐。自从《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以来，给我的感觉最深的一点是：日本人民对《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关心非常强烈。学习的热情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传播开。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以来的销售速度上。《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以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第一版七千部业已抢购一空，而读者的订货却源源不断，以致不得不赶忙着手印第二版以满足读者

需要”。“6月26日，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支部在名古屋举办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纪念集会”，尽管这是在参议院选举的最后几天里召开的，却有大约两千名青年人前来参加，使集会获得了很大成功。”①

到了1966年《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经过日本知识界的努力，出齐了日译本。同年3月23日，日本文化界还为之开了庆祝会。在这期间，根据日本各界群众的需求，还出版了大量的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

其次，学习热潮的第二个表现，是随着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发行，很快兴起了多种形式的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人数之多、积极性之大和学习、宣传形式的丰富多彩，是中日文化交流史所仅见。例如，为了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地出现了学习会、座谈会、讲座会、研究会，有的地方为了长期组织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培养人材还创立毛泽东思想学院。1953年7月，日共理论刊物《前卫》82、85期发表由山崎谦写的怎样学习《矛盾论》讲座材料。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矛盾论》学习上的种种倾向；（二）学习《矛盾论》的必要态度；（三）掌握和不掌握《矛盾论》的区别；（四）《矛盾论》的特别意义；（五）仅仅记住《矛盾论》的内容不够，要运用其立场解决矛盾变为物质力量。以推动群众的《矛盾论》学习。②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联系日本实际，联系自己工作和思想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有的在同敌人斗争中，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必胜的信心。感人至深。例如，1964年10月东京一些青年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每星期聚会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一直坚持下来。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学习了毛泽东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

① 安斋库治：《给日本人民的最富有战斗性的礼物》，转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9月18日。

② 参见《前卫》82、85期，1953年7、8、10月号。

朗的谈话》、《实践论》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多篇文章。①一位读者说：“我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把《矛盾论》读完了。日本人民为了摆脱殖民地的地位，正在作英勇的斗争。正在此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照亮了日本人民的道路。”②一位叫吉田松雄的说：“伟大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刻也不离我的身，我相信它对我们日本人民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理论武器。”③日本前松川事件的被告团长，在监狱里和美日反动派进行了14年的英勇斗争。虽然两次被敌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但他毫不气馁，并在监狱里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其它经典著作。被告团团长杉浦三郎出狱后对人说，在狱中读毛泽东的著作，知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而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是真正强大的，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④

我们再看看下边的材料，会发现日本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真是充满着热情，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著作的强大吸引力！

日共党员朝日茂被日本反动派迫害致病，在患病过程中仍坚持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他逝世前写了二首诗表达他爱读毛泽东著作和对毛泽东思想强烈追求的心情：

（一）

朝闻夕死不为迟，
一心专意寻真理。
病中不忘平生愿，
细读《毛泽东选集》。

（二）

一病立不起，

---

① 《长春日报》1966年6月2日。
② 《读书》1958年11期，第30页。
③ 《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④ 《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心中苦难当。
主义更坚定，
梦寐求解放。①

日本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热情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我们看了1962年7月22日《赤旗报》一篇文章的概括论述，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文章写道："《毛泽东选集》第1卷最初在日本翻译出版，是在1952年2月，因此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在这10年间，《毛泽东选集》给予日本进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目前，在全国组织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和讲习会、研究会，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会上，青年人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教导的方法分析形势，谈论主要矛盾是怎样转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我认为，这些情况明显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日本进步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思想，并且扎下了根。"②

再次，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第三个表现是，许多专家学者不停留于一般的学习和宣传，他们结合实践的经验教训，从各方面展开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著书立说，成绩可观。

这期间，他们创办了不少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问题的杂志，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等。有一些学术杂志也增加了对中国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日本有代表性的学术杂志，如《思想》和《唯物论研究》，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论文。各杂志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自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日本出版发行到1976年以来，学者、专家们写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经验的专著就有近10余部。其中如新岛淳良的《毛泽东的哲学》和松村一人的《辩证法的发展》等著作，都是很有

---

① 《中国青年报》1964年3月26日。

② 浅川谦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习思想方法：最可靠的译本》，日本《赤旗报》1962年7月22日。

质量的。《辩证法的发展》，在日本理论界是《矛盾论》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这期间，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发展虽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和斗争，由于中共和日共之间发生分歧，以及由于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几度出现波折起伏，但是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是没有间断的。据我们在日本的考察了解，现在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都读过一些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在学术领域形成重实践行为的学术传统。这种情况，在日本的文艺界尤为明显。

事实证明，从50年代初期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确实是毛泽东思想在日本传播发展的高潮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重大变化和转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中国人在深思，世界人民也在深思。日本广大人民当然也不例外。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在中国和外国的一些人中，一度成了疑问。有些人动摇，有些人否定毛泽东思想，“非毛化”的倾向，在中国和外国出现了。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出现了消沉情况。但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中国人民，坚定地作了回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日本广大人民和有远见的知识界同国际其他广大人民一样，也坚定地回答：毛泽东犯了错误，但决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1977年柳田谦十郎在他的《毛泽东研究》一书中指出：“尽管毛泽东对晚年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负有责任，但决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对于当今中国的事情应用历史的观点加以认识，即由中国是从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农业国，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作者又指出：“毛泽东

领导的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无疑具有国际意义。因此，须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研究毛泽东”。①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深思。至今，不少人，包括我们国内少数人，对于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对于这个长期过程发生的问题也估计不足，因此每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思想发生动摇。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中有这样正确的认识，觉得非常可贵。当然，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不能把握这一历史转折的人，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民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甚为不满，表示要“以中国人之手来扬弃毛泽东主义，为此，我们有在理论上助一臂之力的义务”。“对有心的中国人起点作用”。②但是，这在日本各界群众中是少数，大多数采取历史的公正的态度。因此，不久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就出现了正常的、冷静的、深入的形势。

其主要表现，一是，像过去那样多的学习会、讨论会式的群众学习运动是没有了，但是，转入了正常的结合实际的学习仍在继续。例如，在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时，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发表文章号召党员，特别是年轻同志，“要紧密结合个人实践的经验，精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既要肯动脑子，又要有学习的热情”。文章还说：“每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或在思想上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只要反复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会豁然开朗，使我们得到进步。”③除了工人、农民和青年人有的结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毛泽东著作外，一些科学家也很重视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结合科学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日

---

① 柳田谦七郎：《毛泽东研究》（东京·日中出版）1977年。

② 三浦：《毛泽东主义》1976年12月出版。

③ 《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

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武器。”① 但是由于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政治的相对稳定，人民的斗争和五六十年代不同，这样，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宣传，主要是在革命政党、进步组织以及进步工人、农民、青年和知识分子之中继续存在和发展。二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日本的发展变化，对于毛泽东、毛泽东著作及毛泽东思想提出了种种问题，存在着种种分歧和争论。日本知识界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开始了更加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更多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17年到1949年10月1日的著作427篇。以后，又编辑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又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1986年由苍苍出版社出版了20卷（注：《毛泽东集》10卷，《补卷》9卷《著作年表》1卷）。不仅如此，他们还来到中国访问毛泽东故乡韶山，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搜集第一手资料，了解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情况、机构设置和人员力量，不久，就由竹内实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プリズム》（即《中国现代史折光》。② 这就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实，这些工作成果的本身就标志毛泽东思想在日本深入传播和发展。三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范围拓宽了。如果说，以前的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若干重要著作，那么现在则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

①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7日。

② 竹内实编：《中国现代史プリズム》，苍苍社1988年12月。

研究了。从已经出版的专著看，有传记、有思想史、有过去与现代比较研究、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关系、有研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关系，还有的搞毛泽东著作版本考证，等等。这样互相联系、互相借鉴，容易揭示毛泽东思想的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也便于推动毛泽东思想整体的研究。从这方面看，没有过去那种群众的多种形式的局面，但是确在新的形式下，朝着深入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日本专家学者，无论在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有一个走在世界其他国家前面的强烈愿望。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可靠基础。他们的艰苦工作必将为日本的现在和未来的中日文化交流，推动两国进步，建功立业。

二、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的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讨论的不多，我们看中岛领雄在他的《北京烈烈》和《文明の再铸造あ目ざち中国》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在战后被介绍进来并引起日本人的广泛兴趣，是鉴于当时，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中国认识的空白”和一种对中国的“赎罪感”。很明显，这很难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很难说明日本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思想那样的学习热情，更很难说明日本思想文化界那样的广泛搜集资料，从各方系统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现象。

我们从日本各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中所表示的态度、意见中，发现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第一、中日思想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自唐代就开始了交流。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别国经验的民族，很早日本就受着中国的文化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想从孔子学说、孙子兵法和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管理现代企业的方法，医治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固疾。虽然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两国社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日本变成法西斯军国

主义之后，极大地破坏了中日正常的文化交流。阻碍了两国人民的互相学习。所以，一旦被侵略、压迫的中华民族取得革命胜利，日本法西斯制度消灭，日本广大人民必然会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特别是他们一经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样，他们急切地想买到毛泽东著作，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必然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发展的基本原因。

第二，日本人民想从中国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参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日本广大人民也遭到极大的痛苦。战争失败之后，又处在美帝国主义占领管制之下，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活动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继续，日本向何处去，成了日本广大人民中心议题。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民主斗争，此起彼伏。他们看到中国由一个被侵略压迫的弱国变为社会主义强国，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我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把"矛盾论"读完了。日本人民为了摆脱殖民地的地位，正在英勇的斗争。正在此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照亮了日本人民的道路"。这是一位普通的日本人读了毛泽东著作说的一番话。我们认为他说出了毛泽东思想在日本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力量吸引了日本广大人民。毛泽东著作一经传到日本，毛泽东思想一经传播。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立刻发现和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真理力量，为它所吸引。他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提高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水平，指导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六十年代，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福井畅郎、交通运输共同斗争会议代表团的付团长森又助，在日本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到中国参观毛主席故乡，了解毛泽东的生平，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更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泽东思想一生也学不完。"我感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世界各国

人民、日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照耀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太阳，是我们心中希望的火光。”① 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说：“毛泽东为了解决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并且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最为斗争中的人民感到亲近。”②

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精华，必将为日本人民长期学习和研究。显然，用所谓“赎罪感”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再说，对于日本广大人民来说，他们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日本反动统治阶级，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我们祝愿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的发展，日益扩大；中国学习日本的科学文化，也必将日益发展。使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交流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各自国家的繁荣发展，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第二节　日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无论从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机构和力量以及研究的成果各方面来看，是居世界各国之首的。

这里，我们只把主要成就加以评述。

一、关于《实践论》的研究

日本的群众很重视学习《实践论》，理论界很重视研究《实践论》，他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章、不涉及《实

① 《中国青年报》1965年11月9日。

② 新华社1966年5月23日电：松村一人在1966年3月23日日本文化界庆祝毛泽东选集四卷在日本出齐会上的谈话。

践论》的几乎没有。因此，日本对于《实践论》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

（一）关于实践的概念和意义。他们认为，毛泽东以实践为主题，从实践出发，阐述认识论，就与过去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同，是抓住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关键和核心。过去的哲学都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讲起，恩格斯也如此。而毛泽东的《实践论》首先提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这是新视角。“恩格斯和列宁相信人脑可以如实地反映自然，不存在什么物自体。他们顽强地拒绝始于康德的批判哲学。他们的反映论是由脑子反映物质，其真伪要由实践来检验这种观点构成的。然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是由于他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地考虑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行’。据毛泽东讲，最早存在的是实践。在实践中，会有一些东西反映到人的头脑里。而且，那是否与客观实际（毛泽东认为，所谓‘实际’包含‘实践’和‘实际的事物’两种含义）相一致，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十分注意避开列宁、斯大林式的教义。”作者又说：“《实践论》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科书，其任务是如何把上述的知行关系的论述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大胆一点说，是如何超过它的问题。”① 无疑，《实践论》讲实践和理论、知和行的关系与马列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统一的。但是，指出毛泽东阐述认识论的实质和特点，是很重要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以实践论为题，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为了抓住辩证唯物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核心。我国过去只强调反教条主义的意义，是不全面的。日本学者的这一观点，是很有启发的。

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关于实践的概

---

① 新岛淳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刊于《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创文社1977年版。

念意义很广。“实践”被毛泽东看作是一切的‘行’”。①从实践形式来说，毛泽东确实认为人类的实践形式是多样的，“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②这就是说，人所参加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活动形式，都属于认识论的实践范畴，不能把产生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看得很窄，很单调。但是，作为产生认识的实践性质，只能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③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感性物质活动。”这个“一切的行”是不包括思维活动，不包括中国哲学史上的所谓“内省”或“修真养性”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新岛淳良在他的《毛泽东的哲学》一书中还说，毛泽东的“所谓‘实践是社会实践’的提法，是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明显区别开来的标志。”这是对毛泽东的实践本质完全正确的理解。

日本学者，一方面指出，毛泽东的实践概念很广，形式多样；另一方面，强调指出，在多种形式中，毛泽东着重提出，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形式，对于人类认识的产生、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新岛淳良认为，提“三大实践”，恐怕是毛泽东的独创。④生产实践是产生认识的最基本的实践，阶级斗争实践是人们在阶级社会的认识产生、发展的重要根源，这已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本学者提出并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科学实验形式的意义。新岛淳良说：“把‘科学实验’列入‘实践’之中，其意义究竟何在呢？第一，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认识方法放在辩证唯物论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特别是第二点，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各国家中，具有给科学家的作用、地位以明确保证的意

① 新岛淳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②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0、445页。

④ 参见新岛淳良：《毛泽东の哲学》，第44页。

义。假如不把‘实验’包括‘实践’之中，或者把‘科学实验’完全包括在‘生产、阶级斗争’的一般之中，科学家的作用就成为比直接生产者、政治活动家的作用次一等的了，科学家在人类认识上的巨大作用将被不当地低估了，科学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受到不当的轻视。毛泽东正是想把科学家的活动——不是以变革现实而以认识现实为目的的集团——的活动——提高到与变革现实同等的地位上来。”① 毫不自谦地说，我国理论界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深远意义。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论述，都是深刻而精彩的。

（二）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的思想，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对于马列主义也有丰富和发展。“而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尚未确立象现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确立的那种理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只是在谈到理论的检验过程时才使用‘实践’这一词。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反复提到的只不过是理论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提出革命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② 这样看，我们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列宁对于马克思的观点有过评论。他说：“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③ 这就是说，马克思也是把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即在检验真理性标准时，才把它作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如作者所说，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的。当然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把实践贯穿于认识过程的始终的思想，但是，他们的确没有从认识的源

① 新岛淳良：《毛泽东の哲学》第48页，劲草书房，1976年版。

② 新岛淳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继承与发展》引自作者的《我的毛泽东研究》一书，野草社1979年5月版。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一直到认识的目的这样系统地阐述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明确地提出并系统论述这一问题，则是毛泽东。毛泽东这一贡献彻底同旧唯物论反映论的缺陷划清界限，真正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实质。日本当代著名哲学家濑户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才是试图把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在实践论的一个侧面加以理解的哲学上的最早尝试。"①我们认为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三）关于实践发展过程的思想，日本学者，也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毛泽东第一次把实践分为'低级实践'和'高级实践'，而且把从低级实践向高级实践发展当作问题。这在毛泽东以前没有人持这种看法的。"②毛泽东认为，认识的过程，不但是思维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是实践的由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作为认识产生源泉的实践、认识发展动力的实践、真理性检验标准的实践和认识目的——改造世界的实践，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彻底的认识辩证法。总之，日本的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揭示了毛泽东的实践思想。

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问题，新岛淳良在他的《毛泽东の哲学》一书，针对日本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正确的阐述，他反对把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变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的公式。认为，把认识产生的始点实践去掉，社会成为唯心论的认识论，他坚持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实践"科学公式。他也批驳了关于认识的"现象阶段——实体阶段——本质阶段"的所谓三阶段的公式。他认为，这是受了黑格尔三段式的消极影响。坚持毛泽东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有人把"三

① 宋益民：《浅谈战后日本的化物论哲学》，《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2期。

② 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研究》野草社，1979年5月。

阶段”解释为同毛泽东的“两阶段”是一致的。新岛淳良则认为是质的不同。① 三阶段论者说，对自然的认识。特别是物理现象如此，而毛泽东的两阶段是适合于社会现象。黑格尔、康德都提出过认识的感性、知性和理性问题，那是讲的认识能力。毛泽东讲的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是揭示的认识发展的从量到质的飞跃规律性，指的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总是由现象、片面到全面、本质。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社会现象的认识，都不例外。这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也有人提出以康德、黑格尔的认识能力的三种形式代替毛泽东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二阶段。这既没有明白康德、黑格尔的观点，也没有弄清毛泽东两阶段的实质，是不正确的。新岛淳良在1976年的著作中就阐明了这一点，表明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有深刻的理解和很好的研究。

关于认识的辩证法，正如岩崎哲二的文章所指出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涉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问题，'客观实在的认识的辩证法的道路，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过渡到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二次飞跃'精湛地做了解释和说明，从而发展了认识论"。② 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关于《矛盾论》的研究

同重视《实践论》的研究一样，日本理论界也十分重视研究《矛盾论》。在这方面出版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很多，其研究成果，令人刮目。已故的法正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政治与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松村一人，早在1953年就出版了《辩证法的发展——以〈矛盾论〉为中心》的阐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专著，同时他还

① 参见《毛泽东の哲学》第三章武谷"三阶段论"、毛泽东の认识论。第61—80页。

② 日《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第4版。

在《思想》杂志发表了6篇论文。他是日本理论界研究毛泽东辩证法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专家。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知名学者新岛淳良于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の哲学》一书，除了以三章篇幅论述概念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外，用7章的文字联系广泛的实际，并且对日本国内的不同观点和争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矛盾论》的各方面的内容。这本专著虽然受历史的局限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和观点，特别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和观点，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就其对《矛盾论》重要理论观点的论述，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是有成就的。虽然作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有某些改变。这是另外的问题。

日本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研究，有不少观点是有启发的。

（一）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问题。新岛淳良的《毛泽东の哲学》一书的第五章专门论述矛盾普遍性问题。关于《矛盾论》的根本问题或核心是什么？在日本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是矛盾特殊性理论，或者说，是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灵魂，就是毛泽东辩证法的核心。而新岛淳良却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当初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时，其意图是更多地考虑论述矛盾的普遍性。根据之一，是苏联的德波林否认矛盾普遍性，从而导致了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的形而上学唯心论泥潭；而这一观点也影响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当时苏联正在继续批评德波林，因此，毛泽东在中国不能不十分重视德波林观点对中国的影响和苏联对德波林的批评。根据之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党内王明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否认国共两党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而搞矛盾调和、阶级合作。这种倾向在毛泽东写《矛盾论》时必然着重加以考虑。他还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出：“矛盾普遍性的思想是矛盾特殊性的鲜明，是毛泽东哲学

的核心。”① 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推动重视矛盾普遍性原理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这一原理在整个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很有启迪作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他之所以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没有重点研究矛盾普遍性，一是关于矛盾普遍性，由于马列主义的宇宙观被成功地运用于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上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二是“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这里丝毫没有表明矛盾普遍性不重要，也丝毫没有否认矛盾普遍性原理在整个辩证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恰恰是，首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遍运用了矛盾普遍性原理分析自然和社会，得到很大的成功，从而使许多人承认这一道理。“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毛泽东在引述列宁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之后，肯定列宁所说“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然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② 同时，毛泽东对于《矛盾论》的叙述逻辑，还指出：先来分析矛盾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旧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矛盾普遍性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毛泽东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82—283页。

对于矛盾普遍性的含义作了经典的概括，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用一句话说，"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① 由此可见，坚持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和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只有首先肯定矛盾普遍性，才能肯定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否则就失掉了前提。只有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才能贯彻彻底的辩证法发展观，才不致像德波林那样认为事物开始没有矛盾，后来才有矛盾，而陷于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只有坚持矛盾普遍性理论，才不会把矛盾看成消极的或者坏的东西，因而怕矛盾，在矛盾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坚持矛盾普遍性理论，才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把矛盾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形式，而不看作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从而也犯形而上学错误。由此看来，认为矛盾普遍性原理是毛泽东辩证法的，或者说，是"矛盾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或"核心"问题，不无道理。

新岛淳良为了说明这一思想列举了大量的有关社会、自然、思维领域中的矛盾实例，可惜没有从理论上论证。历史证明，这一问题得到许多人的承认是一回事，而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又是一回事。苏联30年代虽然批评了德波林的形而上学，但是后来斯大林仍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一直到他的晚年才勉强承认如果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会有矛盾的。重新解释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关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观点，但根本上并未改变把矛盾看作消极的、坏的东西的老观点。在我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94、280页。

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人责怪毛泽东的矛盾普遍性原理，重弹事物运动开始没有矛盾，后来才有矛盾的错误观点。就是新岛淳良在这一理论观点上，也不是前后一致的。例如，他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说，《矛盾论》是“矛盾绝对化的奇论。”①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新岛淳良在《毛泽东の哲学》中指出矛盾普遍性是核心的观点，是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日本理论界认为毛泽东作了重大的贡献，是毛泽东“第一次将矛盾特殊性等重要问题从哲学上加以理论化”，形成了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理论体系。② 毛泽东从事物的发展过程、阶段以及过程、阶段的各个方面分析矛盾特殊性，真正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灵魂。日本学者特别强调关于矛盾特殊性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分析，对指导中国革命制订战略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的学者说：“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功绩，一言以蔽之，就是将‘矛盾特殊性’更加明确……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将‘矛盾特殊性’的内容详尽揭示。”③

松村一人还进一步指出，矛盾特殊性理论中，特别是关于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转化的分析，包含着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完全是这样。完全可以这样说：《矛盾论》实际上体现了以矛盾法则为核心与其他辩证法诸规律、范畴紧密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这个思想在1965年，毛泽东对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是十分明确的。④ 松村一人教授早在1953年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是很深刻的。

① 新岛淳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刊于《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创文社，1977年版。

② 参见松村一人：《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思想》杂志1967年。

③ 松村一人：《辩证法の发展》岩波新书132号，第21页。

④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二）关于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关系问题。在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先后提出过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概念。除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外，这些矛盾的关系和作用是复杂的，它引起日本理论界的讨论，而且发生不同意见分歧，是可以理解的。说实话，这在中国理论界也是缺乏研究的。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根本矛盾是决定事物总过程性质和实质的矛盾，这个根本矛盾不解决，这个总过程的性质和实质就不会变化，过程就不能结束，而基本矛盾则是规定事物发展阶段的性质和实质，它不解决，这个阶段不会完结。还有的学者认为，主要矛盾是反映事物发展特点阶段的矛盾，等等。新岛淳良在他的《毛泽东の哲学》一书中，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指出，不能把“过程”和“阶段”的划分绝对化，毛泽东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分析而使用这些概念的。如果说根本矛盾是反映总过程的矛盾，而同样的矛盾，即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在《矛盾论》中的提法是“根本矛盾”，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则是提的“主要的矛盾”。在这里，毛泽东又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接着毛泽东就说：“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这样看来，“基本矛盾”又与“根本矛盾”完全一致了。如果把“过程”、“阶段”的划分绝对化，在理论上前后不一致，就很难说得通。新岛淳良先生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意见还不够完全。固然把“过程”与“阶段”绝对化不对，但是，毛泽东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确有把“过程”与“阶段”相对区别的情况。《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特殊性，就从过程、阶段相对区别中加以分析的。“根本矛盾”、“基本矛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4页。

盾”、“主要矛盾”的确定，主要还是同其他诸矛盾的关系而言的。例如说，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这些矛盾规定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这是和这个过程其他许多矛盾的地位、关系（例如，工农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封建军伐之间的矛盾、官僚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三大敌人之又交错存在矛盾）而言的。主要矛盾是指某一过程或阶段存在许多矛盾，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不可能是地位、作用相等的。总会有主要和次要之分，而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影响次要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些矛盾关系地位的变化，它既是基本矛盾，又是主要矛盾。例如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侵略中国与其他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一起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而抗日时期，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成了主要矛盾。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中国革命过程的基本矛盾，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它和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则成为主要矛盾。实际上，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几个根本矛盾或在事物发展阶段中的几个基本矛盾都有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这个主要的矛盾可能是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的一种或一个。由此看来，把“过程”和“阶段”的划分绝对化、把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区别绝对化，就不容易说明事物的真象。在理论上，也难于说得通。

由于《矛盾论》的译本不同和理解不同，主要矛盾是“一种”，还是“一个”，日本的理论界也有一些讨论，可见其研究之细致和深入。松村一人、寺泽恒信、森宏一、山崎谦等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主要矛盾是“一个”，而新岛淳良坚持毛泽东的提法，即“一种”。根据事物矛盾不平衡规律，同时存在几个矛盾的复杂过程，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这是无疑的。但是考虑事物过程的复杂性，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围绕这个主要矛盾还

存在同类其他一些矛盾，这就出现主要矛盾的多方面的情况，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矛盾。例如，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就很难加以区别，因为美蒋紧密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进攻。所以这两个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人们把这两个矛盾，也统称之谓中国人民同美蒋的矛盾。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① "一种"主要矛盾的提法比"一个"主要矛盾的提法更准确、更科学。我们认为新岛淳良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们还看到新岛淳良的《毛泽东の哲学》一书，从《矛盾论》联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述毛泽东关于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矛盾的实践和理论以及其他日本学者运用毛泽东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日本人民与美帝主义的矛盾、日本人民和封建帝制、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矛盾，试图探寻日本人民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问题。所有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启发的。②

（三）关于矛盾性质和形式问题。日本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虽然认识不同，有分歧，但是他们能够把《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

新岛淳良的《毛泽东の哲学》关于矛盾性质和矛盾的斗争形式的研究是认真的，有些观点是有启发性的。他为了把握对抗概念的准确性，从汉语词义上进行考察。他认为汉语的"敌对"原义包含"对抗"、"对抗性"。关于"对"字，有"对立"、"对不起"多种用词，而"抗"，有"抵抗"、"抗战"等等用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96页。

② 参见新岛淳良：《毛泽东の哲学》第六章。

法。这样研究，是否完全必要，另当别论，但是，说明作者的认真态度。之后，他得出结论，矛盾从性质上看，区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斗争形式，分为对抗和非对抗。斗争性是一切矛盾的固有的属性，而“对抗性”则不然。“一切矛盾均有斗争性、但是斗争性不等于‘对抗性’”。作者论述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性质的区分和因一定条件的互相转化，论述了矛盾的对抗和非对抗的两种形式。他从《矛盾论》联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联系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转化的条件。作者归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三个条件，例举《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五条。然后作者深刻地认定：“关于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好地处理党内斗争。”作者接着叙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经验，从而使许多尖锐的矛盾趋于缓和，使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使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是需要具备许多条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革命政党是领导者，领导党能否正确处理党内斗争，这对于解决社会诸矛盾，促使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确实是最重要的关键性条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尤其深刻地揭明，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给党、国家、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害！因此，日本作者能够这样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化的最重的条件，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指出，《矛盾论》的第六章的后边，毛泽东虽然引用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但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者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正确处理革命和党内矛盾的经验之后指出：“这样看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论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丰富，理论上的贡献，是非常清

楚的"。①

（四）日本理论界对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及其转化的思想十分重视。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他的"矛盾"的思想、"实践"的思想是统一的。毛泽东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及其转化的辩证分析，既是彻底的辩证法的阐述，又是深刻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新岛淳良在其《毛泽东思想》一书第四章"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第四章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虽然谈到社会历史与自然史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也讲到"动力的相互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强调"历史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②强调历史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反对主要敌人——唯心论，完全有必要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力对经济关系、社会实践对理论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一唯物论观点。但是在说明矛盾双方的辩证作用，即论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不够，对于除了归根到底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外的其他决定因素则缺乏明确的解释。这在青年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所表明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予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信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说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

① 以上引文均参见新岛淳良：《毛泽东の哲学》第八章。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单行本，第38页。

中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决不能“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①]但是其他决定性因素在怎样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问题，恩格斯没有进一步论述。由此，新岛淳良认为，历史过程的终极动因与其他动因的关系是怎样的？恩格斯给后人留下了难题。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则给予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②]

（五）日本对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许多深刻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从这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深度。

首先，他们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开创哲学新路的典范。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③]有的学者说，他“精读《矛盾论》，越发强烈地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点”。[④]正因为理论结合实际，所以“两论”是“群众性、实践性与深刻的理论内容的统一”。[⑤]“毛泽东著作通俗易懂好理解，故此要研究哲学必须从毛泽东的两部著作开始。”[⑥]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两论”真正体现了哲学的方向。

其次，他们认为“两论”是马列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指出：“毛泽东为了解决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践论》和《矛盾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争取解放的全世界人民来说，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思想武器。”[⑦]有的人认为：“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477页。

② 参见新岛淳良：《毛泽东の思想》劲草书房，1976年版。

③ 转引自《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7日。

④ 竹内好：《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思想》杂志，1962年3期。

⑤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1967年纪念两论发表三十周年。《思想》杂志。

⑥ 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第4版。

⑦ 1966年3月23日日本文化界庆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在日本出齐。

泽东的《实践论》才是试图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放在实践论的一个侧面加以理解的哲学上的最早尝试。”① 这种评论，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和体系贡献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矛盾论》的划时代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将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诸法则的核心，由此而阐明了诸法则的内在联系；其二，第一次将矛盾特殊性等重要问题从哲学上加以理论化。② 《人民新报》1986年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文章，认为列宁的晚年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命题，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完成了；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涉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问题，则由毛泽东的《实践论》做了“精湛地”“解释和说明，从而发展了认识论。”③ 总之，日本理论界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

再次，日本许多学者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不仅仅是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教训，而且由于科学地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的知行观中的合理思想。而辩证法思想则吸取了丰富的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华。相反相成、亦阴亦阳、福祸相依及其转化，知己知彼的全面思想，以至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的朴素辩证法因素，都成为毛泽东从中汲收的养料。总之，日本理论界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好继承和发挥。

最后，日本学者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哲学，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伟大意义。日本（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在“《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

① 宋益民：《浅谈战后日本的唯物论哲学》，《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2期。
②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思想》杂志1967年。
③ 《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

命胜利的强大的武器”通栏标题下，刊登工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座谈纪要。报纸按语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引导日本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并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科学地调查社会情况，用一分为二这个革命观点分析矛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① 这就是说，他们把《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指导日本革命的理论基础。

三、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研究

毛泽东关于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使日本思想理论界很感兴趣，虽然他们之间有争论，但是有些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很有启发的。其中研究得比较系统全面的是原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他对于毛泽东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它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地位、意义都有所论述。

竹内实认为，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前，在他的早期思想中就产生了，是他老师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竹内实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被他的老师打了一百分的《心之力》的论文，但是根据其他的早期思想，则推断必是崇尚思想、主观能动性的文章。竹内实引用毛泽东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的毛泽东的观点：“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又说：“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自己求之者。我欲仁则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然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②

---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70年8月27日。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

在看了毛泽东这一关于人的主体思想、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之后，竹内实认为，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主观”，即“自觉能动性”思想。这个思想有两个源流，首先是来自于恩师杨昌济对主观的重视，师第相承。由于查无资料，很难搞清其承继关系的准确性。其次，是“船山学社”的活动对毛泽东的影响。“立志”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由此，竹内实认为，毛泽东的“主观”概念是社会的、人格的、人生哲理的。并且在分析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的情况，他认为“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也是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潮流。这个‘自觉能动性’思想，与其讨论其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列宁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介绍到中国以前，毛泽东已经在他的先觉者的基础上确立了这一思想的事实”。① 在此基础上，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讲演中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完整科学的概念。

为了考察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的真实涵义，竹内实比较了《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和《解放》1938年7月43、44期，新旧版的文字的差别：

新　版	旧　版
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做就必须先有思想，有道理、有意见、有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与方能做得好。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在战

① 参见竹内实：《增补毛沢東ノート》新泉社，1978年。

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

竹内实认为，与经过修改过的新版相比，旧版更能清晰地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轮廓。他根据旧版的“做就必须先有思想，……方能做与方能做得好”的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强调的是，在主体的确立之外没有 任 何 东 西。主体的确立，就是自己的意欲、自觉、奋发、做。没有这些，任何理论、计划行动，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旧版中毛泽东的“方能做与方能做得好”的思想。①其实“做就必须先有思想……”和“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作者根据旧版的提法，指出毛泽东肯定主体自然属性的能力，还是有意义的。当然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是讲的主体与客观、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但是指出这种关系中主体自身的能动方面是必要的。如果不承认主体自身的这种能动性，那么客观的东西就不可反映到人脑中而形成思想、意见、计划和政策，也不可能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即实践。

竹内实把毛泽东和“自觉能动性”的思想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的思想相比较。他引述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中都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②之后，认为“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在对“现实的意欲的喷出的重视”一点上与恩格斯的思想符合。但是，竹内实看到恩格斯关于无论人的如何有意识的、有目的活动，但是

① 参见竹内实：《增补毛沢東ノート》新泉社，1978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总是改变不了“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样一个事实”，①发现恩格斯否定了历史过程中“观念”的决定作用。于是他得出结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自觉能动性”学说，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考虑到他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怎样的位置，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没有十分的学习和研究，因此不可能作为学说的体系来考虑。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②别的不论，仅就《论持久战》中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呢？完全没有。

就历史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决定，还是受人的“观念”、“意志”决定的问题，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一致。毛泽东讲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自觉能动性，只有这样的能动性才能推动历史过程的前进；一切违反客观规律，不顾客观物质条件的能动性，则是错误的自觉能动性，它不但不能推进历史过程，而且会推迟、阻碍历史的发展。但是，毛泽东讲到历史进程或者革命战争中客观物质条件与人的自觉能动性起作用的关系时，则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一般的指出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和重大作用，而毛泽东除强调经济的、物质条件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外，又指出，当着历史发展或革命战争在物质条件具备着向前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按照历史辩证法，认为当着历史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在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这时，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主观条件，人的自觉能动性就起决定的作用。这是一条普遍真理。由此可见，《论持久战》中的自觉能动性思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参见竹内实：《增补毛沢東ノート》新泉社，1978年。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54—455页。

不但不能说毛泽东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证明，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

竹内实在研究了毛泽东自觉能动性的形成、内容之后，指出自觉能动性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把“自觉能动性”作为其思想的根底或者说核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东西”。① 竹内实这一见解，很有启发。的确，毛泽东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以及他的工作和领导方法，无不贯串着“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总之，“自觉能动性”思想贯串于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从而突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四、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

由对毛泽东的若干哲学著作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这是日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没有对著作和重要问题的研究，对于史的研究是困难的，而进入史的研究，又能更深刻、准确地理解著作和重要问题的内容、实质和意义。日本理论界对毛泽东若干哲学著作和重要理论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为了解决问题，不少人逐渐注意开展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日本对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界定和中国不同，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因此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史，只限于毛泽东个人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版毛泽东思想史的完整著作，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的产生、发展研究，还是有进展的。其中有些资料不那么准确，有些观点、结论并不都正确，但有些研究意见，是有价值，有启发的。

中嶋嶺雄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过程中得出的若干结论是值得重视的。第一，他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环境、受中国

① 竹内实：《增补毛沢東ノート》新泉社，1978年。

古典文学的影响和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中的科学进步观点，特别是他的强烈的期望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这就注定了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不是当作纯学术的纯理论，而是当作“行动指南和战略战术的纲领予以接受的”。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并有独创性。第二，由于毛泽东受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反叛”思想影响，接受达尔文思想，因此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度评价“和平”、“调和”，否定“斗争”的儒家哲学不同，他很早就认识“斗争”的意义和作用。① 第三，由于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特别是直接受其恩师杨昌济的新康德学派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制和意志力、追求理想的影响，毛泽东早期哲学中存在着鲜明的个性、主观意志力的观点。有的作者认为，正因为如此，当着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之后，使之成为“自觉能动性”的理论。② 第四，在论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特点时，除了引用马列主义著作来自西方图书资料外，还提供了中国译自日本的马列主义著作的资料来源。据中嶋嶺雄的研究，马克思的名字，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福井準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的，时间是1903年。与此相对照，日本早在1882年（明治15年），《露国虚无党事情》（西川通彻译）中，马克思的名字和巴枯宁的名字一起被介绍到日本，又传到中国。到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发行和《平民新闻》的创刊就更加明瞭了。这对于我们研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有益的。由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和立志改造中国，所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革命的政治运用的，而不是学问的对象，从而不是知识的多寡问题。他的主题，是中国革命。他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原动力与面对的敌人，从实践的立

① 参见中嶋嶺雄：《文明の再铸造さ目ざす中国》一书和《现代中国论》1980年青木书店出版。

② 参见竹内实：《增补毛沢東ノート》新泉社，1978年。

场出发来认识，在过去的革命经验中得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适合的结论”。“他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型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口头上的”。① 这样来揭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二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有两个问题的研究合乎其思想发展的实际，而且抓住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其一，根据毛泽东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斗争的作用，特别根据毛泽东亲自参加领导农民革命斗争和农民教育与调查，从而奠定了关于中国农民的理论，特别是和后来的农村根据地的理论有直接联系，以至形成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与列宁的工农联盟理论的不同特点，即以农民为主力军与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不同。其二，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极端重视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在革命实践中进行阶级分析和实际领导阶级斗争，特别是领导农村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坚实的基础。新島淳良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紧密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正确的。② 虽然有的学者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与巴枯宁、俄国的民粹主义相联系，认为毛泽东的划分阶级是根据所谓是否有“余钱剩米”的“米柜论”等错误看法，但是揭示二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两个“基础”的东西，是有启发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认为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独创性的理论，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不能简单以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数量来评定，而应以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实际及其规律，是否具有真理性而定，也不能以毛泽东的某些文字和论断与巴枯宁、俄国

---

① 《竹内好全集》第5卷，第300页，筑摩书房。

② 参见新島淳良：《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创文社，1977年版。

民粹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就断定毛泽东是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而应从其整个理论体系和实质精神来加以区别。“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前者是巴枯宁讲的“自发的行动”，后者，毛泽东是讲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怎么能说“是相似的”呢。民粹派的“到民间去”和毛泽东要革命知识分子“真正地深入到人民中间去”，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再说，民粹主义并不是错在号召“到民间去”问题，错误在否认历史发展规律，错在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先进作用。由此可见，那种认为“贯穿于1926年至1927年间毛泽东著作之中的思想决不是马克思主义”①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他们在研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史时，对《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予以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评价，并正确地指出，延安整风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确立了毛泽东路线，或称之为“延安共产主义”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1941年至1944年间中共开展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领域的一些大运动，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局面。”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有的作者还考察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发展过程。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研究。可能一些作者鉴于中国提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于是，把中国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示思想，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说成是开始搞“个人崇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多年

① 参看永野英身：《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现代之眼》杂志1977年4月号。

的艰苦斗争，特别经历了多次“左”右倾路线的教训，到了“七大”有了共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理论和实践上成熟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根本不是什么个人崇拜的开始。对此，国内外都有议论。从晚年追索到早年，似乎一错皆错。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认为，从毛泽东的整个理论和实践来看，他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只是到了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在理论和实践上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史研究来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是薄弱的；就是在中国的理论界也如此，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充分肯定1949年建国伊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创造性，肯定中国共产党“八大”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思想不但对于中国是真理，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新島淳良这样写道：“毛泽东思想作为完全以农民和农业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句口号的重点是以农业为主。”作者说，他五次访华，感到许多方面政策措施是围绕着解决农业问题的。他说“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促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工人阶级必须为农民服务。我认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毛泽东是站在第三世界——占人口绝对优势的是农民——的前头，为人类开辟走向幸福天堂的道路。”① 有些表述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作者从亲自来中国的见闻和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探究，揭示出农村、农业、农民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从这一点上很好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

① 新島淳良：《我的毛泽东研究》野草社，1979年5月。

视角。历史反复证明，在中国搞革命没有正确的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理论、方针、政策，是一事无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依然如此。我国的改革是先从农村改革总结经验，逐渐推广的。今后的深化改革开放，需要更进一步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理论、方针、政策。中国居住八亿人口的农村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没有一个质的飞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就不巩固，也不能有新的发展。作者站在局外的立场，揭示出毛泽东思想中这一问题，是很深刻的。

日本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开始注意研究。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难题。中国对此的研究也刚刚开始。历史的科学的，即实事求是的研究好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正确对待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吸取他的错误教训，非常有益。

中西功先生的196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一书涉及这方面的不少问题。他这样早的考虑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自己颇有见地的见解是可喜的。正因为比较早，资料不充足，有些分析和结论就难于那么正确。

怎样界定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中西功认为，就是"完全脱离开'七大'形成的、一直沿续到'八大'的毛泽东思想。"即是和"七大"、"八大"理论、路线不同的思想。"在1957、1958年以后，它得到了全面的展开。"①

中西功在分析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的民主革命阶段的路线和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以及两个阶段的著作的关系没有加以区别，混在一起。他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和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为例证明这一点。二是，认为当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和很多干部思想没有跟

---

① 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青木书店，1969年版。

上来，落后了。所以常常用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于是“游击战时代的经验和现代生产的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以延安时代的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同现代生产要求的实际方法之间产生了矛盾”。三是，毛泽东受了社会实践关系范围的局限。“除了观念世界之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关系不大的长时期的生活环境，把他紧紧地固定在中国的民族革命的桎梏之中，妨碍他积蓄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所必要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① 第一点，是存在的。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基本情况来说，是注意两个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文献，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证明。第二点，开始是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6月毛泽东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提出思想要随着革命转变而转变的问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不断提出并努力克服思想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没有这种转变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第三点，不仅中西功，国内外不少人都提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原因。但不能把它绝对化。亲自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取得直接经验，无疑是必要的。毛泽东也强调这一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这方面受了限制，而在现代的条件下，通过其他渠道和手段了解和分析国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特别是又有我国其他领导者及广大干部的对外实践所提供的材料，也是可以弥补这种局限的。否则，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研究而科学预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可理解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体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② 毛泽东的

① 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青木书店，1969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4页。

话还是真理。因此，中西功根据上述简单分析，就得出结论：毛泽东“没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不能接受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它在中国又有联系，社会主义是从新民主主义发展而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区别的，但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简单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经验、办法，搬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某些观点、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抛弃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优良传统、否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就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把社会主义时期对新民主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立场、方法的借鉴，都说成是用旧方法解决新问题，也是不科学的。

晚年思想确定标准是什么？是以自然生命来确定，还是以理论生涯来划分？中西功先生是以后者为划分标准，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就是不同于“七大”和“八大”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从1957、1958年以后全面开展的。这和我国现在一些人的看法相似。那么晚年的思想，是否包含正确的和错误的两方面的成分呢？中西功没有直接回答。但在他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所涉这方面的问题，只讲了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这样，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错误思想等同了。这是不科学的。如果认为1957、1958年后全面开展的毛泽东思想都是错误的，就失去客观性了。不但对1957、1958年以后不能这样说，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犯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也不能说在这期间没有一点正确的思想和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科学的精神。因为中西功先生的书是写在1969年，我们决不苛求于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有讨

论，在此只是表示我们的意见，共同商讨。

五、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总体研究

日本在进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研究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许多总体性的概括。有些意见很有价值。总体概括，包含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等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日本文化理论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但是并未因此而减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来源于马列主义哲学，但是它不限于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更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有新的形式和内容。如哲学家松村一人说："毛泽东为了解决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并且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最为斗争中的人民感到亲近"。又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争取解放的全世界人民来说，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思想武器。① 这位哲学家还这样写道，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② 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就不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因为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

① 《日本文化界庆祝毛泽东选集四卷在日本出齐》，新华社东京1966年5月23日。

②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思想》杂志1952年。

新的阶段，所以“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这就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列主义哲学的关系阐述得非常透彻。它既反对割裂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列主义哲学的联系，又反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意义估计不足。说得十分恰当。

野村浩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比喻也很有意义。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比作“轴”和“磁场或土壤”的关系。他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必须根据它的多方面的相貌，对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分析。倘若大致区分一下，可以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轴和中国思想这一磁场或土壤。另一方面，作为一心为革命从事理论建设的毛泽东本人在思想上和哲学上的贡献以及几亿人民解放运动的反映，这种思想已成为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①这就是说，这个“轴”和“磁场”相结合，必然使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亿万人民的斗争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日本理论界有很多研究，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他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国哲学优秀传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继承的榜样。有的认为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形式来看，是明显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来源，是不可能的。松村一人指出：“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里都贯穿着中国思想遗产的深入继承”。毛泽东强调对孔子孙中山的继承。“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哲学变成了与民族血肉相连的哲学”，体现了“哲学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的特征。②野村浩一在讲到《实践论》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指出：认识论的知和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而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主要的内容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

---

① 野村浩一：《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刊于《毛泽东》，东京·讲谈社，1978年版。

②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思想》杂志1952年。

统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恐怕就是从这个‘行’出发的。而且，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虽然基本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分析，但还是想重新加以组织。可以将它称为双重过程，即毛泽东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接着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中国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作了一些补充。”① 是否可以说“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值得商量。但是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过程”，是合乎实际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实践论》是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合中，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在研究毛泽东辩证法时，许多学者都认为《矛盾论》从中国哲学的丰富辩证性传统，汲取了养料。有的说毛泽东的矛盾思想吸取了阴阳二元论中的东西，甚至也从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吸收辩证法思想。至于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更是明显地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兵书，特别是《孙子》兵法的合理思想。总之，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下了很多工夫，并且在继续研究之中。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征或特点问题，日本理论界有许多很有价值，同时也是很有深度的研究。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征或特点的研究是多视角的。有的从其表现形式，有的从其内容，有的从与其他哲学相比较，有的从它的功能作用，还有的从它产生背景根源等不同层面，来概括其特征或特点，使人受益非浅。

首先，日本学者注意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坚持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发展的历

① 野村浩一：《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刊于《毛泽东》，东京·讲谈社1978年版。

史事实，因此，他们认为“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创造了完全没有教条主义的理论。”具体谈到《矛盾论》时，认为它的“最大特征”在于彻底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认为《实践论》提出了与主观主义相对抗的理论基础的认识论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①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时代背景看，许多学者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特点，是精神优于物质的哲学，是上层建筑优于经济基础，或者说生产关系优于生产力的哲学，这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人为的指导优于经济规律的思想潮流，这是20世纪中普遍的、特有的时代特色。《矛盾论》中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表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②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这一彻底辩证唯物观点与20世纪蓬勃发展着的人民革命时代相联系，这对于深刻理解毛泽东哲学的精神实质是有意义的。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日本学者认为，在辩证法问题上确定以矛盾法则为核心，把其他范畴联系起来加以统一的把握，把矛盾特殊性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在认识论上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为核心阐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唯物论上强调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观点，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明显的特点。

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看，日本从学者到人民群众认为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大众化、民族化、文字语言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它使日本学者和广大群众受益很大。他们认为大众化、民族化“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认为这两个特点，意义极大。“倘若哲学没有民族的表现形式，它就不能为广大群

---

① 参见松村一人：《辩证法的发展——以〈矛盾论〉为中心》，《思想》杂志1953年。

② 参见新島淳良：《我的毛泽东研究》，野草社1979年5月。

众所理解，不能真正与人们血肉相连。”① 这对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真理，这是对于一些主张在中国取消毛泽东思想，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是一个有力的批评。它对于中国人也很有教益。

大众化，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和哲学思想是紧密结合实际，总结群众的经验，而上升为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虽然哲理深，但又为广大群众容易理解。“像这样密切联系现实的运动，并从现实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几乎是没有的。”② 不但毛泽东自觉把他的哲学变为群众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精神武器，而且，又“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是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③

对于深刻的哲理，能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字语言给以表达，这在日本是有口皆碑的。因此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几乎成了广大日本群众学哲学的入门。岩崎哲二认为：“毛泽东的著作通俗易懂好理解，故此要研究哲学必须从毛泽东的两部哲学著作开始。”④ 毛泽东哲学这一特点是以表现形式反映出来的，其实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决定的。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不能停留在少数人手里，而应当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关系哲学的真正功能和生命力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本质的必然表现，这也正是野村浩一教授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核心是依靠群众来进行中国革命”⑤，这是毛泽东思想本质，在哲学表现形式上必然反映出来的特点。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

---

①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思想》杂志1952年。

② 野村浩一：《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刊于《毛泽东》，东京·讲谈社1978年版。

③④ 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第四版。

⑤ 野村浩一：《毛泽东思想的构成及特征》，《思想》杂志1968年。

体系和实质做出不少有启发性的概括。

他们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是两篇论文，分别论述的是认识论和辩证法，但是实际上不限于认识论和辩证法，涉及了许多哲学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许多问题。松村一人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应看成是两篇著作，而应主要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篇著作。一般说来，可以说这两篇著作一起构成了辩证唯物论的整体。"

有的学者根据毛泽东一生之中一直亲历中国的革命实践，他的理论非常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至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实践，像一根金线贯串其中，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独特之点。因此，他们把毛泽东哲学概括为"实践一元论的哲学"①和"活的实践的哲学"。②关于"实践"的涵义，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毛泽东的用法：即包含实践活动和实际两方面的意义。因此他们所说的"实践一元论的哲学"，并不是排斥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思想，不是与唯物论相对立的，而是真正反映了辩证的唯物论的精神实质。所以关于"实践一元论的哲学"和"活的实践的哲学"的概括，是反映了毛泽东哲学理论体系的实质。仅管中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仍然认为这种概括，是有其价值的。

有的学者根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本质特征，认为虽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是又有毛泽东的许多新内容，而这些新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革命丰富的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不可能有的。于是松村一人作了这样的概括："毛泽东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国际的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新的内容的确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假如用一句话来表达毛泽东哲学的话，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

---

① 新島淳良：《我的毛泽东研究》，野草社1979年5月。

② 《日本文化界庆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出齐》，新华社1966年5月23日。

看，也是日本所需要批判继承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①

还有这样的概括，毛泽东屡次引用列宁的话，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最善于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又有这样的概括，毛泽东最反对“在书斋里一味地思索”搞那种“纯理论的结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决不是实质性的理论上的教义体系，可以认为它始终是实践中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为主的思考形式。”②

总之，这些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实质的概括，对于人们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深为日本理论界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成就而高兴。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毛泽东思想从30年代到今天，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已经近50多年。时间长，影响大，人数多，研究较深，确实有一些特点。

首先，以毛泽东思想之矢，射日本革命之的。这是30年代到60年代，日本传播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特点。

人们知道，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就一直阴谋侵略中国，发展到1931年9月18日开始侵占我国的东北，到1937年7月7日，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以来，由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致使日本广大人民对于现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是很少了解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理论毛泽东

① 《思想》杂志1952年12月。

② 宇野重昭：《“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参见《中国共产党史绪论》一书。

想的伟大生命力思，尤其不了解。但是，经过八年的较量，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失败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特别是当日本人民看到，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不但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而且后来又彻底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日本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了新的认识。

于是，日本的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过去的历史教训和战后的遭遇，有了进一步觉醒，开始希望从中国的人民革命经验，从毛泽东思想里寻找日本的出路。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的日本先进分子，30年代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逐渐向日本国内介绍传播时，就是当代一种革命思想武器介绍到自己的党和先进的人们中间去的。战后从中国回国的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等人在日本的活动充分的反映了这种特点。而当着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1—4卷陆续出版发行之后，日本从先进的革命者到广大群众，从日本革命政党到各界社会组织，为了从中国革命中学习经验，从毛泽东思想吸取智慧，解决日本的革命问题，大量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热情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办学习班、讨论班，建立研究机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形成了自中日文化交流有史以来的空前的高潮。如若不是这个特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时间不会这样持久，影响这样大，群众这么多，成绩如此可观！正因如此，日本人民由衷地说出：

"毛泽东思想一生也学不完"。①

"伟大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刻也不离我的身，我相信它对我们日本人民是极其重大的理论武器。"②

每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思想上有什么烦恼的

① 《中国青年报》1965年11月9日。

② 《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时候，只要反复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会豁然开朗，使我们得到进步。”①

1962年安斋库治在谈到《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日本人民中引起极大的关心和欢迎的一段论述，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日本长期广泛的传播和研究的这一特点。他说：“为什么《毛泽东选集》第4卷会如此在日本劳动人民当中引起极大的关心并受到了衷心的欢迎呢？这里有种种原因。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人正在追求能够解放自己的理论。具体地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日本人民正在热心地从中国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学习解放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他说，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必须避免机械地把中国的经验原封不动‘搬’到日本来，虽然如此，对日本人民来说，学习中国人民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学习其总结性理论——《毛泽东选集》，一般说来比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具有更加切实的意义。那只因为目前日本人民正处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水深火热中，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4卷正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斗争的胜利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理论总结。”② 这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日本革命实际问题，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日本革命之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有的放矢”。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日本传播、研究的最大特点。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研究上看，对“两论”的学习最为广泛，对“两论”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不但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谈“两论”的，就是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学习毛泽东的“两论”的人数也十分

---

① 日本工人党机关报《新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

② 安斋库治：《给日本人民的最富有战斗性的礼物》。转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9月18日。

可观，并且力图以“两论”的观点分析问题，指导工作和斗争，以至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两论”在50—60年代，是家喻户晓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发行量最多的也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学者专家对“两论”的研究，下的工夫最大。从内容上，对于认识的基础、源泉，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和认识的辩证法；对于《矛盾论》的各方面内容都有全面和比较深刻的研究。对“两论”的意义，一般都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有许多创造性的东西。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近些年来，又有人对“两论”形成的历史发展及其与30年代苏联哲学以及中国的艾思奇、李达哲学的联系有所考察。虽然由于资料和研究上的问题，所得结论不那么可靠和正确，但是反映了日本对“两论”研究的面是宽泛的。他们还从“两论”的研究中概括出“实践性、群众性和民族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征和特点。由于对于“两论”研究的重视和长期不懈，以至在日本理论界出现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研究的公认的代表人物。提起松村一人，人们都知道他是《矛盾论》研究的著名教授。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相比，首屈一指！

第三，千方百计，广集资料。为了系统、准确地研究毛泽东思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界都十分注意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而日本的文化理论界尤为突出。他们除翻译出版《毛泽东集》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各种文献外，又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搜集中国尚未公开出版的资料。日本已经收集出版中国尚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讲话、文章及有关资料，录编《毛泽东集》和《补卷》达20卷。他们早就编著了《中共党史》10卷本，他们还收集编辑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10多卷本。此外，他们还不断派学术团体来中国访问，搜集资料。1988年11月出版的，由竹内实编的《中国现代

史プリズム》一书，就是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之后，整理的资料。他们称“中国现代史的折光”，为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搜集资料。其实这本书不只是“折光”，也搜集了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日本搜集资料，首先，着重收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讲话、文章的原本。《毛泽东集》中的不少毛泽东讲话、文章，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群众组织印发的内部材料、传单得到的；有些是从解放前的各种报刊发表的公开的材料集中起来的；有些是从其他国家得到的。例如，1964年和1965年，毛泽东的几次关于哲学谈话，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已广为流传。其次，他们广为搜集解放前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不同版本，从中考察文字的修改变化，以便了解毛泽东怎样随着革命情况的需要而不断补充、完善、修改自己的观点，了解其思想的发展过程。再次，注意搜集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背景资料。例如他们不但注意搜集中共党史资料，而且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中国哲学界的每次重大讨论和争论，他们都积累了很详细的资料，而且有他们的评论。这就为毛泽东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这方面的工作，很值得借鉴。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史论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特别近些年，由于日本学者不象过去那样多从正面论述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错误，使得日本理论界特别注意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对毛泽东著作，注意考察其所谓“原型”，即最初是怎样，后来为何又补充、修改的历史情况，进而了解其理论实质。现在似乎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人们也往往试图从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和实践中寻找联系。由此而发生简单化的缺点，得出的结论，也难以使人信服。他们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多方面的。例如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时期思想加以比较，把毛泽东哲学思

想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观点、方法加以比较，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哲学加以比较，从而发现毛泽东思想和他们的异同，论述毛泽东思想内容和形式的特征和特点。这样使问题的阐述具有鲜明性。但也有陷入简单对比，流于形式和表面性，影响把握问题的实质。如说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与马列的工农联盟理论不同，就不十分准确。除了有个以谁为主的区别外，都是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说毛泽东的辩证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性有“质的不同”，①这就不正确了。有的还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实践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批判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理论的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还有的把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说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阴阳二元论”，②也过于偏颇。说它吸取“阴阳二元论”中唯物主义因素，是合乎实际的。如此等等。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不可能有统一的计划性，都是根据各自的兴趣与可能搞研究。这样出现了研究的多方面、多领域和多角度的特点。有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有研究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有的研究毛泽东生平，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史……，这又有一种好处，就是多领域、多方面、多角度互相借鉴，也有一个互相比较、促进作用。

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是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受着中国情况发展变化的很大影响。因此出现了波浪起伏。最早是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分子的学习和研究，到了50—60年代，逐渐形成群众性的学习和研究高潮；自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又回到某些革命组织和少数学者专家的范围。发生现在的局面，原因是多方

① 参见《竹内好全集》第5卷，筑摩书房。

② 参见野村浩一：《毛泽东》，东京·讲谈社1978年。

面的。首先，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工农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低潮。其次，自日共和中共发生分歧以来，日共内部也出现分裂局面，对于传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发生变化。再次，中国“文化大革命”后，肯定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犯了错误，这使日本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产生很大影响。以至在日本文化理论界一度陷入沉寂，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因此毛泽东思想传播和研究，出现一些曲折复杂的形势。有些人本来完全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现在变为部分肯定，甚至完全否定。把《矛盾论》说成是“矛盾、斗争绝对化”的错误理论。许多问题，在中国，一度也很混乱，无疑也影响了日本一些人。虽然有一些革命政党和对毛泽东思想确有深入研究的人仍在坚持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但是这种力量总是有限的。虽然，毛泽东思想不会因此而失去其真理的光辉，但是重现50—60年代那种高潮，没有新的条件的产生，是难于出现的。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只要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日本人民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对于日本人民始终是有用的，日本的革命政党就不会放弃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教益，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的文化理论界的有识之士，也不会放弃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且从现在的形势看，他们将更下工夫搜集资料，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为日本文化交流贡献力量。特别是广大的日本人民，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的启迪，是不能忘怀的。

如果说，50—60年代，日本的学者专家，主要是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么，未来他们也会对毛泽东的某些理论缺点、错误，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进行探讨，这是正常的，这对于正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也是有益的。即使某些正确的东西被误解和扭曲，那也无碍大局；过去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不少争论，但并未妨碍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的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出的光辉就越灿

烂。”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在新时期新的条件下，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虽然基本原理和原则还是毛泽东思想的，但是有一些新创造，已经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反响，一些学者专家开始了对中国现在与过去的比较研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更加感兴趣。

总之，无论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中国现代文化的精华，还是当作日本人民可以借鉴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是不会中断的，而且必将有一个深入的发展，学者专家们会推出更新更好的研究成果；日本广大人民的斗争一旦需要，还会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学习有益的东西。正如吉田松雄所说：“我相信它对我们日本人民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理论武器。”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② 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65年9月30日。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研究

第一节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传播的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文明国，有灿烂的文化。作为各国文化交流，很早就有传播中国文献的国家，如周易、孔孟书籍、孙子兵法及中国的古典文艺著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早就在国外流传。这在欧美国家也不例外。他们把它统称之谓“中国学”或“汉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侵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重要人物，无不广集资料，加以研究。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文化尤为重视。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于毛泽东著作及其思想的积累和研究，则是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的。

最早把毛泽东不仅作为共产党的领袖、革命战争的领导人，而且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介绍给欧美的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他在1936年6月至10月到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有机会同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革命领导人多次接触和谈话，了解许多外国人不得而知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仅能领导人民打仗，而且是熟悉中外知识的人。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于1937年—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书中写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

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他认为，毛泽东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哲学的，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他写道：“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权衡标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①这本书在欧美的出版、传播，这本书对毛泽东的介绍，对于欧美许多不了解毛泽东的人来说，真是振聋发聩的信息，为他们重新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后来，有个叫卡尔曼的人也到过延安根据地，1939年8月他写了《毛泽东会见记》。其中说他听过毛泽东的讲演。“我听过他在抗大对学生的讲演，他讲演关于战争的辩证法。”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军官，比较早地注意毛泽东军事思想。1940年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杂志上撰文指出：毛泽东既熟读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军事著作，又通晓对立统一的原则，并运用这原则研究战争，提出一整套新的游击战争理论。②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的传播，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展、人民文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之后，逐渐发展扩大的。最早在欧美传播的是毛泽东的文艺著作，1949年10月，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就翻译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法译本后来流传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许多译本均以此为依据。1952年5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由德国艺术学院翻译也出版了这本书，作为代表大会的参考文件之一分送给作家们，同时还举行了这本书发表10周年的纪念

① 《西行漫记》第65、67、68页。

② 参看高铁军：《西方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情况简介》，《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4期。

会。50年代初，在瑞典、芬兰等国也陆续翻译出版。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单行本。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篇《讲话》，一定会发现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毛泽东的听众们来自不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毛泽东坚定地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说来也象是坐在延安会议厅里的听众一样是合适的。"德国戏剧家、《马门教授》和《新木马计》的作者沃尔夫，曾在他主编的德国人民戏剧协会机关刊物《人民与艺术》创刊号的封里中，摘登了《讲话》中所说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以此"作为创办这个杂志的箴言及宗旨。"①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广泛传播，是从1951年10月到1960年9月，我国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和1977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1954年到1955年，英、法等国相继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从60年代起，欧美诸国普遍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挪威、瑞典、芬兰、希腊先后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选集》原英译本有5卷，为了人们的学习方便，后来作了简缩。第一部分是"政治和战略著作"，第二部分是"哲学著作"，并由著名作家安尼·弗利曼特尔写了序言，指出："《毛泽东选集》对那些关心中国革命的内在意义以及中国革命在世界变革中的先锋作用的人们来说是必读之物。"②欧美各国特别注意传播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们编辑了《毛泽东〈实践论〉入门》，包括"两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北戴河哲学谈话》、《杭州哲学谈话》等文章。还编译了《毛

---

① 《光明日报》1987年5月19日。

② M·弗利登伯格：《评"新美国图书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美）《新共和》周刊1962年11月17日。

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入门》，收集了毛泽东有关历史唯物论的文章。到1958年，在法国已有相当多的人读毛泽东著作。巴黎《灵报》月刊1958年11月号发表的富惹罗马斯的《读毛泽东的著作》文章中说："自从1958年5月13日以来，毛泽东在法国成了时髦的作家。我国的若干军官在印度支那战争时期，往往在越盟的战俘营里，曾经有机会接触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1936年写的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题的那部著作。这些军官研究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的理论之后，试图从中吸取教训为法国军队服务。"有的国家不满足于《毛泽东选集》，他们广泛搜集毛泽东著作编辑成集出版发行，供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如德国的海尔默特·马丁主编的《毛泽东文选》收集了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直到他生命终结期间所写的文章。1979—1982年版，共7卷。第1卷于1979年出版，1980年出了德文版，1982年又出了英文版。①美国的施拉姆主编的《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1956年至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美国布朗大学高英茂教授编译的英文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作集》，意大利罗马吕蒂尼出版社出版了《湘江沉思》等。有的刊物不仅积极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而且还发表文章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内容、意义。1958年英共《劳动月刊》载文说，读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觉得这篇著作用诗意的笔法所描绘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富有启发性的景象，对一切献身于改造世界的人们都有共同的实际价值。美国的《新世界评论》说，这篇文章对悲观失望者是"一剂良药"，他使人体会出把帝国主义者称为"纸老虎"的意义。加拿大的《国事》月刊说："要了解今天的世界，就必须了解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意义；要了解这个胜利，就必须阅读毛主席著作。"②

① （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季刊》97期1984年3月。

② 《读书》1958年11期，第30页。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它是积极参预瓜分中国的国家。1945年后，它又支持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它在越南进行侵略，后来又侵略朝鲜，也失败了。所以它对中国采取了经济、政治封锁政策，敌视伟大的中国人民。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不得不积极研究中国，同时，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也是阻挡不了的。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多年间，美国不断地积累关于现代中国的资料。他们把当代中国研究作为一项专门研究。他们不仅搜集毛泽东著作，而且搜集解放前我党出版的报刊杂志。他们购买了几乎全套的《解放日报》、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党的地下出版的大部分小册子和刊物（包括大多数的油印本）。胡佛研究所中共文献收藏部在1960年从台湾那里监制了一大批资料，其中包括大约1500件中共文件。他们对毛泽东著作的搜集出版不限于中国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5卷，也搜集了解放前的各种不同版本。如，1945年3月晋察冀翻印的1944年最早版本；1945年7月由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1）；1946年8月大连的5卷本；1947年3月第三次印刷的大连1946年8月本；1947年3月渤海版；1947年3月晋察冀增订本。后来他们又搜集1949年至1969年的毛泽东文章，自称“卷帙繁浩”。他们正准备出版50至60卷本的《毛泽东全集》，其规模之大将大大超过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此项工作将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主持。为了研究方便，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1972年还出版了《论毛泽东：书目索引》。前言说明：编辑该书的目的，是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并增加对毛泽东及新中国的了解，所收录的图书和期刊论文，包括各种不同的、有争议的观点，但它们并不代表编者的本人的观点。目录分四类：一类关于毛泽东生平事业书目107种（篇）；二类关于毛泽东的“政治学”书目393种（篇）；三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书目163种（篇）；四类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书目147

种（篇），以上四类书目共计800种（篇）。①

由此可见，美国不仅出版毛泽东著作，而且搜集出版有关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书目文章。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的传播中，毛泽东军事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法国、瑞典、希腊合编了《毛泽东军事文选》两卷本。1965年9月17日瑞典记者柏林马克在《劳动报》上发表评《毛泽东军事文选》文章指出：今天在瑞典的书店中可以买到二次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Ⅰ—Ⅱ卷。不读毛著作的人就不可能抓住今天世界政治中、力量斗争中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毛是关于游击战争大量现代著作之父。他以奇异的冷静分析局势，并以特殊的清楚观点得出结论。阅读这个革命要人的文章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他以其理论震动着世界。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是欧美国家军事院校的重要科目。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就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不少学员以此为课题撰写论文。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卡尔逊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考察过八路军领导的游击区，并听取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的介绍，他结合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它运用于太平洋战争。他先后带领游击队在日军占领的梅金岛和瓜岛登陆，开展游击战争，取得辉煌战果，从而荣获海军十字勋章。他们不但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运用于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逝世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欧美各国又开始搜集出版党中央的文献和《邓小平文选》。纽约《美州华侨日报》1983年9月9日报道《邓小平文选》在纽约发行，立即被抢购一空。1988年9月，德国以书名为《革命的改革》的邓小平文选，由西德勒出版社出版，首版印数2万册。这本书搜集了邓小平23篇重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7年4期。

要的谈话和讲话，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经济和改革政策》；第二部分：《国内政策》；第三部分：《外交政策》。本书由前总理赫尔穆特·施米特写了前言。前言说："邓小平使中国共产主义变得实实在在，并使其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的务实主义连同他的威望是当前成功地渡过变革困难时期的最好保证。""这场经济改革，是迄今一切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试验"。并认为，邓小平是本世纪80年代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最杰出的一位。①

由于毛泽东著作在欧美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第一，不少人学习了毛泽东著作之后，增长了新知识，开阔了认识的新天地。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如英国的琼斯说："从他的著作来看，我认为他是一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通情达理的思想吸引了我"。② 挪威一位人士说："对我们这些北欧小国的人民来说，毛泽东永远是我们的导师。他教导我们改造社会。我们记得《实践论》和《矛盾论》打开了我们对事物的新认识"。③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声明指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在革命的德国共产党内成了教科书，这些著作是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性著作的一部分。"④

第二，出现了研究现代中国、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机构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批专家学者。美国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以费正清为首的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设立了中国资料收藏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成立了施拉姆为首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出版的《中国季刊》载有研究毛

---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88年9月4日。

②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5日。

③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402页。

④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101页。

泽东思想和中国建设问题的大量文章。美国、英国、法国、前西德、荷兰、丹麦、瑞典由政府组织了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挪威、以色列由高等教育系统设置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同时，出现了以斯图尔特·施拉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专家。施拉姆30年来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文章，颇有成就。许多人写出了有关毛泽东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毛泽东传等专著，在欧美很有影响。如哈佛大学教授R·特利尔写的《毛泽东传》1980年出版后，被西班牙、英国、以色列等30多个国家的报刊连载，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世界关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毛泽东传》印数已突破50万册。他们不只自己研究，而且在欧美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讨论。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他们在1986年11月18—21日在意大利乌日比诺市召开毛泽东思想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西欧、美国和中国的30人。他们既有国际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梅斯纳、意大利东方大学格列索夫斯基教授和高查教授，又有新近崭露头角的年青汉学家美国特弗兹大学副教授兹威格、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塞齐。还有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纳托利和波切尔教授。这次会议就毛泽东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哲学理论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实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①

第三，引起欧美自上到下的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广泛评价。这种评价不仅存在于毛泽东生前，而且存在于毛泽东逝世之后。这对于一位历史人物来说，是罕见的。

“对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伟大，他的成就及其持久性，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人们可能会有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而且这一点即使在他死后，也仍有说服力。这是从世界的角

①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2期。

度来说的。因为在世界的范围里，人们不能不把他与列宁这样的人物相比较。……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1]我们以英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评论开始，作一些简要介绍。

首先，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英国的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这样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在过去25年当中，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如当今世界上希特勒、卡西姆一类的人物。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2]美国学者费正清说：“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建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3]挪威的特隆·欧格里姆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一书中说：“对毛泽东的巨大信任有事实基础。毛泽东经历了许多考验。他在半个世纪中领导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你信赖建造过许多坚固房子的、经验丰富的老木匠。你对他言听计从，他一开始干活，你就相信他会干得很漂亮。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木匠’，是当代独一无二的‘木匠’”。“几十年来毛泽东确实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这不是哪个代表大会（或中国政府）宣布他为领袖，而是因为他的巨大成就使他获得巨大的

---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② 《在东方的失败》，《国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文选》，第316页。

③ 《美国与中国》，第197页。

国际信任。”① 这是三位学者深思熟虑的评价。

再看一下，毛泽东逝世后，欧美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指出：“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② 前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存在。”③ 意大利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人类。毛主席屹立于本世纪最崇高的领导人之中，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他比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还高一筹。”④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意义及其重要性也有许多精湛的评价。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⑤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态度，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对此，我在许多场合都表明过，认为无论对中国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都是一个重要革新。因此，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密切联系实际的观点”。⑥ 有人这样评论：“如果

① 〔挪威〕特隆·欧格里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第221—2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② 尼克松：《领袖们》第325页。知识出版社，1984年2月。

③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104页。

④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114页。

⑤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139页。

⑥ 布兰德里·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序言。《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2期。

说列宁思想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斯大林思想体现了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列宁主义发展阶段，那末毛泽东思想体现着在亚洲最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斗争普遍化时期的马列主义的发展阶段。”①

著名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逝世后，评论说：“因为毛泽东是人，作为人，他是有错误的。但不管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就是打破马克思列宁主义老教条的束缚，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成立后，毛泽东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作的努力，可以说持续了半个世纪。当然，夺取政权期间的环境与建设社会主义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但他所作的努力贯串了从1926—1976年的一整个时代。”②

一位西德人，叫恩•包斯奇巴斯写了《屹立高峰的雄鹰》诗：

“毛泽东呵，天上的星，
你灿烂的光辉放光明！
在这动荡的世界上，
你是思想家和无产者的希望。
……
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团结我们的是共同的思想！
毛泽东，你是屹立高峰的雄鹰，
你是我们的希望。”③

---

① 《谈谈毛泽东著作》，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创办的《方针》报，1966年5月第1期。
② （英）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③ 《人民日报》1965年12月8日。

远隔重洋的友人，对毛泽东有这样深沉的情感，使人们看到留想的感染力量多么巨大！

法国学者让·雷斯诺在《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西洋的读者，他们常常在孔子或老子面前感到无法理解之苦，但是跟中国共产党领袖却完全可以相处泰然，这就出色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的沟通者的作用了。"① 这一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著作何以能在欧美传播的深刻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欧美为什么还继续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呢？他们说："有关毛的问题是，他既是中国的列宁，也是中国的斯大林。他们不想要斯大林部分，但他们仍然需要列宁"。否定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要宣传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原因。② 一位外国记者了解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看了报刊文字宣传，又访问人民群众，更见到人民对毛泽东的深沉怀念。他报道说："无论是作为现在或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在今天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仍是最有号召力的。"③ 这也是推动毛泽东著作在欧美的不断传播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著作在欧美的传播，虽然不如在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广泛强烈，得到那样地积极学习和运用，也不象在日本50—60年代那样，形成空前的群众性的学习运动。但是，欧美广大人民一经接触到毛泽东著作也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欧美的知识界受到的震动更甚，他

---

① 乔桂云：《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2期。

② 拉雷尔·沃森、毕林格和卡罗尔·博格特：《毛泽东永垂不朽》美国《新闻周刊》1986年9月8日。

③ 徐志忠：《毛泽东逝世15年之后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法新社北京1991年9月7日电。

们开始了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随着他们的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作为一种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有了生存之地。虽然，由于毛泽东的逝世和世界的变化，有人说，“现在，毛泽东已不再是西方青年崇敬的领袖”了，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力量是不会磨灭的。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人们还会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智慧的。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还会继续在欧美传播发展。

“毛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以前中国之千年的历史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找不出毛这样的人。”

“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之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属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60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已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认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① 特利尔教授这一评论，最足以说明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在欧美的命运。

---

① （美）特利尔：《毛泽东传》，第527、53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第二节 欧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哲学家代表，毛主义是当代唯一的中国哲学。”①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在欧美虽然尚有分歧，但是给予肯定的评论的为数不少。虽然欧美专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写出专门著作的不多，但是，凡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学者无不论及毛泽东哲学思想。他们的研究还有相当的深度，值得我们重视。他们的一些研究和提出的问题，不一定那么合适，我们不能同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对于积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对《实践论》的研究及其成就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欧美引起广泛重视，对它的研究、评论很多。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米歇尔·卢瓦为《实践论》法文版写了前言，对《实践论》的评论比较系统。我们以米歇尔·卢瓦的《〈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为主，结合其他人的研究加以介绍。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是1973年巴黎奥皮耶·蒙旦书店出版。此前言在1970年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中国学家大会上宣读过。1971年9月她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曾来我国访问。她对毛泽东哲学著作有一定的研究。无疑，由于时间、地点的局限，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然而，可以无可争辩地说，正是《实践论》给我们提供了那种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全部著作连成一体，并保证运用这种认识论的全部实践前

---

① （美）H·Gcreel：《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纽约版，1953年。

后一贯。所以中国人民一直学习它，无疑，是有理由的。《实践论》分析了“社会实践”这个概念。既然社会实践是从行动到思想又从思想到行动，即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的互相转化的场合，这个概念就尤其重要了。《实践论》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总起来说就是社会实践）是如何必然产生认识、改造世界和人类的。作者强调了毛泽东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指出，“哲学家改造物质而不管思想，这将是毫无用处的。”

作者在论述认识的辩证过程时，注意了毛泽东关于思维和思想的区别，用以批评教条主义不懂通过思维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她指出：“仔细看一看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到，用来说明这种更高一级程度本身的词却有时是思维，有时是思想。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正式文章里，却只用思维来同思考相对应，即用产生思想的行动本身来和深思熟虑相对应。正是毛才进一步区别思维和思想这两个词：思维用来说明思想不断发展的程度，即一种还在部分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而思想则已经在第二次‘飞跃’中回到实践而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因此，思想接近于真正合乎逻辑的概念，即正确的‘理论’，因而能够有效地用之于世界。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条主义者’、‘顽固派’和其他轻视中国现实的人的错误，就在于愚蠢地满足于‘思维’，永远不能向思想‘飞跃’，而这一点只有实践才能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显然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即任何教条主义也不能再使之僵化的、创造性的、‘活的’思想”。作者接着又说：“由于《实践论》是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相对真理的巨大螺旋体需要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发展，才能到达‘绝对真理’这样宏伟而令人鼓舞的比喻来结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永远是相对的‘思维’变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即理论，也即不断地被事物的运动所否定但又在实践的飞跃过程（思考）中不断地被深思熟虑的‘劳动’所赶上的思想；也

可以说，思想是已经达到的‘实际和思想’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本身就是暂时的，在它达到的时候就是不稳定的，一旦实践不再证明它为真实，它就又变为思维。同更高一级的、实践的产物思想相比，它还总只能是思维。如果这种统一就此僵化，它就只不过是剽窃来的思想，是‘学舌的鹦鹉’们和‘留声机’们的空谈，是‘八股’，是‘墙上芦苇’们从西方弄来的时髦货，以后受到资产阶级的一切传染病的感染，就会置党和革命于死地。”作者根据毛泽东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以认识的相对性道理，批评教条主义，是很深刻的。作者对于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作了概括。她指出，《实践论》“他在这篇论文最出名的部分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则尊重从物质到思想，又从思想到物质这一往复无穷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构成认识的产生过程。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分析了事物的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必然使思想和实际经常对立，必须经常重新加以检验。”作者认为，毛泽东强调意识的反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她指出：“毛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已为他‘在马克思主义总的理论范围内结合中国的实践’，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贡献所证明。在这种贡献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通过认识论的深刻研究而使辩证唯物论产生的飞跃，以及他坚决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残留的机械唯物论。他坚持强调人的意志对事物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这样，他在1937年就已经保卫了革命的非经济主义观念。”

作者认为，毛泽东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是根本对立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实践论》是毛泽东的所有哲学论文中不说是最难的，至少也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因它同我们的传统哲学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传统哲学把认识置于实践之上，而且是超阶级的。”因此，责难《实践论》中吸收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对此，《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指出：“有人提出毛泽东把经验主

义的因素带入了唯物辩证法，但是研究这两篇著作绝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英国的H·B·阿克顿在《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中作了更充分的论证。他指出：“有的人认为毛把经验主义的因素带进了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种结论没有为这两篇文章（两论）的研究所证实。真实的情况是，毛首先阐明了认识是从实践过程中在感性器官中形成的从感性认识开始的，然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些理性认识能使世界按照人的目的进行‘铸造’，并使它到达更高一级的理性认识。从文章中，还看不清楚作者是认为这是一种归纳法还是一种假设的经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毛的观点中，在向更高一级认识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飞跃’。由于这样运用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毛断言理性认识无疑在性质上是不同于感性认识的。因此，这种理论是不可能被说成是经验主义的。”① 在国内，一度也有类似观点。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4年12月28日致信李达：“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② 在这里，西方作者注意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西方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划清界限，是完全正确的。

许多西方作者联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毛泽东认识论的特点，就是密切联系革命实际，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英格·舍费尔指出：“毛泽东在30年代的政治性文章研究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这表明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联系何其密切。”1930年他对革命根据地发展悲观主义的批评，就揭露了其认识论上的根源。“毛泽东从哲学上解释了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于非辩证的认识观，因此就不能从事物的表面、现象、部分而深入到它的本质，而把事物非本质

① （英）H·B·阿克顿：《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动态》1986年1期。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的现象当作本质，从而停留在经验主义上。”“1930年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用哲学批判极左的教条主义的例证。毛在这篇文章中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从天上掉下来’的抽象真理。如果是这样，人们就只需要从书本学习，然后把这种真理形式主义地应用于固定的现实。理论——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被当作‘神圣的或神秘的’东西来看待，而必须在具体实践的应用中指出它们的此岸性和力量。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显然的，他不断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建筑在历史情况的特殊性上的实践相结合。”① 他还认为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短文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决非偶然。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历史观强调了历史进程中意识的能动作用。这篇文章同样是和解决党内思想争论有关。所有这些反映了毛泽东认识论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

美国的弗•霍勒布尼奇在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贡献时，对毛泽东的认识论的特点作了全面的概括，也是很有价值的。他指出：“毛的哲学思考全部集中在人类认识的本质和认识方法”。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是鲜见的。他明确指出：“毛的认识论的特点有下面六个方面：（一）特别怀疑和厌恶一切纯观念上的东西；（二）同时明确认定他自己的哲学不是一种思想体系，而是对真理的正确反映；（三）作为典型的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论者，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绝不是静止和永恒的，真理总是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总是不断地来自外部世界，而其自身也总是包含着矛盾；（四）要求不间断地实践和实验，探求真理必须持之以恒、永无止息，因为世界上绝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五）

---

① （西德）英格·舍费尔：《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辩证观点》《毛泽东思想导论》第1编第3章1、2节。慕尼黑出版社，1987年。

相信实践是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实践本身就蕴涵着真理；（六）承认实践和实验在其完全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存在有局限性。”①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认识论的特点。

为了证明毛泽东认识论和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这一特点，米歇尔·卢瓦在《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中，用大量的文字论述毛泽东于1937年研究哲学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他写道：“1937年1月，经过了16年的斗争、失败和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他的部下在陕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安顿了下来，但是，如果说领导权易了手，那条被否定了的路线却仍然存在，这条路线还有强有力的支持者”。“王明及其一伙被称之为‘强硬派’的这些人，满脑子书本知识，‘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研究哲学目的在于“在党内的空谈家和机会主义分子刚刚使革命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但还在继续玩弄公式而不是正视现实的时候，更快地并尽可能更广泛地传授一种生动有效的马克思主义。”②这就促进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和讲演。说明这种历史情况，对理解《实践论》，了解认识论的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二、对毛泽东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欧美对毛泽东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根据《矛盾论》，但是不限于《矛盾论》，涉及面较广，提出的问题和争论较多。研究比较有成果的，目前看来，要数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苏。

① （美）弗·霍勒布尼奇：《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认识论的贡献》，《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

② 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序言》《外国研究中国》1978年第1集。

他写了一本《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在西方有一定影响。我们主要围绕他的这本书，结合其他学者的论述加以评述。

《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由荷兰雷德尔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分为：序言、六章。涉及毛泽东的时代及其思想发展、毛泽东的方法论和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具体内容的论述。作者结合西方的有关争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出版公司介绍说：近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各种思潮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无疑是最多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辩证法理论，是试图从哲学上探讨这个复杂问题的第一本书。

作者通过比较文化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革命活动（实践）的真正基础是他的辩证法理论；"辩证法"的本质是"相互作用关系"或"相关性"；所有的辩证关系都受"可转化性"和"条件性"这个最普遍的原则所支配；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式的，而且明显地更倾向于后者。

作者曾在中国和西方就学，是唯一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在比较文化分析领域里是一项真正的成就。本书对了解毛泽东，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对当代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有所裨益。同时，波士顿大学教授T•布兰克里在《编者的话》中也给予肯定的评价，称此书是"一本比较文化分析领域中天才的代表作。"可见其重要性。

（一）方法论和出发点。

作者认为，哲学要以它的方法论为条件，而且方法本身也成为哲学的组成部分。所以他论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和出发点。作者以毛泽东著作中的大量材料论证毛泽东的根本方法是"活学活用"，或者说"活的学习和活的运用"、"能动的学习和能动的运用"。这就是指出，毛泽东反对把理论看作僵化的东西，反对照搬教条，而把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根据中国具体情

况加以学习和运用。一句话，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毛泽东曾经把实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看作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作者能指出这一点，是很深刻的。

接着作者从毛泽东著作中归纳出方法论的四个基本的要素：

1．综合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全体——局部——全体”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毛泽东受中国人研究哲学方法的影响，总是把现实（情况或事件）作为全体而不是作为局部来理解，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以孤立的观点，而总是从全体上来看待任何情况或事件。当然，他也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始，但把具体问题看作是全体的一部分，和全体联系在一起的。

2．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过去——现在——将来”的研究方法。作者以大量材料论述毛泽东重视历史地看问题。今天是历史的发展，无古不成今；不研究历史的发展，就认不清今天事物的本质，就把握不住事物的性质和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

3．具体的客观性这个观点。遵循“客观——主观——客观”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虽然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就是物质先于精神，无论是在自然界或社会中，变化或运动的规律都在实际中起作用。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毛泽东建议：应该在具体的客观性中去研究现实，它包括三个阶段。在把现实作为整体来考察时，先从客观现实开始，然后产生主观的反映，最后转回到客观现实以完成考察过程。在这整个过程的始终，必须强调客观现实，避免主观主义。

4．实践逻辑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实践——理论——实践”或“社会实践——理论——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在《实践论》中得到充分的展开。这是达到真理认识的唯一的科学方法。

作者最后把“活学活用”看作是“综合的实践”。而把四个基本要素又分别归为两类：“综合”指的是“全体——局部——全体”和“过去——现在——将来”，而“实践”指的是“客观

—主观——客观”和“实践——理论——实践”。

总之，作者把毛泽东的方法论根本点看作是“活学活用”。方法又有四个基本要素。或者说毛泽东的方法就是“综合的实践”。

（二）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内容。

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着重分析了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内容。作者对矛盾的概念作了一般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分析，对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和矛盾的辩证法、即对立统一，作了分析。

作者对于矛盾一词的汉语语义和英语语义作了分析，然后把汉语义与英语义加以比较。作者发现毛泽东常把矛盾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含义有三种不同。一是指逻辑上的矛盾，一是指事物关系的对立，一是指事物、问题。确实有这种区别。但是毛泽东在哲学上使用矛盾，就是指事物之间的对立而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关系。用中国哲学传统语言，即“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毛泽东没有给矛盾下定义，但是其意义是明显的。作者指出，“‘矛盾’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关键之点，而且也是他的整个哲学的核心，而哲学又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乃至他的政治和革命活动的基础。”这一论述，是有意义的。不仅在欧美，就是在中国，有些人并不理解矛盾在毛泽东哲学中的意义。作者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社会、认识中的矛盾的分析，指出，毛泽东为什么说“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思想”。为何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最后，作者对矛盾概念作了五点概括：

1．毛泽东在自然、社会和人或认识这三个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了矛盾一词。

2．从矛盾的这几种不同的用法得出它主要含义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或“动态关系本身”或简称“关系或相关性”。

3. 除了其主要含义外，矛盾还在具有细微差别的三种不同的含义上被使用：即分别用差异、问题或困难和对抗来表示“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4. 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的哲学含义不仅包含对立而且包含相互补充，不仅有斗争而且有同一。

5. 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不仅是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关键，而且是它的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说明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这个词就是“矛盾”，即“矛盾即现实”或“现实即矛盾”。由此可见，“毛泽东赋予哲学上所用的矛盾一词以独特而又丰富、动态的内容”。

我们认为，第五点的概括是深刻的，抓住了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灵魂。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就是矛盾的学说，即关于对立而统一的学说。

接着作者认为，毛泽东辩证法理论包括三个要素：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和辩证性。作者对普遍性、特殊性、对立而统一和斗争均作了分析。作者特别把“转化和条件”与统一性、斗争性并列加以论述，突出了“转化和条件”的重要性。

关于斗争性问题，引起欧美学者的重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对于毛泽东的斗争性观点作了正确的论述。有人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斗争的固有性、普遍性、永恒性和有益性。但是过分强调斗争在毛泽东辩证法中的地位。说辩证法在毛泽东手中“总有着一独特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在他关于斗争普遍性这一概念的论述中特别明显，通过这一概念，用斗争这一共同特性把自然、社会和方法联结了起来。”① 有人说：“一点不用惊奇毛的斗争本能。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屡次主张斗争是一条绝对的自然界的规律，受到列宁的很大影响。毛认为辩证法是斗争的或物体

① J·B·斯塔尔：《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哲学研究动态》1987年1期。

本质的矛盾的学问。”① 其实毛泽东历来明确指出，统一和斗争是矛盾的不可缺少的固有属性，他们的关系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毛泽东讲事物发展动力时，总是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 总之，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且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不但不是强调斗争性，而主要是讲矛盾的统一性。《矛盾论》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也是如此。特别在这里，还指出斯大林对列宁辩证法的片面性，“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③ 不能认为斗争是绝对的就重要，统一是相对的就不重要，更不能因此就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说过“斗争哲学”，但是那是有针对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的。

（三）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

关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有许多研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有些观点是明显的。这些观点是有启发的。许多学者认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个贡献。如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的差别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来说，就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又说，“毛对矛盾结构的阐述匠心独具，比历史上任何一种矛盾理论都更为详尽。它包括1．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即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原理；2．某一事物或现象中有主要矛盾和若干次要矛盾的原理；3．某一矛盾体中有一个矛盾主要方面和若干个矛盾次要方面的原理。毛认为，矛盾内部对立面不断追求平衡而进行

①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沉思》，《毛泽东思想研究》1981年2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的斗争导致了一切事物与现象进行螺旋式地运动。与恩格斯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和螺旋式发展就是一条规律或公理的简单论断相比，毛的事物发展动因说和螺旋发展方向说显然远胜一筹。”①

关于对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贡献问题，不少学者都有一种相同看法，即怎样看待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所谓三大基本规律的关系问题。认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贡献。霍勒布尼奇指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恰如其分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普遍性规律。毛认为，辩证法所有其他规律和法则都是对立统一这一根本规律的演绎。——《矛盾论》中这样的阐述在马列主义文献中还是前所未有的。恩格斯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规律之一，而黑格尔和列宁将其视为辩证法的主要规律之一，唯有毛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唯一大法和根本规律”。②作者从《矛盾论》中发现毛泽东这一思想，是不简单的。就是在1937年毛泽东讲授《唯物辩证法》（提纲）时，也还是三大规律并列的。但在讲《矛盾论》时，就有了以矛盾法则统一整个辩证法体系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矛盾论》未讲其他两个规律和范畴，而讲矛盾理论之中包含了其他两条规律的思想。但是，后来这一思想搁置了。建国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60条》（草案）中又并列三大规律。有的西方作者看了觉得不可理解。就是不了解这种缘故。关于辩证法体系的重新考虑是在60年代。这时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出现了不少经验教训，需要进行理论总结，毛泽东同时从哲学世界观高度研究了一些问题。1965年底一次哲学问题谈话，提出“哲学体系改造”问题。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

---

① （加）《弗·霍勒布尼奇选集》第9章，《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4期。

② （加）《弗·霍勒布尼奇选集》第9章，《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4期。

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我国国内有人说，毛泽东取消两个规律，只讲一条规律，是把辩证法简单化了。后来，毛泽东在1965年给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批注，把他关于辩证法体系的思想明确下来。该文已发表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之中。很明显，毛泽东确实建立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统一的辩证法体系。毛泽东并不是取消质量互变和肯定否定规律，而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质量互变和肯定否定以及其他辩证法范畴，认为三大规律并列不科学。我们认为欧美学者很早就发现毛泽东对辩证法这一贡献，是完全合乎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情况的。

三、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

由于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特别是是否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彻底解决，加之，苏联多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当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发表，在欧美立即引起很大震动。当时的美国当权者也急于弄到这本书来阅读，这样，此书在欧美学者中也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形势要求他们开展一定的研究。

当年的美国务卿杜勒斯首先看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后，他认为共产党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并自觉解决矛盾，这是不简单的事情。文章很厉害。当然他是怀着敌意来研究这篇文章的。美国的《新共和》周刊1962年11月17日发表文章说："也许最富有启发性的文件是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矛盾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存在的。"正如挪威的一位学者指出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态度，表明了他在实践辩证法和论述辩证法理论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揭露和摈弃了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阐述中大量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他针对这些错误指出：阶级斗

争继续存在，阶级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是的，不仅有矛盾，而且充满了矛盾！有人说党内完全一致，这是胡说。党内总有斗争的。是的，'没有矛盾，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人民和社会主义敌人之间的矛盾（敌我矛盾），就是在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他接着又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毛泽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它充满着矛盾，有互相斗争着的阶级，既有正确也有错误，而不是僵化的、完美无缺的和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给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和新鲜血液。而在此之前，由于教条和决定论的僵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正在遭到扼杀。苏联认为，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窒息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却把它撕碎了"。① 从这一论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作用。

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瓦从辩证法的彻底性角度来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她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三篇伟大的哲学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把矛盾法则推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把实践即认识产生过程的依赖扩展了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境界。《实践论》以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共产主义这个灿烂的前景作结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坚决地提醒大家为了这个灿烂的远景，从现在起'人人需要改造'，包括劳动者，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② 作为彻底的辩证法，把矛盾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必然的。坚持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需要自觉地适应客观要求不断改造思想和认识。这也是应有之义。

---

① （挪威）特隆·欧格里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第200页。

② 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

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于毛泽东的文章，作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基于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原因，基于调动人民、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才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他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旨在重新恢复双百运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认为"毛泽东有着这样一种观点：共产党并不必然具有对正确观念的垄断权，因此，党要听取来自外部的批评。重新开始双百运动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需要激发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而且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促进力量，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合乎需要的和永恒的——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毛泽东主义理论的主要公式。"他认为讲话在政治上变得十分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事实证明，这两个命题是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兆。毛泽东列举了许多种矛盾，其中他特别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矛盾不仅一般地存在于政府与群众之间，而且尤其存在'领导者'与'人民'之间，而'领导者'并非单纯地指下级官僚机构中的官员。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排除与人民发生矛盾的领导者也许就是党的最高的领导人这种可能性，他没有排除在一些问题上领导者是错误的而人民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①不仅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毛泽东在其他许多文章中都讲过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讲过中央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从来不把高级领导人排除犯错误之外。《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讲到他也是犯过错误的。到现在，我们也承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说这一观点是"文化大革命的预兆"是缺乏根据的。

---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矛盾，而在于用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

总之，欧美学者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也是有成绩的。

四、关于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哲学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重视和广泛研究，而且误解、分歧也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对主观能动性和"唯意志论"的界限问题。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或者认为，毛泽东哲学中存在"唯意志论"。有的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自觉能动性是毛泽东哲学的一大特点，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联。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麦克莱伦论毛泽东哲学特征时指出，"毛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点，表现在中国人是重视人和精神的因素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强调'经济'的决定地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从属的。在这一点上，毛主义却十分强调上层建筑的地位。这同20世纪里许多改变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这样的流派，是相同的。从传统看，中国对于精神和政治态度是特别强调的，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社会要比其他任何一种观点多得多，并且它具有自身的特征。有的说，毛泽东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有的学者引证《矛盾论》中毛泽东关于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互相转化，讲到理论对实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论述，认为毛泽东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论述具有合理性。但是，有些人以毛泽东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并逐步使之变为革命战士，甚至说这是用政治、思想创造一个"无产阶级"，并说，毛泽东关于社会革命发展是强调人的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经济

因素的决定作用。所以认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对于农民参加革命后，怎样使其由个体农民转化为革命战士，甚至成为共产党人，固然政治思想教育起了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他们过着集体的经济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起了巨大作用。两者不可缺一的。只说是思想改造作用是片面的。对于广大农民的改造，则更是经济改造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虽然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但是，现在工农之间还存在差别，不能说农民已经变为“无产阶级”了。

所谓“唯意志论”，它是主观唯心主义流派。最大特点是否认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否认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而认为主观意志是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唯意志论是根本对立的。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因素关系时是非常明确的。他指出，指导战争，首先要研究战争的规律，不从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就不可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物质条件，而不是决定于主观条件。在《矛盾论》中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首先肯定“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并且说，“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后又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这就是“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问，“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当1938年在《论持久战》一文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②又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这里说的决定的了，就是指变客观可能性为现实性。这是没有疑问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任何唯意志论的观点。只能证明他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

至于有人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某些错误来证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说：“如果有人要概括从1949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中国政策的演变，那么可以描述为不断提高人的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志，使其凌驾于理智地分析事实之上的过程。”由于“思想改造”的方法不断使用，“从而进一步鼓励了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思想显著特点的那种唯意志论的发展。”① 这是忽视了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理论的实现的区别。人们知道，正是毛泽东于60年代发现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大讲要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敢想敢干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如果是“唯意志论”的思想体系，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人看到我们出现某些错误，就联系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证明其一贯性，更是不可取的。人们完全可以判断，早期的毛泽东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本质是不同的。

五、关于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研究

欧美学者对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是当作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加以研究的。许多人写了不少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的文章。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他写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文中说：“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就是使党非官僚化……他的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曾经引起西方知识界的很大注意。”② 对欧美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哲学问题和方法问题。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提倡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紧密相联。美国的爱德华·哈蒙德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群众路线》的文章指出：“群众路线无疑是毛泽东的路线，而且，它比所谓‘正确的’或‘革命的’路线更实在，因为它有一个判断正确与否的坚实基础。因此，它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作者认为毛泽东对群众路线概念没有更多论述，他想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找群众路线的“根”。他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吸取了

① （美）施拉姆：《毛泽东》，第241页。

②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它的‘根’是相当深的。”作者认为《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三条所阐明的哲学观点与旧唯物主义在根本上划清了界限的“革命的实践”，为群众路线这一更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一思想，作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群众路线是社会学。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观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群众路线否定任何‘超人’，技术决定论或超自然的力量，它认为领袖、机器和上帝是人民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第二，群众路线是方法论，特别是领导者的方法论。来自群众中的认识要求回到群众中去。真理的认识不是来自熟读神圣的教科书，不是来自于锦囊妙计或锁在抽屉桌内的科学发现。社会实践的真理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发现——与群众打成一片，特别对政治领导来说更是这样。这样丰富的内容要求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总之，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第三，群众路线是认识论。正确的认识对象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仅要求改造世界，而且要求全体人民来改造世界。在感性实践中，认识过程使群众运动从历史的动力（或客体）变为历史的主体。任何其它的认识对象和方法论，割裂认识对象和方法的观点都不会导致群众路线的产生。我们认为，作者关于群众路线是社会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概括是深刻的，揭示了群众路线的哲学意义。

六、关于毛泽东伦理学的研究

西方作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平等、自由的思想很重视。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更深的程度上探讨了自由的丰富含义，在人的平等理论和实践上是现代领导人中最成

---

① （美）爱德华·哈蒙德：《马克思主义和群众路线》，参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4期。

功的人。的确，毛泽东著作中很多论述关于人的自由、平等问题，反映了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在国内仍缺乏深刻研究，而欧美学者注意了这个问题，值得欢迎。

关于社会平等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历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争取社会平等而斗争。他历来讲革命队伍中的人是平等的，互助友爱的。讲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强调领导者要以普通劳动者资格出现，平等待人，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群众打成一片。弗朗西斯·苏指出："关于社会平等，我要说，毛是所有现代领导人（包括中西方）中第一个认真从事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常用英雄史观和官僚主义化来表述）的解决并有所成功的人。""毛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根据财富、权力，特别是教育来结成相互关系，形成不同等级，那么这种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应该被改变。""尽管他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也没有得到全面的评价，但他对社会平等这一原则的洞见，则使他走在了他的时代的前面，同时也走在了一些现代社会哲学家的前面"。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不若一些人把它污为的社会"乌托邦"的诽见。

关于人的自由，弗朗西斯·苏的评论也是有价值的。他指出："作为一道德概念来考察自由，毛在更深的程度上探究了自由的丰富涵义。"

"毛的自由观包含着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辩证能力。不可否认，在探讨自由问题时，毛确实似乎用社会自由来解释个人自由，这似乎可以从他的三个基本前提得到确证。这三个前提是：第一，国家的美好或共同的美好总是同个人的美好等同的；第二，个人应该为共同的美好牺牲自己的自由；第三，个人在行动时应以道德激励为动机。这种强调社会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毛否定西方世界的那种个人自由。在西方世界个人从而个人自由总是被强调突出，社会自由要以个人自由来说明，而非相反。""在中国，被强调的总是团体而非个人，

个人的自由要用社会的自由来说明。这种观点在强调自由重点时，显然是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朝代、家庭、社会或国家等方面的共同美好总是获得优先权，因为它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美好的必要条件。这样，从理论上来说，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应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我认为，这正是毛试图要做的事。正是基于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互相补充，毛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这个社会将为个人自由和个人美好提供一个必要的条件。”作者认为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这种微妙平衡是不容易的，有时很矛盾。毛泽东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作者仍然认为“意识到个人和社会之间，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辩证能力是明智的，它将永远存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毛的自由观之中。”①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认为“国家美好同个人美好等同”，而认为国家美好、共同美好，总是可以帮助个人美好。毛泽东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绝对自由，并不否定西方世界的那种个人自由。总的看，作者对毛泽东的平等、自由观的评论是正确的。

七、关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一节我们就指出，欧美诸国注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很早就出版了《毛泽东军事著作选集》供军事院校和军事部门研究。1983年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出版了《军事战略》教科书，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许多军事院校讲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有的学员还专门撰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文。欧美军界有的人结合他们的战争经验教训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并试图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去指挥他们的战争。由于其立场不同，战争的条件、性质不同，即使他们得出某些正确结论，但在

① （美）弗朗西斯·苏：《毛对中国的梦想》，《毛泽东哲学研究动态》1986年2期。

实践上也很难实现。有的人直率地批评军界不重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正研究，一知半解，停留在表面上，甚至说，毛泽东著作没有什么“新内容”。英国的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说：“不错，作为一种职业的象征！在许多军官的书架上都可找到毛的著作，”但充其量只不过读了二十几页，仅此就足以使一般读者明白，这些军官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一些有毅力的人确实从头到尾读过毛的著作，但是读完了又觉得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毛依然是个谜。我曾下功夫寻找过因能解释毛的学说而闻名的英、美军官，但是总是发现这种人有名气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从毛的口号中弄到了一点皮毛而已。这些词句与毛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有何关系，他们并无深刻的认识，甚至不懂这些口号的用意是什么。”他批评说：“那种认为毛的教导没有什么新内容的议论，是一种危险的议论，因为它常被用来压抑研究毛的著作的愿望和要求。根据我在陆军里工作的经验，放大嗓门叫喊毛的教导没有什么新东西的人，是那些对战争知之不多的人。”他说：“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① 的确，正因为西方有巴特曼这样一些人，我们从欧美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不少真知灼见。

欧美军界除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和实践有许多正确论述之外，主要认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认为他的军事学说是在他的哲学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见解是深刻的。

首先，他们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之所以正确，就在于他不是孤立地就战争、军事而论战争和军事。“毛的研究之所以入门自然是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以及他从前所作的研究所促成的。在此之前，他已花了多年的时间详细地分析过中国的老百姓

①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

以及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所处的不同社会形态。他把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和暴动，依照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现实加以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就与实际相吻合了，成了他后来军事上胜利的起点。他中肯地指出，对战争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社会的研究，战争并非社会真空中的军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人类社会本质，经济本质及人类历史背景中根深蒂固的特点和特性。”① 因此，毛泽东极为重视群众的力量。“他指导群众，说服群众，动员群众，并使他们站立起来。……他认为中国革命要以五亿农民为基础，以持久的‘人民战争’为基础。”②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水，游击队是鱼。”③既然战争是社会本质，是政治的继续，它的基础是人民群众，那么，就必须使参加战争士兵有政治修养，了解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在美国，我们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使士兵不过问政治，甚至作出更大的努力使政治不触及到士兵。而游击队却恰恰相反。他们竭力保证士兵们有政治修养，在危险情况下也能认清问题。一名经过训练，有纪律的游击队员要比一名用老式鸟枪和自制炸弹武装起来的爱国农民、工人或学生强得多。他甚至还没有练射击就开始受教育，不停地受教育。教育的结果使他成为忠心耿耿，信心十足、目的明确、有政治警惕性的战士。”他结合在越南的战争教训说：“在越南，胡志明、长征和武元甲都是聪明的学生。他们像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样，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政治的继续。我们和在我们之前的法国人都不懂这一点。而正因我们不懂这一点，我们才被赶了出来。”④ 这种关

---

①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

② （美）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斯：《毛泽东论游击战》“译者的话”和“序言”。

③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

④ （美）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斯：《毛泽东论游击战》“译者的话”和“序言”。

于毛泽东军事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之所以正确，就是他贯彻了辩证法。“毛泽东的寻根究底，洞察一切的头脑，很容易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方法。”“按照毛‘对立统一’的原则研究一下他的战略、战术理论，是很有趣的。”①作者认为对立统一，运用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学说。事物的阴阳两方面总是互相作用，永无止境。它的基本论点就是“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游击队分小组活动，几分钟里就会被消灭掉，这是它们的一个弱点。但由于他们分小组活动，他们就可以迅速地偷偷地进入敌人易受攻击的后方。”②这就是强弱的对立统一辩证法。毛泽东分析战争问题总是全面的，看到有利不利的两个方面，“毛通常是经过正面论述和反面论述，再得出结论，如讨论中日战争时，他说：‘亡国论是不对的’，然后他又说：‘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战争将是持久的，但是中国将取得胜利”。“总之，毛的战略原则就是：了解情况；具体地分析情况；找出互相对立的特点或双方强弱因素；利用我之长敌之短争取主动；根据情况改变战略战术；观察战争要有远大的目光。”③另外，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也有正确的认识。说：“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粹军事性考虑为基础来进行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却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毛泽东军事理论一再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要能巧妙地运用兵力，以打击敌人的弱点，力求陷敌于最不利的地位。”④例如，进攻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思想里是一个

---

① （美）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塞缪尔·B·格里非斯：《毛泽东论游击战》“译者的话”和“序言”。

② 塞缪尔·B·格里非斯：《毛泽东论游击战》一书“译者的话”和“序言”。

③ 菲利普·戴维逊：《毛泽东的战略》、美《陆军》杂志，1963年4月号。

④ （美）基辛格：《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经常要处理的观点，但在欧美的一些军界人士那里也变得复杂了。他们指出："主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军事著作中比西方显得更为巧妙，西方只把主动用于进攻，而在中国传统中在防御时也能采取主动。这是毛泽东'战略退却'思想的核心部分，他指出，'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①有的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是非常深刻的战略，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

最后，欧美许多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之所以正确，使日本、蒋介石失败，使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就是因为它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就是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巴特曼指出："列宁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运用于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则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于战争问题。通过这种形式的推理，毛研究敌人战争理论产生的条件以及得以贯彻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以及军事情况，以确定这种战争观是否正确。""他的学说的基础是'人民军队'的军事体系和'人民战争'的政治军事哲学。""毛泽东的战争哲学，如同他以前的战争胜利者的战争哲学一样，也是来源于对战争的分析。"②西方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启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并未因为现代战争条件的变化，而轻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思想家的著作：如《孙子兵法》也十分重视，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这是有远见的。

八、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的研究

欧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什么特点讨论很多。一是从毛泽东

① 《哲学译丛》1978年6期。

② （英）迈克尔·爱特略·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

著作的大量内容看问题，二是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比较看问题，三是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看问题。有些研究是有启发的。

第一，有不少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强调实践性。“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践范畴，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是唯物论范畴，历史唯物论范畴，使用非常广泛。实践不但是认识产生的基础，而且是认识发展的动力，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十分强调哲学的实践目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人。这和马列主义哲学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是在人怎样把物质反映到头脑来的，他是强调实践的作用。其实，毛泽东认为应当把物质和实践统一起来。认识是对物质的反映，但是没有人的实践，物质是不能反映到头脑中来的，所以，毛泽东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和马列主义强调物质对认识的根源性，是一致的。

第二，有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充满着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间的矛盾，解决人间的矛盾。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指出：“毛的著作的内容的中心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就‘人道主义’这个词是指关于人和人同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毛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改造社会，通过改造社会结构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称为一种人本主义或“积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哲学。

特别是毛泽东总是强调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

① （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外国研究中国》1978年第1集。

盾，给欧美学者以深刻的影响。他们从哲学高度来概括毛泽东哲学这一特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他的方法是一种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他激发人们思考问题，自己也参加思考，从中获得知识。他相信有一种乐意与人共享而不强加于任何人的基本哲学，相信这种哲学最终将得到证明。"① 这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自然就是注意人的能动性，所以自觉能动性问题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必然的特点。欧美学者把自觉的能动性仅仅说成是思想、意识能动性，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所讲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指的思想和行动，即实践，这两方面的能动性。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只有正确的思想，没有实际的行动，自然、社会是不能改造的，同样没有正确思想指导的行动，也是不能更好地改造自然和社会。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他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毛泽东强调思想的能动作用。但他的自觉能动性，不就是思想、意识的能动性，不就是如同欧美学者所说的"思想改造"、"政治教育"。不仅要强调思想、意识，而且更要强调思想、意识指导下的实践。这才是毛泽东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

第三，欧美一些学者从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发展，总是和分析解决革命内部和党内倾向分不开的事实，断定政治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30年代写信批判林彪对根据地的悲观主义，毛泽东从哲学上解释了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于非辩证的认识观，因此就不能从事物的表面、现象、部分而深入到它的本质，而把事物非本质的现象当作本质，从而停留在经验主义上。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用哲学批判极"左"的教条主义的例证，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抗日时期写的《实践论》和《矛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1965年11月5日。

盾论》，结合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哲学上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表明“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联系。① 政治性，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有的人公开说，毛泽东哲学就是“政治哲学”。

“政治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性，是合乎实际的。但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是“政治哲学”，未必确当。毛泽东哲学联系政治问题，但他所得出的结论不限于政治问题。它具有普遍意义。以《实践论》和《矛盾论》来说，就是明显的证明。

第四，有的作者还根据毛泽东哲学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命运，这就促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特殊性、个性、特殊道路的观点非常突出。这也是一个特点。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马克思者毛泽东》一文中说：“1938年，在面临即将与中共党内的‘国际主义’派（即亲苏分子）摊牌的情况下，毛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了这一问题。二十年以后，为了再一次决心摆脱苏联的教条，提出有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中国革命一直处于和教条主义划清界限，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特殊情况进行革命和建设。这就必然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方面的特点。美国弗·霍勒布尼奇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毛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来源于这种鲜明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态度，即强调特殊性、个性和通往真理的‘不同道路’。”还有的说：“事实上，一种对立客观相互依赖的敏锐知觉，以及对这种辩证法的审慎运用，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之一。”总的来看，欧美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从不同方面的各种论述，都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上把握它的特点，还是需要

---

① （西德）英格·舍费尔：《毛泽东思想导论》第1篇1、2节，蒙尼亚出版社1987年版。

国内外学者继续研究的。

九、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及其体系的研究

欧美等国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也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关于毛泽东哲学的来源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来源于马列主义哲学，特别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哲学；一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他们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研究中，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特别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哲学。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就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没有关系，则是片面的。毛泽东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进行革命，进行理论思考，不吸取总结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另一种意见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纯属中国的传统，属于中国的产物，不属于马列主义思想体系。而且从语言结构和引用中国古典资料的数量来下这种结论，也有失片面性。否定马列主义哲学的来源，是难于通过的。琼·柯尔认为，只有既考虑马克思主义传统，又考虑中国传统的情况下才能理解毛的哲学思想。但这不是两种传统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结合"。他写道："毛的思想代表着一种创造性的全新思想，很明显，她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另一方面，它根植于上述二种意识形态中。事实上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结合的独特产物。"① 这一论述带有极大

① （澳）尼克·赖特：《西方毛泽东研究：分析及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9年4期。

的合理性。我国也正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的最高概括。这个概括无疑要取吸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且也吸收世界各国哲学的精华。所以，只说它是马列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也不恰当。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欧美学者分歧很大。主要两派，一是，认为有一个体系，一是，认为没有什么体系。至于体系的内容是什么，认识也不一致。

“那么，毛留给国人的他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一套完整的革命思想体系？还是一种方法？抑或属于二者之间的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尽管毛在辩证法和在对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的分析中还留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他身后留下的，决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早已形成为体系的思想。”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意见是明确的。弗朗西斯·苏在他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中关于如何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论述，也是令人信服的。此问题留待第六章《商榷和对话》第二节加以讨论。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内容的概括，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论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体系。前西德科隆大学研究员英格·舍费尔认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哲学著作的基本思想占有特殊的地位。”他认为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是矛盾及理论——实践——辩证法问题。”②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西洋大学教授认为，毛泽东哲学分为三大问题：“多重矛盾的理论和事物发展的主导因素”，“群众路线的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结合中国哲学史加以论述。③ 还有的学者认为《实践论》和《矛

---

① （英）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② （西德）英格·舍费尔：《毛泽东思想导论》，1978年。

③ （美）窦宗仪：《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2期。

盾论》就是毛泽东的哲学体系。虽然这些概括，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总的看，他们还未能从毛泽东著作整体研究中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及其内容。

十、关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发展的研究

欧美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在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的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和新思想，从而丰富了哲学”。①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哲学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不是偶然的。“马克思的经验是在那些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形成的，列宁的经验是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工业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经验则可以说是在欧洲工业文明的反面，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占优势的中国形成的。”“毛泽东正是活着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他的经验无论比马克思的经验还是比列宁的经验，不仅更新，而且最有独创性。”②

首先，“在这种贡献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通过认识论的深刻研究而使辩证唯物论产生的飞跃，以及他坚决拒绝马克思的概念中残留的机械唯物论。他坚持强调人的意志对事物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这样，他在1937年就已经保卫了革命的非经济主义观念。”③金思恺认为，毛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把这个关系总结为‘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的阐述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同时，与马克思本人的文献相比前进了一大步。他论辩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系

---

① （西德）英格·舍费尔：《毛泽东思想导论》1978年。
② （意）“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创办的《方针》报，1966年5月1期。
③ （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

统地论述过'认识论的问题。①

其次，许多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学说的系统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他以对立统一学说总括辩证法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增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致性"，它"使唯物辩证法更加符合现实。"② 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再次，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哲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没有系统、明确的研究。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其解决方针政策，都是马列主义哲学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他们联系前苏联一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特别是否认存在对抗性矛盾的事实，感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创造性的新理论。"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变化，这无疑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既当成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又当成方法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还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深刻体会说："毛泽东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清除了许多教条主义的渣滓。毛泽东总结和摈弃了斯大林时期那些被官方认为是信条的错误。"③ 还有的说：毛泽东"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④ 欧美学者从不同角度、侧面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
③ （挪威）特隆·欧格里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第199页。
④ （美）特利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526页。

宁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

十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

欧美学者注重对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他们搜集了广泛的资料，写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撰写毛泽东传，但尚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专著。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些概括，还是很有价值的。

他们首先，考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特殊产物。有的关于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哲学影响，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如何吸取中国哲学史精华，作了历史的考察。甚至以毛泽东著作引用马列主义材料和中国历史材料相比较，以确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

最早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是有人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了证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反驳悲观主义时，就指出“从事物的表面、现象、再分而深入到它的本质”的认识论思想。认为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用哲学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从天上掉下来”的抽象真理，反对只限于书本，然后把“真理形式主义地应用于固定的现实”①的深刻哲学思想。而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的哲学活动，特别是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致力于给党一个哲学基础。”②认为“两论”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基础，许多学者高度评价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认为毛泽东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意义重大。普遍肯定《论十大关系》

---

① （西德）英格·舍费尔：《毛泽东思想导论》第1篇第3章1、2节，慕尼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英）戴维·麦克莱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动态》1986年2期。

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强调主观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1964年和1965年的哲学讲话，非常重视，认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认为用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统一了唯物辩证法体系，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应该说，欧美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他们这些概括，还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

由于资料的逐渐增多，欧美一些学者逐渐注重毛泽东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一些学者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颇有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也会获得成就。

综上所述，欧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涉及面十分广泛，参与研究的人员也是多方面的，有学者专家、有党政界的人士，还有军界人员。虽然他们的立场、认识不同，但他们在搜集资料、调查研究情况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从各自的不同方面获得了研究的成果，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诸国播种、发芽、开花、结果。有些研究是克服了政治、经济、文化困难，而逐渐开展起来的。我们看到一些学者、专家为了研究现代中国，为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多年，不辞辛苦，在国内外广集资料，调查研究，然后才写出文章、专著，令人钦佩！

应当承认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要克服不少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十分可贵的，值得庆幸的。

第三节　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欧美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起亚、非、拉美，比起日本，比起前苏联东欧要晚一些。这是有其一定的历史

原因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侵略，干涉中国失败之后，又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和研究。但是这种侵略、干涉、封锁一经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被挫败、打破之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研究的形势发展很快。也形成其与亚、非、拉美、日本、前苏联不同的特点。

一、大力广泛搜集资料

他们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收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公开出版的资料，而且搜集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关其他资料。他们编辑了"两论"为主的其他毛泽东哲学谈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的毛泽东其他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文献资料；他们不仅收集解放后公开出版的资料，而且广为收集解放前出版的资料。对于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修改情况也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借以了解中国革命政策、方针的变化。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尤金·吴写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集的回顾与前瞻》介绍了美国几十年，如何搜集现代中国的资料的情况。虽然不是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但从中可见一斑。说明他们在搜集现代中国资料方面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他们不但收集一切公开出版的书刊资料，而且收集解放前我党出版不公开的油印资料。他们收集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各种不同的版本。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印发的资料，他们收集了不少毛泽东未发表的"哲学谈话"，出版成辑，供学者们研究。许多资料在我国国内还不曾见过，但是在欧美则广为发行。在这方面，他们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二、自由研究，提出的问题甚多

他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同他们国家的政治外交没有直接关系。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根据自己所占有的资料，同一个

题目可能有许多人重复研究。例如，毛泽东传记性著作不下几十种。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也可能几个人同时开展，各有长短，资料多少不一。自己不同意的，随时提出疑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几种意见同时存在，争论不休。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认为毛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就是凭政治、意志制造一个"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是"唯意志论"。他们停留在表面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唯物论缺乏深入研究，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某些提法、词句，就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因素，对此也引起不同争论。他们有些人根据西方哲学传统甚至怀疑毛泽东是否能算一位哲学家，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问题，在亚、非、拉美甚至日本是不存在的。由于他们的实际需要，只是千方百计加以理解，然后应用于分析解决他们的问题。

另外，他们感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新鲜问题，就敢于下结论，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例如许多学者一致认为毛泽东哲学中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强调调动人的能动作用，强调对人的思想改造，就明确提出毛泽东丰富发展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看到《矛盾论》对矛盾的深刻系统的分析，看到毛泽东关于以矛盾法则统一辩证法，就明确认为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他们还认为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的"一分为二"思想，"是一种进入未知领域的革命思想"，对此倍加赞扬。① 如此等等。使人看到无拘无束，敢于研究，敢于提出问题，敢于下结论。这是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长期研究，成果斐然

自从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并写了《西行漫

① A·弗里德曼：《爱因斯坦和毛：革命的比喻》，《毛泽东哲学思想动态》1987年3期。

记》，宣传毛泽东不仅是游击战的指挥者，而且深知中外历史知识的人，并且具有“他的哲学”之后，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在欧美逐渐开展起来，有的政府资助建立研究组织，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出现一大批研究当代中国和毛泽东思想的专门人才。据统计，在美国有大约4000—5000人左右。有一些长期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如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等，就几十年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和哲学思想。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就问世了，到现在已经修改出了4版。施拉姆写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例如《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与亚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也是有影响的著作。他在研究大量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对于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体系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欧美学术界的好评。70—80年代，欧美学者撰写了大量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如，英国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德国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美国的《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等。据不完全统计不下10多部，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文就更多了。总之，欧美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四、注重学术研究，不在于应用

这是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与亚、非、拉美和50—60年代日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亚、非、拉美从领导到一般群众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目的完全在于运用，以求得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日本在50和60年代的学习、研究目的也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寻求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办法。欧美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完全从学术上和东方

文化的视角来探讨问题的。顶多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的发展变化。澳大利亚一位学者评论说：事实上西方研究毛的学者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和这种情况有联系。因此不少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一是寻找西方的思想根源，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上寻找根源。而且注意概念、范畴的含义的解释。

但是军界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则有例外。他们试图总结经验教训，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于战争的实践。另外，欧美诸国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很明显注重于应用，但是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也难于实现。例如前西德《共产主义工人报》写道：“毛泽东的一生及其学说对我们生活在寒冷的资本主义纬度上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斗争，我们能够胜利，简而言之，这是我们的前途。”又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人民战争的学说，对认清当前德国情况，对德国共产党的改造、增强德国共产党的力量有着直接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首先要按着毛泽东关于矛盾哲学的论述，学会科学地、全面地去理解现实及其矛盾。擦亮眼睛，认清现实，并把这种现实作为矛盾的运动来理解。”①人们知道，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世界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行动，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总的看，欧美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限于一般的学术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争论，无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局，也是被允许的。

五、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问题

欧美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特点。他们提出不少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反映综合法”、“动态性研究法”、“定态性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多数学

① 联邦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1977年121期。

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

他们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多层次的。首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从它的产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比较，探讨其来龙去脉，进行论证。其次，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哲学加以比较，发现毛泽东的新东西及其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并指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不足，也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不足和缺陷。再次，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例如和葛兰西哲学思想比较，发现其异同，再次，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加以比较，发现其批判继承关系。甚至从毛泽东著作不同版本前后修改增删情况加以对比，从中发现毛泽东思想的运行轨迹，藉以估量革命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这种方法往往使问题更加鲜明、尖锐、清楚，令人深思。但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往往出现简单化，使比较方法变成机械类比，有失科学性。

今后，欧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如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按过去的情况看，很难预料。例如，当“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指出毛泽东的错误之后，有人估计，国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再不会振兴了！但是，恰恰相反，国外学者同中国一样，经过一段反思之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又以新的姿态重新复兴起来。现在国际社会主义发生了曲折，前苏联、东欧解体，有人估计，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了。其实恰恰相反，在国际社会主义曲折面前，中国不但没有动摇，正以改革开放的新步伐，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这就引起国外人们深刻思考：为什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具有如此的品格？会激起人们深入研究的兴趣。国际上一些人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找答案，兴起“新儒学”研究；指导、左右中国人民前进的力量，根本不是什么“新儒学”，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和“新儒

学”没有关系，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于是他们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评价，认为这是“明智”的。欧美的许多学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经和当前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前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出现了新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献已在欧美传播，《邓小平文选》已经在欧美一些国家出版，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研究邓小平思想的文章逐渐增多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欧美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着资料的丰富而发展的。今后也必将如此。不仅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也会随着他们国家出现的问题而发展变化。现在国际风云变幻，旧格局已经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一定会有人从毛泽东哲学思想那里寻求答案。

“对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伟大，他的成就及其持久性，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人们可能会有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而且这一点即使在他死后，也仍有说服力。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世界的范围里，人们不能不把他与列宁这样的人物相比较。……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①

这是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的一段话。既然是“我们时代的巨人”，又影响了“人类的多数”，那么，人们在今后的斗争生活中，总会不断地研究他的思想，从那里汲取营养，以指导斗争、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会因为毛泽东逝世而消逝人间，不会因为历史的曲折而失去它的真理光辉。

①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第五章

第三世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发展的历史概况

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传播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它是随着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同步并进的。

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长期处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压迫，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享受不到起码的民主自由，因此，先进的文化思想的传入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先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是那里的革命团体、先进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例如，越南的革命进步组织和印支共产党就是在中国成立的。胡志明等越南的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了学习中国的革命经验，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越南。胡志明同志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①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劳动党一直把毛泽东著作作为经典著作，在党内组织学习和研究。再例如，印尼共产党人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印尼后，极大地武装了党员的头脑，他们在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指导思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纲规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① 《胡志明选集》第2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斯大林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和'慕梭大改正'的基础。"在党章第二章规定党员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深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艾地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在传播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十分重视毛泽东著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组织党内进行学习，以便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新西兰共产党就曾经在"整个党内的各级组织""进行毛泽东的伟大的理论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②]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如菲律宾共产党人也曾经在党章中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的理论。

历史证明，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本国，对于他们组织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对于武装其组织成员的思想，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起初阶段，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限于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少数人，而且是秘密进行的，经历了艰难险阻。他们冒着坐牢和杀头的风险，宣传、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读者在以后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种具体情况。

随着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尤其是中国人民革命获得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帮助了第三世界的广大群众，在亚、非、拉美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中国的政治、思想影响传遍全世界。从1951年到

---

① 《人民日报》1963年9月5日。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7月17日。

1960年，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渴望的精神食粮——《毛泽东选集》1—4卷相继出版并及时在国外发行，又由于第三世界的人们亲自看到和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政策，这就迅速扩大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在第三世界出现了传播、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

这期间，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已经不限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人了，从各种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到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战士和进步青年，都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从60年代到70年代，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的各种单行本，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到1963年已达10万册。1963年到1964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哲学著作先后出版发行；《实践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各发行5万册。1958年，印度就出版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1964年到1965年，《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在锡兰出版发行。再如，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巴基斯坦；中近东的伊朗、阿联酋、以色列、黎巴嫩；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都出版发行了各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于是在第三世界形成了购买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结合各国实际领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3年，我国在阿尔及利亚和马里举办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展览期间，群众对于毛泽东著作十分欢迎。在阿尔及利亚展览期间，一共售出毛泽东著作4000多册；开幕的头一个星期，就有200多本《毛泽东选集》第4卷被抢购一空。有一个6口之家的工人家庭，就买了6本《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手一册。他们

说，他们的朋友过去老早就有了《毛泽东选集》前3卷，这次买到第4卷，实在高兴。在马里的展览，开幕半个月，即售出毛泽东著作1500本。一位农民说：“你们获得的成就非常伟大，我要阅读毛泽东选集来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位教师跑了60公里路来买《毛泽东选集》第4卷，并且问什么时候出版选集第1—3卷的法文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凯塔的官员特地到售书处，买了10多本毛泽东著作。他说，很多马里青年在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以便研究中国的道路。一位青年军官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等单行本，并说，他已经在朋友家里看到过这些书，今天能买到这些书很高兴。②

我国的一位新华社记者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我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军官们进行过谈话。他们告诉我，他们都读过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对于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向我介绍他们在解放战争中怎样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怎样在武器装备劣势的条件下歼灭敌人，怎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他们谈起毛主席的著作，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地表示崇敬。

我曾经在靠近摩洛哥边境的山区，参观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军营。在一位政委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毛泽东选集》1—4卷的法文版（法国出版）。书的封面显得破旧，看来已有很多人读过了。在这位政委的办公桌上我发现在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名著里，人们用阿拉伯文注上了一行行蝇头小字。我曾经越过荒无人烟的弯弯曲曲的高山，去看望驻扎在山头上窑洞里的阿尔及利亚官兵们。在这里的办公桌上看到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10月7日。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1月17日。

一本北京出版的法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一位军官介绍说："这本《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兄弟赠送的。我们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军官们轮流看，现在轮到我这里了。"

阿尔及利亚国民经济工作人员埃沙，一次买了20多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他说："毛主席是伟大的人物，我要认真学习他的著作。"有些学校的教员到处寻找毛主席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他们说："这本书对做青年工作的人很有用处"。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尼说："阿尔及利亚的战士和军官渴望得到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取得胜利的办法。因此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思想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乡村、草原游击区得到了传播，得到了实现。"①

以上是我们举办的展览会和我们的记者采访的资料。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三世界的人们以及其他形式反映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说：我是泗水的一个大学生。有一次，我到日惹去，看到车上有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在读一本书。我问他这本书好吗？他回答：毛泽东著作，好。并向我解释这是一部四卷合订本。下车后，我立即到日惹的书店去买，没有那本书。但我却发现那里有毛泽东著作袖珍本。我买了，它成了我极好的侣伴。我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我还是要买到那本书。后来，我趁假日跑到别的城市去寻找，终于在三宝垅一家书店里买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下册。我为什么千方百计地买它呢？我认为这本书太有意义了，这

① 新华社记者陈迹：《毛泽东著作在阿尔及利亚》，转引自《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3日。

对一个要献身于革命的人来说是必读的好书。①

一位非洲革命青年写了一篇《读毛主席著作，坐牢也不怕》的文章说："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毛主席著作飞越重洋来到我们手里。我真心喜欢读它、珍视它。据我所知，大家所以喜爱毛主席著作，是因为书里介绍了中国的革命经验，启发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去为反对剥削和压迫而斗争。

我读过毛泽东同志著作中一些哲学方面的小册子。我曾把这些书散发给我的伙伴们。……我相信，只要跟着反帝英雄毛泽东同志及其他革命家的脚步走，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②还有刚果（利）卢蒙巴主义全国青年组织第一总书记伦布埃勒——布塔的来信："刚果（利）革命者越来越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把毛主席的思想看作是我国人民解放的最有力的武器"。说："毛泽东主席著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一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胜的真理和决定因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成为刚果游击队员的必读之物，他们把它视为珍宝。在游击队中，爱国者在休息的时候，集合在一起学习和讨论这位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

信还这样写道："不仅我一个人，还有好几名我们的游击队战士也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确定这种解放战争的方式之前是否曾经在我国住过'，因为毛泽东同志制订的方法、策略和原则符合于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性质"。③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在1976年9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埃塞俄比亚人广泛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制定了革命的纲领"。

拉美地区和亚、非一样，人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并结合实际加以领会和运用于自己的斗争事业。例如，毛

① 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65年9月30日。
② 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64年3月26日。
③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10日。

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不久，古巴的领导人就积极学习并把其中的精神运用于解决古巴的问题。他们十分注意引导人们学习毛泽东著作。他们认为："今天，这些著作已成为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论武器。特别是成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中进行着斗争的先锋队力量的理论武器的一部分"。 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联合会书记西尔索·费尔洛斯说：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革命斗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业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在拉丁美洲，谁要是忽视农民这一重要力量，谁就休想领导人民革命得到胜利。他说，他读过21本毛泽东写的小册子，每读一遍就觉得有更深刻的体会。 古巴的乌·爱尔马旦斯说："我读完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后，我把他的书选为必读之书。这既不是偶然的决定，也不是一时的激动，而是著作本身具有的绝对说服力所致"。③

最后，我们再从一些国外和其他地区报刊材料看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情况：

1964年12月28日，法国《快报》周刊登载的《毛泽东是这一年的中心人物》文章说："在非洲，中国慢慢地增加了它的影响。……所有的非洲青年学生，都狂热地读毛泽东著作，从中去寻找行动的指针。因此，在中国之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第三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社会名流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典范。""狂热地"，可能是作者有些夸张。但是，考虑到青年们为了"从中去寻找行动的指南"，解决自己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他们不是一般性地学习，而是带着强烈的愿望，充满革命激情地去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7月19日。
② 参见《中国青年报》1964年3月26日。
③ 参见《中国青年报》1965年9月30日。

所以作者说"狂热地"倒也反映了真实情况。

早一些时候，1960年10月1日，香港《新晚报》载文评述毛泽东思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到重视，毛泽东著作受到热烈欢迎的客观事实，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真实情况。

文章评述道："在非洲，常常听到人们这样的话：'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建设成就，给非洲人民极大的鼓舞。'几内亚民主党达拉巴行政区书记说，读了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献，大大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他说：'这个文献使我们懂得了帝国主义不仅是应该反，可以反，而且是可以打倒的'。在非洲，好多人读过或正在读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比如，在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有一家叫做'西非书店'的小书店，它的经理说，从今年1月至4月，就售出了《毛泽东选集》375册。他还说，毛泽东著作不但在几内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且在西非或其他国家也受欢迎。"

文章又评述道："《毛泽东选集》不仅在非洲受到热烈欢迎，在拉丁美洲也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一种去年由阿根廷一家书店翻译出版的西班牙文两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全拉美出售，结果很多书店都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很快就销售1000多部，人们都说，委内瑞拉全国只有600万人口，文盲又比较多，《毛泽东选集》达到这个销售数字是很难得的。古巴各地都争相购买毛泽东著作，有的书籍供应不上，很多人就向驻哈瓦那的新华社记者再三索要，知识界人士以家里有一本毛泽东诗词为荣。古巴人民对毛泽东著作的需要是急切的，不计代价的，《毛泽东选集》在哈瓦那最高卖到每部15个比索（等于15美元），仍然销路很好。古巴革命军在反对巴蒂斯塔战斗中即已传阅着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并称为'来自中国的食粮'。有一位空军上尉称颂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是'来自中国的良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和《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都是古巴革命政府和人民非常殷切需要的。”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给予拉丁美洲人民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古巴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古巴政府革命武装部长劳尔卡斯特罗曾对去访的中国京剧团负责人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

上述种种客观、具体、生动的事实证明，这期间毛泽东思想在亚、非、拉美，确实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出现了高潮。

虽然由于60年代以来中苏分歧和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分歧，同时也由于一些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的变化，又由于对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民主革命的战士、进步知识界，特别广大劳动群众，还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始终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他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影响，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他们由于毛泽东生活的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某些失误，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历史的评价对他们的影响，由于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地位、作用评价的分歧，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要重新探求结合新的实践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极需结合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这就使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发生了新的情况。

第一，由于毛泽东的逝世，震撼了世界人们的心，引起世界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沉悼念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纷纷评论。他们结合自己的理论、实践的经验教训，重新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意义，作了历史的全面评论。他们根据不同意见分歧，除了指出毛泽东

的某些错误和自己的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缺点错误之后，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价值，充分肯定他们过去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坚决抵制国内外的“非毛化”倾向。例如，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于1978年12月24日，在《先锋报》上发表题为《马列主义的巨人毛泽东85诞辰》文章指出：“马列主义的巨人有三位，即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正确的。当然，这三位都是人。他们当然都有错误和缺点，但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同他们对人类所做的贡献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人民的产物。他们每一个人都集中了工人和普通人的智慧。”毛泽东“他工作了60年。他的名字在世界上是家喻户晓的。他的著作使得世界上又有亿万人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他的著作为社会问题带来了出色的解决办法。”关于毛泽东思想对于澳大利亚的革命作用，文章指出：“他的著作和观点使澳大利亚革命运动的思想得到大解放。他的这些著作和观点使澳大利亚革命者走上了实事求是的道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射澳大利亚革命之的。”又指出：“毛主席的思想使我们摆脱了把马列主义强加于澳大利亚实际的‘教条’的束缚。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我们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也完全可以这样评价毛主席，如果没有他的著作和思想，我们至今也仍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因为我们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而只是从书面上去理解。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问题。澳大利亚的革命运动和全世界革命运动应该归功于他。毛主席的著作、思想、生平、工作和榜样将与世永存。”① 前南斯拉夫的同志是富于独立思考的。他们经过深入研究，在1978年出版的《马

---

① 澳大利亚：《先锋报》1978年12月24日。

克思主义史》一书，是这样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他们也反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非毛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史》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策略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出发，“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很清楚根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摆脱对于历史问题的任何教条主义解决方式。”①（前南斯拉夫，我们之所以没放在前苏联东欧一起讲，这是因为南斯拉夫在二战后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而且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家之一，它又和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联系密切）。大量材料证明，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坚持肯定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许多第三世界的政治家、理论家，都结合本国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重新深入思考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从而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坚持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运用的正确方向，所以当着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历史的全面的科学评价之后，他们为之欢欣鼓舞。正当我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总结经验教训之际，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些亚、非、拉美的朋友就奉告，不要因为毛泽东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我们第三世界人民的伟大朋友和导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不但否定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伟大功绩，而且也否定了第三世界的人民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81年，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问我国，和我国一位领导同志谈话时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我们实在看不了，看不懂，也很难用。说他们的革命能够搞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1—4卷。王震同志说过这样一段

① P·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16页。

话："近几年来，我先后访问过一些国家，同政界、经济界、科学教育界以及文化界的人士进行过广泛交谈，许多朋友都赞扬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公正评价。"① 这无疑也反映了第三世界的人们的情况。

第二，这一阶段，由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开始转向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第三世界的人们，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进行期间，他们主要是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学习、运用毛泽东著作以解决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当他们取得独立解放，就有条件深入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水平。例如，澳大利亚共产党《先锋报》1978年12月24日发表的《马列主义的巨人毛泽东85诞辰》文章，《澳大利亚共产党人》1981年7—8月号发表的《略论毛泽东的国际意义》文章，都从总体上深刻地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澳大利亚共产党人》的文章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引导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获得解放并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将得到发展。"该文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指出："决议说'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它的总的原理是正确的，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行动指南。"文章又进一步指出："把毛主席看作是神或者认为他说的话是包罗万象的真理，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没有要求毛主席去研究，例如政治经济学。把毛主席或马、恩、列、斯看作是神或者认为他们说的话都

① 王震：《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红旗》杂志1988年17期。

是绝对真理，主要的缺点就在于否定了他们的思想的实质，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如果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它，它是万无一失的指南；如果机械地'运用'它，它就是走向灾难的指南。"①再如，前南斯拉夫的P·弗兰尼茨基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毛泽东不是职业哲学家或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和策略家。不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策略思想同中国革命的进程不可分，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也始终是为革命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服务的。他认为，尽管《实践论》和《矛盾论》不是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专门的理论探讨，而是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制定革命策略服务的，但在这些著作中包含着"杰出的辩证法家、卓越的实践家和革命策略家的光辉思想。"②同年，印度的曼诺朗强·莫汉蒂著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认为："中国革命的哲学，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运动的产物。特别中国近50年的历史，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的某些政治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想象力的产物，它们是通过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种种成功的和失败的试验，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创造性的贡献，在于他不时定期地把运动中的实际经验教训和在哲学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或者'理论化'。所以，我们所称作'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或者'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就是上半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哲学。"作者强调"必须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哲学的基本方法论。"③当然把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概括为"政治哲学"并不恰

① 参见澳大利亚共产党《先锋报》1978年12月24日。《澳大利亚共产党人》7—8月号，1981年。

② P·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22页。

③ 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序言1978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当，但是，他们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及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系，指导革命实践，并为革命实践服务的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深刻的。

第三，这一阶段，第三世界的人们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新变化，逐渐把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政策结合起来，以借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且开始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献和《邓小平文选》的研究，有的还进行有益的比较研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一位澳大利亚远东史学教授在《毛泽东——中国人与马列主义》文章中，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考察，论证了毛泽东自身是中国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统一。他反对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毛泽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中国化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确信，当他仍旧是中国人的同时，也一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雄心勃勃的革命念头之所以受到压制，原因在中国自身：九亿人口，深重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人民因袭守旧懒散的劣习。考虑到他1949年接受的是怎样的烂摊子，他设法要使中国人走得像他一样的快和远，这实际上也是他个人成功的标志。中国和马列主义，这二者在他的心灵和性格中，以不可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尽管毛泽东犯了错误，遭到失败，但他确实做成了他作为中国人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他的中国显然已经对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中国，他也不要求世界去简单化尊敬和崇拜那个死去了的文明的荣耀和成就。他的意思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中国，她之所以新，决定性地在于她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将永不再把世界看成当然之物，也不会再接受世界曾对她作出过的那种估价。"①许多人只知道批评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但是看不到毛

① 参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3期。

泽东希望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革命搞好的可贵思想。这位教授从这方面肯定毛泽东的"雄心勃勃的革命念头"之可佳。这是很不简单的。作者反对因为毛泽东犯了错误就否认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他的历史的功绩的形而上学观点，他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看问题的方法，这也是难得的。另外，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比尔·布鲁格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位人物比毛泽东更有争议，希望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为此，该中心从1987年开始举办了一个论坛，继续讨论从80年代末的角度重评毛泽东。总之，第三世界的人们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前30年和新时期的10多年，进行着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曾经产生过一些复杂的情况，例如，他们从重视毛泽东思想转到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但这不是主流。有的人由于受中国的"左"的错误政策影响，也产生过某些倾向。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他们自己的实践、反思，完全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既然能够自觉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推动革命和建设，无疑也必然能独立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长期的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发展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进步和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需要，再好的思想理论，也不可能在他们那里传播。毛泽东讲到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并起那么大的作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

不起作用的。”① 完全可以用这一论述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发展的原因。那么，第三世界的“社会条件”是什么？这就是，经过第三世界的先进政党和团体组织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长期的斗争，人民有了觉悟，有了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遭到很大的打击和削弱，同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强大，更加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于是，战后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他们极需寻找民族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第三世界“社会条件”需要的基本事实。

第三世界的社会条件需要，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为何到中国来寻找革命真理呢？这是因为中国过去长期以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第三世界的社会制度同中国相类似，第三世界的人民遭遇和中国人民一样。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思想，使他们倍感亲切。因此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士发问，毛泽东制定的那些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之前，是否来过阿尔及利亚；非洲一位领导人说，他们的革命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选集》第1—4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世界的人民，他们看到有过同样历史命运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取得那么伟大的胜利，很受鼓舞，很羡慕，所以他们想通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他们还认为，中国不但自己的革命和建设搞得好，而且还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搞革命和建设。“中国人民有强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念，他把世界人民的斗争，看作是他自己的斗争。他们没有一刻忘记亚、非拉人民的斗争。”② 这就使亚、非、拉美人民对中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坚信不疑。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广泛传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04页。

② 圭亚那妇女进步组织代表锡耳马·里斯夫人：《中国人民全心全意为革命》。转引自《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3日。

播和运用的第三个原因。

一个时期以来，那些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辩护士，出于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仇视，说什么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是中国人“输出共产主义”。稍微正视一下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的客观事实及其原因，就会发现那完全是阶级偏见，不值一驳。

第二节　第三世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问题和成就

第三世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成就，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他们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绩。特别是在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岁月，希望找到什么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长篇理论文章或专门著作，是不实际的。但是，我们从各方面的研究资料考察，他们在毛泽东哲学学习、研究上，确有可喜的理论硕果。

一、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功绩的研究和评价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世界的许多共产党人、国家领导人和学者们，对于毛泽东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对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为赞赏，但是，他们清楚群众创造历史和个人，特别是和革命英雄人物的作用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和“个人迷信”本质不同；不但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真正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作用的认识，由于他们亲自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第三世界

民族民主运动所起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因此，他们很注意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历史功绩的研究和评价。第三世界从共产党人到进步学者，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一致肯定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伟大的哲学家。认为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第三世界革命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的导师”，是“我们世纪的伟人”、“指导全世界自由的人们的明灯”、“当代的列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说：你们完全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非常伟大的共产党人。我敬仰列宁和毛泽东，我认为在政治上两千多年来，列宁和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者。第三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对于人民创造历史极为重要；群众的社会实践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但是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是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美革命进程。“在世界历史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非常罕见的。毛主席的思想促进了亚洲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①“毛泽东主席著作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中国和亚洲，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财富的一个基本部分。它以它的正确道路照耀着非洲、拉丁美洲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人民。”②“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这种巨大成就为各个时代的革命者树立了不朽的光辉榜样。”③“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是世界革命的

---

① 尼泊尔代理外交大臣夏尔马的讲话。

② 叙利亚阿拉伯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二版后记。

③ （孟加拉）《新觉醒》周刊社论，1976年。

导师。”① 还有的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遵循的基本路线。”②

不少人看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影响和作用，还这样写道：“地球上没有一个地区没有毛的思想和毛主义的追随者，他们正在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业而斗争。”③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活动家，影响了人类。因为，自从耶稣基督以来，没有哪一个人象他这样影响过人类。”④他们还认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仅限于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不仅限于推动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对于一个时代、一代人都产生着它的影响，留下它的历史印记。巴基斯坦一家报纸不无感慨地写道：“历史时代已经有很久不同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过去的半个世纪除了称为毛泽东时代外还能有什么的称呼呢？事实上，在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刚刚成为历史人物的八亿中国人的领袖更完全更重要地影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后代人看来，这一代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传奇一样的时代里。”⑤他们从历史伟人的正确思想，组织领导和威信等各方面论证了领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一贯反对强调群众创造历史时否定领袖人物的作用，也一贯反对强调领袖作用时否定群众作用，他总是把群众创造历史和领袖人物的实践活动辩证的统一起来。由此可见，第三世界人们关于领袖的历史地位、作用的思想，是发挥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者感到，仅从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那么多的人去认真地研究、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事实，就说明，忽视和否定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是不正确的，不是辩证

---

① （马里）《发展报》1976年9月。
② 引自《光明日报》1965年10月31日。
③ （菲律宾）《每日快报》1976年9月。
④ （毛里求斯）加埃唐·杜瓦尔悼念毛泽东逝世谈话，1976年9月。
⑤ 《巴基斯坦时报》社论，1976年9月。

历史唯物主义。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的总体研究和认识

国外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不了解中国实践和哲学的特点，以资产阶级哲学模式为标准看问题，他们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否认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存在，因此，对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但是，第三世界的许多人们深知中国社会和哲学理论的特点，经过认真的研究，他们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印度的曼诺朗强·莫汉蒂在他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中指出："如果不从中国长期传统的历史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也许就不能正确地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但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的全部争论已局限在重复的论点圈中。有人竭力把毛的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孤立的对比；也有人在西方自由派思想家中寻找毛思想的来源，这些作法都同样平淡无味。他们的偏颇都在于离开了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实际社会情况紧密相关的。"① 前边已经提到把毛泽东哲学体系概括为"政治哲学"是否恰当，另当别论，但是作者认为考察毛泽东哲学理论体系，评价毛泽东是否哲学家，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和由此决定的毛泽东的实践相结合，既不能孤立地与中国古典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简单对号，也不能同西方的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相类比。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哲学家和不同的哲学体系，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客观事实。这样去认识毛泽东哲学体系，评价毛泽东是否哲学家的方法，我们认为是科学的。我们认为前南斯拉夫的理论家卡德尔对毛泽东哲学性质的认识也颇有意思。"为了生存，中国需要自己的内部哲学，许多人认为这一哲学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可笑的。但是它却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他

① 曼诺朗强·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南亚出版社，1978年版。

回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样评论道："在听毛泽东谈所有这些论点时，我从中所看到的只是哲学，而且是忍耐的哲学，自力更生方针的哲学。"①这里指的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虽然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会议，但是情况很复杂，不同意见分歧和斗争随时可见。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种诸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的方法。毛泽东对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宣言"也是有意见的，但是，毛泽东不是如同前南斯拉夫同志采取的对抗方法。所谓"忍耐的哲学"就是矛盾诸方面又统一，又斗争的辩证法，考虑长远目标和解决眼前问题相统一，照顾小局和大局的关系。中国的誓言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卡德尔称毛泽东哲学是"自力更生方针的哲学"。他发现"自力更生方针"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是有启发的。在这里顺便提一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盛赞中国的自力更生方针，认为它对第三世界的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他们称这是"自力更生道路"。墨西哥前驻中国大使欧亨尼奥·安吉亚诺，对毛泽东哲学体系有所感受。他说："毛泽东是我们世纪的伟人。他把现代马列主义理论巧妙地应用于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他有能力彻底确立诞生于马列主义的、但得到丰富的和适合于亚洲现实的中国新哲学"。②在他看来，把马列主义巧妙地应用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这个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但又不是停留在马列主义之上，而是加以丰富了的。这就是毛泽东确立的"中国新哲学"。

毛泽东确立的"中国新哲学"的主要内容和系统，许多人认为：以《实践论》为主要内容和构架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论》为主要内容和体系结构的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的唯

---

①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75、176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版。

② 欧亨尼奥·安吉亚诺悼念毛泽东逝世的谈话。1976年9月。

物主义和以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有的人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如此等等。总之，他们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总体研究方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共同认为，毛泽东的中国新哲学具有中国的特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服务。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又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他们还共同肯定，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反对否认毛泽东哲学体系的观点。

三、关于毛泽东的若干哲学著作的研究

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于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主要精力集中于《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著作也有一定的研究。他们对于许多具有深刻哲理内容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也有广泛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他们制定的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之中。这里主要谈一下他们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研究。

对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总体评价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好的作品"。他们研究"两论"不是从理论兴趣出发，是为了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印尼共产党前主席迪·努·艾地就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这是第三世界的人们所以重视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根本原因。

首先，关于《实践论》的研究。许多学者正确地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清算教条主义，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服务的。"他有根据地特别强调实践，强调认识始于实践，并通过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9月5日。

理论认识回到实践。”①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认为《实践论》关于实践概念的含义是深刻的，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前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类认识、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并且强调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这样一来，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且克服了对于认识过程的根深蒂固的思辨阐述。”②认为毛泽东把实践作为“人类认识、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是深刻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这是公认的，许多人都作过论述。但是指出《实践论》把实践作为“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则是对《实践论》中的实践思想的深刻理解。把实践不仅看作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且看作是人类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这就揭示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体系。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虽然指出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是他强调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种形式的重要性，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斗争和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及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科学实验的三种实践形式是统一的，对人类认识的产生、发展是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认识最基本的来源；而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斗争的实践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和自然斗争、社会斗争的各种科学实验紧密相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复杂、尖锐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环境之中，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认识、理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阶级实践的紧密联系，因此他把阶级斗争看作认识产

① （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570页。
② （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22页。

生、发展的三种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是自然的，也是科学的。“他指的实践往往指的是进行斗争特别是阶级社会中进行的阶级斗争。这样，知识或者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就产生了，并且不断地由阶级斗争的经验所检验。这就是哲学和阶级斗争的统一。”① 应当说，这确实是从一个侧面阐明了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这也正是毛泽东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之所在。

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毛原先似乎把辩证法视作认识论的方法，但他解放以后的著述以及中国实际的政治实践已经表明，在毛那里，辩证法既是认识理论又是实践理论”。“毛一直想把唯物辩证法变成实践的规律，服从于不断的调查、实践和发展。”而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两方面，“以物质是观念的起源或者基础为问题的一方面，以观念转化到物质为另一方面。第一方面使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第二方面使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正是这二方面的理解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革命战争。”关于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的辩证发展，作者不是以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公式去说明。他认为“毛的出发点是知和行的相互联系。认识产生于感性经验过程表明了毛泽东的全部辩证规律。”就是说，不仅整个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发展，而且认识的每一阶段也是辩证的发展。作者还认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依赖、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物质与观念的相互转化，形成了毛的认识论的核心。”并且认为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强调某些不同方面。作者还断定“这三个方面一起形成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政策和工作的基本哲学观”。② 在阶级社会，在革命时期，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实践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概念，去指导实践，

① （印）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② （印）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是不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作者把这也给予肯定，是个缺欠。但是作者关于毛泽东认识理论的核心的认识是把握住了一定的实质性问题，是接近毛泽东哲学实际的。前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在分析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时指出："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一再重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背熟的思想和辞句，而不懂得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到具体和特殊的环境中去，他有根据地特别强调实践，强调认识始于实践，并通过理论知识回到实践。这样，毛泽东就能够比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并驳倒对认识过程的顽固的抽象解释。"① 印度的莫汉蒂更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在认识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什么是'认识过程'。这个问题现在变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许多讨论中，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弱"。而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的认识是从肯定物质是观念的基础开始的，但观念并非物质的机械反映，人对物质力量的感性知觉聚集了毛称作的感性知识。当人运用他早先的知识去把握新得到的感性知识时，就产生出逻辑的或者理性的知识。下面的阶段更重要，对已形成的理性知识（原则、理论、规律等）再检验、证实、修改和纠正。实践和认识的过程如此继续不断。它们的统一性在于它们的相互依赖性，知识在人们感知客体时指导人们的感官，而这些经验又决定我们知识的性质和内容。"② 说实践和认识的无限发展的"统一性在于它们的相互依赖性"，这样的提法是符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但是，它不只是相互依赖就行了，又有相互推动和相互转化的问题。认识离不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和检验的标准，这就是说认识依

① （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570页。

② （印）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赖于实践，没有实践，认识就不能产生和发展。同时，实践又需要认识（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思想、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是不能产生正确认识和思想理论的。另外，实践的经验又靠已得的认识（思想）指导去进行正确的思维或总结；没有正确的总结，也是不可能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这是指的实践是真知的可靠基础，不是说实践一定出真知。实践了，不能正确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是不能出真知的。从此我们可以说，实践又依赖认识、思想的指导，才能进一步提高实践水平，才能出真知。认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其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同样，实践是指认识、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得成功或失败，还要靠思想理论的总结和判断。总之，实践和认识的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相互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不停止，这种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就不会终结。这就是毛泽东揭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概括，蕴含极为深刻的内容，有待我们和国外学者继续研究。

其次，关于《矛盾论》的研究。第三世界的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高度评价《矛盾论》的理论价值及其对马列主义辩证法理论的贡献。因此，他们对《矛盾论》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对于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也是有启发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的光辉的阐述者和维护者。他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阐述家和实践家之一，达到了经典的水平。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属于全面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最优秀的著作之列。”①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也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指出：“毛泽东说，在马克思

① 《澳大利亚共产党人》1981年7—8月号。

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中有一个根本的法则，这就是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指出了区别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这个提法使他以后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特别注重毛泽东关于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即区别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主张。

当我们在新西兰全面地掌握了这个论点，我们就将在我们的总的政治路线方面，在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全面斗争中，真正地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他认为，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是学习《矛盾论》，“再也没有比学习毛泽东的伟大著作《矛盾论》有更好的开端”。[1]要掌握辩证法法则，首先要把握它的根本法则，即矛盾法则；而把握其根本法则，又要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不同的斗争形式。这对于革命政党正确制定政治路线是极端重要的。这种理论结合实际地论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非常可贵。

文章又指出：“列宁曾说过：‘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而“正是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彻底破除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的阐述，而这种机械的阐述把许多好人引入精神上的死胡同”。这种机械的阐述就是把辩证法本来研究对象自身矛盾的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完整辩证法，割裂成互相独立或并列的若干部分。这种错误倾向长期地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极大地阻碍了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作者指出毛泽东这一重大贡献和过去在辩证法问题的错误倾向，是深刻的。文章还特别赞赏毛泽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辩证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2]这正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

---

①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7月1日。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7月16日。

关于《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深远意义和作用的这种认识，决不限于新西兰的同志，第三世界的许多人都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当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经典著作。

前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们对于《矛盾论》的辩证法理论及其意义的研究抱有很大的兴趣。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迫切的问题，就是抵制国内外的教条主义压力，创造性地解决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把握好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法，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重大革命问题和哲学问题上作出了贡献。M·德鲁罗维齐在1982年萨勒布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革命有其特殊性，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不是以无产阶级而是以农民为主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功绩就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不是导师或“天生的哲学家”，而是始终置身于与世界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相同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他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他说，尽管有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压力和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同时中国革命也汲取利用国际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经验，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能正视“中国自身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和长远的革命利益”，没有接受外国的理论设计和模式。“这是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它的力量和权威性的关键。”[①]也正是毛泽东辩证法力量之所在。因此，前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们特别重视《矛盾论》这一著名辩证法著作的研究，其中尤其注意关于矛盾特殊性理论意义的研究。普·弗兰尼茨基在他著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讲到《矛盾论》时指出：“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所作的分析中也尖锐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片面的经验主义”。称赞毛泽东对矛盾特殊

①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1988年版，第26页。

性和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特别强调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认识辩证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在其革命过程中表明自己是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① 他还指出，尽管《实践论》和《矛盾论》不是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专门的理论探讨，而是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制定革命策略服务的，但在这些著作中包含着"杰出的辩证法家、卓越的实践家和革命策略家光辉思想"。②

关于《矛盾论》的研究成就，还应提到印度的曼诺朗强·莫汉蒂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这本书是比较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现代世界的矛盾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四个规律等。作者在第四章中研究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并提出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四规律，即"知行统一律、分析律、综合律和特殊律"。虽然他这样概括毛泽东辩证法尚有待商讨，但是作者在分析《矛盾论》内容时提出的一些独立见解，是具有启发性的。

首先，作者指出，在毛泽东哲学中，辩证法和世界观是统一的。"毛泽东把辩证法看作一种世界观，它'主要教导我们怎样去观察和分析不同事物中对立面的运动，并且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为了理解事物的性质，我们进行辩证的分析"，"不是为分析而分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认识事物性质和解决问题方法的统一，这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和优点。作者这一认识是符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精神实质的。

其次，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中，矛盾、一分为二和辩证法的本质是内在的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毛泽东肯定"事物本身就是矛盾"，就必然认为事物的运动是自身引起的，是内部矛盾决定的，就必然认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矛盾法则，而辩证法的核心或本质必然是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那么分

①② 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575、22页。

析事物的基本方法必然和只能是矛盾分析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作者写道：“怎样辨别矛盾的双方呢？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一分为二’。这就是说，每一事物内部和外部都能分为二个主要对立的力量，只有这样分了以后，人们才能知道哪一方面较弱，在哪一方面它需要更多的注意。这就是如何认识世界和如何改造世界的结合”。作者还把一分为二方法和抓主要矛盾方法联系起来。他认为，一分为二不是把问题并列出来就行了，而要看到矛盾不同方面或力量的强弱、主次差别，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主要矛盾。“这种强调要抓住一个问题或一件分析对象的本质的观点几乎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比如象‘基本矛盾’、‘主要敌人’、‘基本任务’等概念就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行动。上述思维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把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核心、实质、矛盾和一分为二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既肯定了矛盾理论，又肯定了矛盾分析法，是真正领会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不若有的人随意把同毛泽东辩证法不相干的范畴，什么“合二为一”、“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概念相提并论。这表明了作者对《矛盾论》的深刻理解。

最后，作者对毛泽东辩证法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地论述。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是针对“教条主义者”的，因此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对。作者指出：“众所周知，在了解特殊性解决具体问题上，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作者把矛盾特殊性称作特殊律。认为矛盾特殊性有“三种基本因素”，一是“以一事物各个方面的特殊本质定义一事物的本质”，二是规定事物特殊本质的是“最有影响的”主要矛盾，三是“对抗在不同的矛盾中或矛盾关系中的性质问题”。对于特殊律的“三种基本因素”，是作者对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理论的新解释，而且是很好的解释。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在1937年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时，认为教条主义不懂得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

特殊性之中。他们不懂得，为了指导革命实践，在处理我们面对的具体事物时，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何等的重要。”接着作者对矛盾的特殊本质、主要矛盾、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以及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精神实质都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解放后许多创造性的特殊政策的制定，都是矛盾特殊性理论的产物。这是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创造性的方针政策的哲学理论根据啊！

特别是作者着重指出，毛泽东关于特殊和普遍关系的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极端重要性，是理解了问题的实质。第一，说“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活动的哲学基础是特殊和普遍的辩证法”。的确，如果说“特殊和普遍的辩证法”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活动的全部哲学基础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是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实践证明，解决好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都是一个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看，就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辩证法。作者结合中国实际研究《矛盾论》，提出这样的重要观点，十分深刻。第二，作者研究了《矛盾论》特别是研究其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之后，强调指出：“毛泽东的著作一再明确表明，不能把辩证法降格为‘一成不变的教条’”，矛盾特殊性理论，也不能当成教条，而是一种方法。同样的普遍和特殊相结合，因为各国国情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指出这一点，我们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第三，作者揭示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他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人有时自称普遍论者，但他们似乎仍然把普遍融入特殊律中，他们要求革命活动家通过不断的实践，调查和学习，‘创造性地把普遍规律运用于具体形势’。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特殊律公式表现了自己是什么后，

把主要的实践问题留给实践者自己去解决。”① 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把握普遍和特殊辩证法的。不如此，就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的东西、运用普遍性的东西和丰富发展普遍性的东西。不仅如此，当着中国共产党人称自己是矛盾特殊论者，强调特殊性的时候，是把特殊放在普遍的指导之下，不是离开普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普遍和特殊的全面辩证法。有的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矛盾特殊性，坚持自己独立的理论，走自己特殊的道路，而认为是离开了普遍，脱离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是观察、分析问题的表面性，是不了解毛泽东关于普遍和特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

第三世界的人们除了注重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其他具有哲学思想的著作，特别是对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也很注意研究。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等战略战术辩证法思想，都有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著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军事战略家，这本书不仅是关于军事科学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甚至为西方军事学院所采用。”② 可见其军事理论价值。有的人说：“毛泽东主席著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包含着一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胜的真理和决定因素。”是游击队员的“必读之物”，是他们的“珍宝”。③ 认为，由于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的长期武装斗争，写了许多指导革命战争的著作，因而“产生了关于军事科学”。④

① 以上引文均见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

② （锡兰）桑穆加塔桑：《列宁之后——毛泽东》锡兰《太阳报》1964年10月1日。

③ 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10日。

④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先锋报》1978年12月14日。

有的人还这样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导师。"①

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思想的领会更加深刻。结合他们的斗争实际研究这一思想，运用这一思想。他们指出，这一重要辩证法思想"使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心中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这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强大武器。"②"桑给巴尔的国土虽小，人口也少，但我们却能用原始的长矛、刀枪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赶走了，这不是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正确吗？"③这是桑给巴尔的一位高级军官结合他们的革命实际对毛泽东这一辩证法思想的论证。他们认为，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并且在斗争中实践这一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才起来敢于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正是他藐视强权，甚至不惜使他自己的国家受人排斥，才照亮了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道路，教会了小国站起来坚决反击，唤起了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觉悟，使他们看到了即便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靠的世界上依靠自力更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④第三世界人们结合实际的论证，便毛泽东这一辩证法思想的真理性光芒四射！

毛泽东的关于战争的理论和军事科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最后胜负是军队的物质力量，但是，在物质力

---

① 马里的《发展报》1976年9月。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1日。

③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④ 《巴基斯坦时报》社论1976年9月。

量具备了的条件下，军队的精神力量，例如思想政治工作，军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士气，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这种精神力量又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军事科学、指导战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第三世界的人们，特别是那些领导革命斗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十分理解毛泽东这一思想，注意研究它，运用它。有一位高级指挥官说，他们有两种武器：一是精神武器，“那就是中国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这种重要武器”，“帮助我们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使我们懂得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去，使我们永远不怕敌人而且能够战胜它们。”二是物质性的武器，这就是“步枪、机枪、地雷，能帮助我们杀伤殖民军”，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把毛主席的思想看作是我国人民解放的最有力的武器。”②他们深切地懂得毛泽东这一辩证法思想。

关于毛泽东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第三世界也有很好的研究和实际运用。他们说：“毛主席一贯的信念就是，坚信人民是世界历史的不可替代的动力和创造者。”③特别是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相信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基础。”④他们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群众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如何发动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战争，毛泽东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尤为需要。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联合会书记西索尔·费亚洛斯指出：毛泽东“关于革命斗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业尤其具有重大意义。”⑤

总之，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理

---

①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②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10日。

③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53页。

④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49页。

⑤ 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64年3月26日。

论上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的运用，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发展的鲜花盛开，硕果累累。

第三节 第三世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

第三世界的人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其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广泛性。我们从第一节所介绍的材料看，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特点。所谓广泛性，一是，毛泽东著作几乎传遍亚、非、拉美各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十分广泛，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遍及第三世界。有人说，除耶稣基督外，再没有比毛泽东思想影响更广了；没有一块地方，不存在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从中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广泛性。三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阶层之广，人数之多，恐怕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统帅到士兵、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从大学教授到大学生，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力图从中寻找解决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以至工作生活的真理，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这使我们中国人都为之感叹不已。

第二个特点，是结合本国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重在运用。虽然我们介绍了他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文章、讲话的观点、结论，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成就是实际上的运用。他们首先运用毛泽东思想制定自己的指导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同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所说，我们的革命所以搞成功，就是学习、运用《毛泽东选集》1—4卷。拉美国家有的人学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之后，就明确表示它对于拉美许多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拉美也可以说，谁忽视了农民群众，革命是不可能成功

的。他们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制定了指导战争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适应敌我变化搞“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们运用毛泽东经济思想解决经济问题。他们说“自力更生”方针不只是中国的政策，也是第三世界解决自己经济的政策。还有许多国家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建设，建设好自己的革命党。更为令人赞叹的是，许多自由战士、进步分子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作到在革命斗争中不怕坐牢，不怕牺牲。我们认为这是第三世界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个特点，正因为第三世界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视实际应用，随之而来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毛泽东哲学的普遍和特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法论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政党和进步组织都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其意义极为重大和深远，对第三世界最富于启发性。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原则，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丰富发展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因。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中也有过数次由教条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指出了符合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并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指出：“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光辉结果。”②伊朗的报刊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是运用

① 《胡志明选集》第3卷，第177页，越南外文出版社，1964年。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7月17日。

辩证唯物主义的最高榜样和典范。他教导我们要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应用于各国的革命实践。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在于同具体情况相结合。”[1]而马来西亚共产党则坚定的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障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2]

前南斯拉夫的学者对于毛泽东这一根本方法和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普·弗兰尼茨基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策略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出发，“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很清楚根据已有的理解和经验摆脱对于历史问题的任何教条主义的解决方式”。事实证明，“在复杂的历史事变和环境中以唯一的经验和革命理论作为指南是根本不够的”，必须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发展这种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表明自己是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3]德鲁罗维齐指出，中国革命有其特殊性，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不是以无产阶级而是以农民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功绩就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并创造性地给以解决。“这是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它的力量和权威性的关键。”[4]第三世界的人们结合他们的实际，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

---

① 《红星》月报1976年9月。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1年7月1日。

③ 《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16、13、570、575页。

④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第26页。南斯拉夫萨勒布，1982年版。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11月15—19日。

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只有结合本国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学会马列主义，才能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才能在新的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理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实践相结合，决不是简单的重复马列主义，而是创造性的活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是理论的创造性活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着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际，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极力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说什么以后“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了。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党中央所拒绝。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坚决抵制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第三世界关于毛泽东的普遍与特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辩证法思想和研究，对于中国人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四个特点，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珍视中国革命经验和崇敬毛泽东的统一。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第三世界的巨大影响和毛泽东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促进了人们对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积极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又推动着人们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和对毛泽东的敬仰。在第三世界的人们看来，中国的经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形成了学习、研究中国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榜样的三位一体的特点。也由于这一特点，他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踏实、时间持久、人数众多。

第三世界的许多政治家、革命领导者、理论家和革命人民，无不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远远超出了本国范围，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认中国革命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由于是在一个人口几乎众达全球四分之一而又曾经处于地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的国家内实现

的，因而它大大地超越了本国的范围，作为一次最宏伟的国际事件而产生自己强烈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丰富而悠久的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机械抄袭别国作法的经验。”“中国革命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主要是被压迫各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它的经验是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财富；是教导所有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庄园主桎梏，或面临建设新社会的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科书。”① 这种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中国革命经验重大意义的评价，决不只是巴西革命者的看法，它反映了第三世界人们的共识。因此，他们极端重视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必然的。

由此而来的，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威信日益提高，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敬仰更增强，于是从不同方面评价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品格和作风，也相当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人们之中。

这里仅介绍几个材料。巴基斯坦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近邻。他的国家领导人历来和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友谊，是互相了解的。前总理布托在毛泽东逝世时，他发表声明，对毛泽东作了诚挚和富有情感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族人民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① （巴西）毛里西乌·格拉波依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力量》，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8月16日。

1976年9月，尼泊尔的《祖国》周刊评论指出，毛泽东主席是“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众的指路人，为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鼓舞力量的源泉”。同年9月，委内瑞拉外长埃斯科尔瓦尔说：“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20世纪的历史”，“每个国家，乃至每个个人，不论对毛泽东思想持什么观点和立场，都不能否认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同年，塞浦路斯《自由爱好者报》发表评论指出：“毛主席以他的勇气、哲学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强国。”由于他们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由于无限敬仰毛泽东，所以在第三世界的人们中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学习、赞赏毛泽东的革命品格、革命精神、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成为他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三世界的人们如此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经验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学习赞扬毛泽东革命精神和作风相结合，而且长期坚持，应当怎样认识这种历史情况？有的人说，这是受了中国的宣传，甚至说，这受了中国的“个人迷信”的影响。站在冷静的立场想一想，思想、文化交流，甚至政治、经济的交往，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是难免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本国本民族人民的内部条件。所以对一个国家产生的不论是政治、经济现象，还是思想文化现象，简单地说成是外在条件决定的，都不是科学的方法论。这不但抬高了外在因素的作用，而且也是对于内部因素的贬低。对第三世界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种历史现象如何回答，最好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

“我读完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后，我把他的书选为必读之书。这既不是偶然的决定，也不是一时的激动，而是著作本身具有的绝对说服力所致。”①

---

① 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65年9月30日。

“先前，我不理解广大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天天赞扬毛泽东思想，当我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及毛主席的诗词后，才真正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值得世界人民赞扬的。”①

“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的前夕，全世界所有进步人民，……都向中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向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热烈致敬。这不是形式上的致敬或赞词。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欢呼，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民和党表示信任的宣告，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党，由于他们的正直、英勇、果断和明智，已经证明他们能胜任历史现在召唤他们完成更巨大的任务。”②

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回答啊！

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传播发展的趋势如何？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作简要的分析。

从第三世界的革命建设发展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发展及其关系来看，今后的趋势，已经和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多数国家和多数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发展新经济，更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新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越来越多地研究《邓小平文选》和其它现实的文献资料。虽然他们和中国社会发展尚具有不同之处，但是也面临一个巩固和完善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他们需要从其他国家汲取经验，也要向中国学习新经验。例如，1980年4月，卡翁达总统访问中国时说：“我对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中国和今日中国都公开表示钦佩。”③1990年5月8日至13日，几内亚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维·范桑·耶古拉访问中国之后，特派记者易·西塞写了一篇《中国是一所

---

①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3日。

③ 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4月13日。

学校》的文章说：中国1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效果。北京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旅游者来自四面八方。耶古拉说，中国给他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几内亚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为经济现代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所进行的种种改革。耶古拉赞扬中国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不断改革企业和服务行业的管理，同时，维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成果。他表示，几内亚对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经验兴趣，认为值得借鉴。他说，对所有人民来说，中国是一所大学校。① 二是，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本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发生的正反面情况，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写出专门的理论著作，如像印度的莫汉蒂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有质量的文章。例如，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1978年12月发表的《马列主义的巨人毛泽东85诞辰》的文章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教授王衮吾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的《毛泽东——中国人与马列主义》的文章，就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向。他们的研究都贯彻了历史辩证法思想。他们关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绩与缺点的评析是客观的全面的，反对那种“左”的或右的片面性和主观任意性。这是很可贵的。还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院讲师尼克•奈特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一书中，对于怎样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是很有见解的。作者认为，作为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有普遍规律是不行的，还要有特殊规律，而且只有二者的结合才是完备的。作者解释道，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并非因强调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乃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马克思

① 参见几内亚《自由报》1990年5月26日。

主义臻于完备”。“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同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相结合。”分析得多么贴切！[1] 三是，第三世界的广大群众，由于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了解和信任，他们从理智和情感上，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在和发展，这样就从内心里愿意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指导自己的斗争、工作和生活。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他的著作用鲜明、生动、朴素的语言，说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使一切人都懂得”。[2] 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能够扎根于亚、非、拉美广大群众之中原因之一。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适合第三世界的实际需要，这是第三世界的人们过去、现在和今后都要研究它的根本原因。

---

① 参看《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 转引自《解放军报》1965年9月30日。

第六章 商榷和对话

我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国外学者有启迪，同样，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我国也有帮助。我国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和观点，有同有异；同样，国外的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和观点，也有同有异。这样，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既存在着共同的认识和观点，又有一些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之间开展学术交流，互相探讨，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有益的。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对于一些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商榷和对话。

有一些问题尽管是作为不同意见而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决不抱着"真理只在我手里"的态度，仍然希望国外学者反驳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受国外一些学者启发而有共同认识，因而加以补充和发挥，是否补充、发挥得对，也希望国外学者不吝赐教。这就是我们商榷和对话的态度。

第一节 关于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哲学家

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世界传播以来，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是否称得上一位哲学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仅在学者中间认识不一致，在政治家之间评价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有的则认为毛泽东顶多可以称为"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不能称为哲学家。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一位哲学家，如果说是一位哲学家，又是怎样一位哲学家？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至关重要。

从古今中外历史上看，所谓哲学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即所谓职业哲学家。第二种情况是，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后又研究哲学，在哲学上亦颇有造诣，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第三种情况是，从事社会活动，领导革命的政治领袖，他们为了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了扫除阻碍社会革命的思想理论，对于某种哲学进行批判继承和创立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而进行哲学研究，他们既是政治家、革命领袖，又是哲学家。这三种类型的哲学家在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史上都是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哲学家。有一种意见认为不是职业哲学家就不能称之为哲学家。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太简单化了。就这三种类型的哲学家的社会功能来说，由于第三种情况的哲学家的特殊社会历史地位，他的哲学更易于变成群众的力量，对于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作用更大，更有效。人们谁也不会否认康德、黑格尔哲学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启迪作用，但是，比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功能，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此，忽视或者不承认第三种类型的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很不科学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不少职业哲学家，他们的哲学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启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对于世界历史的巨大作用则是不能比拟的。在近现代的中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就等于抹煞了近现代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客观发展，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正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流方向。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专门哲学著作只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很难称为哲学家。的确毛泽东没有像国内外那些职业哲学家那么多专门的哲学著作，但

是说只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本则有失事实。毛泽东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一般哲学原理的著作是1937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而《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其中两个问题。这本书在中国解放前，从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间，曾在不同的刊物、出版社多次公开发行。社会主义时期，除了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外，还有1964年和1965年的三次专门哲学问题谈话。这些哲学著作构成了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架和基本内容，而大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则蕴藏在毛泽东关于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著作之中，这些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所以判定毛泽东这样的哲学家的著作的数量不能仅仅限于他的专门哲学著作，而且应当看到他的大量的饱含哲学思想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可以说是军事、哲学融会在一起，可称之为军事哲学著作。因此葛兰西讲："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述"，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有的国外学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初产生自军事著作之中，说不研究毛泽东的大量军事著作，就不能懂得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不无道理。不但毛泽东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具有类似这种情况。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也不多，而他们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战略策略的大量著作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是他的《资本论》可以称得上第一流的辩证法经典。列宁的《哲学笔记》虽是个笔记，但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则包含了深刻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范本。大凡革命家兼哲学家的人都有这个特点。这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的实践造成的。

还有以哲学的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形式来衡量毛泽东是否称得上哲学家。他们往往以西方职业哲学家的哲学著作的严密逻辑

体系和抽象的思辨形式，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为尺度来否认毛泽东是哲学家。这种观察问题的标准和方法是不恰当的。对此，美国的学者弗朗西斯·苏在他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中有一种恰当的论述，我们认为他分析问题的方法正确，所得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很有说服力。

弗朗西斯·苏指出，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地位、意义及其价值，特别是怎样判定毛泽东是不是一位哲学家，不能以西方关于哲学家和哲学的看法为标准。“毛的哲学方法论都是‘非系统化的’、‘非结构化’的，就是说，它们并不象西方哲学所普遍采取的形式那样，不是由规范化的条文所形成的体系”。“从形式上看，西方哲学经常是以系统化的条文根据逻辑推理所表达出来的系统形式”。“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托马斯·阿奎那的《总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然而，当我们把毛的著作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考虑时，就会看到一幅不同的画面。因为，就中国哲学的内容而言，中国哲学的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尤其是从社会和实践的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而其它的关于自然、神等哲学主体，要么是很少涉及，要么是干脆置之不理。例如，中国一些哲学流派也曾探讨过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论’，当然从来也没有特别重视过。而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神论’，在中国哲学中则很少有人提及。就其表达形式而言，中国哲学倾向于运用格言、语录和谈话等大多是来自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方式。这大概是中国的哲学著作没有可以同西方哲学相比的很长的、系统化的、合理的争论等形式的原因，也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哲学不能同生活分裂开来、不能成为纯粹的、泾渭分明的信条。相反，中国哲学同生活总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换言之，一个中国哲学家有指望去实践自己的哲学，同时，除非他去实践自己的哲学教诲，人们才能称他为‘公认的哲学家’，这就导致产生了漫长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传统。按照我们对中

国哲学的这种理解，我们争论的问题——毛是否可以被称为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就进入了新的领域。”作者还针对不同意见，对于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和毛泽东哲学的中心内容及某些特点作了分析，肯定毛泽东是一位“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分析说：“如果我们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就可以称毛为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因为毛的著作的内容的中心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就‘人道主义’这个词是指关于人和人同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毛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改造社会，通过改造社会结构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解和改造中国的复杂的社会现实，毛意识到理论和实践二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他更强调的是实践，所以说，毛的著作总是带有一种政治的色彩和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由此就否定毛关于人、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哲学见解，也不能由此就否认他做为一个哲学家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哲学和生活总是具有传统的联系，没有关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观点的僵死的表达形式的话，那么，在这种程度上，毛的许多著作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标准，因此，他应当正确被当作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1]

这一论述，如下几点是有启发，应当肯定的。第一，指出了哲学因为国家、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不同，因此它的逻辑结构、体系内容和表达形式也不同，不能以某一哲学模式为标准去裁定其他哲学家、哲学著作之是非。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作者虽然没有回答毛泽东哲学是否存在其固有的体系结构问题，但是却肯定了毛泽东大量著作的内容中心“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指出它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哲学和生活紧密联系，强调实践

---

① （美）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荷兰D.Reidel出版公司1981年版。

性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第三，作者认为决不能以哲学的表达形式不同，而否认毛泽东是哲学家。也不能认为西方的“系统化”的、思辨的形式出现的著作是哲学著作，而以“非系统化”、“非结构化”的、用“格言、语系和谈话”的表达形式就不是哲学著作。无论从马哲史还是从中哲史角度，无论从哲学著作本身还是从表达形式上，毛泽东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哲学家，即“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否是“非系统化”、“非结构化”？有没有自己的体系结构和固有特点呢？这在国外学者中间讨论很多。这就是我们想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节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体系和特点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问题，国外学者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此问题，但是他们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看法。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从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来源的考察研究，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移植，或者说，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的产物。二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传统的历史联系、从毛泽东著作与中国传统思想观点、材料的联系进行考察研究，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是，认为既不是原封不动的马列主义，也不是照搬中国传统思想，而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思想，在总结中国现代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第一、二种看法不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实际的，但有真理性成分。第三种看法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实际的，具有全面真理性。

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或要义是什么？从40年代初，中国就有人进行研究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到了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了一个基本的统一认识。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在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 毛泽东在1951年9月修正一位地方党领导干部的报告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概念作了如下的修改和肯定：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②

我们认为"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或本质内容的揭示，否认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存在，否认这一体系自身的系统性、逻辑结构性，是不恰当的。

毛泽东思想表现在各个领域的理论，如哲学、政治经济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教育理论等，都离不开这个总的和基本的框架。例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理论的优秀成果，总结中国人民的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思想斗争的丰富经验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根据我们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这个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虽然理论体系和马克思、列宁一样，但是，在许多方面，不论是内容和形式，特别是强调和阐述的重点，都具有中国革命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对于马列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及其提出的新思想，则具有鲜明的毛泽东的标志和特色，所以被国内外称之为"毛泽东哲学思想"。

首先，在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辩证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② 转引自1951年9月9日《人民日报》。

地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条件和人的作用的关系，但是，由于反对哲学倾向的需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泽东则着重阐述的是意识，主观、理论、社会意识和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能动作用的理论。

其次，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一样，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解决了认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认识来源问题和人对客观世界的可知性问题。毛泽东认为要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能把实践只是作为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作为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应把实践作为认识开始的基础、认识产生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即把实践贯彻认识过程的始终，“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① 只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坚持实践基础上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无限发展的辩证法，即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的认识运动基本规律。毛泽东的《实践论》贡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

再次，在辩证法方面，虽然毛泽东提过对立统一、质量转化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三条规律，但是，毛泽东开始研究辩证法理论时，就特别重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这就是列宁不并列三条规律，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根本规律；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列宁说的：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的重要思想②。由于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成“说明和发挥”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的任务。因此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思想，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的对立统一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体系和内容。1937年的《矛盾论》就是这个体系的首次提出和基本论证。此后，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研究和关于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上的运用，重点是关于矛盾的理论和矛盾的分析方法。到了60年代初期，毛泽东明确表明不同意三条规律并列的辩证法理论体系。于是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只主张一条规律，取消其他两条规律。其实这是误解。对此，1965年毛泽东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一文中作了明确的表述。这是毛泽东在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的一个批注。文字不长，不妨原文引录如下：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①

这个批注明确地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不是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批注又明确指出“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并不是取消这两条规律。同年，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中说过，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规律。他主要是不同意三条基本规律并列，认为只能是一条基本规律。仍然没有取消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意思。他认为质和量，肯定和否定与其他范畴，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实际上仍然主张把其他规律放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下，在核心规律中加以说明，统一于核心规律，而不是并列。我们认为这是他的《矛盾论》关于辩证法是对立而统一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说明和发挥。

这里涉及毛泽东说到“旧哲学传下来的几条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的问题。提出辩证法三条规律是黑格尔。而黑格尔是否把三条规律并列了呢？在我国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是肯定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黑格尔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他的方法核心的，而把质量互变只作为矛盾规律的实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三条规律的。但列宁则不同，他没有并列过三条规律的问题。除了人们公认的是，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实质之外，在他的关于“辩证法的要素”分析中，则明确指出，“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是对立面统一的‘实例’”[①]，很显然，毛泽东是说明发挥了列宁的思想，而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条规律并列的提法。关于辩证法理论体系究竟如何概括，我们愿意同国外学者继续研究。但是，总的看，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弗朗西斯·苏、松村一人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

第四，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础，以人和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规律的辩证矛盾运动过程，着重研究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解决方法。毛泽东强调的是人在社会规律基础上的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具备了客观可能性，而变可能性为现实性，这时就决定于人、群众的能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关于辩证法要素（9）、（15）、（16）。

动作用。按着社会发展规律去积极创造革命条件，而不是等革命条件的自发到来。大部分国外学者对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特别看重人的能动作用，是重视人的哲学体现。

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一个创造性的独特的内容，就是把哲学原理运用领导和实际工作，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使高深的哲学原理实际化、具体化和群众化，变为广大群众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关于领导和工作方法的系统和基本内容，在拙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国外学者亦十分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应予肯定。

综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体系和内容，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基本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经常提倡的“实际哲学”。他曾经提出把旧哲学改造一下，要搞实际哲学，不搞脱离实际的，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使人看不懂的抽象哲学。毛泽东哲学就是实际哲学的典范。

对于这一特点，国外有的学者认识了这一点。在我国虽然有认识，但对于实际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意义仍然缺乏认识，不少人们正在构造什么主体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等等。如果不搞毛泽东所主张的实际哲学，一切构造哲学新体系的努力都不会成功、哲学就不会扎根群众之中，就不会有生命力！

实际哲学，根据毛泽东的本意，就是反对哲学脱离客观实际，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使人民群众看不懂、用不上的抽象哲学而提出的。它主张从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思想斗争的现实实际出发，总结现实经验，说明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高度，以武装人们的头脑，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当然哲学要总结历史的实际和经验，但主

要不应当是历史的实际和经验的重复。当然哲学要吸取前人的书本知识，但是只停留前人书本知识上，哲学不会大发展。这是毛泽东指出的创立、形成哲学理论的过程的基本原则。而在进行哲学宣传普及时，亦应主要结合现实社会斗争、自然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和经验加以说明，也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抽象地说教。这种实际哲学的表达方式方法，则应是广大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毛泽东具体说过这样的意见：希望我国的哲学工作者用大量的现实的实际事例论证对立统一辩证法、让哲学从哲学家和大学课堂里走出来，变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要把哲学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等等。他认为只有搞实际哲学，哲学才能具有真正的科学性、革命性，才有生命力。

国外许多学者肯定毛泽东有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与马列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但又具有毛泽东的特点，这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还试图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体系是以“社会实践概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其方法论有“四个基本要素”或“特征”，即一是综合特征，由此产生了“整体——部分——整体”的研究程序；二是“历史的观点，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而有“过去——现在——将来”的方式进行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的研究；三是“具体分析客观现实”，以“客观——主观——客观”的研究方式；四是“运用”的方法或途径，遵照“理论——实践——理论”的形式展开。[1] 印度学者莫汉蒂认为毛泽东辩证法体系是由四条规律构成的，即“知行统一律、分析律、综合律和特殊律”。[2] 这都是有益的探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取其中深刻的思想观点。

---

① 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

② 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第三节 关于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

关于毛泽东哲学的自觉能动性理论引起国际学者普遍重视和研究，但是看法却不同，或者说很不相同。一种认为，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是毛泽东哲学的“最大的特点”，把毛泽东哲学称为“人本主义”或“积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哲学。“自觉能动性是毛泽东思想核心之一”。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原则，是一种“唯意志论”。西方学者的最主要论据就是，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强大工人阶级基础和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而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作用，硬是把农民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方法，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地位，主观创造了工人阶级作为自己领导革命的主力军。并且认为，这个理论和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甚至有的人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是“农民马克思主义”，是“农民领袖”，不是无产阶级领袖。

自觉的能动性理论，确实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核心之一，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理论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是贯穿毛泽东哲学的每一部分原理之中，它确实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自觉能动性理论是否是正确的理论，首先有必要研究清楚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涵义，了解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以及关于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的实践结果。其次，还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会明瞭它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就会知道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意志论”。

自觉能动性概念是毛泽东1938年在著名的军事哲学著作《论持久战》一书中提出的。

原文是这样：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很清楚毛泽东说的“自觉的能动性”指的是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和人的实践活动。是从人类之区别于物的特点而说的。人的思想和行动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所以人们要求发扬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思想指导的正确的行动，而发扬正确的自觉的能动性，而努力避免错误的自觉能动性。思想包括思想活动和思想活动的产物——思想产品，如，各种意识形态形式以及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等。

为了论述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从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哲学根本问题、社会发展过程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关系、自觉能动性的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充分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性质，从而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唯物论，深刻地阐发了辩证唯物论原理。

毛泽东的基本论点是：（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这是一切唯物论的观点，还不是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承认意识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从意识、思维的内容看是物质、存在决定的，没有物质、存在，不能有意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5页。

识、思维的客观内容，这是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决定的。但是，物质、存在之所以反映到人的意识和思维中来，是由于人的意识、思维的能动性，通过实践能动地作用于物质和存在，一个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物质、存在无论如何不会进入头脑和形成人的意识和思维。首先是人作用于物质、存在，然后物质、存在反作用于人，而不是相反，才形成意识、思维。所以毛泽东说："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①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② 没有实践这种人的能动作用，物质、存在怎么会反映到头脑中去呢。从意识、思维的根源和客观内容上否认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是唯心论，从意识、思维的产生、形成上，否认意识、思维的能动性，是机械唯物论。在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看来，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首先是思想着实践着的人作用物质，然后，物质、存在才反作用于人，这才是能动的反映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而过去那种所谓首先是物质、存在作用于人，之后是人反作用于物质、存在，才产生了意识、认识和思想。死物却能动作用于活人，活人反倒反作用于死物。这完全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二）社会的发展、革命的胜利，首先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没有必备的和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基础，革命就失去了胜利的前提条件。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总是要根据社会和革命的固有的客观规律进行的。人要违背这种客观规律，不顾社会物质条件的客观实际情况去改造社会、进行革命是要失败的。但是，社会发展、革命胜利具备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按照其固有规律的实现，则就要有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没有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5页。

的胜利，规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毛泽东论述革命战争胜利主客观条件作用关系时，最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发展中主客观条件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他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继而在他的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又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 他又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决定革命战争的胜负问题，而社会发展问题也是如此，离不开这种客观条件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作用。

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负和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而是"主要的"决定作用，还有自觉的能动性的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主要次要作用的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当着客观物质条件具备着胜负和发展的可能，变可能为现实时，人的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5—4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54—455页。

自觉的能动作用就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着客观物质条件在战争和社会运动变化其原来的状态时，也主要的决定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战争和社会的规律是客观的，但是规律的实现，则完全取决于人对规律的认识、利用和驾驭。因此，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

（三）思想和做（知和行、认识和实践）都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那么思想和做的关系如何，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是行先知后，另一种认为知先行后，第三种认为无所谓先后问题，而是知行合一。各执一端，争持不下。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唯物地辩证地解决了这一争论。毛泽东认为，从认识、思想、知识的产生、来源上看，当然实践是第一位的、是基础，没有实践不可能产生认识、思想、知识。但从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连续性看，认识、思想、知识形成之后，它又指导着人的实践，对于人来说，没有思想指导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没有正确思想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如果具备实践的条件，但还缺乏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的时候，这时正确的思想、理论的制定就是决定性的了。"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②毛泽东的这个论点受到一些人（包括我国内）的误解，似乎这有点近乎唯心论了。其实，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0—3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0页。

系。这里决没有否认理论来自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而是说来自革命实践的理论，反过来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能有什么真正的革命运动吗；没有革命理论指导的社会运动，只能是自发运动，难道这不是历史事实吗。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违背这个道理。这是一个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论点。

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就是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些基本观点，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运用了它指导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指导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预期效果。

那么，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下面我们再简略地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一比较，人们就会一目了然。

应当说，“自觉的能动性”概念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讲这个概念。但是，马列在论述人的思想、实践和论述思想、实践与物质存在、客观条件的关系时，也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论述物质和意识、思想和存在、人的活动和客观规律的关系时，除了强调物质、存在、客观规律的第一性和决定作用之外，也指出了意识、思想、人的活动的作用，肯定它们的反作用和第二性的作用。而肯定人的思想、实践的能动作用，反对机械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规律、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① 又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原因，但是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1]当然，自然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以达到“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2]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集中强调了意识，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之外的决定作用，阐述了历史观的辩证法内容。而列宁的观点更加突出一些。他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但是总的看，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马列强调物质、存在、客观条件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强调认识是物质的“反映”、“摄影”、“模写”、“反作用”较多，因此人的能动性方面的观点被淡化了。

在社会发展中的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关系、社会规律和人的能动性关系上，他们强调的是经济物质条件、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强调的是历史规律不可违反性。虽然他们反对把经济因素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说成是“唯一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得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决定作用的结论。虽然他们认为，人们能“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我们的历史”[4]，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得出：在这些“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具备了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则决定于人的自觉能动性。虽然他们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他们没有明确揭示：社会规律的实现是决定于人的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活动的事实。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不是违反马列的基本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1—4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22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1页。

物主义理论的深化。

那种认为毛泽东自觉能动性的理论和实践是"唯意志论"，完全站不住脚。其中除了某些外国学者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故意歪曲之外，至少是对毛泽东自觉能动性理论和我们社会实践的经验缺乏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所谓"唯意志论"，它是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之一。它否认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而认为人类意志具有决定的、头等的意义。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不顾历史固有规律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英雄人物的意志决定的。或者表现为主张人可以制造、改变和消灭客观规律等等。而毛泽东的自觉的能动性理论，首先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然后才指出意识的能动性，是人作用于客观物质之后物质反作用于人脑机能，才产生意识、认识和思想。他首先肯定社会发展中的客观物质条件主要的决定作用，然后才指出仅仅这一点还不够，还有自觉能动性的决定作用；而且特别指出自觉能动性的决定作用是在客观物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指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时候，自觉的能动性才起决定作用。他首先肯定社会规律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而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在这个前提下，再发挥人的思想、实践的能动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于指导战争的人员总是强调"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②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样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他说，规律是个大学校，它教育着我们千百万干部。说，违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6页。

反了规律，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他在检讨"大跃进"的错误时着重论述了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办事的极端重要性，论述了认识和掌握社会规律的过程性，并且承认"大跃进"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最近几年我们""干过许多蠢事"。① 由此可见，说毛泽东的自觉的能动性理论是"唯意志论"是毫无根据的。

这里有若干具体问题，我们愿意和国外学者共同讨论一下。

第一，怎样认识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农民是革命主力军问题，能否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凭着意识形态理论，主观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主力军？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实是一个新问题。人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采取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他的"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观点"。②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不能去加速这种分化，但不能阻碍这种分化。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对的，那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怎么看呢？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的实际出发，认为在中国农民阶级既不能认为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认为是"反动的"，而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要努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

力防止两极分化，通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然后再经过长期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也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指望"再版的农民战争"解决德国的民主革命。列宁对工农联盟论述得更加充分一些。但是工农联盟，农民能否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还要以农业为基础？这在马克思、列宁时期是没解决的。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胜利。这是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军，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人民军队，在经济上由实行土地改革，分地给农民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政治上实行工农联盟，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用无产阶级思想创造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呢？否则似乎就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那样认识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是指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主力军应是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没有一定的大工业基础，是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中国工业落后，工人阶级队伍不大；敌人占领了工业发达的全国大中城市，迫使城市工人阶级和转到农村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的隔离；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后，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只能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我们以农民为主力军，组织了以无产阶级思想和纪律为要求的强大军队，建立发展了以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多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原则的强大的中国共

产党，在根据地以土改为中心发展农民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从而使中国的广大农民一直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要求，没有超过农民阶级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范围能够完成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求的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农民阶级完全能够接受的，我们的强大思想教育也是围绕着这个政治中心而进行的；经济上不是消灭私有制，而实行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和逐渐实行集体所有。这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最高要求是有质的差别的。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农民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和无产阶级也仍然存在着差别。由此看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对农民的政策都是适应着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农民的阶级利益要求，而逐步领导农民阶级前进的。我们并没有简单的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创造了新的无产阶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除了以正确的经济、政治政策领导中国农民之外，对农民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毛泽东自觉的能动性理论得到正确贯彻的结果，而决不是什么“唯意志论”。

第二，怎样认识中国的“大跃进”错误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国外有的学者本来是高度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但是，后来由于某种政治原因，以中国“大跃进”错误为例，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性，而称之为“唯意志论”。其它问题暂且不论，仅就中国“大跃进”错误能否就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意志论”呢？

造成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以后的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诸如，试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对中国实际研究不够，又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由于复杂的国际斗争又招致了废合同、撤专家、搞经济封锁的打击和破坏，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不那么慎重了，由于深感中

国的落后和人们迫切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意愿，因而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急性病”，等等，于是出现盲目跃进、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搞强迫命令，造成国民经济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这样，发生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严重的经济困难。不能讳言，这里有毛泽东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言论所反映的哲学思想来看，还不能作出结论：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唯意志论”。比如，他在解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时，说好省是限制多快的，不是越多越快越好。多快好省要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比如，他反对浮夸风，反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说亩产十万斤，不过吹牛而已。比如，他提倡头脑要有热有冷，行动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他主张文武之道亦张亦弛，不能总是拼命。再比如，当他发现“左”的错误，违背了社会经济规律之后，他提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指出，违背客观规律会碰得头破血流，是会失败的。一九六二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规律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来在社会规律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社会规律的理论。由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我们党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有效措施，到1962年就开始扭转了经济困难，克服了危机。由此可见，把由于我们主观和客观许多原因造成的中国“大跃进”错误和经济困难，统统归结为毛泽东的哲学“唯意志论”，是不科学的。

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不作具体分析，就会主观离开客观。中国的“大跃进”期间，确实出现过一些主观主义的观点和口号，出现过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误解而提出的一些观点，报纸还大加宣传，这样，对于“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但这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身，有的是毛泽东的误解，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不能因为毛泽东某些理论失误而否认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性，而贬之为"唯意志论"。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是群众熟知的，是报纸加以宣扬的。对于群众为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作用来说，其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整个口号则带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色彩。如果提"地有多高产，人有多大胆"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两句话，这个口号就有了辩证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提"人定胜天"其本意并不否认天能制人的事实，而在于强调人的能动性、人的精神、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并没有否认"天"客观存在的唯心论意义。例如有人提出，15年超过英国的超英赶美的口号，把经济建设看得很容易。又例如，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极"左"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吃饭不要钱和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毛泽东当时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提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不实际，而只能加以逐渐的限制。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要允许商品的存在和发展的，中国不具备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也否定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并阐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备条件。对于所谓"超英赶美"的急躁口号，则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①这样，就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越发符合其固有的规律性。

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当时国内外的特殊条件下，试图寻找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但是，毛泽东也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而在实践中又不断地发现主观主义错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既不断克服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上出现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

主观、急躁、盲动、左倾幼稚病的倾向，逐渐战胜了困难。因此决不可以把毛泽东的局部的一时的思想上的错误同根本否认自然和社会规律性和必然性，认为人的特别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决定一切的“唯意志论”相提并论。

第四节 关于毛泽东的矛盾理论的一些问题

毛泽东的名著《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此《矛盾论》在国外受到广泛的研究和很高的评价，是很自然的。也有一些学者对于毛泽东的辩证法著作和毛泽东某些辩证法观点提出异议和反对意见。在这里，我们想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商榷。

毛泽东认为辩证法的理论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及其实质极为重要。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国外有不同的看法。

矛盾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早就有了，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韩非在他的《难一·难势》中就使用了“矛盾”概念以表达客观事物的关系。“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很丰富的。毛泽东是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因此，毛泽东在论述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时，以《矛盾论》为题不是偶然的，是批判继承了中华民族哲学优秀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表述。

毛泽东使用的“矛盾”概念摆脱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涵义，完全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界定。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矛盾概念的使用确实是多义的。例如，形式逻辑意义上，他讲过不要前后矛盾，不能违背形式逻辑而自相矛盾。他有时说问题、困难就是矛盾。这个矛盾的意义就包含着“关系”，也包含“实体”。但是，从哲学上毛泽东指的矛盾就是指的两种意思。一是指一事物和一事

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对立而统一关系。他指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这在《矛盾论》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明了。二是指的客观事物的本体。他指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总之，客观一切事物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 由此可见，认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只是一种"关系概念"，或者只是一种"实体概念"是片面的。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是关系与实体的有机统一。关系是实体的关系，没有实体的关系是空的关系；同样，实体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没有对立统一关系的实体也是不存在的。

关于差异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一些异义，有的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有的认为不正确。日本的一位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不能正确地把握矛盾的本质。"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它导致了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要把这个观点辩论清楚，要了解毛泽东是怎么提出并论述这一问题的。否则各说各的理，不易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最先是在1937年8月《矛盾论》中指出，"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么，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54、280页。

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助矛盾的，仅仅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①非常清楚，在这里，第一，毛泽东是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反驳了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错误；第二，毛泽东讲的苏联社会的富农与一般农民的差异、法国革命的工农资产阶级的差异是指的事物之间的内在差异；事物的内在差异，无异是包含着矛盾，或者说本来就是矛盾关系。第三，毛泽东明确指明了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有“激化形式”和非激化形式的差别；同是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又有性质和解决方式的不同等。由此可见，认为毛泽东关于差异就是矛盾是“不能正确地把握矛盾的本质”，是不正确的。

1937年9月毛泽东在《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中，又提到事物的外部差异和矛盾的问题。他认为，外部差异，也不能说不是矛盾和不能成为矛盾。不能作这样的绝对判断。艾思奇在《哲学与生活》中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毛泽东指出：“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为此，毛泽东还举一些例证说明。最后他得出结论：“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②很明显，这里毛泽东并不把任何客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81—282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1页。

观事物的外部差别都说成是矛盾，而是在一定的条件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就成为一种“具体的矛盾”。在关系中的矛盾。因此那种批评毛泽东随意把差异说成是矛盾属于把矛盾庸俗化了绝对化了完全是无的放矢。由此不能得出这一观点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论。

关于差异和矛盾，黑格尔曾经以“同一——差异——矛盾”的公式说明概念的自我运动的逻辑秩序，反映概念的逐步由混沌到清晰的发展过程，但当他说到同一、差异与矛盾的关系时，并不看作绝对对立的，而看作是辩证的，互相联系、互相包含和互相转化的。他反对绝对同一，认为同一是差别的同一，“同一是一个有差异的东西”。“差异物之所以是差异物，是因为它是在它的对立面之中，即同一中。”① 差异与矛盾也是如此。他说：差异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个否定进一步把自己规定为差异，规定为对立，这也就是建立起来的矛盾。”又说：“区别一般已经是自在的矛盾。”② 由此可见，以黑格尔的“同一——差异——矛盾”公式来否定毛泽东的差异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对黑格尔的公式作了形而上学的，或者说，形式主义的表面的理解，而恰恰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同一、差异、矛盾关系的辩证法真谛。在我们国内曾经有人说，当年苏联德波林的观点是合乎黑格尔辩证法的，而米丁等人批评德波林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观点是违背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大错特错的。至于说，差异就是矛盾的辩证法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两类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是找错了地方。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是坚持矛盾普遍性理论，是彻底的辩证法。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关于矛盾性质问题，国外都知道毛泽东把矛盾性质分为非对

---

① 《黑格尔论矛盾》，第81、88页。

② 《黑格尔论矛盾》，第114、105页。

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在社会领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学者批评毛泽东不承认可调和矛盾的存在，不承认矛盾的自我实现是解决矛盾的方式，而只是把矛盾区分为对抗、非对抗两类。对此，值得商榷。

首先，毛泽东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而且认为无论是自然、社会和思想领域都普遍存在。但是毛泽东不把两类矛盾绝对化，而认为因一定条件是发展变化的，就是同一种矛盾在同一的时间空间其对立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对抗或者纯粹的非对抗，对此必须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特别是毛泽东对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的具体分析，丰富了矛盾分类的理论。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① "革命性"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非对抗性的，"妥协性"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和工人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如此，中国各个不同的革命阶级凡属于人民范畴的剥削阶级和工农的矛盾性质也是有对抗性一面和非对抗性一面，所以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② 这就是说，社会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存在着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和既有对抗性一面，又有非对抗性一面的二重性质这样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有对抗又有非对抗二重性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我们讨论关于所谓"可调和矛盾"是否存在的问题。应当说关于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没有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毛泽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364页。

东的也是我国哲学界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学术界有的人提出疑义和不同意见，认为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也存在着可调和的矛盾；认为矛盾不可调和论是僵化，是形而上学，国外也有的学者提出同样观点。这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结果吧。

毛泽东的《矛盾论》虽然没有明确说矛盾的不可调和问题，但是他在论述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时则明确地说明无论什么矛盾都是对立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而“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① 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也不能把矛盾分为“可调和矛盾”和“不可调和矛盾”，只能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后来，即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他明确指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国外学者说毛泽东不承认有可调和矛盾的存在，这是事实。但是认为毛泽东否认任何调和的存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认为所谓矛盾不可调和，就是指的任何矛盾都存在着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虽然和旧社会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不同，但是还是有斗争的。例如，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激烈的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集团之间还有斗争，社会还会有各种改革和革命，这就是斗争。又例如，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7页。

之间的差别，虽然这些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所谓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没有斗争的矛盾，这是不存在的。无论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都不存在没有斗争的矛盾。因此没有什么可调和的矛盾。矛盾就是事物的诸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诸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相结合。没有斗争就不成其为矛盾，就不成其为事物，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变化。

现在国外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以统一为主的矛盾，所以是可调和的或者说“不是不可以调和的”。是否存在以统一为主和以斗争为主的矛盾，这样的划分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就是以统一为主也不能排除统一的相对性，不能否认辩证法的统一是斗争的统一，也是由于斗争的推动使事物由旧的统一过程转化为新的统一过程。只要不能否认斗争的存在，就不能说什么可调和的矛盾和矛盾是可调和的。至于说毛泽东不承认矛盾的自我实现是解决矛盾的方式，则完全不是事实。毛泽东从来认为，不论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解决都是经过矛盾的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自我实现来解决的。毛泽东也承认外因或外部矛盾对事物矛盾的解决的意义和作用，但认为这是第二位的，它总是经过事物的内部矛盾（原因）而起作用。这在《矛盾论》第一章讲得十分明白。那么是否可以说“矛盾的自我实现”就是可以调和的矛盾呢？不是的。任何矛盾的解决都是自我实现的；自我实现也是经过斗争的结果，没有斗争的自我实现是根本不存在的。矛盾的自我实现过程只有斗争性质和形式的不同，而不是斗争的有无。过去有一种传统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得到解决，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解决。于是有的人就认为前者是矛盾自我实现，属于可调和的矛盾，而后者不是矛盾自我实现，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误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自我实现是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有时也是尖锐的斗争，才解决的，

根本不是什么可调和的矛盾，也不是经过调和才解决了矛盾。说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彻底解决，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不是“自我实现”的，它也是经过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诸方面又统一又斗争而最后“自我实现”，即社会革命。由此可见，以“矛盾自我实现”为标准来区分矛盾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是不科学的。

现在一些人对于“矛盾不可调和”存在一种误解，似乎一讲“不可调和”就是对立双方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根本不是如此。哲学讲的矛盾不可调和就是说矛盾总是斗争的，总是斗争推动矛盾的发展，不能否认矛盾的斗争，否认斗争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否认矛盾可调和或可调和矛盾，就是坚持矛盾斗争的无条件性和绝对性。坚持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的又统一又斗争的辩证关系。

现在国外还有一种倾向，由于不能全面正确的反思，似乎认为哲学的斗争性不是个好东西，是“极左”。其实哲学概括的斗争性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之中的，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事物矛盾运动的特性之一。斗争的无条件性、绝对性，贯串事物始终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真理，是一个好东西，不掌握这个真理，人们就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就必然犯错误。斗争是绝对的，贯串事物的始终，但是，每一事物和每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斗争性质、形式则是不同的，因为事物的性质、事物的存在发展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因而是相对的。过去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问题，犯错误，主要根源在后者，即把事物斗争的性质、形式的相对性当作斗争的绝对性。现在决不能注意了斗争性质、斗争形式的相对性，而否认斗争存在的绝对性。这样就又走向了另一种片面，它同样会使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又犯错

误。前一段"熄灭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就是如此，从淡化阶级斗争观念，有可能跳入另一个极端。

既然毛泽东不承认可调和矛盾的存在，不承认矛盾是可调和的，那么是否承认矛盾在其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存在调和现象呢，并且主观是否应当适当利用这种调和现象呢？我们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毫无疑义承认这一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说到事物的量变状态时就提到"调和"现象。他认为这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的一种现象。在社会矛盾中，矛盾的双方，由于一定的条件，互相减弱斗争，或者互相放弃某些斗争，而处于调和状态是常有的，虽然是暂时现象，但是确是事物运动客观存在的，因此人们恰当地认识和运用这种情况，以适当的方式、方法推动其发展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在处理各个不同时期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系，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灵活机动政策、策略方面就体现了这种辩证法。因此，认为毛泽东否认可调和矛盾的存在，同时也否认任何调和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不正确的。但是也可以肯定"调和"决不是毛泽东的根本方法论。

关于矛盾理论，还有一个斗争性和统一性问题，主要是怎样认识斗争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斗争性和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意义以及所谓"斗争哲学"问题，国内外对此讨论很热烈，分歧也很大。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国外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斗争问题，是有启发的，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有的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斗争性问题存在疑义，甚至认为它并没有普遍性，说恩格斯讲的力学矛盾，在那里不存在"斗争"，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都肯定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如果不把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7页。

又斗争的关系、地位作用研究清楚，就无法说明矛盾如何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样，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就等于空话。这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矛盾，世界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事物的运动是矛盾的运动，而矛盾就是事物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所以构成事物运动的就是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统一性相结合；既不能说构成事物运动的只是统一性，也不能说构成事物运动的只是斗争性。这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基本观点。

那么，作为矛盾实质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是怎样的关系，构成事物运动的统一和斗争的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又是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关于斗争性理论的实质和意义，就会领悟毛泽东所说的“斗争哲学”的意义。

“斗争性”是对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存在及其发展实质的最一般的哲学概括，不同于社会那种狭隘的矛盾双方的互相打骂、对立之类，这些只能是斗争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哲学斗争性概念是对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的相反、相斥、排挤、相异、对立、抵抗、争论、对抗等倾向的概括。认为这种斗争性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各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具有特殊性，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在自然界和力学的矛盾中不存在斗争，这是非科学的。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就是又统一又斗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讲的吸引和排斥或者叫引力与斥力之间，也是一种统一和斗争的关系。因此，说恩格斯不讲自然界的斗争性，不是事实。即使由于某种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讲自然矛盾的斗争性问题，也不能因此否认自然界矛盾斗争的客观存在。不能以某人是否说过来判断是非，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方法论。

我们从自然、社会、思维的矛盾实质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矛盾的统一斗争不可分离，但是从二者的内在本质关系

看，斗争性则是更根本的、更本质的，是第一因素，是更积极的而富于生命力的。这是因为，首先，任何具体的统一都是斗争的统一，统一是从斗争中引导出来的，相反才有相成。没有斗争的统一是不存在的，是形而上学的同一；其次，统一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不断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而转化的动力则是斗争，由斗争引起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事物从旧的统一到新的统一的发展，就没有对立面的转化。就是在气体中也有分子的排斥和斗争，而在更稀薄的分散的物质中，例如在慧星尾中就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非常巨大的力起着作用。因此恩格斯称赞黑格尔的天才，是"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第一因素的排斥中引导出来的第二因素"① 这里说的吸引和排斥实际上和统一与斗争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恩格斯是肯定斗争和统一是第一因素和第二因素的关系。这就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矛盾运动时，总是非常重视斗争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可以理解列宁在讲事物发展时，着重指出的是，承认和发现自然、社会、精神过程的"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以至明确说："发展是对立的'斗争'"，② 从而也会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事物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之间的这种一致性，没有什么奥妙！因为他们都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因此那种否认斗争作用和否认斗争普遍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国外学者把毛泽东的矛盾、斗争和变化的观点归纳为：斗争的固有性；斗争的普遍性；斗争的有益性和斗争的永恒性，这并不错。只是斗争的有益性，需要多说几句。从斗争是客观事物的固有性来说，自然就肯定其客观有益性。但从主观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6—307页。

用客观斗争性问题时，就有了正确运用和错误运用的区别。正确运用客观斗争性，对于事物的发展和工作的完成是有益的；而错误的运用，对于事物发展和工作的完成则是无益的。因此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历来主张进行正确的斗争，适当的斗争，而反对斗争不够、不力和过火斗争。所以对于斗争的有益性不能绝对化地理解。有的学者也注意这一点，指出毛泽东“虽然认为斗争是一种固有的、自然的状态，他也更注意斗争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认为这种自然发生的斗争在事情中间、在人们中间将预先注定以确定的方法从自身中间产生。……依他的看法，世界中斗争的存在，需要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加以反映。”①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位学者对毛泽东的斗争观点作了评价之后，却说：“我们对斗争的评价，倾向于否定它，而不是肯定它。斗争被认为是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助力。斗争就是在进步取得之前必须排除的障碍，它们确实不是进步的动力。”②这就是说他肯定的毛泽东关于斗争的理论不是当作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此他是不接受斗争观点的。但他又说：“斗争就是在进步取得之前必须排除的障碍”，那么排除这种障碍时不就是斗争吗；而进步却又成了斗争的结果。所以这位学者也很难自圆其说。

总之，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斗争性观点的着重阐述，在于强调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否认统一的作用，更不是否认马、列、毛关于相对的统一和绝对的斗争相结合构成事物运动的基本观点。

下边再讨论一下，是否由于毛泽东的斗争性观点，而导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斗争哲学”体系呢？不是，绝对不是。从作为毛泽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毛泽东的晚年，虽然毛泽东在坚持马克

---

①② J·B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中有自己的重点、新观点和表达形式上具有中国的特色，但他始终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并没有提出过新体系。

那么他所说的“斗争哲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讲话中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人家送来的，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说对了。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斗争哲学还在他们后面。离开斗争讲团结，或者斗争不确当，没有劲，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斗争哲学”的概念。从上述情况看，毛泽东提出“斗争哲学”，不是给哲学下定义，也不是说无产阶级的哲学性质和体系，而是由于国民党有人攻击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搞革命战争，唯恐人民的斗争损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因而贬斥共产党只会搞斗争，只会讲斗争，搞斗争哲学。但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我们实行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只是在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搞只团结不斗争；结果国民党的右派势力起来背叛革命，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实行屠杀，搞对抗性的敌我斗争，于是大革命失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保存和继续发展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我仍然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既反对了抗日初期的只团结不斗争的右的政策，又反对后来的只斗争不团结的“左”的政策，从而大大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因此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权利是斗争来的，不是国民党送给我们的。要说斗争，实际上是剥削阶级首先压迫被剥削阶级，首先他们向被压迫阶级斗争，然后才有被压迫阶级反压迫的斗争；首先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向共产党搞残酷的斗争，而后才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党搞斗争哲学、国民党同样也搞斗

争哲学；而且它是首先搞斗争哲学的，我们的斗争哲学是跟国民党学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提出斗争哲学概念的。绝对没有什么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讲的斗争哲学要人们正确处理斗争和团结即统一的关系的观点，就是既不能离开斗争讲团结，又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的乱斗争，“斗争不确当，没有劲”都是错误的。“斗争不确当”就是斗争过火，“没有劲”即斗争不够或不敢斗争。前者是“左”的错误，后者是右的错误。总的说，毛泽东既主张搞斗争哲学，又反对把斗争绝对化。这些观点应当说是毫无疑义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两次提到斗争哲学的问题。同样也只是从一定意义上说的，另外，又加以阐释。一次是在一次讲话中说，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再一次是在一篇文章中说，总之，按照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这里解释了两点：一是，以矛盾、斗争的普遍性为根据，认为斗争哲学并不错，二是，再一次阐明不能把斗争绝对化，斗争形式要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用来解释党内矛盾和分歧时，把党内的认识和思想上的是非之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显然是把矛盾斗争性质判断错了，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江反党集团，为了阴谋篡夺党政最高权利寻找理论根据，1967年9月22日公开发表所谓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把毛泽东这一段话斩头去尾只刊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一句话，隐匿它的历史背景，歪曲它的本来意思，把斗争绝对化，乱用斗争哲学的概念，使之变为他们打击、陷害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变成他们打击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棍子。我国“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使许多人认清了林、江反党集团篡改、歪曲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罪恶目的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恢复了毛泽东提出的“斗争哲学”的本来意义。我们今天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评价毛泽东的观点。

评价一种理论和一种观点的正确与否，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真有道理，而不是看什么人说的和说过和怎么说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实践出现的问题，往往还是迫使人们去强调那些老生常谈。这里又涉及到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必须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在这方面，国外学者亦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即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论。

第五节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问题

国内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者，都很注意对毛泽东哲学特点（特色）的研究，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兴趣，比起我国的学者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研究所达到成果令人瞩目。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所采取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许多观点、结论和方法我们是同意的，但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共同讨论。拙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有三点概括：“一曰，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结合，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二曰，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三曰，同民族的大众的形式紧密结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提出了三个“结合”和“具有”。[①]这种概括不

① 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第20—24页。

无一定道理，但是整个看来还是有不少欠缺之处。近几年，看了国外不少学者的真知灼见，颇受启迪，故愿重新探讨，使我们的研究日臻完善。

我们认为研究这个问题不宜笼统而论，这样不易说清楚，而应从若干不同方面揭示其特点。即从时代背景、内容、体系结构、毛泽东个人实践、民族文化和表达形式等诸方面进行研究，这样，对于把握毛泽东哲学的实质、地位、意义，就更易于理解一些，也便于消除学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分歧。

一、时代特点

毛泽东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时代背景，就国内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革命战争，是国内最大的时代特点。就国际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出现了新的危机，即资本主义各国瓜分殖民地的斗争连年不断，为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可以突破的薄弱环节，从而发生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首先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斗争的时代。两个体系、两种制度的对立斗争，是世界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特点和马克思不一样，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虽然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但基本上属革命运动初期，或者是大革命的准备时期。虽然毛泽东曾经说，他和列宁是同一个时代。但是列宁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对立斗争的时代之前，而当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国内的革命战争，国际上的两种制度的对立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所处时代特点，也是他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环境。马克

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毛泽东哲学必然反映所处时代的特点，汇集时代精神的精华。于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实践的认识论、矛盾的辩证法和彻底的革命观与群众观，就成为毛泽东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时代精华。

二、内容特点

由于时代特点所决定，毛泽东哲学在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点。首先，在唯物主义理论方面，如果说马克思适应时代要求，在物质和意识、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强调的是规律的客观性决定性和主观的被动性、服从性，那么毛泽东则是在物质第一性基础上，强调的意识的能动性和人的主观对规律的认识、利用、驾驭的能动作用，总之，就是强调自觉的能动性。虽然列宁在这方面比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有所前进，但是还不够充分。例如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就很明显。应当说，这都是时代特点决定的。

其次，关于认识论的理论。毛泽东根据马、列的有关论述，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① 认识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实践。从而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一个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认识论。② 关于毛泽东认识论的特点，国外许多学者加以充分地肯定，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再次，唯物辩证法方面的特点。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时，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72页。

主要是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发现的质量转化、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称为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并认为是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三条基本规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体系。马克思两次表示自己要撰写独立阐述辩证法的专门著作，① 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如愿以偿。恩格斯专心写了《自然辩证法》，但属于卡片、笔记的材料。是否也打算专门阐述唯物辩证法不得而知。从列宁的《哲学笔记》看，似乎打算重点研究辩证法，但是也没有完成唯物辩证法的专门著作。虽然人们高度评价列宁的遗留给人们的《哲学笔记》，但是毕竟尚属于比较片断的思想。许多属于提出问题和观点以及对黑格尔思想的评价，有些甚至是猜测性的随想。关于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只能算是一个提纲或大纲。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其中的深刻的和创造性的思想观点。毛泽东在列宁提出的辩证法实质和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质量互变、肯定和否定、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现实和可能、必然和偶然等规律、范畴围绕一条对立统一基本规律而构成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一个辩证法理论体系。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研究重点是对立统一规律，他的实践运用重点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为中国人民贡献了基本矛盾、根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把对立统一理论运用于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提出了矛盾分析方法。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基本矛盾"、"主要敌人"、"基本任务"等概念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行动，它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维方式。②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特点。在这方面，似乎不少国外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6页，第32卷，第535页。

② 参见（印）莫汉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学者有共同的看法，即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不一样，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毛更重视、强调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在社会规律和人的能动性关系，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更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上，则更重视上层建筑的意义和作用。甚至有的认为毛泽东使用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并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异端”，也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只抓住了某些表面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对中国这个社会存在的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相对立。这方面的论述极其系统而深刻。他只是在肯定存在、规律的基础上，又十分重视意识的能动作用和人的力量。再例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肯定生产力是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关系作用的著名论点，他首先明确的是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①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观点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文章划分敌我时，就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② 抗日时期毛泽东谈到集团、政党政策的社会作用标准时指出：“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0页。

务”只有两项，一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他明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结蒂”，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由此可见，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而且认为这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是不正确的。相反，毛泽东所坚持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发挥了恩格斯晚年关于完整准确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理论上是有贡献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是阶级论、社会革命论和群众路线论。这完全是中国的革命时代需要决定的。毛泽东自己这样叙述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 从这时开始，阶级斗争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为中国人民贡献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的阶级性、阶级本质、阶级斗争规律、阶级以及阶层的标准及划分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他在我国完成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上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最突出的贡献是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特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伟大理论，这和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列宁根据俄国实际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同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这一理论、方法在革命实践的贯彻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巨大丰富和发展，具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正如国外一位学者指出的："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就是使党非官僚化"，"他的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曾引起西方知识界的很大注意"。这位学者是抓住了实质问题。最后一个内容特点，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这是在马克思、列宁那没有或者很少有的内容，毛泽东把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创造了一般理论、方法与具体理论、方法相结合的一整套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原则，使哲学到实践、哲学武装群众找到了有效的中介，架起了桥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三、体系结构特点

有的学者以毛泽东哲学体系与西方哲学体系结构作比较，认为"西方哲学经常是以系统化的条文根据逻辑推理所表达出来的系统形式"，"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托马斯·阿奎那的《总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而毛泽东的哲学和方法论都是"非系统化的"、"非结构化"的。确实存在这种不同的特点。不但如此，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比较，也存在这种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和方法论时，无论是以批判继承别人的哲学形式出现，或者以总结、清理自己的不正确的哲学影响而著述的理论，都有以系统化的条文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所表达的哲学著作。例如《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而毛泽东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系统哲

学著作之外，再没有以系统条文和严密逻辑推理而构成的哲学巨著。由于这种情况，以至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否认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存在，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

我们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如同西方哲学体系结构那种特点，甚至与马克思、列宁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毛泽东哲学和方法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毛泽东哲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不仅表现在他的少量的专门哲学著作之中，而且大量地表现在他的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和关于战略策略以及方针政策的文章之中，特别是表现在大量的军事著作之中。例如，1936年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包含着深刻的唯物论和认识论思想；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一书，堪称是一部辩证法巨著；还有1956年和1957年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又一部《矛盾论》巨著。有一位日本学者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毛泽东哲学首先存在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之中，他说，没有他的大量的军事著作，就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他还认为毛泽东哲学开始产生于他的军事著作之中。这种认识不无道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表现在各种著作中的哲学思想的系统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并不亚于以系统化、逻辑化形式出现的哲学著作。因此，国内外一些人由于毛泽东哲学体系、结构这种特点，而否认毛泽东哲学体系，否认毛泽东是哲学家，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表面性的表现。

毛泽东哲学体系结构的这种特点，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毛泽东不是职业哲学家；（二）他投身革命事业之后，中国就是一个革命成熟的国度，一开始就忙于参加和领导革命实践。既无条件，又无时间更多地从事于理论研究，只能在研究、解决革命的各种实践中学习、运用、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三）他开始革命活动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哲学新体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受过唯心论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他没有形成自己的唯心论或旧唯物主

义固定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和时间，如同马克思那样去清算自己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影响而去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哲学；（四）毛泽东所遇到的哲学批判对象和马克思、列宁不同，它不是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对象，而主要是党内和革命内部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以及形而上学思想倾向。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也无必要以专门哲学概念去系统化、逻辑化地长篇大论。但这不是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没有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哲学敌人。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乏其存在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隔离，危害所及并不直接。而和这种公开的哲学敌人作批判斗争的，则由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地下理论工作者和其他进步文化人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因此毛泽东批判的哲学对象，对于这种人涉及甚少，而锋芒所向，主要是主观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教条主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泽东哲学体系结构形式的这种特点。

四、个人实践特点

这里指的是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或革命职业生活所决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博于中外历史文化，有理论素养的人。这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撰写的《西行漫记》中早有叙述，而且也为毛泽东长期以来表现出来的很高的理论、文化素养所证明。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决定，他没有成为职业的理论（哲学）家，尽管到了生活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当一名教员的愿望，他终于成为职业革命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职业和他所熟悉的实践，在创立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就注定主要不能从古今中外哲学资料中去思维和创造，只能是主要的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党的集体经验和人民群众的丰富实际经验为基础，同时吸取古今中外的思维精华。同时，又注定毛泽东不可能也无必要以古今中外某一唯心论哲学家为对

象，经过批判继承以构造它的内容和体系。毛泽东哲学是在研究革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践经验中体现的。因此，毛泽东说他是搞“实际的哲学”的，他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本式哲学。为此，他曾经提出，要把哲学改造一下。毛泽东所说的实际的哲学，就是要总结自然斗争、社会斗争、思想斗争的实际经验上升到哲学，创造新理论，而主要不是从前人书本中构造哲学；就是要运用哲学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结合实际地解释、宣传哲学。他认为这样创造出的哲学才有生命力，这样宣传的哲学才能被群众掌握，这样运用哲学才是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搞实际的哲学，这又是毛泽东哲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五、民族文化特点

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毛泽东酷爱中国历史文化，尤其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结合实践吸取其中的精华，古为今用。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概念、内容、资料和体系结构各方面都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实事求是、矛盾法则、知行统一、一分为二等主要概念、范畴，都是来自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对它的重新解释和改造；毛泽东哲学著作引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资料。据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五卷本中仅就引用的中国成语故事即达113条之多。从内容上看反映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非常明显。中国的传统哲学贯穿着人和人的关系这样一条中心线索，毛泽东哲学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渗透着关于人的论述。例如，毛泽东早期哲学就十分强调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个性解放；在讲到人与社会关系时，指出社会是为人而设，不是人为社会而设。认为压迫个人自由的三纲五常是“罪莫大焉”。而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他论述了人性问题，指出在阶级社会，人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论述了个人和社会、集体，个人解放与集体、阶级解放的关系；论述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个人与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关系；论述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论述了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生产关系最重要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他特别强调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他还论述了把坏人改造为好人，实行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原则。竟把伪皇帝和国民党的许多将领改造成为新人，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总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①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人的理论的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为实现这关于人的理论，毛泽东还设想在中国造就一个和谐的政治局面：“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②虽然毛泽东在实践这一理论过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出现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严重的失误，但不能因此否认毛泽东哲学中贯穿着关于人的理论或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特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在他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就中国哲学的内容而言，中国哲学的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尤其是从社会和实践的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而和中国传统哲学密切联系的毛泽东哲学也如此。“毛的著作的内容的中心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我们认为弗朗西斯·苏这一深刻分析，具有真理性。另一位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和马列主义哲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它是一种“积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哲学。③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对于毛泽东哲学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大众化、民族化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之一”。“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倘若哲学没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③ 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2期。

有民族的表现形式，它就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不能真正与我们血肉相联。”毛泽东强调对孔子和孙中山的批判继承。“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里都贯串着中国思想遗产的深入继承”。“把马列主义哲学变成了与民族血肉相连的哲学”，体现了“哲学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的哲学。①我们完全同意这种分析。

六、关于表达形式的特点

用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字和语言表达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问题。在国外，从哲学家到大学生，从总统到一般市民，凡是读过毛泽东著作，学过毛泽东思想的，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国外一家著名报刊，在评论毛泽东的《实践论》时对其文字表达形式甚为赞赏：“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这篇著作是有一种简单明瞭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1986年4月15日载文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文章说，毛泽东的著作通俗易懂好理解，故此，要研究哲学必须从毛泽东的两部哲学著作开始。有的人说，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言语把重大的哲学问题说得那样清楚明白，有的则妙趣横生，简直是一种创造。特里尔也讲：毛泽东“是第一个用明白而直率的语言对全世界谈论与大家都有关的问题的中国人。”毛泽东哲学表达形式的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或群众熟悉的成语、典故讲解哲学理论。二是富于从生产、生活实际提出并说明哲学理论问题，致力于使哲学和生产、生活息息相通，以增强哲学的生命力，并成为群众手中的武器。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就是从人们日常生活提出的问题并深刻地

---

① （日）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1952年）。

解决问题，使用那样实际，那样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论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还常常抓住各种实际典型材料从中提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号召人们学习。他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也自觉地贯彻他的哲学思想，而且那样实际和生动活泼。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说是深刻的辩证法，是富于生活的事例与生动活泼的语言的有机统一。① 更不用说人们普遍读过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地把论述认识论、辩证法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有机结合的事实了。特别令人启发和妙趣横生的是毛泽东常常巧妙地从人们身边事物提出哲学问题，说明哲学问题。这里仅举一例：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机回国。银鹰腾空，不一会儿已经穿过几千米的高空，机身平稳得连铅笔都能立住。毛泽东同志这时把尤金大使请到对面就坐，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摸不着头脑，表示："那好吧，争取及格"。于是毛泽东主席问道："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被问住了，说，"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毛泽东主席说："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么一说，旁边的同志都笑了起来，尤金也服了，连声说："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② 毛泽东在1939年讲精神变物质的道理时，也是联系农民种田开始制订计划，然后种地结果等实际生产、生活事例说明的。如此等等。毛泽东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号召我国哲学工作者也用群众语言，通俗易懂地讲哲学课，写哲学著作。他曾经提议哲学工作者以一百个实际事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498页。

② 参见李越然：《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中国广播报》1989年4月19日。

例通俗易懂地论证对立统一规律，帮助广大群众掌握辩证法。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的号召。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哲学讲哲学，实际上不只是一个表达形式问题，是关系哲学性质问题，而哲学是否能被群众理解和掌握，能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哲学是少数人的哲学，还是群众的哲学的问题，而少数人的远离群众和实际的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是要死亡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特点，是毛泽东长期以来脚踏中国实际，真正了解我国广大群众的实际理论文化水平以及对理论文化接受能力的结果，是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认识的必然表现。

“他的方法是一种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他激发人们思考问题，自己也参加思考，从中获得知识。他相信有一种乐意与人共享而不强加于任何人的基本哲学，相信这种哲学最终将得到证明。”①是的，这一特点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基本哲学”的必然表现。

我们这些见解也决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定论，只是由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启发，在这里表述一下我们的进一步认识。中国古语云：抛砖引玉。我们希望看到国外学者更深更新的见解，共同推进毛泽东哲学研究工作。

---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年6期。

附录

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书目文献索引

一、著　　作

西　　文

中国对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训　E·R·白劳德　1949　纽约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B·I·施瓦茨　1951　哈佛大学出版社

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献汇编　B·考普顿　1951年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　P·S·R·佩恩　1951　伦敦塞克和沃堡出版社

中国的红色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政治传记　R·S·埃勒根特　1952　博得利·黑德公司

毛主义：原始资料　A·H·斯坦纳　1952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学含意　Y·P·赞特　1952　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解释共产主义　H·D·蔡　1952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和儒教　戴省育（译音）　1953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崛起和他的使用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1953　纽约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出版社

在毛泽东的土地上　C·休戈　1953　伦敦乔治爱伦、安文出版公司

依照毛泽东的面貌　K·A·阿巴斯　1953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征服中国　S·R·戈尔　1954　亚洲自由保卫社

毛泽东　威夫特　1955　纽约出版

毛泽东　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毁者？　K·A·威特福格尔　1955　美国劳联自由工会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　韦文治（译音）　1955　得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空军人员训练研究中心，空军研究发展司令部

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让·雪斯诺　1955　巴黎社会出版社

新中国背后的人心　D·A·海德　1956　伦敦菲尼克斯·豪斯出版社

毛泽东关于革命和战争的共产主义　V·陈　1957　纽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　肖瑜　1959　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　H·C·克里尔　1960　新美洲文库出版公司

一个革命家的肖像：毛泽东　R·佩恩　1961　阿贝拉德——舒曼出版社

中国飓风　D·A·沃纳　1961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

毛泽东　白英（译音）　1961　纽约出版

毛泽东论游击战　S·B·格里菲思　1961　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西行漫记　E·斯诺　1961　格罗夫出版社

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E·斯诺　1961　纽约雷德姆出版社

毛泽东，蓝蚁之王　G·帕洛济——霍尔瓦斯　1962　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

红色蛮子：毛泽东的生平与时代　R·麦克雷弋——黑斯蒂　1962　费城奇尔顿公司图书部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神话　G·L·萨默斯　1963　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概论　H·钱伯　1963　P·J·肯尼迪父子公司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S·R·施拉姆　1963　普雷格出版社

毛泽东的思想中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毛主义的起源研究　J·E·鲁　1963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中苏冲突简史　弗洛伊德　1963　纽约出版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A·W·泽尔曼　1963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A·A·科恩　1964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　佩恩　1965　汉堡克鲁格出版社
毛泽东：涂了漆的偶像　H·L·布尔曼　1965　中国研究中心
毛的军事样板　D·B·博布罗　米尔拉特评论出版社
在长城的背后，对毛的中国的评价　L·斯诺齐　1965　普雷格出版社
共产党中国的征伐：毛取得政权的道路和为世界革命的新斗争　G·温特　1965　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27至1935年的反对派毛泽东　J·E·鲁　1966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列宁和毛著作中"中国"的作用　D·M·洛夫　1966　加利福尼亚出版社
毛泽东　P·O·卡尔森　1966　斯德哥尔摩西里格出版社
毛泽东　S·R·施拉姆　1966　企鹅丛书出版社
毛泽东的基本战术　S·R·施拉姆　1966　纽约出版
毛主义的基础　R·斯沃拉普　1966　新德里版
毛的中国　B·康普顿　1966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毛领导下的中国　R·麦克法夸尔　1966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中国的共产主义　R·C·诺恩　1966　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中国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和刘少奇　陈永平（译音）　1966　马蒂纳斯·奈霍夫出版社
共产党中国：危机和改革　J·W·刘易斯　1966　纽约外交政策协会
在野的毛泽东：1927——1935　J·鲁　1966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大革命"内幕　1967　纽约梅里特出版社
中国往何处去？　D·菲奥多尔　1967　纽约四洲图书公司
毛以后的中国：附文件选集　A·D·巴尼特　1967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毛和中国革命　陈志让　1967　牛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　R·麦克雷戈——黑斯蒂　1967　杰拉德公司
毛和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斗争与争论的解决　S·卢布曼　1967　中国研究中心
东方的失败：毛泽东的战争成绩　M·埃利奥特——贝尔曼　1967　牛津大学出版社
红卫兵，关于毛泽东的一份报告　H·格兰奎斯特　1967　普雷格出版社
人、上帝还是斯芬克斯？对毛泽东的政治透视　A·卡达塔斯科雅　1968

科伦坡论坛出版社
中国：毛的最后一次跃进 J·R·麦克法夸尔 1968 伦敦经济学家新闻报出版社
毛主义的军事学说 R·L·鲍威尔 1968 纽约亚美教育交流社
毛泽东的中国 韩素音 1968 MUNCHEN, VERLAG, C·H·BECK
《毛泽东选集》索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索引 J·李和G·E·迪莱编 1968 香港联合研究所
共产主义与中国：变革的思想意识 B·许华茨 1968 哈佛大学出版社
在过渡社会中占优势的政治领导和政治统一体：1935年至1949年的中国、蒋介石和毛泽东 D·S·吉本斯 1968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红书和长城：对毛的中国印象记 A·莫拉维亚 1968 法勒、斯托斯与吉罗出版社
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J·格雷和P·卡文迪什 1968 普雷格出版社
革命不朽 R·J·利夫顿 1968 诺顿出版社
按着毛思想发展起来的经济 J·P·塞尔梯也 1968 巴黎经济出版社
毛 P·德维利尔斯 1969 伦敦麦克唐纳出版公司
毛主义关于制定政策和组织的理论 H·哈定 1969 圣蒙尼卡，兰德公司
毛主席的神化 I·T·迈耶斯 1969 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伟人生活之观察） 陈志让 1969 新泽西州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
毛泽东 M·札奇 1969 贝希托出版社
毛泽东 P·S·R·佩恩 1969 纽约韦布赖特和塔莱出版社
毛派反对刘少奇的实况（1967） R·S·哈尔曼 1969 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R·W·林登 1969 波尔德科罗拉多大学出版社
毛的文化大革命 1970 撒克出版社
毛的论文：1957年后的著作和讲话 J·陈志让 1970 牛津大学出版
毛：战争或和平 F·N·特雷格编 1970 亚美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　A·贾米森　1970　C·贝尔出版社

毛泽东，走向权力的道路和奥托·布劳恩（李德）的纪事　海因齐　1970　科隆出版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E·M·罗伯茨　1970　伦敦梅休恩出版社

共产党人眼中的毛主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报刊论毛泽东集团的政策　V·I·克里弗佐夫编　1970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按照中国传统和革命发展的毛思想　D·H·陈　1970　盐湖城犹他大学出版社

盒子和毛主席语录；两出互相关联的戏剧　E·阿尔比　1970　乔森纳·凯普出版公司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　G·汤姆森　1971　中国政策研究小组

毛主义在印度　M·拉姆　1971　维卡斯出版社

毛主席的奇迹　G·厄本　1971　汤姆·斯特西出版社

毛主席的新衣　本蒙·里斯　1971　自由自由天地出版社

毛的长征历险记　F·塔顿　1971　西塔德尔出版社

毛的伟大革命　R·S·埃勒根特　1971　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

毛泽东：一个分析评价　H·W·卡明斯　1971　阿尔伯塔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对和平与新秩序的看法　H·W·布里格斯　1971　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

毛泽东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J·C·谢尔曼　1971　科罗拉多丹佛大学出版

毛泽东和中国经济　N·梅里特　1971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　R·索罗门　1971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昨天与今天　S·R·施拉姆　1971　收入F·A·鲁兹所编《东亚·传统与彻底变革》　苏黎伦奇出版社

论毛泽东书目　V·D·梅德林　1971　俄克拉何马大学亚洲事务研究所

持久的比赛：以围棋解释毛主义的革命战略　S·A·布尔曼　1971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缔造者：从孔子到毛　B·马丁、隋前东（译音）　1972　B·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毛和文化大革命　S·托马斯　1972　萨德纳·普拉卡桑出版社

毛和中国：从革命到革命　S·卡诺　1972　瓦依金出版社

毛的道路　E·E·赖斯　1972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对蒋：1925年至1949年为夺取中国而战　R·S·埃勒根特　1972　格罗西特和邓拉普出版公司

毛泽东　J·阿切尔　1972　霍索恩出版社

毛泽东　H·R·阿瑟　1972　惠特科姆和汤姆斯出版公司

毛泽东：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杰出人物丛书）　G·喀尔兰德　1972　萨姆哈尔出版社

毛泽东时代　多梅斯·于尔根　1972　W·称尔哈默出版社

毛泽东，红色的龙　弗罗芒坦　1972　巴黎出版

毛泽东和林彪：革命以后的著作　K·范　1972　新泽西安查尔出版公司

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D·B·T·艾克曼　1972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早晨的洪流：毛泽东和中国革命，1893—1953　韩素音　1972　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

论毛泽东：书目索引　A·C·W·舒　1972　密执安大学出版社

漫长的革命　E·斯诺　1972　神殿图书公司

1949——1969年的共产主义中国　F·迈克尔　1972　纽约大学出版社

中国寻求富裕：毛泽东的经济学　L·古德斯塔特　1973　韦瑟希尔出版社

毛的长征：人类英勇的史诗　I·G·埃德蒙兹　1973　麦克雷·史密斯公司

毛的囚犯　保罗·王（译音）　1973　纽约，考伏特，麦凯恩出版公司

毛泽东　J·格雷　1973　路特沃思出版社

毛泽东与甘地：对社会变革的看法　J·班迪奥帕德希雅　1973　国际出版服务社

毛泽东传　弗罗基尔罗夫等　1973　柏林出版

毛泽东传——征服中国的人　R·尤恩森　1973　富兰克林·瓦茨出版社

走向凤凰座：毛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人间乐园导论　L·R·马钱特　1973　伦敦　安格斯和罗伯逊出版社

陈伯达与三十年代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有意制造　R·怀利　1973　伦敦　SOAS（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哲学和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从马克思到毛　R·杜纳耶夫斯卡雅　1973　德尔科特出版社和德尔塔出版社

摘自毛泽东政治传记　奥·乌拉基尔洛夫等　1973　柏林：迪茨出版社

蓝蚁之王毛泽东　G·帕洛济——霍尔瓦斯　1973　格林伍德出版社

1944到1945年的缅甸战争，附O·温格将军和毛泽东传略　M·G·阿布扬卡尔　1974　纳特拉杰出版社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　托马斯·格奥尔格新道路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　R·麦克法奈尔　1974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毛：从长江流域来的年轻人　B·施　1974　阿什利图书公司

毛主义真谛　P·P·H　1974　人民出版社

毛在国内未公开发表的著作、讲演和讲话（1949——1971年）　H·马丁　1974　墨尼黑汉泽尔出版社

毛泽东　麦克唐纳教育出版公司

毛泽东　J·罗博顿　1974　朗曼集团公司

毛泽东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　J·N·霍金斯　1974　休·斯特林出版公司

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　1974　纳特拉吉出版社

行动中的毛主义：文化大革命　C·L·邱　1974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评传　S·尤哈莱　1975　纽约新观点出版社

毛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质　L·德柳辛　1975　新德里斯特林出版社

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　G·吉尔金诺夫　1975　索非亚出版社

毛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　K·沃兹查沃和韦德查　1975　柏林出版

毛的第一继承人　李廷民（译音）　1975　胡佛研究所出版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按毛主义改造中国的形象　R·H·索罗门　1975

安克尔出版社
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　斯图尔特·R·施拉姆　1974　纽约神殿出版公司
毛泽东1917年—1927年文献　M·亨·戴　1975　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瑞典）
革命的序幕：毛，党和1962至1966年的农民问题　R·鲍姆　1975　纽约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毛和1931年及193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研究专题论文第10号）　D·J·沃勒　1975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所出版
中国的经济和毛主义的战略　约翰G·杰勒　1976　每月评论出版
毛以后怎样？中国的军党群的竞争　J·P·杰恩　1976　光辉出版出版社
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　F·韦克曼　1976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中国和今天的毛主义：中国，儒教和毛　T·T·Y·叶　1976　东西文化交流出版社
毛泽东和中国　C·P·菲兹杰拉德　1976　霍姆斯和万耶出版社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1949——1975："风满楼"　韩素音　1976　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费子智（译音）　1976　纽约出版
毛泽东伟大的战略计划　S·约阿希姆　1976　柏林：弗尔泰茨出版社
毛泽东：领袖人物　派伊　1976　纽约，基础著作联合出版社
解放后毛泽东著作书目索引　J·B·斯塔尔　1976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1921年至1949年毛和中国的改革　N·塔林　1977　海涅曼教育图书公司
个人和社会：自然——马克思——毛　H·卡特修斯　1977　兰，彼得出版社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汉斯·克拉森　1977　利特尔　施佩出版社
中国文明：从明代复兴到毛主席　Y·雅布、A·科特雷尔　1977　威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出版社
毛与中国的转变　塔林　1977　阿克兰，赫纳满出版社

毛的神话：斯大林主义的遗教在中国　T·克里　1977　探索者出版社
毛泽东　H·薄舍尔　1977　圣马丁出版社
毛泽东之“道”　M·J·奥马利　1977　M·J·奥马利出版社
毛泽东传　阿切尔　1977　纽约出版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M·迈斯纳　1977　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社
毛泽东和不断革命　F·迈克尔　1977　巴伦出版社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　R·霍华德　1977　每月评论出版社
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　D·威尔逊　1977　剑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指南　A·鲍克　1977　圣马丁出版社
毛思想中的爱和斗　R·L·怀特海　1977　奥比斯图书公司
毛泽东：领袖人物　L·W·派伊　1977　基础图书公司
世界秩序中的毛主义的形象　S·S·金　1977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现实：毛领导下的不协调　P·J·希尼克　1977　塞奇出版社
革命暴力：印度毛主义运动研究　M·莫罕蒂　1977　新德里斯特林出版社
天命：马克思和毛在现代中国　N·哈里斯　1978　查尔斯·里费图书公司
中国的损失和毛泽东的革命遗教　B·阿瓦基安　1978　革命共产党出版社
农村革命的城市起源——1921年到1927年中国湖南省的精英人物和群众　安格斯·W·麦克唐纳　1978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毛以后的中国　L·埃文斯　1978　莫纳德出版社
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M·迈斯纳　1978　莫纳德出版社
毛的最后战役：下一个阶段　B·史密斯　1978　中国政策研究小组
毛泽东和他的中国　张国兴（译音）　1978　海涅曼教育图书公司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M·莫罕蒂　1978　南亚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导论　英果·舍弗尔　1978
毛凑满了五个：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　R·罗塔　1978　旗帜出版社
毛逝世了：继承　梅纳特　1978　巴黎，法阳德出版社

中国真相　J·舒曼　1979　瓦茨出版公司
毛（7年级以上读物）　P·卡特　1979　瓦依金出版社
毛主义：口号与实践　V·格列波夫　斯特林出版社
毛以后的中国　G·凯尔卡　1979　尤沙出版公司
毛主义：言与行　V·格列波夫　1979　斯特林出版社
毛泽东的不朽贡献　B·阿维克恩　1979　芝加哥革命共产党出版公司
毛的中国　M·迈斯纳　1979　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社
毛泽东：人民的上帝　D·威尔逊　1979　哈钦森出版社
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意识形态　M·罗素　1979
　　M·罗素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　S·S·金　1979　高尔出版社
拥护毛　P·科里根、H·拉姆赛、D·塞耶　1979　麦克米伦出版社
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J·B·斯塔尔　1979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人民的皇帝毛泽东传　D·威尔逊　1980　弗多拉出版公司
毛以来的中国　K·H·伊姆　1980　麦克米伦出版社
毛、白劳德与社会民主　美国马列主义党　1980　马列主义出版社
毛主义的形成：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探索（1935——1945）
　　R·F·怀利　1980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毛主席：无产阶级的教育　朱唐前（译音）　1980　哲学丛书出版社
毛的人：革命中国十六人写照　B·M·弗罗利克　1980　哈佛大学出版
　　社
毛的传记　R·特里尔　1980　哈珀和罗出版社
毛泽东（领导人丛书，9至12年级读物）　A·杜雷斯和K·杜雷斯
　　1980　戴维和查尔斯出版公司
毛泽东（世界史丛书）　D·彭特　1980　格林哈文出版社
毛泽东　佩恩特　1980　明尼苏达，格兰哈文出版社
毛泽东　E·周　1980　卡斯尔公司
毛泽东　P·O·卡尔杭　1980　斯德哥尔摩西里格出版社
从满族到毛的中国（五年级以上读物）　J·R·罗伯逊　1980　阿西纽姆
　　出版社
为中国而决斗：蒋介石同毛泽东之间为控制中国而进行的斗争　W·莫尔

伍德　1980　埃弗雷斯特豪斯出版社
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者：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　J·G·格利　1980　诺斯出版社
关于毛的入门书（有插图）　刘斯　1980　神殿出版社
拥抱月亮：有插图的毛泽东传　E·哈蒙德　1980　兰开斯特——米勒出版社
中国：1962至1979年从激进主义到修正主义　B·布鲁格　1981　克鲁姆·赫尔姆公司
中国：毛以后的观点　V·P·达特　1981　新德里联合出版社
毛主义的未来　S·阿明　1981　每月评论出版社
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　S·利斯　1981　阿利森和巴斯比出版公司
毛泽东　N·科尔帕斯　1981　麦克图书公司
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　N·奈特　1981　格里菲斯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　F·Y·K·苏　1981　克罗威尔出版社（荷）
湘江的沉思　G·曼蒂　1981　罗马吕蒂尼出版社
1917年至1935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基础　B·沃马克　1982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大救星与官吏　D·布拉德沃斯　1982　阿西纽姆出版社
毛以后的中国工业化社会　R·L·汤　1982　莱克辛顿图书公司
毛泽东　F·K·普尔　1982　瓦茨出版社
毛泽东：人和神话　E·周　1982　斯坦和戴出版社
毛泽东和工人：1920年至1923年的湖南工人运动　L·谢弗　1982　M·E·夏普公司
毛泽东和中国　J·邓斯特　1982　牛津大学出版社
毛领导下的教育：1960至1980年广州学校的班级与竞争　J·昂格尔　1982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　C·P·埃弗代尔　1982　政治经济研究所
崇拜与教规：国家毛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H·马丁　1982　M·E·夏普

出版公司
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M·迈斯纳　1982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文化革命的起源——1958—1960年的大跃进　R·麦克法夸尔　1982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领导、合法性和冲突：从富有感召力的毛到接班的策略　F·C·泰韦斯　1983　M·E·夏普出版公司
从毛到邓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M·E　1983　夏普出版公司
为无米之炊：纳撒尼尔·格林的南征与毛泽东的运动战　J·M·戴德里　1983　森弗劳尔大学出版社
毛以后的中国政治：1976至1983年的发展和自由化　P·R·穆迪　1983　普雷格出版社
毛泽东：初步重评　S·R·施拉姆　1983　圣马丁出版社
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H·休和Z·斯特恩　1983　牛津大学出版社
毛继承人的阴谋与凶杀　姚时理（音译）　1983　科林斯出版公司
中国“文化大革命”内幕　S·卡诺　1984　企鹅丛书出版社
毛及反对者　C·霍林沃思　1984　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
毛泽东　鲁尔　1984　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在法国和美国的政府与实践　B·菲尔兹　1984　普雷格出版社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H·索尔兹伯里　1985　美国哈波——罗公司出版
剑桥中国史　第14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R·麦克法夸尔、J·费正清主编　1987　剑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　J·加德纳　中译本　1989　张金鉴等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思想　S·R·施拉姆　1989　剑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　R·麦克法夸尔等　1989　哈佛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　1990　弗吉尼亚奥克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
毛的中国：转变的国家　R·维帕　阿布西纳夫出版社
毛的中国：进退两难　T·K·马利克　索梅亚出版社
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　N·特伦达菲洛夫　索非亚出版社
毛泽东和长征　J·G·吉廷斯和R·W·V·吉廷斯　赫尔顿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J·D·甘达利雅斯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红旗　N·桑穆加塔桑　科伦坡版

日　文

毛泽东传　松本仓吉　1946　高山书院
毛泽东和中国的红星　波多野乾一　1946　帝国书院
毛泽东的思想　岩村三千夫　1948　世界评论社
从孙文到毛泽东　岩村三千夫　1949　弘文堂
毛泽东周围的英雄　森健等　1949　中央书籍
毛泽东的旗——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滕田福平　1949　兰书房
蒋介石与毛泽东　渡边茂雄　1949　讲谈社
孙文和毛泽东——我的中国观　井贯军二　1950　教育クイマス社
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发展　岩村三千夫　1951　青木书店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他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展开　宫板宏　1951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
《实践论》及其学习　尾崎庄太郎　1951　中国资料社
《中国革命思想的诸问题》纲要及参考文献——孙文主义、蒋介石主义、毛泽东主义　神古正男　1954
毛泽东的《矛盾论》　寺泽恒信　1954　理论社
毛泽东思想的诸问题　岩村三千夫　《政治学讲座4》　1955　理论社
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记　上居明夫等　1956
毛泽东传　贝塚茂树　1956　岩波书店
水浒式的中国革命——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立　吉田东祐　1956　え社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　池田诚　《市民革命的理论》　1957　有斐阁
浅释毛泽东词《雪》——关于“数风流人物”一句　菊地三郎　《亚洲文

化的再认识》 1957 朝日新闻社
人民公社和毛泽东的立场 桑原寿二 《中共的人民公社》 1959 明德出版社
毛泽东 岩村三千夫 1959 日本书房
毛泽东为何退居二线? 1959 公安调查厅
毛泽东辞职的探究 1959 公安调查厅
毛泽东主义的精髓和人民公社 桑原寿二 《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经济》 1963 芦书房
毛泽东——波澜的生涯及其思想 1963 今日问题社
《实践论》、《矛盾论》入门 尾崎庄太郎 1963 青木书店
现代中国革命的认识 新岛淳良 1964 清水书院
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批判 森信诚 1965 刀江书院
毛泽东的人类学 鹿岛宗二郎 1965 经济往来社
毛泽东:诗与人生 竹内实等 1965 文艺春秋社
游击战——毛泽东的战略震撼世界 冈本隆三 1965 讲谈社
毛泽东的时代——怎样理解现代中国? 新井宝雄 1966 潮出版社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政治领导 T·依西达(日文为石田) 1965 东京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政治 各务寮一 1966 三一书房
毛泽东的哲学 新岛淳良 1966 劲草书房
毛泽东和整风 1966 朝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
毛泽东研究序论 今堀诚二 1966 德间书店
毛泽东的思想 杉本达夫等 1966 德间书店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上府别亲志 《亚洲社会的近代化和价值体系》 1966 岛崎经济研究所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倒退与堕落 三浦勉 1966 至诚堂
近代中国的文化运动和毛泽东的辩证法 小林多加士 《亚洲社会的近代化和价值体系》 1966 岛崎经济研究所
燃烧的天安门——毛泽东革命的内幕 大森实 1966 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岛淳良 《中国的目标》 1967

德间书店
毛、刘双方的路线对立　高市惠之助　《毛泽东的挑战》　1967　朝日新闻社
毛泽东　小野信尔　1967　人物往来社
毛泽东　宇野浑雄译　1967　角川文库
毛泽东和刘少奇——文化大革命的轨迹　新井宝雄　1967　潮出版社
毛泽东的世界战略　市川宗明　1967　原书房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共革命的再检讨　现代亚洲社会思想研究会编　1967　现代亚洲出版会
毛泽东的青春——革命家的诞生　高木健夫　1967　讲谈社
中国讲座3：革命的展开　野原四郎　1967　筑摩书房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管理革命　上妻隆荣　1967　山口大学东亚经济学会
毛泽东的挑战——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发展　1967　朝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
毛泽东的焦虑与孤独　松村英　1967　中央公论社
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关于最近中国的几点假说　村松祐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1967　现代亚洲出版会
向马克思挑战的毛泽东——苏联的再评价及中国的批判　堀建三　1967　弘文堂新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　滕村俊郎　《中国讲座4：今后的中国》　1967　筑摩书房
关于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　竹内实　《中国的思想与文学》　1967
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毛泽东革命的特点　小林多加士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1967　现代亚洲出版会
中国传统社会和毛泽东革命　东亚学院纪要编集委员会编　1968　东京，霞山会东亚学院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草野文男　1968　民主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的思想　新岛淳良　1968　劲草书房
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　松村一人　1968　东方书店
毛泽东语录解说　大冢有章　1968　青年出版社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菅沼正久　《现代中国讲座1》　1969　大修馆

书店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重新研究　中西功　1969　青木书店
毛泽东和中国思想　桑原寿二　1969　时事问题研究所
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管沼正久　《现代中国讲座3》　1969　大修馆书店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藤村俊郎　1968　亚纪书房
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安藤彦太郎编　1968　亚纪书房
未来的问题　山田庆旧　1968　筑摩书房
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和毛泽东思想　藏居良造　《中国传统社会和毛泽东革命》　1968　霞山会东亚学院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岛淳良　《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1968　亚纪书房《中国向导（中国讲座别卷）》　1968　筑摩书房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思想和农民运动　山本秀夫　《中国传统社会和毛泽东革命》　1968　霞山会东亚学院
毛泽东思想中经济建设的理论　上妻隆荣　1968　山口大学东亚经济学会
毛泽东革命和中国克服官僚主义的课题　古贺登　《中国传统社会和毛泽东革命》　1968　霞山会东亚学院
关于毛泽东的初期著作　丸山松幸　1968　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
现代中国思想史　山口一部　1969　劲草书房
新的革命　新岛淳良　1969　劲草书房
70年代阶级斗争的展望、现代革命的条件　现代史学会编　1969　亚纪书房
革命的思想与实践　梅本克已　1969　三一书房
孙文·毛泽东　小野川秀美　1969　中央公论社
继续革命和毛泽东思想　管沼正久　1969　三一书房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破产　本多延嘉等　1970　前进社
毛泽东　宇野重昭　1970　清水书院
毛泽东的五次战争——中国现代史论　鸟居民　1970　草思社
毛泽东的真面目　桑山静逸　1970　政界公论社
毛泽东神话的破除　黑田宽一　1970　拳头书房

"毛泽东哲学"的原型　高田求　《现代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下）1970　青木书店
孙子和毛泽东——中国的思考的秘密　神子侃等　1970　北望社
中国的社会主义　管沼正久　1970　清水书房
毛泽东札记　竹内实　1971　新泉社
毛泽东主义的形成（1935——1945年）　德田教之　1971　庆应通信　《列宁的国家法的理论》　1971　法律文化社
中国革命　藤村俊郎　1971　三省堂
中国革命的思想　野村浩一　1971　岩波书店
革命的思想——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管沼正久　墒书房
革命家毛泽东——革命的终止　宇野重昭　1971　清水书院
谁也没有写过的毛泽东　柴田穗　《经济评论专集》　1971
现代中国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内部考察（增补版）　中岛岭雄　1971　青木书店
中国社会主义的展开　杉野明夫　1971　シネルヴア书房
毛泽东的言论　近代思想研究会编　1971　芳贺书店
毛泽东集（十卷本）　竹内实主编　1971年初版　苍苍社
讨论毛泽东思想和现代课题　远坂良一　1972　三一书房
中共五十年略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和胜利　藤井满洲男　1972　东方书店
毛主席的诗词——吟颂大自然和悠久的历史　白石凡　《伟大的中国》1972　朝日新闻社
毛泽东及其军队　岛村乔　1972　仙石出版社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竹内实　1972　中央公认社
毛泽东和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课题　河地重藏　1972　智慧书房
围绕《新民主主义论》的二条路线　林要三　1972　《帝国大学论集 3》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佐滕铁章　1972　潮出版社
政治的基本方针和毛泽东思想　岩村三千夫　《中国指南》　1972　读卖新闻社
戴高乐·毛泽东·河本大作——三个有骨气的人　木村武雄　1972　讲谈

社

毛泽东思想的基点　福本和夫　1973　三一书房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　高桥勇治等　1973　日中出版社

毛泽东入门——人的魅力与信念研究　冈本隆三　1974　日本文艺社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斋藤秋男　《现代中国》　1974　满江红

毛泽东和周恩来　柴田穗　1974　浪漫出版社

毛泽东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杉野明夫　《现代中国》　1974　满江红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下）　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议　1974　东京三一书房

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斗争——批林批孔群众运动的开展　福本和夫　1974　三一书房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现代中国》　1974　满江红

毛泽东政府中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宇野重昭　《中苏社会主义的政治动态》　1974　亚洲经济研究所

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　竹内实编译　1974　现代评论社

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矢吹晋译　1974　现代评论社

韩素音著《毛泽东》　岩村三千夫　《现代中国》　1974　满江红

毛泽东谈外交路线　太田滕洪编译　1975　现代评论社

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　矢吹晋编译　1975　东京现代主义社

毛泽东谈社会革命　藤本幸三编译　1975　现代评论社

毛泽东谈哲学问题　竹内实编译　1975　现代评论社

周恩来和毛泽东——试论周恩来　鸟居民　1975　草思社

毛泽东主义形成过程及内容——转折时期中国的起点　柴田穗　《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形成》　1976　亚洲经济研究所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毛泽东讲话的意义和背景　小岛朋之　《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形成》　1976　亚洲经济研究所

毛泽东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研究　三浦勉　1976　劲草书房

毛泽东传　王力著　竹内实译　1976　太平出版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入门　坂えひア子译　1976
　长崎出版
毛泽东评传——鲜明的个性·生涯·诗　西河毅　1976　新书房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　高桥亨　1976　太阳书房
毛泽东思想和作风问题　藤井满洲男　1976　苏联问题别册
毛泽东最后的挑战　桑原寿二等　1976　钻石·时间社
毛泽东不断革命的真相　西蒙·莱伊著，绪方太郎译　1976　现代思潮社
毛泽东的青春　肖瑜、高桥正译　1976　サイスル出版会
毛泽东的哲学　新岛淳良著　1976　劲草书房
毛泽东研究绪论　今屈诚二著　1976　劲草书房
文人毛泽东　竹内实　《中国的巨星殒落》　1976　每日新闻社
作为社会主义战略的毛泽东主义的起源　德田教之　1976　亚洲经济研究
　所
“革命”了革命思想的毛主席　坂本义和　1976　每日新闻社
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毛泽东　加地伸行　1976　中央公论社
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　德田教之　1977　庆应通信社
毛泽东《实践论》入门　坂元ひア子议　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研究　1977
　长崎出版
毛泽东研究　柳田谦十郎　1977　日中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第五）　附注释　中国研究会议　竹内实监修　1977　三一
　书房
毛泽东的五次战争　岛居民　1977　草思社
文化与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野村浩一　1977　三一书房
星星之火　毛泽东思想学院编　1977　关西劳动学习ず｜ヘタ
思想的积木——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金恩恫著　矢吹晋译　1977
　龙溪书社
谁也未曾写过的毛泽东——“红色巨星”之谜摘要　铃木明著　1977
　サンケイ出版
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战略　J·G·哥勒著　中兼和津次　矢吹晋译　1978
　岩波书店
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　中国摄影编部编　1978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外文出

版社
孙文与毛泽东　贝塚茂树　1978　中央公论社
中国革命的思想　野村浩一　1978　岩波书店
毛泽东　野村浩一　1978　讲谈社
毛泽东传　贝塚茂树　1978　岩波新书
毛泽东传·人与思　宇野重昭　1978　清水书院
毛泽东笔记　竹内实　1978　新泉社
中国的迷惑——邓小平与毛泽东路线　野纯一　1979　新日本出版社
毛泽东——罕见的巨星　大森实　1979　讲谈社
我之毛泽东观　新岛淳良　1979　新泉社
我的毛泽东研究　新岛淳良　1979　野草社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L·埃文斯著　山田侑平译　1980　日中出版社
现代中国论　中岛岭雄　1980　青木书店
毛泽东著作年表（上卷年表篇，下卷语录索引篇）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风云——动乱的中国（上）、北京风云——转折时期的中国（下）　中岛岭雄　1981　筑摩书房
历史中的毛泽东　新岛淳良　1982　野草社
我理解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中冈哲郎　1983　筑摩书房
毛主义的未来　S·阿梅因著　大友意·北次正雄译　1983　第三书馆
毛泽东集（十卷本）　竹内实主编　1983年第2版　苍苍社
毛泽东集补卷（十卷本）　竹内实主编　1986年初版　苍苍社

俄　　文

毛的政策向何处去　茹科夫　1967　国际关系出版社
毛泽东集团把中国引向何处　维达尔·让·埃尔著　什拉伊别尔译　1967　进步出版社
中国发展的根源　1968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毛的假社会主义　V·G·格尔布拉斯　1968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毛泽东集团的政治基础　拉希莫夫　1968　思想出版社

异乎寻常：论毛集团的外交政策　贾丕才　1968　政治出版社
共产主义眼中的毛主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报刊论毛泽东集团的政策　克里甫佐夫　1969　进步出版社
哈哈镜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B·斯吉麦科夫　1969　思想出版社
不加伪装的毛主义　费奥克季斯托夫　1970　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者的经济冒险主义：论毛主义者的经济方针　维亚特斯基等　1970　经济出版社
毛泽东理论体系的批判　1970　思想出版社
共产党人眼中的毛主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报刊论毛泽东集团的政策　V·I·克里弗佐夫编　1970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的经济"理论"　科尔巴什　1971　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观点评析　M·L·阿尔泰斯基　1971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伪装与不伪装　巴夫洛夫　1971　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的根源和演变　鲁缅采夫　1972　科学出版社
毛主义的方针：反对和平与进步　1973　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批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报刊论文集）　1973　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进程（毛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格尔布拉斯　1974　莫斯科出版社
毛主义的经济"理论"　E·卡巴森　1974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的经济"理论"　F·科尔巴什　1974　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反动实质　F·格尔金诺娃　1974　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和政治上的敌人　1974　真理出版社
日本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毛主义　B·B·波斯别廖夫　1975　科学出版社
毛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和事件（1956——1973）　马尔科娃　1975　科学出版社
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　G·吉尔金诺夫　1975　索非亚出版社
毛主义的对外政策观　1975　Mencu·yhap·othourehnq
毛泽东政治传略　里亚赞采夫·奥等　1975　政治出版社
风满楼：毛泽东与1949年——1976年的中国革命　韩素音　1975　巴黎斯

托克出版社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共和毛的背叛 王明 1975 政治出版社

毛主义在思想上的实践上的军国主义 1976 军事出版社

毛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反共产主义的实质 H·N·卡普琴科 1976 知识出版社

毛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实质 拉马年科 1976 国际关系出版社

毛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质 1976 新闻出版社

毛主义的起源和实质 克里甫佐夫 1976 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反动本质 1976 思想出版社

毛泽东（我们的拿手一着是战争和专政） 布尔拉茨基 1976 科学出版社

危险的方针·新阶段毛主义的制度 1976 政治出版社

毛主义的今昔——中共“十一大”后毛分子的政策记实 M·A·伊里因

洗脑 米·格·斯捷潘诺夫 1977 知识出版社

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洗脑 C·A·沃耶沃金等 1977 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 M·E·斯拉德科夫斯基 1978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毛主义——军事理论与实践 A·B·安托西亚克等 1978 军事出版社

毛分子思想和政策的军国主义性质 U·A·奥尔科冈诺夫 1978 军事出版社

发展中国家和毛分子在联合国的外交 U·阿尔捷米耶夫 1978 科学出版社

危险的方针：毛泽东后的中国（9—11集） N·亚历山大罗夫 1978—1981 政治书籍出版社

毛主义和毛的继承人 N·康斯坦丁诺夫 1979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 鲍·瓦波斯别洛夫 1979 科学出版社

毛主义——世界战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 M·伊里因 1979 国际关系出版社

没有毛的毛主义 索波捷夫等 1979 政治出版社

毛泽东：一幅思想和心理的画像 F·伯拉茨基 1980 进步出版社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毛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演变　O・E・弗拉基米洛夫等　1980　国际关系出版社

毛以后的毛主义　1980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毛主义"社会学"的核心　A・N・布尔金　1980　东方文献出版社

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的党是怎样建设的　N・O・费奥多洛夫等　1980　政治书籍出版社

毛主义：战争威胁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1980　军事出版社

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　O・布尔拉兹基　1980　国际关系出版社

毛泽东的政治传记（增订第四版）　O・弗拉基尔洛夫　1980　政治出版社

赤裸裸的毛主义——毛泽东的某些已公开的和中国报刊未发表过的言论　O・E・弗拉基尔洛夫　1980　进步出版社

当代的中国哲学　B・T・布罗　1980　科学出版社

反社会主义的毛主义　A・别列夫斯基　1981　思想出版社

毛泽东的遗产　M・格鲁贝　1981　前进出版社

货真价实的毛主义：毛泽东的声明（已发表的或尚未在中国报刊上刊登过的）　康普・奥尔泰斯基　1981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港　　澳

毛泽东论（增订本）　张如心　1946　红棉出版社

毛泽东论（增订本）　张如心　1946　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人民将领群像　海云　1947　澳门春秋书店

少年毛泽东（1893——1905）（画册）　米谷　1949　新民主出版社

毛泽东自传（附中国共产党年表）　斯诺著　方霖译　1949　新民主出版社

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工　陈寒波　1952　自由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论稿　双山　1963　倍达出版社

毛泽东的军队　周鲸文　1964　时代批评社

我与毛泽东行乞记　肖瑜　1968　明报月刊社

毛泽东诗词笺注（1—4册）　张白天　1969—1971　昆仑出版社

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　黄雨川　1970　友联研究所

毛泽东投进国民党　岳骞　1972　中国笔会
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　三原　1972　倍达出版社
毛，列宁与革命　E·阿克西尔罗德　1972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评论　南山　1973　中国世纪文社
毛泽东的面面观　刘富兰　1973　友联出版社
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韩素音著　杨青译　1974　南粤出版社
毛泽东评传（1893——1927）　司马长风　1975　文艺书屋
毛泽东论　张如心　1976　学术出版社
毛泽东与周恩来　司马长风　1976　南菁艺文社
毛泽东会见记　斯诺、贝兰特、斯坦因等　1976　科博出版社
毛泽东评传（1928——1934）　司马长风　1976　文艺书屋
毛泽东的一生　谢海涛　1976　阿尔泰出版社
毛泽东的故事（一）　徐海东等　1976　朝阳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　金思恺　1976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毛泽东与我　肖瑜　1977　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
毛泽东的故事（二）　刘白羽等　1977　朝阳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剖析　陈雨苍　1977　中共研究杂志社
怀念毛泽东　韩素音等　万源图书公司
毛泽东的纵横术　傅漫飞　1978　祥云出版社
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　傅漫飞　1978　祥云出版社
西行漫记　斯诺著　陈云翩译　1978　南粤出版社
毛泽东批判（增订本）　任卓宣　1980　帕米尔书店
毛主义和发展：中国工业管理的政策　C·W·锺　1980　香港大学出版社
二万五千里长征（西行漫记）　斯诺　现代出版公司
毛泽东自传　斯诺、肖瑜　现代出版公司
毛泽东领导政治斗争略　心韦　红星文献社

二、文　　章

西　　文

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　斯坦因　新闻记事报　1945年1月30日

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爱泼斯坦　纽约下午报　1945年9月2日

谈《实践论》　谢尔基尔克　世界知识　1952年1期

论毛泽东的“创造性”　B·许华茨　外交事务　1955年10月

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让·雪斯诺　思想　1955年11—12月号

“毛主义”的传说　卡尔·A·威特福格尔　中国季刊　1960年1—4月

“毛主义传说”的传说　B·许华茨　中国季刊　1960年4月

“毛主义”有何创造？　阿瑟·A·科恩　共产主义问题　1961年10月

毛泽东的哲学　P·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　1961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

毛泽东具有二重性的个人本质　中国分析　1962年4期

毛泽东的战争哲学与战略　中国分析　1962年7—8期

编辑摘记：陈云与毛泽东　中国分析　1962年9期

列宁、毛和艾地　贾斯特斯·M　中国季刊　1962年10期

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五首早期诗歌　中国分析　1962年11期

毛泽东及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　中国分析　1963年2期

毛泽东的战略　F·戴维逊　陆军　1963年4月号

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吗？　中国分析　1963年4期

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关系　中国分析　1963年4期

毛泽东与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分析　1963年5期

毛泽东论美国的种族冲突及其新著　中国分析　1963年10期

北京——莫斯科：毛泽东与第三世界　中国分析　1963年10期

北京——莫斯科：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警告　中国分析　1963年11期

毛泽东的文学观　H·L·布尔曼　中国季刊　1963年13期
毛泽东：淦漆的偶象　H·L·布尔曼　中国季刊　1963年第16期
毛泽东人格中的中国和列宁主义成份　S·R·施拉姆　亚洲概览　1963年3卷6期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偏差”　S·R·施拉姆　共产主义问题　1964年1期
毛泽东、斯大林、托洛斯基、赫鲁晓夫　中国分析　1964年1期
作为一个诗人的毛　S·R·施拉姆　共产主义问题　1964年5期
毛泽东对苏联并吞的谴责　中国分析　1964年10期
评价：七十岁的毛　J·罗宾逊　中国季刊　1964年18期
论1927年毛泽东的倾向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64年18期
论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　D·J·都林等　中国季刊　1964年19期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　F·霍勒布里奇　中国季刊　1964年19期
蒋介石和毛泽东战争手稿目录分析　查尔斯·R·斯特勒斯　亚洲概览　1964年4卷6期
毛泽东的中国　S·R·施拉姆　法国政治学杂志　1965年6期
北京——莫斯科：毛的不妥协的新的宣战　中国分析　1965年12期
现代化和毛分子论中国共产主义目标的前景　B·施瓦茨　中国季刊　1965年21期
书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中国季刊　1965年21期
北京——莫斯科：苏联领导人答毛泽东　中国分析　1966年1期
毛泽东其人及其理论　S·R·施拉姆　共产主义问题　1966年5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的继承人毛泽东　中国分析　1966年6期
关于毛的至高无上的个人崇拜十二例　中国分析　1966年6期
新闻——毛主义与广东“晚报”的自我批评　中国分析　1966年6期
毛泽东、林彪及中共中央第11次全体会议　中国分析　1966年9期
社会空想家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中国分析　1966年11期
越南综述Ⅱ：反对毛主义的社会改革？　中国分析　1966年12期
毛泽东与秘密会社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66年27期
毛，神秘主义　中国札记　1966年4卷2期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家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67年1—8月
“毛泽东的高压政策”摘录 中国札记 1967年1期
教会和毛的门徒 中国札记 1967年1期
毛的矛盾论与文化革命 中国分析 1967年1期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核心 中国分析 1967年1期
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中国分析 1967年2期
1966年神秘的崇拜：长江游泳者毛泽东？ 中办 1967年3期
受毛主义激励的士兵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中国分析 1967年3期
关于1959——1962年的毛反对派及1962年——1966年毛的反攻 中国分析 1967年3期
毛泽东坚信文化革命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分析 1967年4期
马尔萨斯、马克思及毛或中国的“人口爆炸” 中国分析 1967年4期
莫斯科改善了结合反毛宣传进行的太空战争 中国分析 1967年5期
文化革命—战略：毛的八次有趣的讲话 中国分析 1967年6期
毛和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中国分析 1967年12期
书评：1927——1935年的反对派毛泽东 D·J·沃勒 中国季刊 1967年30期
书评：中国政治思想：毛泽东和刘少奇 约·E·鲁 中国季刊 1967年30期
评论：毛的文化革命：起源和发展 J·罗宾逊 中国季刊 1967年32期
毛的游击战概念 B·N·马加莫达 中国报导 1967年2卷7期
评论：毛主义的衰落 中国报导 1967年3卷2期
毛主义化 吉里 中国报导 1967年3卷3期
毛泽东作为宗教领袖 S·R·施拉姆 亚洲概览 1967年7卷6期
毛的批评者国防部长彭德怀 中国分析 1968年2期
对毛夫人江青的推测 中国分析 1968年2期
总结毛的胜利及文化革命的失败？ 中国分析 1968年2期
毛主席的思想：道路、口号 中国札记 1968年3期
毛主席思想 中国札记 1968年3期
毛的崇拜 中国札记 1968年3期

毛主义：宗教教义　中国札记　1968年3期

毛泽东——辩证法大家　格拉伯曼　国际哲学季刊　1968年3月（第8期）

毛的特别列车里：与铁路工作人员困难的讨论　中国分析　1968年4期

概论毛的重新建党组织计划　中国分析　1968年4期

毛与刘：1953——1967年围绕农业政策展开的角斗　中国分析　1968年4期

警察、司法机构——毛反对派的避难所　中国分析　1968年5期

西方毛宣传者在北京生活有危险　中国分析　1968年6期

不为人知的毛的家庭：兄弟、堂妹、妻子、儿子、侄子　中国分析　1968年6期

学习毛主席对辩证法的新贡献　威尔科克斯　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　1968年6月号

1968年的中国与1966年毛的中国区别何在？　中国分析　1968年9期

1942年毛的讲话仍是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　中国分析　1968年10期

毛的个人崇拜标志着毛主义开始崩溃　中国分析　1968年10期

血吸虫病——毛的二首诗与余江县卫生　中国分析　1968年10期

转入地下活动的波兰共产党与未来的“毛的国际”　中国分析　1968年11期

1968年国庆：毛领导集团内的等级顺序　中国分析　1968年11期

林彪真能成为毛的接班人吗？　中国分析　1968年11期

1956——1966年毛、刘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争论　中国分析　1968年11期

1944——1945年与华盛顿第一次接触　中国分析　1968年12期

毛分子对印度的路线　B·S·格普蒂　中国季刊　1968年33期

书评：东方的失败：毛泽东论战争的性质　L·汤普森　中国季刊　1968年33期

书评：马克思、列宁和毛在中国的作用　D·M·洛　中国季刊　1968年33期

1967年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　F·布里奇汉姆　中国季刊　1968年34期

毛泽东的困境　M·什巴塔等　中国季刊　1968年35期
书评：《毛泽东》　M·L·布尔曼　中国季刊　1968年35期
毛主义和党际关系破裂：北京、日本共产党疏远　S·W·西蒙　中国季刊　1968年35期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转变：毛分子神话的起源　W·F·多里尔　中国季刊　1968年36期
1963年后的中国外交政策：毛分子形势　M·B·胡耶达　中国季刊　1968年36期
毛分子赢得全面胜利　中国报导　1968年4卷5期
毛分子的军事教义　L·L·鲍威尔　亚洲概览　1968年8卷4期
1949年3月5日毛的讲演是当代的指导路线　中国分析　1969年1期
毛75寿辰：生活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伟大一生　中国分析　1969年1期
悼词：徐特立、老革命家、毛的老师　中国分析　1969年1期
1956——1967年毛的农业十二年纲要　中国分析　1969年1期
工业管理问题及毛——刘争论　中国分析　1969年2期
毛分子抉择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毛分子家庭的礼拜式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毛思想作为婚礼礼品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毛泽东取代西藏活佛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毛泽东和文化帝国主义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毛思想是建立新式家庭的指南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基督徒——毛分子对话　中国札记　1969年2期
1968年毛主义对日全食的观察　中国分析　1969年3期
乌苏里战争Ⅲ：地理政策、南北战略与毛　中国分析　1969年4期
毛的“九大”及将来的一些问题　中国分析　1969年4期
毛关于不断革命的七条核心论点　中国分析　1969年4期
毛的二篇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及林彪的报告　中国分析　1969年5期
概论毛在农业政策上的左倾路线　中国分析　1969年6期
北京的政治语学：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　中国分析　1969年6期
九届中央，权力分配与毛统治的机制　中国分析　1969年6期

毛泽东与毛主义：部分文献目录　中国分析　1969年7—8期

20年毛制度：1、革命周期的背景；2、1849——1949年一百年危机；3、1949——1969年综述　中国分析　1969年10期

回顾：1959年10月及1969年10月的毛和中国　中国分析　1969年11期

福建事变和中国共产党：毛分子的修正案　威廉·F·多里尔　中国季刊　1969年37期

中国共产主义观念中的党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69年38期

文化革命和中国政治体系　唐楚　中国季刊　1969年38期

中国的革命和反应：文化革命前景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L·鲍姆　中国季刊　1969年38期

革命不朽：毛泽东和中国文化革命　罗伯特·J·里夫顿　中国季刊　1969年38期

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军事著作选索引　詹姆斯·李等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毛泽东著作选英文第五卷中专有名词的统一　H·M·林德特奎斯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论积极分子：毛分子连结国家与社会的动力观念和政治角色　L·H·所罗门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共产主义中国的二十年：周期性　J·K·麦克法夸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三权鼎立和中国外交政策　J·吉廷斯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极权主义社会的矛盾　M·林德塞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二次中国革命　C·约翰森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共产主义中国的世界：来源和传统　J·R·罗文森　中国季刊　1969年39期

书评：人民的战争　中国季刊　1969年40期

书评：中国文化革命　中国季刊　1969年40期

毛泽东与中国的政治均势　S·R·施拉姆　政府与反对党　1969年4卷1期

毛以后的中国　贾·拉尼·卡拉拿　中国报导　1969年5卷2期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探索　S·R·施拉姆　皇家中亚杂志

1969年56卷 1 期

毛、刘或人生地位的两极分化　中国分析　1970年 1 期

乌托邦Ⅱ：毛、林彪的未来幻想的轮廓　中国分析　1970年 2 期

毛的经济增长战略是荒谬的吗？　中国分析　1970年 2 期

毛的辩证法医治一般的、流行的疾病　中国分析　1970年 2 期

毛泽东、林彪、江青三权鼎立　中国分析　1970年 3 期

文件：迄今一直保密的毛于1969 年 作 的 二 次 讲 话　中国分析　1970年 4 期

1870——1970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遗产？　中国分 析　1970年 5 期

毛作为会预言的超人、神话、萨满教及偶像　中国分 析　1970年 9 期

1969年经济预算或按照毛的设想所作尝试　中国分析　1970年 9 期

什么是“毛主席建党学说”？　中国分析　1970年10期

新宪法与毛的有关国家问题上的幻想　中国分析　1970年12期

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理论，1958——1969年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71年46期

书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P·威尔堡　今日中国　1972年19期

书评：毛的文化大革命　L·霍华德　今日中国　1972年21期

毛泽东的诗　N·赫登　今日中国　1972年26期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伟大的联盟”　S·R·施拉姆　中国季 刊　1972年49期

毛泽东与刘少奇，1939——1969　S·R·施拉姆　亚洲概览　1972 年12卷 4 期

书评：晨祸：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A·詹金斯　今日中国　1973年31期

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基础　S·莫杰　今日中国 1973年31期

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第二部分：统战策略　S·莫杰　今日中国　1973 年 32期

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第三部分：变动的世界　S·莫杰　今日中 国　1973年33期

行动哲学　D·J·沃尔基　今日中国　1973年39期

书评：毛统治下的佛教　中国季刊　1973年56期
毛现代化民兵　中国报导　1973年9卷6期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　米歇尔·卢瓦　巴黎奥皮耶·蒙旦书店　1973年
毛泽东：自画像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74年57期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幻想和修正　柯里什娜·普·卡布塔　中国报导　1974年5卷6期
毛分子前景的内幕　M·斯奈哈　中国报导　1974年5卷6期
毛反儒吗？　G·D·戴森卡尔　中国报导　1974年10卷1、2期
人类的前景　D·布赖恩　今日中国　1975年48期
论哲学　肖恩·塞耶　今日中国　1975年51期
论毛的新观点：2、他对苏联政治经济的看法　L·利维　今日中国　1975年61期
书评：毛泽东本相，谈话和通信　中国季刊　1975年62期
毛分子的经济发展模式　B·C·卡尔塔　中国报导　1975年9卷2期
毛眼中的斯大林　M·莫汉蒂　中国报导　1975年9卷4期
真正的亲人：毛　N·戴丝　中国报导　1975年9卷5、6期
毛泽东和马克思讨论会——第一部分：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一个答覆　B·许华茨　现代中国　1976年10月（2卷4期）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　D·费恩巴奇　今日中国　1976年65期
"毛泽东和马克思"讨论会——第一部分：在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和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并提出一种初步的重新估价　R·M·波弗夫　现代中国　1976年10月（2卷4期）
对艺术家的挑战　G·布雷特　今日中国　1976年65期
毛的诗词　I·赫登　今日中国　1976年65期
书评：革命的序曲：毛，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　中国季刊　1976年65期
书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　中国季刊　1976年68期
毛泽东和19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　J·安格斯·W·麦克唐纳　中国季刊　1976年68期
评"毛泽东：人和神"一文　中国季刊　1976年68期
毛泽东和通向未来的道路　韩素音　新中国　1976年2卷3期

正统的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　L·M·佩弗　现代中国 1976年2卷4期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报导　1976年12卷1期

毛时代的终结　P·H·尚　亚洲事务　1976年14卷11期

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J·B·斯塔尔　国际杂志　1976—1977年32卷1期

毛：法家和儒家　L·S·帕里·洛莫福　中国历史研究　1977年3期

毛主义和教育中的乌托邦与现实——评《毛主义的教育革命》一书　D·挪瑞那瑞扬　中国导报　1977年1—2月

毛论中国的民主与集中　S·R·施拉姆　权力　1977年3期

毛与甘地：集中与分散　J·D·塞舍　中国导报　1977年1—2月（13卷1期）

毛泽东个人形象的改变——毛泽东诗选研究　韦明昌（译音）　亚洲研究　1977年2月

毛以后的共处　O·E·克拉伯　进步分子　1977年2月（41卷2期）

毛时代的理论和实践　波尔·M·斯威兹　每月评论　1977年2月（28卷9期）

为毛和将来而斗争　A·斯卡拉皮澳　环救国际事务杂志　1977年春季（21卷1期）

中国的辩证法：毛主义者与道家　J·W·弗雷伯格　关心亚洲学者通报　1977年1—2月（9卷1期）

华主席修订毛的遗著：《论十大关系》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77年3月（69期）

评《毛》　N·格瑞　今日中国　1977年3月（70期）

评《毛泽东：领袖人物》　J·陈　太平洋事务　1977年春（50卷1期）

评《毛思想中的爱与斗争》　M·L·布克斯　中国札记　1977年春（2卷1期）

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毛主义解释　D·H·贝沙　亚洲事务杂志　1977年春（2卷1期）

毛以后的中国　H·哈丁　共产主义问题　1977年3—4月（26卷2期）

毛主义完结了　F·B·雷达奥　国家评论　1977年3、4月（29卷）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返回的三个“马列主义者” P·雷格拉特 新时代 1977年6月（32卷371期）
评《毛取得政权的道路与共产国际》 H·克鲁斯 东欧 1977年6月（27卷6期）
评《世界力量的改组——毛泽东最后一次革命影响下的俄中不和》 J·杰拉伯特 东欧 1977年6月
评《解放以后的毛泽东著作：书目索引》 J·陈 太平洋事物 1977年夏（50卷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条件下的毛主义 B·N·帕列夫 亚洲 1977年7期
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J·B·斯塔尔 共产主义问题 1977年7—8月（26卷4期）
毛泽东与中苏分裂的发展 B·E·沙恩德 中国导报 1977年7—8月
毛选五卷述评 G·D·基申恩卡 中国导报 1977年7—8月（13卷4期）
评《毛的囚徒》 C·特瑞 今日中国 1977年7—8月
毛以后的中国 O·E·克拉伯 当代历史 1977年9月（73卷429期）
毛时代的理论和实践 何罗·M·斯威著 每月评论 1977年（29卷4期）
毛主席论苏联经济和其它问题 每月评论 1977年9月（29卷4期）
评《毛主席语录注释》 邓寿平（音译）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 1977年7—9月（97卷3期）
耶稣基督，救世和毛主义 R·L·维特海德 中国札记 1977年秋（15卷4期）
对“耶稣基督，救世和毛主义”一文的答复 C·莱希 中国札记 1977年秋（15卷4期）
从毛主义乌托邦角度看调和和斗争 M·迈斯纳 中国哲学杂志 1977年10月（4卷3期）
毛对人类的贡献 C·R·海斯曼 今日中国 1977年9—10月（74期）
孔教的“调和”、毛主义的“斗争”和它们在西方的对应物：一种辩证的比较 J·C·豪森 中国哲学杂志 1977年10月
以托派的眼光看毛主义的中国——评《中国的党、军队与群众》一书 D·沙克特卡恩塔 中国导报 1977年9—10月
1977年的中国和俄国：没有毛的毛主义 R·C·豪恩 亚洲概览 1977年

10月

关于毛与马克思的专题讨论第三部分：学术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 M·迈斯纳 现代中国 1977年10月（3卷4期）

中国民粹主义和毛泽东的遗产 J·R·汤森德 亚洲概览 1977年11月（17卷11期）

毛以后的中国 A·S·威丁 亚洲概览 1977年11月（17卷11期）

毛以后的政策：党的十一大研究 R·A·斯卡拉皮澳 亚洲概览 1977年11月（17卷11期）

毛主义的遗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M·迈斯纳 亚洲概览 1977年11月（17卷11期）

介绍毛的遗产 P·P·成 亚洲概览 1977年11月（17卷11期）

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J·B·斯塔尔 国际杂志 1976年—1977年冬（32卷1期）

毛的神话 S·雷斯 分歧 1977年冬（24卷1期）

毛的第二次死亡 P·梅那 非洲—亚洲 1977年12月（150期）

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评述《中国的不断革命》和《毛泽东》二文 L·理查德 关心亚洲学者通报 1977年10—12月

评：《毛以后的中国》 陈策浩（音译） 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 1977年12月（8卷4期）

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陈策浩（音译） 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 1977年12月（8卷4期）

评《毛》 诺埃尔·格雷 今日中国 1977年70期

国家的概念：孙中山和毛泽东 罗伯特·E·比德齐 中国季刊 1977年70期

毛泽东思想，争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毛以后的时代 唐楚 中国季刊 1977年71期

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毛主义解释 唐纳德·H·毕晓普 亚洲事务杂志 1977年2卷1期

历史的友谊：八个美国人回忆毛主席的接见 新中国 1977年3卷1期

毛泽东、马克思论集——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化 安德鲁·G·沃尔德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1、2期

纪念毛泽东 新中国 1977年3卷3期

马克思、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M·塞尔登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毛泽东、马克思论集——第三部分：评论 S·R·施拉姆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毛泽东、马克思论集——第四部分：反应 安德鲁·G·沃尔德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毛泽东、马克思论集——第三部分：反应：毛和马克思：悟性、学识、观念形态 理查德·M·佩弗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毛泽东、马克思论集——第三部分：毛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 莫里斯·迈斯纳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论文集：讨论和评论 约翰·G·格利 现代中国 1977年3卷4期

评《楼上的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1949——1975年》 C·帕森斯 现代亚洲杂志 1977年7卷3期

中国的辩证法：毛主义者与道家 弗赖伯格·J·W 关心亚洲学者通报 1977年9卷1期

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评述《中国的不断革命》和《毛泽东》二文 理查德·利维 关心亚洲学者通报 1977年9卷4期

毛以后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中国报导 1977年13卷1期

毛和甘地：集中与统一 J·D·塞恩 中国报导 1977年13卷1期

毛分子教育上的乌托邦和现实 娜·戴丝 中国报导 1977年13卷1期

评：《论十大关系》 中国报导 1977年13卷3期

毛的五卷选编 G·D·戴森卡尔 中国报导 1977年13卷4期

介绍毛的遗产 彼得·P·切恩 亚洲概览 1977年17卷11期

毛泽东与苏联 S·R·施拉姆 政治家报 1977年43卷3期

评《毛泽东：领袖人物》 杰罗姆·陈 太平洋事务 1977年50卷1期

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 E·海姆英德 现代中国 1978年1月（4卷1期）

列宁、毛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概念 A·K·罗 中国导报 1978年1—2月（14卷1期）

没有毛泽东的毛主义 本刊圆桌会议 今日中国 1978年2期

评《中国的经济和毛主义的战略》 ① C·哈佛曼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科学院纪事 1978年1月
② K·R·沃克 太平洋事务 1978年春季
③ N·R·拉德 亚洲研究杂志 1978年5月
④ R·阿瑟 国际事务 1978年7月
⑤ S·佩尼 每月评论 1978年7—8月

评《毛泽东》 N·格雷 今日中国 1978年1—2月（76期）

评《从历史衡量毛泽东》 ① J·E·豪瑞 亚洲事务 1978年2月（9卷1期）
② D·S·G·古德受 国际事务 1978年4月（54卷2期）
③ E·L·法莫尔 美国历史评论 1978年6月（83卷3期）
④ V·苏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8年12月（72卷4期）

评托马斯、沙尔宾编写的题为《毛的编年史。生活与著作年表》一书 J·哥拉夫贝兹 东欧 1978年2月（28卷2期）

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前的变化 A·N·布尔金 今日中国 1978年3期

毛的最后的想象 B·格劳斯卡波 进步分子 1978年3月（42卷3期）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1923—1939 苏达曼·特雷弗 现代亚洲杂志 1978年3期

评《毛》 A·W·麦克唐纳 中国季刊 1978年3月（73期）

评《毛泽东：他的思想的指南》 ① M·M·鲍尔德 新中国 1978年春（4卷1期）
② J·B·斯塔尔 国际杂志 1978年秋（33卷4期）

评《毛和中国的变革》 M·陈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会评论 1978年4月

（1卷8期）

评《毛泽东：领导人》 D·S·G·黄德受 国际事务 1978年4月（54卷2期）

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 ① A·E·凯恩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科学院 1978年5月（437期）

② H·莫里斯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科学院 1978年（437期）

③ M·霍克曼 国际事务 1978年10月（54卷4期）

④ E·E·雷斯 太平洋事务 1978年（51卷2期）

“中国道路”的起源：从毛选第五卷看一些新观点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78年6月（74期）

评《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① E·E·雷斯 太平洋事务 1978年夏（51卷2期）

② A·W·唐纳德 中国季刊 1978年76期

评《毛泽东：领导人》 E·V·沃费斯坦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8年6月（72卷2期）

评《从历史衡量毛泽东。由〈中国季刊〉组织的对毛泽东的初步评价》 E·E·雷斯 太平洋事务 1978年夏（51卷2期）

评《革命不是宴会：毛主义变革中国的盛景》 ① E·弗雷德曼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8年6月（72卷2期）

② G·E·约翰逊 太平洋事务 1978年夏（51卷2期）

③ R·威特科 亚洲研究杂志 1978年11月（38卷1期）

评1977年9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刊登的费多罗夫的题为《毛

主义在非洲自我暴露》一文　I·派奇　东欧　1978年7月

毛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　E·克罗科　亚洲思潮与社会　1978年9月（8卷8期）

评《毛泽东批评苏联经济学》　① M·滋威格　新中国　197年4卷3期

② J·罗宾　今日中国　1978年80期

评《彻底革命：对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统治下的中国的比较研究》　T·H·格林恩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8年9月

评《解放以后的毛泽东著作书目索引》　M·卡乌　中国季刊　1978年9月（95期）

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M·胡克海姆　国际事物　1978年10月

评《毛思想中的爱和斗争》　① B·威特　今日中国　1978年9—10月（80期）

② V·C·佛尔克海姆　中国季刊　1978年12月（76期）

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现实：毛领导下的不协调》

① L·狄特莫尔　亚洲研究杂志　1978年11月（38卷1期）

② S·M·周美国历史评论　1978年12月（83卷5期）

③ V·C·弗尔克海姆　中国季刊　1978年12月（76期）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　付韦森（音译）中国哲学杂志（荷兰）　1978年12月（5卷4期）

“天下大乱”：毛主义和海洋法　H·H·埃斯特勒　亚洲思潮与社会　1978年12月

毛泽东论世界政治（1949——1957年）　B·E·塞恩德　当代综论　1978年9—12月（14卷5—6期）

1947年土地改革中的毛和刘：是伙伴还是论敌？　G·塔耐卡　中国季刊　1978年75期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M·耶胡达　今日中国　1978年76期

评《毛泽东》　N·格雷　今日中国　1978年76期

评《毛和中国的变革》　尚·莫林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学会评论　1978年

1卷3期

毛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　E·克罗克　亚洲思潮与社会　1978年8卷8期

毛泽东和1922年10月长沙的建筑工人罢工：马克思主义在工业发展以前的中国　L·谢弗　现代中国　1978年4卷4期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　F·H·卫孙　中国哲学杂志　1978年5卷4期

毛泽东的反苏路线在1964——1966年美国侵略越南升级时的作用　P·巴斯齐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1978年6卷5期

中国的制度和官僚政策：毛主义的经验　B·塔拉齐　国际发展比较研究　1978年13卷1期

列宁、毛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概念　L·A·库曼　中国报导　1978年14卷1期

毛泽东论世界政治（1949——1957）　B·E·夏德　中国报导　1978年14卷5、6期

毛分子时代　S·查可巴提　中国报导　1978年19卷4期

评托马斯·沙宾编写的题为《毛的编年史·生活与著作年历表》一书　格劳毕茨·德阿希姆　东欧　1978年28卷2期

毛的最后的想象　B·格鲁西库　进步分子　1978年42卷8期

评《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E·E·赖斯　太平洋事务　1978年51卷2期

评《革命的序幕：毛、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年）》　S·J·诺莫夫　太平洋事务　1978年51卷3期

评《毛泽东：领导人》　①　大卫·S·G·古德曼　国际事务　1978年54卷2期

②　U·V·沃尔弗斯特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8年72卷2期

毛泽东、陈伯达与“马克思的意义”（1936——1938）　R·F·韦勒　中国季刊　1979年9月（79期）

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一种探索　李红杨（音译）　中国季刊　1979年9月（79期）

毛以来中国的政治和哲学　B·沃马克　中国季刊　1979年12月（80期）

毛的革命变革战略：文化革命典型研究　李红杨（译音）　中国季刊　1979年77期

毛：鼓动者　威廉·休厄尔　今日中国　1979年86期

论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约瑟福·W·埃什里克　现代中国　1979年5卷1期

毛：政治哲学家　B·博特沙因　中国报导　1979年15卷6期

极端的毛主义，命令的列宁主义，中国经济现代化策略上的阶级斗争　N·卡特　中国报导　1979年19卷6期

毛的革命人道主义　K·T·范　苏联思潮研究　1979年19卷11期

反孔：毛的最后运动　A·J·格里格等　亚洲概览　1979年19卷11期

毛泽东的最后一仗　R·罗塔　中国季刊　1980年3月（81期）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A·D·奥内特　中国季刊　1980年3月（81期）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教育：是进两步、退两步和从头开始吗？　B·苏娜娜　中国季刊　1980年3月（81期）

毛、林彪和第五次反围剿　胡赤石（音译）　中国季刊　1980年6月（82期）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解放前的文本　N·尼科　中国季刊　1980年84期

毛和毛泽东思想　爱迪多尔　今日中国　1980年88期

毛泽东思想的实用方面　拉姆·阿希　印度哲学季刊　1980年7卷2期

雅格宾党人、布尔什维克分子、毛主义者进行的是同样的战斗……（评T·斯科克波尔著的《国家和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皮·布里博姆　世界　1980年8卷3期

毛论斯大林　拉姆斯·纳兰耶斯维米　中国报导　1980年16卷5期

非斯大林化和非毛化　斯里麦蒂·切克拉巴蒂　中国报导　1980年16卷5期

毛泽东的遗产　L·迪特默　亚洲概览　1980年20卷5期

毛泽东身后中国的行政改革与现代化　W·C·弗尔克汉姆　太平洋事务　1980年53卷11期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81年87期

毛对社会主义过渡模式重新思考　D·马穆　现代中国　1981年7卷1期

马克思、毛泽东与合法斗争问题　艾拉·斯莫兰斯基　亚洲侧面　1981年9卷1期

毛以后中国的年青人　古帕·乔施　中国报导　1981年17卷4期

毛分子后的中国　古帕·乔施　中国报导　1981年17卷6期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群众运动　L·P·马德森　共产主义问题　1981年30卷6期

毛泽东　S·R·施拉姆　今日历史　1981年31卷

略论毛泽东的国际意义、《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文章　澳大利亚共产党人　1981年7—8月号

湖南的好人（评介毛泽东青年时期）　昂科·皮切尔　再生　1982年39卷8期

凋落的野百合花：王实味与毛泽东在中共第一次整风运动中的"延安讲话"　T·奇克　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月刊　1984年第11期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84年3月（97期）

毛主义的前途　S·阿美恩　中国季刊　1984年8月（97期）

毛以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和解放　P·R·姆特　中国季刊　1984年12月（99期）

毛的中国　T·K·蒙利克　中国季刊　1985年9月（102期）

遵义会议：毛泽东权力上升的一步　B·杨　中国季刊　1986年6月（105期）

文革20年回顾：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四种观点　L·W·派伊　中国季刊　1986年6月（105期）

灾变的界限："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影响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86年6月（105期）

毛泽东：初步的评价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87年6月（105期）

十三大以后的中国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88年6月（109期）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巩固权力的下一个步骤　K·托马斯　中国季刊　1989年3月（112期）

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　D·L·山姆巴夫　中国季刊　1989

年12月（115期）
毛泽东的思想　S·R·施拉姆　中国季刊　1990年6月（117期）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　基辛格　《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毛泽东与游击战　S·B·格里菲斯　《毛泽东论游击战》

日　　文

毛泽东是杰出的理论家和天才的战略家　冈野进　解放　1946年8期
毛泽东论　岩村三千夫　世界　1946年7期
毛泽东周围的人们　中西功　世界　1946年7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佐野学　民主文化　1946年1卷1期
中共的发展和毛泽东的领导　宫田修　新世界　1948年9期
中国解放战争和毛泽东（上、下）　新民办　1948年10、11期
毛泽东思想的展开　岩村三千夫　世界评论　1948年3卷6期
毛泽东的政策——中共之剖析　大久保泰　政界　1949年3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宫武谨一　中国研究　1949年8期
铁托和毛泽东　和田齐　思索　1949年20期
毛泽东和蒋介石　鹿地亘　评论　1949年31期
从孙文到毛泽东　岩村三千夫　展望　1949年38期
毛泽东和《论联合政府》　岩村三千夫　朝日评论　1949年4卷2期
毛泽东与知识分子　岩村三千夫　思想与科学　1949年5卷1期
毛泽东　安滕彦太郎　理想　1950年200期
湖南的虎——毛泽东的半生　盐协幸四郎　新历史　1950年1卷1期
毛泽东的性格　泉紘彦　评人　1950年1卷2期
毛泽东和胡志明——对亚洲共产主义领袖的回忆　佐野学　读卖评论　1950年2卷10期
毛泽东的苏联之行　草野文男　组合运动　1950年5卷3期
怎样阅读毛泽东的著作　尾崎庄太郎　理论　1951年17期
毛泽东的战争论　佐野学　日本及日本人　1951年6卷2期
致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信　草野文男　组合运动　1951年6卷2期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猪木正道　人间　1951年6卷6期
毛泽东——评传　竹内好　中央公论　1951年66卷4期

从《矛盾论》看毛泽东哲学的意义（1--3） 松村一人 思想 1952年339、340、342期
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山本正治 经济学杂志 1952年27卷6期
中国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西顺藏 现代中国 1953年15期
《矛盾论》、《实践论》解说 山本秀夫 现代中国 1953年18期
关于《中国的〈实践论〉〈矛盾论〉》——理论的实践性 西顺藏 现代中国 1953年20期
辩证唯物论的传统——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解 梅本克己 理论 1953年20期
新民主主义形成的过程与毛泽东的思维（一） 石墨俊逸 山口大学文学会志 1953年4卷2期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福本和夫 改造 1953年34卷7期
《实践论》 《矛盾论》专题讨论会 井尻正三 现代中国 1954年430期
毛泽东和尼赫鲁 冈仓古志郎等 知性 1954年1卷5期
尼赫鲁、毛泽东会谈的意义 坂本松德 东邦经济 1954年24卷12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中村九一郎 大孤经大论集 1955年13期
尼赫鲁、毛泽东、金日成——印度、中国、朝鲜的政治方式 板本松德 世界与日本 1955年21期
毛泽东的革命的战争论 田畑忍 同志社法学 1955年27期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史的发展 今堀诚二 史学研究 1956年63期
毛泽东传（1—9） 贝冢茂树 世界 1955—1956年118—120、122、123、126、127、129、132期
毛泽东的哲学——对《论持久战》的考察 小林登 爱媛大学纪要（人文科学） 1956年3卷1期
同毛泽东主席会谈记 土居明夫 大陆问题 1956年5卷12期
关于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久重福三郎 太平洋问题 1957年42期

——解释毛泽东的理论 高桥勇治 历史评论 19 69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青地晨 知性 1957年4卷1期
毛泽东报告 中山优 潮流 1957年5卷6期
毛泽东理论的意义和影响 和田敏雄 海外事情 1957年5卷9期
毛泽东和词 冈崎俊夫 东京支那学报 1958年4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西顺藏 现代中国 1958年33期
毛泽东 冈崎俊夫 妇人公论 1958年43卷1期
毛泽东主席辞职的背景 爱田重藏 东亚时代 1959年1卷2期
人民公社和毛泽东思想 寺尾五郎 新日本文学 1959年14卷6期
毛泽东的战争观 笠原正明 亚洲研究 1959年6卷2期
毛、刘的交替与今后的中共 波多野乾一 国连评论 1959年38卷6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中国的读书界 八木宽 书报 1960年33期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政治上的能动性问题 池田诚 立命馆法学 1960年34期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高桥勇治 中央评论 1960年69期
毛泽东的战争观——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和平共处的理论 河上伍郎 东亚时论 1960年2卷4期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2） 猪木正道 法学论丛（京大） 1960年67卷4、5期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记 冈田春夫 世界 1961年484期
毛泽东主席会见记 亚洲经济旬报 1961年5卷10期
关于毛泽东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 滕本昭 世界经济评论 1961年5卷10期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岩村三千夫 大安 1961年7卷1期
关于毛泽东词《雪》的历史背景 小池洋一 大安 1961年7卷8期
毛泽东主义的特征 桑原寿二 中国问题研究会 1962年
战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践论》、《矛盾论》 木村郁二郎 中国文化研究 1962年2期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安斋库治 前卫 1962年6月号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文化评论 1962年

9 期
《矛盾论》杂记　小林正　中研笔记（大阪市）　1962年9期
人民公社的失败——毛泽东的领导受挫　桑原寿二　世界周报　1962年43卷36期
强化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的领导体制——十中全会的经济调整方针　井上昌三　世界周报　1962年43卷42期
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思想　桑原寿二　中央公论　1962年77卷3期
关于毛泽东的词《雪》　大山茂　文化评论　1963年14期
再谈毛泽东思想　竹内好　思想　1963年463期
对毛泽东主席直言　大平善梧　论争　1963年5卷8期
孙子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路线的思想背景　鹿岛宗二郎　东亚时论　1963年5卷10、11期
国际派和毛泽东　滕井高美　法学论丛　1963年74卷3期
毛泽东的思想和战略　桑原寿二　中央公论　1963年78卷9期
毛泽东主席　野村浩之　中央公论　1963年78卷9期
《实践论》、《矛盾论》批判的反批判　寺泽恒信　唯物论研究　1964年18期
今日的毛泽东路线和日中贸易　坂井丰一　前卫　1964年223期
落后国家革命的典型——毛泽东主义　上别府亲志　共产圈问题　1964年8卷4期
毛泽东的对苏态度——中国共产党史上的独立性发展　宇野重昭　中央公论　1964年79卷12期
毛泽东选集选读中所见到的典故　下斗米晟　东洋研究　1965年11期
中国最近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兼评毛泽东的《矛盾论》　岩崎允胤　唯物论研究　1965年21期
毛泽东《实践论》的批判和反批判（上）——关于寺泽·三井田的论文　森信成　唯物论研究　1965年21期
对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转变的疑问　浅田光辉　唯物论研究　1965年23期
给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　杉浦明平　潮　1965年63期
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　冈本隆三　潮　1965年65期
毛泽东路线的目标　高田富佐雄　潮　1965年65期

毛泽东的越南总战略　各务寮一　劳动问题月刊　1965年89期
毛泽东思想的源流　桧山久雄　现代之眼　1965年6卷11期
马克思主义的变质过程和毛泽东辩证法　小林多加士　ユハア评论　1965年7卷4期
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实践——《实践论》　中岛岭雄　评论　1965年7卷5期
毛泽东的误断　葛西纯一　东亚时论　1965年7卷8期
近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和毛泽东思想　小林多加士　东亚时论　1965年7卷10期
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期的情况　中岛岭雄　社会科学　1966年9期
毛泽东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若干问题　宫坂宏　社会科学　1966年9期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发展和背景——军事上的政治挂帅　田所竹彦　社会科学　1966年9期
毛泽东思想和邻国的态度——毛的外交　曾村保信　社会科学　1966年9期
矛盾论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论》的批判　三浦勉　社会科学　1966年9期
毛泽东哲学的诸概念的探讨　新岛淳良　教养诸学研究　1966年23期
《矛盾论》批判（1—5）　小林立　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室报告（第一部）　1966—1968年20、22—25期
太平天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它的"禁欲主义"　山口一郎　研究（神户大学）　1966年37期
整风运动和人的改造——毛泽东思想是发展还是僵化　山口一郎　潮　1966年73期
毛泽东与工农兵体制　冈本隆三　潮　1966年73期
毛泽东与蒋介石　新井宝雄　潮　1966年73期
中国和苏联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观　菊地昌典　潮　1966年73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革命的主体问题　野村浩一　展望　1966年91

期

毛泽东思想的展开 野村浩一 展望 1966年95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与领导力——毛泽东体制的政治思想状况 各务寮一 劳动问题月刊 1966年102期

文化革命与毛泽东体制 各务寮一 劳动问题月刊 1966年102期

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小林多加士 外交时报 1966年1024期

中国社会主义观的发展过程和毛泽东的学习运动——革命理论的深化和新共产主义过渡理论 小林多加士 外交时报 1966年1031期

毛泽东国内国际路线的推进——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本质 广田洋二 外交时报 1966年1035期

毛泽东政权的黄昏 猪俣敬太郎 日本及日本人 1966年1441期

毛泽东的统战原则 吉村五郎 大东文化大学纪要（文学部） 1966年4辑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侧面 新岛淳良 东洋学术研究 1966年5卷7期

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毛泽东主义——专制主义的由来与现代政治体制 根本诚 东亚时论 1966年8卷11期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肃反 堀健三 自由 1966年8卷11期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毛泽东哲学 山本秀夫 农业综合研究 1966年20卷8期

毛泽东体制会变吗？——文化革命的本质与朝代的交替 桑原寿二 世界周报 1966年47卷21期

刘少奇为何下台——毛、林新路线的性质和方向 桑原寿二 世界周报 1966年47卷36期

绝不对苏让步——毛林国际路线的基本点 桑原寿二 世界周报 1966年47卷38期

毛泽东——从《实践论》看其人类观 西顺藏 一桥论丛 1966年56卷4期

从注释的立场看《毛著作》语言研究中的问题 香坂顺一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66年1期

《矛盾论》——对立的统一 小林立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67年2期

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年代考 林要三 帝国山大学纪要

1967年3期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前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抵制　北田定男　现代科学论丛
1967—1970年1—4期
毛泽东传　吉村五郎　东洋研究　1967年15期
毛泽东的宣传工作与民众组织　小山荣三　新闻学研究（关西大学）
1967年17—19期
展望毛·林新领导体制的中共　桑原寿二　国际时评　1967年21期
"造反"运动的指导性与分散性——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个"的理解
三宅英生　马克思主义公论　1967年25期
毛泽东的脸谱　今村与志雄　中国　1967年49期
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方式——文化大革命的原理和发展　吉田实　潮　1967年81期
中国的氢弹和毛泽东思想　中岛岭雄　潮　1967年86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新井宝雄　潮　1967年86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浅野雄三　经济研究　1967年141期
毛泽东的文章　小林立　中国语学　1967年172、181期
中国革命和今日的毛泽东思想　石田元　世界　1967年258期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第七次访华归来　宇都宫德马　1967年262期
毛泽东派"改组分化"论的批判——分裂主义及其分裂手段　神利夫　前卫　1967年271期
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文发表十周年　岩村三千夫　亚洲经济旬报　1967年687期
毛泽东的命运　田村幸策　外交时报　1967年1040期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成功吗？土居明夫　外交时报　1967年1044期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日本的文化运动　井上清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67年2卷8期
从西安到延安（1—6）　幸田正子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67年2卷5—9期
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调查报告　大家有章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67年3卷1期
从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阶级分析看毛泽东的阶级观　矢吹晋　亚洲经济

1967年8卷8期

中共领导体制的变质与毛林路线　上别府亲志　东亚时论　1967年9卷4期

苏联共产主义和毛泽东革命的特点　小林多加士　东亚时论　1967年9卷4期

读《毛主席语录》日文版——赞成点与不赞成点　丰田悌助　海外事情　1967年15卷4期

毛泽东的语言　芝田稔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　1967年—1970年16卷4期、17卷4期、18卷13期、19卷1期、20卷1期

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再论毛泽东的《矛盾论》　森信诚　人文研究　1967年19卷1期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性质——毛体制末期的症状　中岛岭雄　经济往来　1967年19卷3期

毛泽东的焦虑与孤独　村松英　中央公论　1967年82卷2期

毛泽东的世界战略和越南——世界革命中的对外政策的分析　柴田穗　潮别册　1968年10期

试论毛泽东　冈口武彦　九洲中国学会报　1968年14期

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仓岛贤一　新亚洲　1968年17期

观察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上野秀夫　世界经济报导　1968年20期

中国文化大革命旁证（1—5）　草野文男　拓殖大学论集　1968年59—61、64、69期

长征途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滕田正典　历史学研究　1968年333期

《毛泽东语录》的语汇　柴垣芳太郎　谷大学论集　1968年386期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　滕村俊郎　思想　1968年523期

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的诸问题　新岛淳良　思想　1968年523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特征——群众路线的思想　野村浩一　思想　1968年525、526、528期

毛泽东著作的阅读方法（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冢有章　毛泽东思想月刊　1968年1卷6期

毛主席党的建设路线的伟大胜利——学习中共十二中全会公报　小室刚

毛泽东思想月刊　1968年2卷1期
关于《毛泽东的战争论》　今村幸雄　防卫论集　1968年6卷3期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新阶段　杉山市平　现代之眼　1968年9卷1期
毛泽东政权的前途　雨宫庸藏　自由　1968年10卷4、5、8期
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目的两个独裁者　菊地昌典　朝日杂志　1968年10卷18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　草野文男　共产圈问题　1968年12卷1期
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其政策的展开　共产圈问题　1968年12卷1、2期
毛泽东与民族主义　佐滕慎一郎　海外事情　1968年16卷6期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中西功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　青木书店　1969年版
对小林氏的《〈矛盾论〉——对立物的统一》一文的批评　新岛淳良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69年3期
访华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语录》原文版的意义　香坂顺一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69年3期
听近代史研究所张友坤　尹士德谈中国现代史上的毛泽东思想　新岛淳良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69年3期
早期的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　林要三　帝国山大学纪要　1969年5期
毛泽东的暴力思想——战争论　新岛淳良　社会科学　1969年15期
《矛盾论》研究（1—3）　小林立　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　1969年—1970年26—28期
中国的现状和毛泽东思想　柴三九男　大学基督者　1969年28期
对毛泽东思想中"群众"的考察　松尾善弘　汉文学会会报　1969年28期
《矛盾论》的构成理论　小林立　现代中国　1969年44期
毛泽东周围的人们　滕井彰治　国际时评　1969年51期
毛泽东——威力无比的思想家　小野信尔　思想科学　1969年91期
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型　竹内实　思想　1969年538期
拥护毛泽东思想——中国"九大"的断想　斋滕　现代之眼　1969年10卷6期
从同志到敌人——毛泽东和刘少奇　桑原寿二　自由　1969年11卷4期

中国的“九大”之后——从毛泽东到林彪 中岛岭雄 自由 1969年11卷6期

毛泽东——第三世界的红太阳 新岛淳良 朝日杂志 1969年11卷25期

从毛泽东的性格看文化大革命 佐滕慎一郎 海外事情 1969年17卷5期

毛泽东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 中岛岭雄 中央公论 1969年84卷7期

“毛泽东神话”的生与死——从延安到“九大” 山本哲也 中央公论 1969年84卷11期

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 持田真一 干部学校记事 1970年1月号

毛泽东只有搞文化大革命 野上正 朝日亚洲评论 1970年1期

毛泽东思想中的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 S·R·施拉姆 Ajicho月报(日) 1970年1期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策 滕井高美 爱媛法学 1970年2期

“毛泽东思想”这个神话的形成与变化 德田教之 亚洲季刊 1970年4期

毛泽东哲学的新阶段及其内容 鸣海三郎 中国研究 1970年4期

《毛泽东选集》词汇索引——编辑草案 上野惠司 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1970年4期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和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哲学的展开 山口一郎 亚洲经济学会 1970年10期

毛泽东的家庭 长野广生 中国 1970年77期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 草野文男 拓殖大学论文集 1970年—1971年75、76、78、80期

严肃的中共内情——毛泽东主义与刘少奇主义的暗斗 鹿岛宗二郎 ユリア评论 1970年112期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日常性和革命 津村乔 中国研究 1970年264期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管沼正久 中国研究 1970年266期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 新岛淳良 中国研究 1970年266期

中共的权力斗争史——西北系与毛泽东三十余年的殊死斗争 山村文人 自由世界 1970年7卷10期

毛泽东思想者的十戒　新岛淳良　构造　1970年9卷10期

毛泽东在中共的权威——从遵义会议到“七大”德田教之　亚洲经济　1970年11卷1—9期

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的神化（1941—1942）　德田教之　亚洲经济　1970年11卷12期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和毛泽东　蜂屋亮子　亚洲经济　1970年17卷1期

毛泽东在中共里的权威和领导地位的产生与确立过程——从遵义会议（1935、1）到六届六中全会（1938、10）前　德田教之　法学研究　1970年43卷6期

毛泽东外交，新展现的秘密　柴田穗　时代　1971年1—3期

中国外交和毛路线　柴田穗　时代　1971年8期

过渡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管沼正久　情况增刊号　1971年10月

现阶段和中国政治状况——毛泽东将采取稳健政策　德田教之　鼓动月报　1971年11期

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　上别府亲志　东亚季刊　1971年13期

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　河地重藏　经济学年报　1971年31期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发展　管沼正久　现代中国　1971年46期

毛语录中的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理解中国　白士智夫　经济学家月刊　1971年2卷6期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1958—1962年　S·R·拉施姆　亚洲季刊　1971年3卷3期

江河日下的毛泽东王朝　柴田穗　诸君　1971年3卷5期

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　大家有幸　毛泽东思想月刊　1971年4卷8期

毛泽东政治的前途　藤井满洲男　亚洲　1971年6卷2期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创立及其凝聚力——1943年——1945年　德田教之　亚洲经济　1971年12卷8期

毛泽东统治的特点和病症　桑原寿二　自由　1971年13卷5期

毛泽东的矛盾，中国的苦闷——权威与分离　桑原寿二　共产圈问题

1971年15卷12期

毛泽东的法思想序论　福岛正夫　社会科学研究　1971年17卷1期

迎来第二个转折点的中国——毛泽东主义的寿终　柴田穗　国防　1971年20卷2期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展开　上妻隆荣　东亚经济研究　1971年48卷1期

毛泽东思想的基点　今堀诚二　现代中国　1972年4期

中国革命和反权力的宗教思想——农民起义的哲学和毛泽东革命　小林多加士　东亚季刊　1972年16期

中国传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再探讨　古贺登　东亚季刊　1972年17期

通过文革所见到的毛思想的核心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2年24期

从摆脱"文革"化到非毛化　加滕荣治　中国研究　1972年29期

关于"文革"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几点感想　鹿地亘　中国研究　1972年30期

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论和文化大革命　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2年31期

所谓"毛泽东哲学"　高田求　文化评论　1972年131期

毛泽东的形象改变　鹿岛宗二郎　世界政经　1972年1卷8期

毛泽东所谈的林彪事件的真相　鹿岛宗二郎　世界政经　1972年1卷9期

毛泽东领导的矛盾　山村文人　问题研究　1972年1卷12期

受到挫折的毛路线　桑原寿二　问题研究　1972年2卷8期

作为中国政治和法律的指导原理的毛泽东思想　饭田忠雄　神户学院法学1972年8卷1期

"毛泽东主义"和中国外交　高市惠之助　流动　1972年4卷12期

毛泽东与周恩来——领导者的权力关系　松野谷夫　流动　1972年4卷12期

从井冈山的斗争中学什么?　中川清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72年7卷4期

毛泽东思想考——文化大革命和"人类自由"的问题　加加美光行　亚洲经济　1972年13卷12期

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中国的青少年　黑川慧　青少年问题　1972年19卷10期

毛泽东终于战胜了林彪　冈田英弘　世界经济　1972年27卷1期

毛泽东和周恩来　柴田穗　中央公论　1972年87卷3期
毛泽东主席的诗的世界　大有信良　中国研究　1973年38期
现代中国和毛泽东的作用　大谷政吉　中国研究　1973年43期
由大寨所见到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路线　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3年44期
《实践论》研究笔记　新岛淳良　社会科学研究　1973年18卷2期
在毛泽东的诗中见到的革命思想　竹内实　文艺春秋　1973年51卷5期
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笔记》　矢吹晋　UP　1974年21期
论毛泽东　吉村五郎　东洋研究　1974年38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　杨天溢　现代中国　1974年48、49期
对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有关理论的考察　副岛种典　中国研究　1974年54期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毛泽东、刘少奇、金日成路线的比较　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4年56期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　矢吹晋　展望　1974年189期
毛泽东的苏联社会主义观——决定中苏关系的转变　太田胜洪　世界　1974年348期
学习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参考资料　藤村俊郎　毛泽东思想月刊　1974年7卷10期
《毛泽东思想万岁》赞——充满着活泼精神　竹内实　现代之眼　1974年15卷9期
现代中国评论的致命弱点——"毛泽东的中国"和"中国的毛泽东"　柴田穗　自由　1974年16卷3期
毛泽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　矢吹晋　经济评论　1974年23卷9期
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毛泽东主义　法学研究　1974年47卷6期
据1920年下半年的资料看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特点　天儿慧　一桥研究　1975年30期
读《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在解放后的著作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5年60期
冯友兰的“哲学”和毛泽东思想　高田淳　汉文教学　1975年113期
毛泽东自作的“引退之道”——对四届人大的推测　高田富佐雄　エリア评论　1975年161期
问题与研究：毛泽东、中共、路线、文化大革命、群众路线　矢岛钧次　问题研究　1975年4卷10期
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机构的变迁　妙高寺龟马　问题与研究　1975年4卷12期
毛泽东战略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序　河野牧　军事史学　1975年10卷4期
农业合作化问题和毛泽东主义的起源——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演说　德田教之　亚洲经济　1975年16卷2期
关于《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的考察　佐佐木信彰　亚洲经济　1975年22卷3期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性质——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划时代的贡献　小野进　立命馆经济学　1975年24卷2期
毛泽东的游击战和孙子兵法　法学研究　1975年48卷6期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　户宽敏雄　进路　1976年12号
毛泽东的妇女观　中山媛弘　北九州大学外语部纪要　1976年28期
毛泽东思想与农民　加藤裕三　朝日亚洲评论　1976年28期
土地革命与毛泽东——1929～1930年红色根据地的土地斗争　天儿慧　一桥研究　1976年31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6年72期
背离毛的中国　加藤荣治　中国研究　1976年76期
再论毛泽东——“伟大的”独裁者之死　高木桂藏　革新　1976年76期
毛泽东思想和日本人民　新井宝雄　前进之路　1976年152期
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斗争　藤村俊郎　前进之路　1976年152期
毛泽东的死和中国的未来　高田富佐雄　エリア评论　1976年179期
毛泽东主席的遗迹　佐佐木更三　社会党月刊　1976年239期
回忆毛泽东　黑田寿男　社会党月刊　1976年239期
回忆毛泽东主席　冈田春夫　世界　1976年372期

毛泽东之死与中国　上别府亲志　主张与解说　1976年613期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战略和阶级斗争论——1955年前后接受斯大林理论　德田教之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6年1卷1期
毛泽东思想中的伦理革命和物质革命——“抓革命，促生产”　宇野重昭　现代思想　1976年4卷9期
蒋介石与毛泽东——大陆的两个先驱者（1—8）　川合贞吉　世界政经　1976年5卷1—8期
对毛以后的展望　中岛岭雄　世界政经　1976年5卷11期
乱世英雄乎？——评价毛泽东　山村文人　问题研究　1976年6卷3期
毛泽东的死和北京政变　高田官佐雄　日中　1976年6卷12期
毛泽东和鲁迅　小野信尔　诗与评论　1976年8卷4期
毛泽东的权力观和肃清的辩证法　三浦勉　现代之眼　1976年17卷7期
毛泽东思想集团和毛泽东的死　新岛淳良　现代之眼　1976年17卷11期
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矢吹晋　朝日杂志　1976年18卷39期
毛泽东的遗产　山岛仓民生　经济评论　1976年25卷11期
毛泽东的最后赌注　木田明彦　中央公论　1976年54卷6期
对毛以后时代的准备——毛主席中止会见，健康是最大理由　世界周报　1976年57卷26期
伟人毛主席死后的空白　世界周报　1976年57卷38期
新毛泽东论　村松英　中央公论　1976年91卷9期
毛泽东的变形　贝岛茂树　中央公论　1976年91卷11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新岛淳良　《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　创文社　1977年版
毛主义的对外政策设想（3）　ユス・ユルユフ他　新世界纪事　1977年1月（147期）
毛泽东思想与韩非子　新岛淳良　亚洲　1977年1月（1期）
传统思想中见到毛泽东与中国人　贝塚茂树　竹内实　亚洲　1977年1月1期
评林彪·毛泽东（上）　福岛洋子（解说）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7年1月

（下） 福岛洋子（解说） 尾崎庄太郎（译） 中国研究 1977年2月

毛主义的对外政策设想（4） ユス・ユルユフ他 新世界纪事 1977年2月（148期）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合 中岛岭雄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3月（3期）

毛泽东主义与苏联——理论与实践问题 木村明生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3月（3期）

毛泽东的幻想 铃木明 文艺春秋 1977年3月（3期）

毛泽东思想的兴衰及其历史性评价 今堀诚二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3月（3期）

评《毛泽东主义》 小林文男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3月（3期）

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 永野英身 现代之眼 1977年4月号

毛泽东死后留下了什么？ 藤井彰治 动向 1977年4月（1367期）

现代中国的领导人（1）——毛泽东的派系（上） 高田富佐雄 亚洲 1977年4月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的外交"来看 渡边俊彦 中国研究 1977年5月（81期）

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藤井满洲男 中国研究月报 1977年5月（351期）

毛主席、周总理与日中关系 三尺二郎 中国研究月报 1977年5月（351期）

毛泽东的过渡时期阶级间争论批判（一）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7年5月（81期）

（二）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7年7月（83期）

（三）高桥勇治 中国研究 1977年9月（85期）

毛泽东主义的去向——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吗？ 小杉修二 中国研究 1977年7月（83期）

《矛盾论》和现代中国法律 田中信行 中国研究月报 1977年7月

（353期）
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　伊藤一彦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7月（5期）
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7年7月（83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研究（一）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7年8月（1146期）
（二）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7年9月（1147期）
（三）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7年10月（1148期）
（四）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7年11月（1149期）
（五）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7年12月（1150期）
（六）上别府亲志　外交时报　1978年3月（1153期）
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补遗）　尾崎庄太郎　中国研究　1977年8月（84期）
中国革命史的再现——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西园寺一晃　朝日亚洲评论　1977年9月（85期）
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　藤井满洲男　中国研究月报　1977年9月
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书呆子”论的源流　大川隆明　中国研究　1977年9月
中国现时情况下的毛泽东主义　ヴュ・テヘレソ　新世界纪事　1977年10月（156期）
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　宇野重昭　亚洲研究　1977年10月（24卷3期）
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石井明　亚洲研究　1977年10月（24卷3期）
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　姬田光義　亚洲经济　1977年11月（18卷11期）
中国的政治的虚象与实象（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研究　石

川贤作　中国研究　1977年11月（86期）

（之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研究　石川贤作　中国研究　1978年1月

查田运动与毛泽东——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毛泽东路线　宫坂宏　社会科学年报　1977年11期

教育史中的毛泽东——《中国大学史研究》笔记　斋藤秋男　社会科学年报　1977年1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下的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文版发行之际　ヘルムト・マルテン著、相浦果监议　亚洲季刊　1977年10月（9卷3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意义——中国当前报刊上见到的中国情况（4）矢岛钧次，小贯节子　改革者　1977年12月（213期）

现代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思想》的命运与新政权的前途　野村浩一　世界　1977年12月（385期）

"继续革命论"的建立过程　迁康吾　亚洲经济　1977年12月（18卷12期）

从所谓"社会主义外交"看毛泽东与中国外交的转变　渡边俊彦　中国研究　1977年81期

毛泽东主义的前途——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吗？　小杉修二　中国研究　1977年83期

邓的再复活和毛思想的命运　德田教之　革新　1977年86期

毛泽东死后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政治　宇野重昭　书斋之窗　1977年260期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藤井满洲男　中国研究　1977年351期

现代中国的相位——"毛泽东思想"的命运和新体制的前途　野村浩一　世界　1977年385期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华政权的政策　上别府亲志　主张与解说　1977年623期

华国锋体制和毛泽东思想的综合化　外交时报　1977年1149期

毛泽东主义和苏联——理论与实践　木村明生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卷3期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见　中岛岭雄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卷3

期
毛泽东思想和盛衰及其历史的评价　今堀诚二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7年1卷3期
毛泽东思想和韩非子——一脉相承的传统思维　新岛淳良　亚洲　1977年12卷1期
传统思想中见到的毛泽东和中国人　竹内实等　亚洲　1977年12卷1期
毛泽东战略思想中的胜利观的考察——平型关战斗　河野牧　军事史学　1977年13卷1期
毛泽东的幻想　铃木明　文艺春秋　1977年55卷3期
处于社会主义建设转折点上的毛泽东思想　杉野明夫　经济学杂志　1977年77卷4、5期
统一与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设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天儿慧　一桥论从　1977年78卷3期
由毛、周二者的葬仪所见的爱与憎　松井耶依　中央公论　1977年92卷3期
评《毛泽东1917——1929年文件》　北村稔　亚洲季刊　1978年4月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六）——在长征中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若松重吾　军事研究　1978年10月
打破"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　辛　世界周报　1978年9月12日
打破"毛泽东不犯错误"的神话　辛　中国研究　1978年11月
毛泽东神话的演变——继续革命理论在华国锋政权下的转变　德田教之　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　1978年4—6月
共产国际曾高度评价毛泽东　重木宣人　亚洲季刊　1978年2期　《苏联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最新的中国现代史资料》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野村浩一　《毛泽东》　东京讲谈社　1978年版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宇野重昭　《中国共产党史绪论》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柳田谦十郎　《毛泽东研究》　日中出版社1978年版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继承与发展　新岛淳良　《我的毛泽东研究》　日中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现政权和毛泽东的遗产　S·R·施拉姆　亚洲时报　1979年2期

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藏原惟人　科学与思想　1979年33期田中祥之　中国研究　1981年7、8月

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　今堀诚二　现代与思想　1979年35期

延安时代与毛泽东路线的确立　德田教之　《中国现代史》　1981年版中国的新生和毛泽东主义（上、下）　田中祥之　中国研究　1981年7、8月

毛泽东执政的轨迹　阪木楠彦　中国研究　1983年1卷12期

朝　文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批判——兼评中国哲学的立场　金忠烈　亚细亚研究　1979年2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共的现代化　金乐熙　政治文化　1979年10期

毛泽东思想地位的下降及其方向　罗昌柱　北韩　1980年11期

毛泽东的刺客（上、下）　政治文化　1982年4、5期

"毛泽东主义"今昔　郑钟旭　新东亚　1982年5期

毛泽东主义走过的道路　孔冀斗　国际问题　1982年5期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　丁世铉　新东亚　1982年10期

俄　文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　曼努意斯基　《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8月　解放　杂志1946年3期

毛泽东　A·史特朗　文学报　1947年10月10日

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真理报　编辑部　1950年12月18日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　伏尔科夫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1年74期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尤金　真理报　1952年8月26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B·米赫耶夫　共产党人　1953年14期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四卷　M·哈尔拉莫夫　真理报　1953年12月23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A·阿列克山德洛夫　共产党人　1953年14期

毛泽东选集　M·米丁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4年2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F·叶费莫夫 共产党人 1954年1期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戴着马克思外壳的民族内容 A·鲁采夫 共产党人 1964年12期
毛泽东 罗森塔尔·尤金 《简明哲学辞典》 1939年初版 译本据1955年俄文版译出，1958年出版
毛的假社会主义 V·G·格尔布拉斯 1968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不加伪装的假革命者 真理报 1970年5月18日
毛泽东哲学观点评价 M·L·阿尔泰斯基 1971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的经济"理论" E·卡巴森 1974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编辑部文章 远东问题 1977年4期
北京反社会主义政策演变的新阶段以及同毛主义斗争的任务 远东问题 1977年4期
对毛政权的解剖 T·C·奥斯洛莫夫 远东问题 1977年4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条件下的毛主义 B·N·拉列夫 苏联历史问题 1977年7期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O·萨贝娣 苏维埃拉脱维亚共产党人 1977年10期
今日中国：外表的变化"第二次解放"或"非毛化"的神话 K·贝鲁奇 立陶宛共产党人 1977年12期
毛主义理论的实践中的军队 Г·莫斯柯 军事历史杂志 1977年12期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O·萨贝梯 共产党人 1977年12期
毛主义在非洲的自我暴露 Ю·阿利莫夫等 共产党人 1977年14期
毛主义的自我暴露 Г·C·尼古拉叶夫 远东问题 1978年1期
毛主义危机的新阶段 M·米德维杰夫 政治自修 1978年2期
毛主义者的外交战略 B·A·克利夫乔夫 远东问题 1978年2期
没有毛泽东的毛主义（本刊"圆桌会议"） 编辑部文章 远东问题 1978年2期
评"毛选"五卷出版 B·Г·格利勃拉斯 工人阶级与当今世界 1978年2期
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前的变化 A·П·布罗基 远东问题 1978年3期
北京的战争与和平观 Г·阿帕利 斯普特尼克 1978年10期

"三个世界理论"的沙文主义内核 B·纳米特基夫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 1978年11期

毛主义"三个世界理论"的实质 共产党人 1978年17期

毛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扩张本质 B·费奥克斯基托夫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1979年6期

毛主义和毛的继承人 N·康斯坦丁诺夫 1979 进步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反毛运动 B·拉萨列夫 共产党人 1980年8期

毛以后的毛主义 希尔拉斯基 1980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毛泽东：一幅思想和心理的画像 F·伯拉茨基 1980 进步出版社

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敌人 远东问题 1981年4期

美国中国学对毛主义某些社会心理概念的论述 E·B·亚基莫夫 远东问题 1981年4期

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 B·希基哈密诺夫 远东 1981年11期

关于中国共产党内围绕"毛泽东思想"的争论 工人阶级与当今世界 1982年3期

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B·H·阿基莫夫等 远东问题 1984年2期

中国革命的三十五年 C·Γ·有尔科夫 远东问题 1984年8期

港 澳

从《论十大关系》看中国政治前途 陈祖涵 七十年代 1977年4期

试论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作用 陈瑜 七十年代 1977年4期

抓毛泽东思想的四个原则 朱养民 七十年代 1977年6期

阅读《毛选》五卷的一些线索 梁学初 七十年代 1977年7期

毛泽东去世一周年 余从哲 七十年代 1977年9期

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 斯威齐（美） 七十年代 1977年9期

回忆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的时候 李振翩 七十年代 1977年9期

与毛泽东的会见 尼克松（美） 七十年代 1978年8期

打破毛泽东永不会错的神话 齐辛 七十年代 1978年8期

中共为何要发表毛泽东1962年的讲话？ 吕桦 广角镜 1978年70期

从对毛的神化解放出来 周迅 广角镜 1978年74期

毛泽东的家庭悲剧 陈芝芬 争鸣 1979年4期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政治关系　王家新　争鸣　1979年17期
杨献珍、毛泽东有什么分歧——"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　杜烽
争鸣　1979年21期
评毛泽东的文艺观　怀冰　争鸣　1979年26期
从《实践论》看贬毛运动　朱新民　综合月刊　1979年122期
毛泽东的人格模式与行为法则　朱新民　东亚季刊　1979年10卷3期
"黑五类"出身的毛泽东（上、下）　郑学稼　自由谈　1979年30卷1、2期
毛泽东论点逐个评——必须批判"两家"论　庐中坚　争鸣　1980年31期
毛泽东思想是容许批评的　王若水　争鸣　1980年31期
毛泽东、铁托的政治差异——论铁托和毛泽东之二　庐中坚　争鸣　1980年33期
毛泽东斯大林功过比较初论　刘思凤　争鸣　1980年33期
毛泽东、铁托、领导作风——论铁托和毛泽东之三　庐中坚　争鸣　1980年34期
康生与毛泽东　杜烽　争鸣　1980年34期
毛、刘的最后一次会面　柳萤　争鸣　1980年36期
评毛泽东和文艺批评标准　怀冰　争鸣　1980年36期
毛泽东论点逐个评——"矫枉必须过正"是极左理论　蒙仁　争鸣　1980年38期
用"毛泽东思想"批"毛泽东的思想"　符聪　争鸣　1981年39期
从诗词看毛泽东的"形象"　西门东（新加坡）争鸣　1981年40期
不能曲解毛泽东诗词——与西门东先生商榷　关塞秋　争鸣　19
毛泽东诗词必须重新评价　牛虻　争鸣　1981年41期
驳毛泽东的"舆论一律"　谢重齐　争鸣　1981年41期
大跃进与不断革命　杨君实　抖擞　1981年45期
不必为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粉饰——由诗词中的毛泽东形象说起　方展　争鸣　1981年46期
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怀冰　争鸣　1981年47期
论"坚持毛泽东思想"——四评"四个坚持"　温辉　争鸣　1981年48期
毛泽东的"十大关系"和赵紫阳的"十项方针"　熊达　中报月刊　1982

年 1 期
略谈毛泽东的知行观——和熊达先生商榷　辛非　中报月刊　1982年 3 期
再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翁松燃　明报月刊　1982年 4 期
想起毛主席不亦快哉！　卢因　明报月刊　1982年 4 期
毛泽东的宪法思想　金思恺　明报月刊　1982年 5 期
社会革命与乌托邦主义　杨君实　抖擞　1982年49期
学习毛主席文艺讲话　陈忠　展望　1982年490期
毛泽东思想与“自由化”　王若民　展望　1982年492期
“新经济政策”与阶级斗争　杨君实　抖擞　1983年52期
再论蒋介石与毛泽东　范树奚　展望　1983年501期
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谢扶雅　展望　1983年507期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华羊　中报月刊　1984年 7 期
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　鲁凡之　中报月刊　1984年12期

结 束 语

从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从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影响，特别从世界各国对毛泽东崇敬和信仰来看，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早已超出中国，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与世界的联系交往还远远不够，因此，总结国外研究的成果，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是我国理论界应当继续努力的。

毛泽东在世界的影响，决不限于其哲学思想，他的影响是全面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广泛地被世界人们研究。我们以后将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各方面情况加以反映，努力与世界的研究进行交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属于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由于时间匆忙，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搜集的资料还不全面。诚恳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共同努力，把我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推向世界，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更发扬光大。这是中国理论界光荣的历史任务。

现在，国际格局都面临着新的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艰巨伟大的事业，现实和将来都需要战胜许多困难险阻，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需要总结新经验，需要吸取世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指导我们的新的实践，迎接国内国际的新的挑战。

本书的酝酿时间较长，是在原来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我们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受益匪浅。同时，感谢中

央党校出版社有关同志对此书的关注与热心支持，使之能在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付梓。

由于成书时间较长（从1990年到1992年），集中研究不够，其中仍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诚恳希望毛泽东研究领域和热心读者对此书给予评说、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毛泽东百年诞辰，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性之光辉煌与世。

作　者

1993年7月于北京





ISBN 7—5035—0794—2
A · 33　　定价：7.20元

